房龙文集

Hendrik

荷兰共和国的衰亡

Willem

朱子仪　译



van Loon

北京出版社

房龙文集



荷兰共和国的衰亡

朱子仪 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兰共和国的衰亡/[美]房龙著；朱子仪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房龙文集)
ISBN 7-200-04240-4

Ⅰ．荷… Ⅱ．①房… ②朱… Ⅲ．荷兰-近代史-研究 Ⅳ．K5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74941号

房龙文集
荷兰共和国的衰亡
HELAN GONGHEGUO DE SHUAI WANG
[美] 房龙 著
朱子仪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10 000字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200-04240-4
K·442 定价：18.00元



向无知与偏执挑战

钱满素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 年—1944 年）一生中出版了三十余种书籍，单枪匹马地将人类各方面的历史几乎全都复述一遍。如此浩大的工程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真令人钦佩他以有涯之生向无涯之知挑战的勇气。

房龙不是深奥的理论家，但却未必没有自己的体系与思想。他的著述包括《人的解放》（即《宽容》）《人类的故事》《文明的开端》《奇迹与人》《圣经的故事》《发明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选择的题目基本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

知识就是力量，但无知同样也是力量。当千百万民众被无知与偏执驱使时，他们干的蠢事还少吗？虽然人类的经验与思索已经记录在案，本可引以为戒，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在重复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诸多原因中，知识的不够普及至少也是一种，有多少人能天天坐在图书馆中去研读人类的文字积累呢？理论玄妙得高不可攀，历史悠久得令人生畏，知识浩瀚得一望无

边，理论注定是极少数人的专利。

但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少数人掌握的知识若不能为大众所分享，就不会有人民的觉醒和人类的进步。鲁迅笔下，作为精英的夏瑜所能奉献给华老栓之辈的，只是他被砍头时流下的鲜血。一个民族要孕育少数精英容易，要提高整体素质却很难。普及工作是艰巨而伟大的，是一项民族和人类赖以发展的事业。房龙着眼于此，一生致力于此。他以生动简洁的语言，自配插图，将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所应具备的科学人文知识复述得精彩扼要，其中还不时闪烁着他的真知灼见。在普及现代知识的同时，他也普及了现代意识。

人们往往一辈子钻在本行的微观世界里，忽略和疏离了宏观世界，因而失去对世界和自己的平衡感觉，甚至陷入极端。阅读房龙的著作，听听他从“我碰巧属于哺乳动物种族”的角度来叙述的宇宙、人类的故事，也许可以重新摆正各种事物在心目中的合适位置，保持自己与世界的正常联系。

房龙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虽然作为一个过了二十岁才移居美国的荷兰人，他不可避免地更多写到他熟悉的西方，也更钟情于他的故国，但他决不是西方中心论者。他一直在努力从人类的眼光来观察和叙述，超越地区的、宗教的、党派的和种族的偏见。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包括那种为了给本民族增光而歪曲事实的超爱国主义。房龙的这种观点发展到最成熟的形式就是他的《宽容》一书——宽容，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他最杰出的贡献。这本书另一个版本的名字叫《人的解放》。

人类从一种野蛮生物开始，为摆脱野蛮，必然经历一个野蛮的过程。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是正常状态。统治人类原始社会的也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也是为

此奋斗争夺的历史。每个群体为求生存，都必须制定许多强制和禁忌，对与自己不同的异类保持高度的怀疑、警惕和排斥。所以房龙说，不宽容不过是人的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宽容与专横之争贯穿人类的历史，今天的异教徒明天成了正统，又马上成为其他持异见者的死敌。耶稣以身殉道，提倡爱人如己，四海之内皆兄弟，突破了犹太教的狭隘与偏执，但基督教得势后，照样设立自己的宗教法庭，大肆迫害异端。红衣主教们还时不时地增扩“禁书目录”，妄图阻止求知的欲望和知识的传播。种族间、阶级间、政治派别间、宗教团体间互不相容，从一种不宽容到另一种不宽容，厮杀争斗了多少个世纪。悲壮也罢，惨烈也罢，这一切都不是无端而生，而是人类走向文明所不得不经历的血与剑的洗礼。幸运的是，当其他动物永远只能停留在丛林原则时，智慧的人类毕竟慢慢悟出了宽容的道理，提出以理解、关爱和宽容来取代偏执、仇恨和迫害。

房龙说得好，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不宽容的根子就在于自诩正确的思维，在自以为惟一正确和永远正确的人看来，宽容就是宽容错误和邪恶，就是道德的沦丧。有史以来，所有的不宽容都是以“上帝”或“真理”的名义在向“谬误”开战，真理是惟一的，而且只有自己掌握了它。文艺复兴迎来了观念的变化，怀疑和探索的精神抬头了。随之无休止的宗教战争终于使一些人明白，谁又能独占《圣经》的含义呢？真理不能被垄断，灵魂拯救的道路也许不止一条，对信仰和思想的最后评判权还是留给上帝吧，政府无权干涉宗教，让所有的信念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房龙注意到，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与独立思考程度成正比。在历史上，贸易所带来的平等和交流往往使这些地区和国家

的人民最容易接受宽容的道理。宽容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当然首先是指官方的宽容。但是，公众和个人的宽容是官方宽容的社会基础，很难想象由宽容的个人所组成的宽容的大众会产生或容忍一个不宽容的官方。说到底，提高国民素质是建立一个宽容社会的根本。

二次大战中，房龙主张的民主、理性、宽容与法西斯的专制、强暴、黑暗势不两立，他积极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在电台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为批驳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写下了针锋相对的《我们的奋斗》。令他愤慨的是，巫师们还在搅拌那装满仇恨的大锅，“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不宽容比中世纪又胜一筹”。对当时通行于世的一些基本准则，他深感怀疑忧虑，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启发人们思考：在人类文明各种可能的形式中，它们是否是最佳选择？房龙的所作所为正像他自己描绘过的伊拉斯谟：“他像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造理智和知识的堤坝，惨淡地希望能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房龙的著作在出版当时，便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产生了相当影响。久违了近半个世纪，房龙的著作又被国人重新发现，陆续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当然，书中某些见解囿于时代局限而留下的偏颇，今天的读者自会辨识。北京出版社有感于房龙的文化意义，为便利读者，将他的主要作品汇编成集，特邀有翻译经验的高校教师认真翻译。编译者态度严谨，力求译文质高味浓。我相信，他们的努力将不负读者厚望。

1998年11月

（钱满素女士，1946年生于上海，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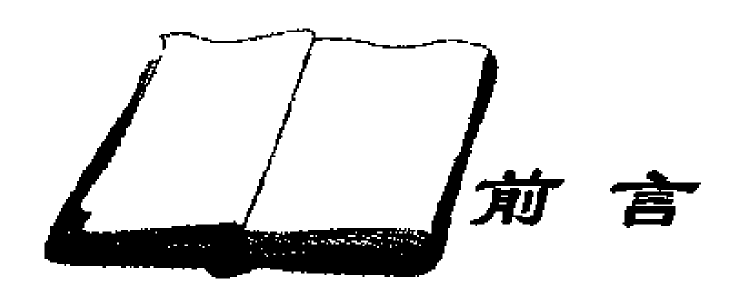
“最好的历史记载就如同运用伦勃朗的技巧：它将一束耀眼的光线投射在某些选择出来的因素上面，投射在那些最完美、最重大的因素上面，而将其余的一切都留在阴影里和看不见的地方。”

比斯肯·许埃特[①]《伦勃朗的国家》

① 比斯肯·许埃特(1826—1886)：19世纪荷兰杰出的文艺评论家之一，所著17世纪荷兰文化史《伦勃朗的国家》是经典性著作。

目　录

前言 ……………………………………………………………(1)
1. 政坛风云变幻 …………………………………………………(5)
2. 经济和社会的盛衰 ……………………………………………(33)
3. 威廉四世 ………………………………………………………(79)
4. 安妮公主 ………………………………………………………(96)
5. 布伦瑞克公爵 …………………………………………………(106)
6. 美国独立战争 …………………………………………………(117)
7. 最后一次英国战争 ……………………………………………(144)
8. 爱国者党 ………………………………………………………(190)
9. 最后的岁月 ……………………………………………………(244)
尾声 ……………………………………………………………(260)
荷兰共和国与欧美政局(1579—1795)大事年表 …………(266)
译后记 …………………………………………………………(276)



前言

以下的对话非同寻常。

文艺守护神问作者在干些什么。

“写一部历史。”

“那不赖，很有益的事情。关于什么的历史?”

“关于荷兰共和国[①]的衰亡。”

“太棒了!莫特利[②]也写过的，我们需要用点新的眼光来看

---

① 荷兰共和国(1579—1795)：正式名称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也称尼德兰共和国，由尼德兰的荷兰、泽兰、乌得勒支、格尔德兰、奥弗赖塞尔、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7省组成，疆域约相当于今荷兰王国。17世纪为世界强国之一，曾夺得许多殖民地，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18世纪突然衰落。1795年由于国内发生革命和法国军队入侵而土崩瓦解。一般认为它衰落的原因是因长期进行战争而国力衰竭。房龙则有不同的看法。

② 莫特利(1814—1877)：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以所著《荷兰共和国的兴起》(1856)而驰名。

待这个问题。从一种现代的、崭新的观点出发——向我们展示荷兰人是如何……请等一等，我搞错了。你说的是‘荷兰共和国的衰亡’？而莫特利写的是它的‘兴起’。哎呀，我都不知道这个共和国衰亡了。”

对于绝大多数可敬的读者来说，似乎在每100位尚有兴趣提问的人当中，就有99个人自从那位杰出的美国历史学家（莫特利）不再继续写荷兰共和国的历史之日起，对荷兰共和国的传奇便印象模糊了。即使少数曾在学院里学过英国历史的人，他们也想不起身为玛丽王后[1]丈夫的某个奥伦治家族[2]的威廉，曾在麦考利勋爵[3]的著作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然而这位著名英国历史学家的过早去世，使问题变得无法确定了，威廉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和如何离开人世的，已无人知晓。

至于多数的学生，他们有关荷兰历史的知识之源因始于16世纪的英雄业绩而显得生气勃勃，随后的17世纪就不那么激情洋溢了，而到了18世纪便犹如走入了干旱的沙漠，他们的知识之源也就此枯竭。他们注意到如今那里存在一个荷兰王国这样的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在麦考利成名的威廉三世[4]时期与现代王国的建立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那就如同希腊中世纪的历史或中国的历史那样，成了令人胡乱猜想的题目。我的用

---

① 玛丽王后：即奥伦治的玛丽，英王查理一世之女，1641年5月2日与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威廉二世结婚。

② 奥伦治家族：一个贵族世家。名称来自中世纪古普罗旺斯的奥伦治公国。这个世家在尼德兰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1544年，拿骚伯爵成为奥伦治亲王，成为威廉一世。至1890年，奥伦治王室家族绝嗣。

③ 麦考利勋爵（1800—1859）：英国政治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他因所著《英国史》获得不朽的声誉。

④ 威廉三世（1817—1890）：尼德兰国王和卢森堡大公。

意就是为美国读者起见，填补他们知识系统中缺少的一环。

我的荷兰同胞们则对这个题目有着完备的知识，至少他们是理应如此的。在勃洛克教授的《荷兰人的历史》这部出色的18世纪通史之后，有科伦伯兰德博士的专门研究，按我们不甚完善的人类标准看来，他的著作是近乎完美的。

要写一部这样范围的书，本书的作者既没有干劲，也没有耐心和能力。他只能立志于写一篇有关导致老荷兰共和国灭亡的主要事件的短篇故事，并寄希望于有一天，一位更有能力的作家将写下这部值得一写的灭亡史。

因此，这本书并不故作姿态地要提供一幅完美无缺的图景，它仅是草草的一幅速写。作者诚心诚意地想使它尽可能的简短。它已尽力删除了能够舍弃的一切，而给读者留下了印象深刻的内容。

总的来说，日期和人名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并无意义，因此它们只在必要时才被提及。完备的注释[①]将告诉那些更喜欢追根究底的读者朋友，他们可以到何处寻找作者建立其观点的依据。

留待解决的还有文字风格的问题，甚至于正确使用英文的问题。

在作者的大半生中，他对被称作“英文”的那稀奇古怪组合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并不熟悉。好在有位好心的朋友已逐页清除了原稿中明显不合文法的地方。

至于书中仍然留存的程度不同的谬误，作者只有请求读者的宽恕和原谅了。

但在他结束这番唠叨之前，允许他再说几句话。这部带有

① 原书有大量的注释，详细说明有关资料的出处。所涉及的文献多为荷兰文，这里没有译出。

这样那样欠缺的作品，假如没有众多的好心人友善的鼓励和支持是无法完成的，而这样的鼓励和支持作者本无资格获得。由于印刷在这个国家是很昂贵的，他不打算详详细细地列出他们的名字。不过此时正需要鼓起勇气，因为从当今文学和公开出版物中，你们已确知你们这友善的国家正走向政体分裂和经济崩溃。

由于这里的人对待自己国土上的外乡人是如此友善，读者对待他们最卑微的仆人——作家也是如此。主对这么一个国家自有其最特别的恩赐。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1912年10月31日于新罕布什尔州都柏林凯伯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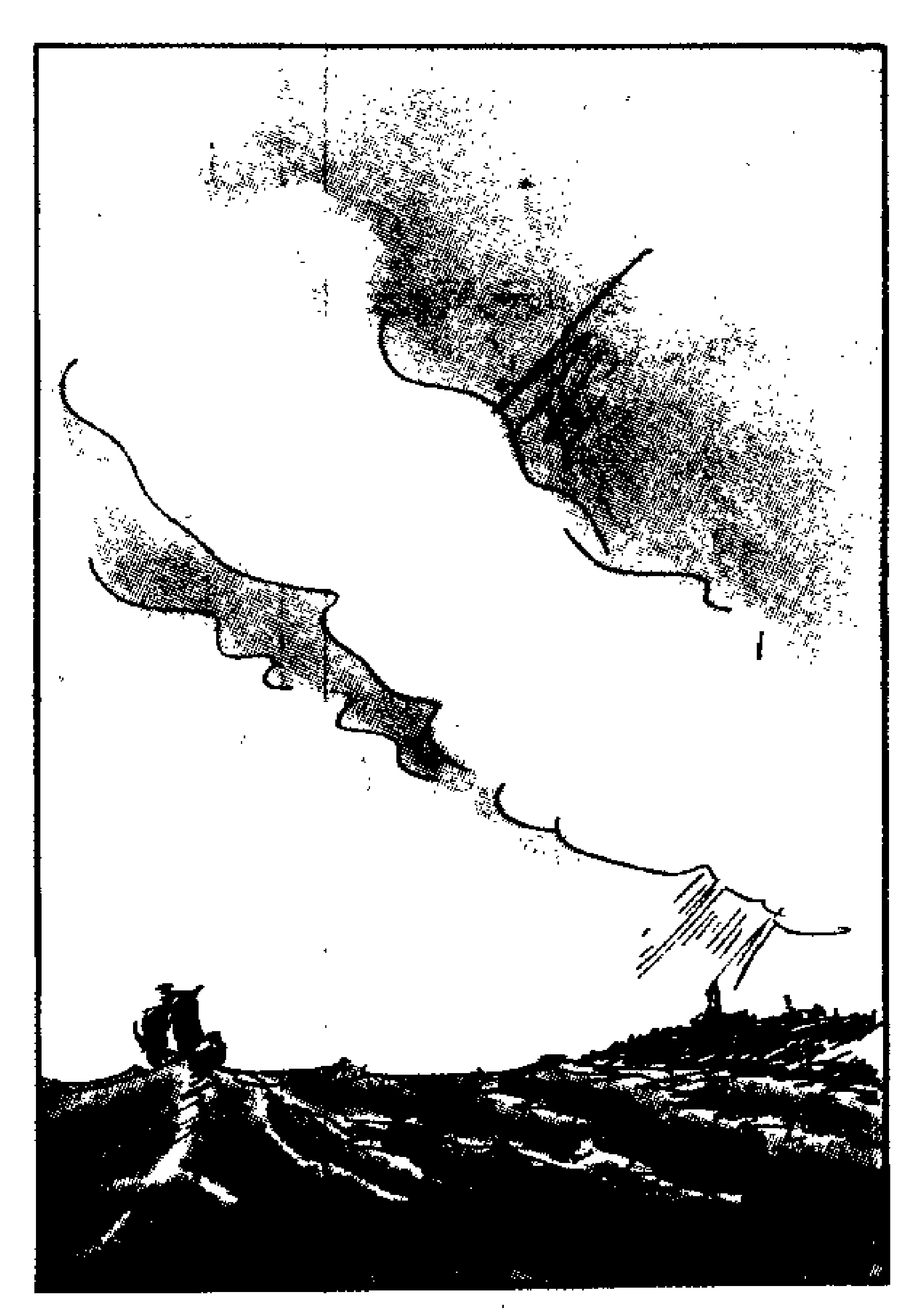
1 政坛风云变幻

基督纪年1794年12月，法国革命军跨越布拉班特省[1]冰冻的河流，对荷兰共和国虎视眈眈。1795年1月初，他们越过马斯河和瓦尔河攻入了荷兰边界。

法军所到之处，城镇和乡村相继陷落，不多的几个要塞也不发一枪一弹就向法军投降了。1月16日，固若金汤的乌得勒支城[2]向入侵者敞开了大门。第二天夜里，国家议会在海牙召集会议，认为在这样的境况下，继续抵抗是不实际的，投降是惟一的选择。次日午夜，也就是1月18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最后一位世袭最高行政长官威廉五世，离开了他的国家逃往英国。几个星期以后，共和国就不复存在了。它的位置被“巴达维亚共和国”所取代，后者成为战胜国法国的政治上的从属国。于是，花了几个世纪倾力而建的事业，没有几天就遭到了毁灭。

① 布拉班特省：比利时中部一省。

② 乌得勒支：荷兰乌得勒支省的省会城市。



最后一位执政离开荷兰



法国人跨越冰冻的荷兰河流

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个结局并不令他们惊奇。要是有理由表示惊奇的话，倒是因为共和国竟勉力支撑了这么久这个事实。已有好多年了，它一直走在通向政治和经济破产的路上。但世人对共和国作为一个富有和管理得力的社会的敬重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使这个国家能在其事务无法正常进行之后仍能幸存。就像许多别的生意（事实上它差不多就是一家掺和一点政治观点的大商号），它靠过去的声誉生存，正当他们需要认清自己事业的真实境况时，却满足于无所事事的安逸生活，把精力都花在打发时间上面。

而此时有一股新兴的力量在欧洲崛起。这股力量既不尊崇世袭的特权也不敬重旧的传统，它随心所欲地安置自己的居所，并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去拯救它的近邻和世界，一般来说它不管别人是否需要这种拯救。

看啊，并未引起世人多大的震惊，这个历史悠久的共和国就土崩瓦解了！包括最高执政官在内的理事会为保全他们的生命而逃亡，股东们则让自己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组合。社会上的一般民众对以前的领导层是如此厌恶，以致他们欢呼国家的重建，齐声拥护新主人所许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新时代。

我们将在后面试着描述这一切如何能发生：曾经将欧洲的命运握在手中的强大的共和国如何变成了“吃利息者”的不求进取的国度，给腐败的肌体注入新的血液、新的能量和活力的企图如何因被称作人民领袖的人士的愚蠢而徒劳无功，以及投靠法国是如何完成的——绝大多数的公民似乎更偏向于摆脱旧的国家体制而赢得“自主”。

尼德兰七省联盟共和国在欧洲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以前也存在过其他的共和国，从很早以前的雅典和斯巴达到威尼斯和瑞士诸州同盟的时代。然而以前从未有过一个共和国完全由第三等级（即中产阶级）创立和维持。这个由来使共和国自始至

终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共和国的政府确实不久就发展为寡头独裁,甚至在它的黄金时期一般来说也无真正的民主可言。但基本的事实却是这个共和国直到它的最后时刻依然忠实于其原本的角色,统治这个国家的寡头独裁并未演变为确定的贵族统治。

在中世纪的早期和晚期，后来结为联盟的不同的省份，并未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重视。这些省份具有明显的优越条件，由于它们处于大德意志帝国的疆域内，因而省掉了不少中世纪时德国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争斗的烦扰。但就像当时的整个欧洲，低地国家逐渐分成相当多的公国、郡县和主教管区，这片土地见证了许多城市的建立，虽说这些城市并未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但作为当地统治者管辖区的中心，它们已具有了一些实力和影响。它们孤立的地位，以及许多大河和内陆海将它们与内地分割开，使其居民有了某种程度的安全感，也使他们习惯于水上的生活。与此同时，任何天然物产的绝对缺乏迫使剩余的人口去寻觅不同于中世纪人类从事的主要职业（务农）的其他职业。他们找到的职业是经商，即用他们的小船从欧洲大陆将货物运到英格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到了 13 世纪，当鲱鱼离开波罗的海来到了北海，他们也开始从事渔业。中世纪时，南方地区则要繁荣许多。早在 12 世纪，布吕赫城[①]扮演着今天伦敦或纽约所扮演的角色。北方地区大小形状与现在的荷兰王国一致，那里的生活还算过得去，但也仅此而已。那里有一点产业，但它们只能满足本地的消费。

11 世纪以后的神圣罗马帝国[②]时期，这些各不相同的小邦

① 布吕赫城：今比利时西佛兰德省省会。15 世纪由于茨文河口湾发生淤塞，该城商业衰落。

② 神圣罗马帝国：公元 8 世纪至 1806 年的传统欧洲政治组织。800 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被封授为罗马帝国皇帝。从 15 世纪开始，皇帝称号实际上由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王室世袭。

国对自己正式属于谁毫无兴趣。12世纪中，它们开始因语言问题与它们的邻居大国分离开。这种分离无法造就一位共同的君主，而让每个封建小领主自己设法自救。幸运的是，对于这个国家而言，领主的自救措施并未像封建主义时期通常的情况那样与其臣民的意愿截然相反。这个国家不利于造就小暴君。自由总是滞留在大洋的沿岸。生活在蒂罗尔[1]或德国中部的农民在受到主人的虐待时，惟有去往下一个郡县，在那里他们可能发现雇主比自己家乡的还坏。而在一个四周开放、四面环水的国家，臣民若有不满可以驾船离去，到附近城市的地界内开始新的生活。这些城市是商业贸易赢得适度繁荣的产物，它们不止是防止某个小君主掉脑袋的堡垒。因此，小君主应该维护它们的和平，小心谨慎地对待其忠实的臣民。

缺乏世界其他地方的那种农业生活，使这个国家较早采用经济制度成为可能，就总体而言给国家带来了利益。封建领主能存在下去只是因为有封建制度在支持他，而生活中的经济制度战胜封建制度之时，封建领主便开始挨饿了。不让自己挨饿的惟一方式就是得到现钱，而不是奶油、蜂蜡和家畜什么的。现钱在农民中是找不到的，许多农民整个一生都没见过一个硬币。城市的高墙内才能找到现钱，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到它。一种方式是占领城市盗掠城内的财物。另一种方式是向城市要钱，为了有一天一无所有时可以用来支付。这后一种方式更为有利。既然要对方给钱，自己也必须付出代价，封建领主为了满足城市方面的要求，逐渐卖掉了自己的许多权利和特权，当时签名画押放进保险箱，将保险箱置于市政厅的高楼上。在不多的几个未遭火灾的市政厅里，我们仍能见到这些文件。而通过这些文件，我们也弄明白了为数不少的老德意志自

① 蒂罗尔：奥地利西部的一个州。

由之魂是如何避免绝种的。

有关中世纪北方低地国家详尽的历史，可能只有专家才感兴趣。对于一般人而言，它只意味着丹麦或卡尔马联合[①]的中世纪史，并不存在实质上的荷兰文明，也不存在建筑或音乐的荷兰学派。至于绘画，也没多少可谈的，除非在南方，在那里佛兰德斯画派[②]吸引了北方所有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为较高的报酬和更为适宜的文明所吸引。

到了15世纪中叶，南方的情况依然如故。北方则是偏远落后的乡村地区，那里的人们对宗教问题产生了兴趣，开始完全照搬在文明世界早已过时的清教徒兄弟会的行为方式。

15世纪中，北方只是走着构成欧洲政治地图的其他成百上千个小国家所走的同样的道路。一个有法国血统的强有力的家族怀着复兴的野心出现了。这种野心是从查理曼大帝的孙子洛泰尔那里继承来的。这个家族开始对位于默兹河和北海之间的各自为政的小公国施展收买、偷盗或联姻的手段。在比一个世纪略多的时间内，他们获得了这些小国中的大多数，并开始了逐步合并的过程。就每个小公国、郡县或别的什么而言，它们依然保留其形状、形式和地方政府，但勃艮第[③]公爵成为它们共同的领袖，取代了以前的公爵、伯爵或领主，并通过指定的代理人——总督或执政[④]统治它们。

---

① 卡尔马联合：1397年6月在瑞典卡尔马城结成的斯堪的纳维亚联盟，挪威、瑞典和丹麦三国共戴一个君王。

② 佛兰德斯画派：指佛兰德斯15至17世纪初期的绘画派别，以生气勃勃的写实主义和高超的技术造诣而著称。

③ 勃艮第：法国中部一个历史上的省名。勃艮第人于公元5世纪建立强大王国，后被法兰克人灭亡。15世纪勃艮第家族东山再起，疆土大为扩大。

④ 执政：原指国王在某一省份的代理人，后来在荷兰共和国时期沿用来称呼共和国最高行政长官。

到了16世纪末，勃艮第家族的宏伟计划因后裔绝嗣而破产，继承其事业的是哈布斯堡家族[①]。这个家族来自属二等贵族的一个小小的瑞士家族，此时却使自己登上了欧洲极为显赫的位置。一个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身兼德国皇帝、西班牙国王和匈牙利国王，以及尼德兰所有小国和意大利很多小国的至高无上的君主。

要是我们用现代的词汇来转述其地位，我们会说16世纪的哈布斯堡家族拥有船舶托拉斯、食品托拉斯和铁路托拉斯的绝对股份。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向该家族支付贡税。如今，这个家族只是控制着奥地利和西班牙的股权。

在16世纪的前半时期，这个家庭的首脑有着非凡的能量。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无疑会成功地将荷兰的属地拓展到一个辽阔和统一的荷兰王国可能具有的疆域——相当于将今天的荷兰和比利时加以合并。而在前50年里，同样的境况却使德国延缓了中心化的进程，也使荷兰那些小国无法持续它们正常的发展。

阻碍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宗教改革。

低地国家的居民历来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不仅如此，他们对宗教方面的事情怀有狂热和清教徒似的兴趣。天主教会与德国皇帝既在政治上也在宗教事务上争夺霸权，前者越来越变成一个世俗的机构而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特点。按16世纪一般拉丁人的想法，教会是一种公共俱乐部，教徒自然而然地从属于它，因为教会给你施洗礼、将你埋葬和保存你的婚姻记录，但你日常生活中的其他适当的追求无须受到妨碍。你对其既定的教规保持适度的兴趣，在特定的时候履行某种程序，而不必

① 哈布斯堡家族：欧洲著名王室家族，建立欧洲最大的王朝之一——哈布斯堡王朝，又称奥地利王朝。16世纪末哈布斯堡王室达到权力的顶峰。

做更多的事情。但在北方就不同了，在一个低于海平面的国家的抑郁和严肃的气氛里，宗教的严肃性总是达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拉丁民族的懒散、浅薄的想法令忧郁和吃苦耐劳的荷兰人极度厌恶。荷兰人严肃地对待宗教，因为他们也严肃地对待生活中的任何事情。

在这些小国家里，什么事都不能随随便便地过去（如今这种情况依然如故），不管是灵魂方面的事情还是肉体方面的事情。人们对此无能为力，他们天生就是如此。各个小国没有必要再对相邻国家的袭击作无休止的防御。对立郡县之间的谋杀和抢劫被严令制止。小国之间不再有挑起战争的必要，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同属一个主人。城市迅速发展，其居民的财富与以往相比是失去比例的增长。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有更多的闲暇献身于研究。自从印刷技术带来了生活稍富裕的人都买得起的书籍，读书就变得非常普遍了。但人们读的书也是种类单一的，绝大多数是神学著作。凡显示出不同一般的才能的人都有好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学堂可进。

那种继承下来的不满足于表面含义、想获得事物真正的内在价值的欲望，使这些人在那个时代重大的神学问题讨论中倾注了极其严肃和强烈的兴趣。发生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的精神上的巨变对于当时人心灵的作用，可能就如同我们这个世纪经济领域的大变革对我们物质生活的作用。人们感觉他们的精神生活不能再走原有的路，就如同今天我们感觉那种让大多数人挨饿、少数人也不见得就过得更好的经济制度有点不对头。

在 15 世纪，人们一而再地想改革教会。这些企图无一例外都彻底失败了。在 16 世纪的前半段，他们因德国人的作为而重新点燃了热情之火。渐渐地，事情与他们个人的意志和群体的愿望多有违背，这些新的改革者便被迫离开自己教会的信徒而另立门户。

我们易于认为宗教改革是一次突然的剧变，今天这样，明天就那样了。而在德国，宗教改革在最终确定无疑的爆发之前酝酿的时间超过一个世纪。在低地国家，原本意义不明确的运动在明确显示其特定结果之前也用了差不多的时间。至少有半个世纪，似乎很有可能达成和解。但偏巧低地国家共同的统治者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他是从其父亲查理五世那里继承来这片土地的。而他父亲又是从其祖母勃艮第家族的玛丽[①]那里继承来的。莫特利先生曾非常公正地对菲利普国王的性格作了评述。有充分理由表明，换一个不那么过分心胸狭隘、不那么顽固不化的统治者，就能赢得避免宗教改革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政治运动又演变为一场真正叛乱的绝对机会。革命很少是由全体民众中的大多数引起的。民众中的大多数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极端保守的。但在某个时刻，当外在条件到了使多数人被迫放弃漠不关心的态度、自愿给少数人无声支持的地步，革命便总能成功。这场变革也是如此，就像克伦威尔时期的英格兰、1775 至 1783 年的美洲以及大革命时期的法国。

由于多种境况（既有宗教性质的、也有政治性质的）的综合作用，尼德兰的民众被迫进行公开的叛乱。西班牙统治者想将一种政治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虽说这种政治制度西班牙人尚能容忍，但鉴于荷兰人的天性，要他们适应这种政治制度还不如把满族人的政体强加给美洲人。荷兰人的天性属旧时德国人的、利己主义的那种，他们本能地拒绝任何将君主专制的集体化制度强加到他们头上的企图。

这块土地上的旧贵族出于对剥夺他们以往权利和先前特权的政治改革的不满，成为这场反对由西班牙国王引进的宗教和

① 勃艮第家族的玛丽：勃艮第家族的女公爵(1477—1482 年在位)。

市政改革的意义不明的运动最早的领袖人物。然而不久贵族们就发现对这场反抗统治者的运动表示支持的主要来自中产阶级——来自城市居民。不能期望任何阶层的人为别人的利益而献身。贵族们从中产阶级那儿得不到什么，而从国王那儿却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因此贵族们不久就与他们合法的君王达成了谅解，恢复了他们原有的忠诚。那些城市则听天由命了。

北方的城市除了阿姆斯特丹，这时都热衷于新的信仰，不是马丁·路德的教义就是加尔文[1]的学说。在多年的反叛之后，这些城市打算在政治问题上妥协，承认他们的统治者有权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着手进行政治上的变革。但他们谁都明确地拒绝作出放弃新的宗教信仰的允诺。南方一些城市的居民因在极端的加尔文主义煽动者的手中遭受苦难而愿意作出妥协。他们正式回到过去的信仰并得到西班牙国王的宽恕，在此之后也受到了礼遇。但北方 7 省的城市不会这样做。他们坚持礼拜自由的要求。当这些要求被断然拒绝时，他们被迫继续斗争。要么他们不顾后果地继续斗争下去，要么就坐以待毙。

在为宗教自由而战的最初 20 年扮演重要角色的所有领袖人物中，只有一位杰出的人物始终保持对这七省事业的忠诚。这是一位地位显赫的德国亲王，他曾经很富有，但此时已一贫如洗。他名叫威廉，身份是拿骚·迪伦伯格伯爵。他因其更高的头衔奥伦治亲王而闻名于世。后世的人们称他为“沉默者”威廉[2]，但我们弄不清起这个绰号的由来。他的官方身份是西班牙国王在荷兰、泽兰和乌得勒支诸省的代理人，即执政。

---

① 加尔文(1509—1564)：法国神学家，16 世纪西欧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与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齐名。

② “沉默者”威廉（1533—1584）：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英雄。因有一次听法王亨利二世讲述把新教徒赶出尼德兰的计划时，虽大为震惊却缄口不提反对意见，从而获得“沉默者”的称号。

就性格而言，他具有菲利普国王所不具有的一切。他作为政治家和组织者的卓越才能以及身处逆境时所表现的机智和耐心，使他成为大变革的中心人物。他不像克伦威尔或华盛顿那样是杰出的军事领导人。作为一个将军，他的能力实在是非常平庸的。他也没在任何时候成为公认的联合反抗的正式领袖。当许多省份在继续作徒劳的抵抗时，他甚至没有参与。他只是三个省的行政首脑,他的工作成果完全是靠他人格的力量取得的。他自然且毫不费力地扮演自己的角色,逐渐成为共同反抗西班牙国王的理想的化身。没有谁比菲利普国王更了解他了,1579年,国王出大价钱和额外的奖金悬赏要取威廉的性命。

从 1575 至 1584 年的这段岁月里，威廉的个人生活可谓困难重重。他的健康状况很糟，还得应付欠债，被囚禁在西班牙的大儿子的去世令他痛苦万分。在上述情况下，他实在难以满足他那个大家庭的生活需求。他日复一日地忙于避免各个反叛省份之间的自相残杀，因为在与共同的敌人作战时，他们仍难以忘却彼此之间微不足道的嫉妒和不断发生的小误会。

幸亏他们的境况变得非常危险，以至于为了最终的事业，他们于 1579 年不得不捐弃前嫌，被迫订立防御联盟。这个联盟是 1579 年 1 月缔结的，被称为“乌得勒支同盟”，它成为建立尼德兰七省联盟共和国和后来的荷兰王国的基础。从那时起，7 个反叛省份在保留各自完全的自主权的同时，在团结一致对付外敌目的的促使下，他们行动起来变得步调一致了。

既然已走出了这一步，由这一行为引起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就相对容易理解了。1581 年，7 省的代理人郑重发誓放弃他们共同的君主——菲利普国王，声称他违背君臣之间达成的契约，竟然对臣民实施迫害，而他原本是应该以父爱和远见卓识去关怀他们。

君臣之间有契约约束的这条原则，一个世纪以后让英国人

利用来砍掉了统治者的脑袋,[1]再过 100 年又用作法国人和美国人的范例。愤怒的法国人对路易十六处以斩首,而美国人反叛乔治三世国王[2]则取得了成功。

既然他们以这种方式处置了一位统治者,现在共和国不得不去寻找另一位。由于当时还没有人想建立一个完全独立民主的国家,就像如今葡萄牙、巴拿马或中国相继建立的那种国家。荷兰和泽兰想要复兴旧时伯爵的封建特权,想使威廉成为各省的立宪伯爵。这一步骤不会太困难。荷兰前封建领主的实际权力一直为勃艮第王亲所控制,后又为西班牙国王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执政所掌握。但其他省份害怕荷兰省所拥有的雄厚财力,以及这种财力在联盟中所产生的影响。他们预见到荷兰的统治者也将成为联盟的统治者。他们的利己意识不赞成这种事情。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做了各种尝试在国外寻觅可能的统治者。

非利普国王因坚持悬赏 4 万荷兰盾谋杀威廉而使整个事情更加复杂化。1584 年 7 月 10 日,他的赏金终于有了得主。威廉在代尔夫特[3]他自己的家中遭谋害,奥伦治家族成为共和国立宪首脑的机会落空。因为威廉最大的儿子莫里斯虽继任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却缺乏他父亲作为一个政治家所有的优秀品质。让这位做事鲁莽的骑兵将领担任这个应具备超出常人的非凡的手腕、耐心和谨慎的职位是不可能的。

因此,莫里斯一直呆在前线,清除共和国边界内的西班牙人。而寻觅外国某位亲王当统治者的尝试仍在继续。然而这些尝试失败了,完全地失败了。渐渐地,这 7 个省远非本愿地只

---

① 指 1649 年,英国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敌人的罪名判处国王查理一世死刑。

② 指美国独立战争。

③ 代尔夫特:荷兰城市,临鹿特丹和海牙之间的斯希河。

好承认没有一位近邻愿意按照他们开出的条件成为他们的统治者。惟一的选择是他们着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

作为惟一的将各个省份相联系的纽带的“乌得勒支同盟”此时成了一种共同的政体。这种局面不仅出乎人们的意愿，而且显得毫不适宜。7省的三级会议[1]是旧秩序的主要残存形式，此时只好承担起自己国家直接的统治权，自己来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在我们的时代，民众行使国家的权力，但在16世纪，这样的民众还没有创造出来。他们还是人海茫茫、无形无序的群体。三级会议是惟一有形的代理人，因此他们担任了各省和联盟的领袖。

三级会议这样的组织差不多存在了两个世纪。它们原本是一种顾问委员会，在封建领主需要资金时接受咨询。它们最初是由来自神职人员和贵族的代理人组成。渐渐的，由于城市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增强，它们应邀派出各自的代表。在15世纪，城市成员的影响迅速增长。在宗教改革时期，神职人员自然已从三级会议中消失，他们的配额被城市成员占据了。这意味着贵族失去了他们绝大多数的权力，因为在各个三级会议中，他们会遭到大部分成员的反对。许多国家，特别是德国，教士的配额落入了贵族之手，这意味着平民的事业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挫折。

在7省宣布放弃他们的国王之后，三级会议被非常完整地按原样保留了下来。它们仍主要是一个咨询机构，由来自各个城市的一定数量的代理人组成。这些代理人由自己城市的议事会直接任命，而不是由民众选举。就形式而言，没有两个省的三级会议是相同的。整个体制是如此错综复杂、如此具有共和

---

① 三级会议：君主制下的三个“等级”代议制议会。所谓三级通常是：教士、贵族和市民阶级。

国的典型特点和很强的个别性，以至于我们无法用短短几句话就把它描述清楚。

荷兰省的省三级会议共有19张选票。其中18张属于18个主要的城市。1张属于有7个成员的旧贵族，他们只好集体投这一票。因此，城市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各个城市愿意派多少代表都行，但每个城市只有一票。至于小城镇和乡村地区，根本没有发言权。贵族想维护自己的利益也是一种奢望。

泽兰省的省三级会议有7个成员和7张选票。其中6张属于6个最大的城市，1张为贵族拥有。但贵族并不存在，显贵的家族要么已绝后，要么因仍然对西班牙统治者忠心耿耿而被剥夺了选举权。当地旧贵族的一票此时属于已买下了弗利辛根和韦尔侯爵爵位的奥伦治家族。

在乌得勒支省事情则非常复杂。这是因为乌得勒支先前是一块主教领地，在这块土地上天主教教士自然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照说这些教士已经不在了，但人们发现因他们从修道院和遍布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农场离去而留下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似乎仍在纠缠不清，原先属于教士的选票依旧保留。这一票如今属于由贵族和较小的城市特别任命的一些代表。贵族也拥有1张选票。4个大城市共同拥有1张选票。因而我们发现在这里，城市所充任的角色远不如在荷兰省和泽兰省那么重要。

格尔德兰省的情况相同，那里的体制甚至还要复杂。这个省以前是一个公国，此时已被分成3个所谓的“地区”。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小型的三级会议，每个这样的三级会议有两张选票，分别属于城市集团和贵族集团。不仅如此，大多数城市都有一个由30或40个特别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机构，代表们可能会在特定的场合受这些三级会议的咨询。3个地区一年举行3次联席会议。不过他们从不共同商议事情。商讨的问题在全体会议上提出，却是分开进行辩论；投票也是在联席会议上进

行，但每个地区只有一票。

奥弗赖塞尔省的行政机构的复杂性也差不太多。

弗里斯兰省的情况甚至更糟，它有 4 个不同的地区。其中 1 个地区包括 11 个大城市。其他 3 个地区又下分 11 个、10 个和 9 个分区。一次三级会议的联席会议召集来的代表超过 80 人，但只有 4 张选票供他们支配，每个地区只有 1 张选票。如果票数是 2 对 2，就请该省的执政裁决。

格罗宁根省分为两部分，每部分有 1 张选票。1 张属于格罗宁根城，另一张属于周围的乡村。周围的乡村又分成 3 个地区，每个地区直接分设下属三级会议。

荷兰省的三级会议实际上一年到头都有会议，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议会。其他省份的三级会议则是一种极其僵化和不易管理的政治工具。因为当城市集团和贵族集团只有一张可供支配的选票（泽兰省不在此例）时，他们只要能负担得起就会尽可能多地派遣代表。这些代表在投票之前聚在一起开会，然后决定如何投票。不过像乌得勒支省那样的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即乌得勒支城通常派遣 20 个代表，其他 3 个城市只是各派两位代表。据说乌得勒支城凡事都能按自己的愿望行事。在奥弗赖塞尔省，事情则以固定的方式进行，凡取得了多数票，不是 3 个城市与一个贵族投了相同的票，就是 47 个贵族与一个城市投了相同的票。在弗里斯兰省，每个能自立的农民都对政府产生直接的影响，都有权利到分区的会议上旁听。在格罗宁根省，格罗宁根城市政议会的全体人员因他们的职位而都成为参加三级会议的代表团成员。泽兰省的一些小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可恶的自治城镇”，比占共和国总人口 1/8 的阿姆斯特丹在荷兰三级会议中拥有更多的特殊权力。

简而言之，不存在什么普遍的体制。每个省都尽可能地贴近其以往固定化的政治制度，强烈反对任何要求一律的企图。

以往的制度当然是糟糕的，但由于它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便形成了它的势力。它的演变非常缓慢，此时它则纯粹通过习惯的力量起作用，就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可理喻的度量制那样起作用，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种制度的主要缺陷是实际存在的，即它使三级会议仅仅成为几个自主城市的代理人的开会场所；别希望他们能通力合作，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各自的小利益，他们最大的快乐就是阻止邻居和竞争对手的计划实现。

不幸的是，联盟政府从总体上说也是乏善可陈。中央政府的最高机构是三级会议总会。这个常设机构是想把众议院和参议院合二为一，再加上一点行政机构的权力。

虽说每个省也是想派多少代表就派多少代表，可以按照自己的时尚任命他们，但每个省都只有一张选票。这些代表相聚活像许许多多来自若干自主的统治势力的特使和全权大臣，他们惠允相会商讨某个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但他们毫不妥协地想要维护自己国家完完全全的自主权。三级会议总会受命讨论战争与和平、条约、陆军和海军、宗教以及税收等问题。它也指出联盟应该遵循的外交政策。

有时候当所有这些大使碰巧在某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时三级会议总会确实可以说成是召集了一次具有现代议会性质的会议。但这只在极少情况下发生。通常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意见分歧，除非共和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将他的意志强加在整个社团之上，公众习惯于只听从某位统治者而不愿接受某个多数派的决定。至于乌得勒支同盟高层签约的党派，即使是在极端危险的时刻，他们也谨慎地避免出现集权的制度，因为后者会将他们固有的和偏爱的无政府状态变成一个集权的政府。中世纪的精神在他们身上是太强烈了，很难希望凡事各省都出于善意。

不过共和国还有难以说明其权力和特权的第三种力量，它易于把事情搞得更为复杂。这第三种力量就是执政。执政原本是君主的代理人，也是每个省的行政官。但当统治者被弃绝的时候，让省三级会议来掌管全省的行政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机构因未受过有关的训练，运行过于不便以至于无法胜任行政管理。因此执政在各省继续行使其职责。但他的直接权限是什么呢?这很难说，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三级会议变得更具有自主权，他们不断侵占执政的权力，与此同时执政也接二连三地尝试着侵占三级会议的权力。

在君主被弃绝之后，执政名义上是三级会议雇用的行政官和公务员。但在许多方面他的权力远比他名义上的雇主更直接、范围也更大。当执政碰巧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很容易就功高盖主，完全将他的雇主们遮蔽了。不久他在三级会议人士的眼里就成为他们非常不愿看到的知名人物。只要机会成熟，各省便试着处置自己的事务而不必任命一位执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行政权力收回自己手里。于是我们经常发现有的省份有执政、有的省份没有执政；或者几个省份有一个共同的执政。

还需要补充的是，除了泽兰，各个省份都有独立的宗教会议来看护教会的事务，一些三级会议的代表在需要予以关注的时候照料这类事务；还有独立的高等法院；五个相对独立的海军部，各管各地工作。每个省都以各自特殊的方式看管自己的钱财。我们不禁自问：这样的各行其是的政府怎么能像实际情况那样的存在那么久?它如何能使自己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力量之一?然而，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事实上整个事情只是照着它通常的方式进行。没有一个法定的核心人物引导这个共和国，没有一种合法的强有力的势力能将其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但没有坚强的领导，一个民族无法生存。因此事情不可能合法地

进行，虽说做得不尽合法，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最后便要谈到非常庸俗的金钱问题。荷兰省支付全部经费的 58%，荷兰省经营着共和国。假如别的省份拒绝听从指挥，荷兰省便会用拒绝支付其公共经费份额的方式，威胁要让共和国垮台。依次类推，凡在荷兰设法成为最重要的人物或党派，也会在整个共和国地位显要。读者最好把这个事实记在心里，因为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进行有关讨论。

归根到底，共和国地位最显赫的官员是“执政”这位行政长官。但在与西班牙作战的岁月里，执政通常都是离开其政府职位，奔赴前线去防御对共和国疆域的入侵和肃清领土内的西班牙人。这种时候，另一位省级官员就设法让他的官职获得广大而重要的权力。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由于共和国存在前半个世纪受命担任这个官职的人物的卓越才能。这个官职就是荷兰大议长。

要说明什么是荷兰大议长也很困难。他把持如此多的办公机构（我们今天则需有许多人来负责），我们没法给他的权限直接找到现代某个对应职位。他出席荷兰三级会议和联省三级会议两方面的会议，在荷兰三级会议，他不仅是议长，而且宣布贵族的投票。刚刚独立的时候，荷兰主动组织一个外交部门，大议长便是管理这个部门的人。以后他继续管理这项工作，实际上成了整个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大议长是与政府所有最重要部门真正保持日常接触的人物，他自然对事态的发展了如指掌。要是我们称他为众议院领袖、首相以及外交部长的合而为一或许更接近事实。这样大的权力能使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成为联盟的实际统治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职位还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荷兰大议长成为分离主义党派的领袖，我们称该党为共和国两大党派之一。当时并不存在我们所谓的与正式会议、预备会议、领

袖人物及所有其他的内容相联系的党派。但存在两种被普遍认定的一般模式，一部分人认为政府只有高度集权国家才有救，执政也就成了他们的领袖，与此同时，大议长则成了要求政府具有高度地方分权性质的人们的非正式领袖。若建立高度集权的政府，执政将成为立宪君主。

我已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民众与政府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那么，谁设立了各个三级会议，以及市议事会庞大的机构，还有三级会议代表团、海军学院等等呢?毫无例外他们是某个有影响的家族的成员。对共和国来说，由显贵家庭来统治并非什么新发明。让我们回溯到中世纪，那时候由几个有势力的家族把持政府是必不可少的。什么地方要是不这样的话，什么地方就会像比利时大城市里的情况那样，结果是不断地陷入混乱。在与西班牙作战的时候，几个家族成了亲敌分子，在他们遭到失败之后便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他们的位置被对新的事业付出非常热情的其他人所取代。但政体仍保留原来的。

在每个城市都有一些家族因财富和家族关系而处于显要地位。他们并不属于旧贵族，却命中注定要保留在市政府里。执政作为最高行政长官从这些家族中任命市长、市议事会和司法长官。他们又在自己的圈子里任命派往省三级会议和联省三级会议的成员。还有海军学院的理事和每个大的金融企业的理事，都由他们自己人担任。他们形成一个关系紧密的社团，为了保存自身，其成员只与自己圈子里的人通婚，严格地将一切外来人排除在外。一个新的家族也可能被接受，但即使在几代的“试用期”之后仍然非常困难。作为一个阶层，他们被称作“摄政者”。

身为受人尊敬的大城市或小城市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他们经营这些城市、省份和共和国就仿佛它们是自己的商行。他们

在权力方面彼此极为嫉妒，而每个小社团都想让自己像其较大的邻居一样赐教于他人。因此当一件事被拿到联省三级会议讨论时便发生了如下情况：这件事被送回省三级会议，省三级会议又将它送回各个城市的市议事会，各个市议事会于是提出它们的观点并将这些观点返回省三级会议，省三级会议于是又将这些观点转交联省三级会议，联省三级会议于是才能试着去达成一些总的结论。这个方式意味着任何事情都要先经过代表约50个不同城市的大约两千位不同人士的讨论，而在这些事情返回它们开始的地方之前，它们在交付讨论的进程中通常要花费半年的时间。这也意味着没有什么事能保守秘密。共和国成功的统治者只能违背法律和惯例,建立一个由六七人组成的秘密团体,相当违法地越过所有其他官员,办理当时必须保密的重要事务。

这种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强自身，在其整个形式上变得越来越严密，但它不得人心。民众并不怎么在意处于有皇家血统的执政的统治之下——这位亲王的头衔与欧洲的其他贵族没什么两样。他保留了一个真正的宫廷和一支真正的卫队；他是联盟军队的最高统帅，假如他像莫里斯和他的弟弟那样碰巧也是一位著名的将军，他的宫廷便会成为一个中心，全世界的年轻贵族会云集这里学习这路行当；他身穿漂亮的制服，由他的随从簇拥着神气活现地骑马游荡；他的妻子是皇族的女儿。那都是实实在在的。他是人们所想像的真实王子。

可街上的人对议事会成员会有什么样的尊重呢?很多身着庄重的黑衣、衬衫胸部带花饰的公民，他们的祖父却曾是卖蔬菜的和酿酒的，他们的妻子不值得人们尊敬。钱财、家族影响和总的境况可能曾帮助其祖父脱离原来的阶层，但他的邻居们并不想忘掉他的出身。

现在看啊，由于这些家伙大权在握，他们便无视民众的存

在。常被称为暴民、百姓和下等人的人占到人口的95%。95%的人并不喜欢这种待遇，但他们过分忙于自己的物质生活了，在经济方面过分依赖于富裕阶层了，所以总不能充分表达他们的不满。这与我们具有高度现代特点的“阶级斗争”情况很不相同。直到最近50年左右的时间，大多数人才认识到必定存在阶级这个事实。要是没有互相的嫉妒，所有的人都会感到快乐。16世纪时的一般人都很愿意将政府交给他们的老爷管理，自己不愿多操心。但人们必须在两种政府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即在非常符合民意和显贵的、让皇家派头围绕着的执政与他们在议事会的、跟所有富商的极端虚荣联系在一起的特定主人之间作出选择，那人们当然会对执政高呼“万岁”，而仅以一个冷冰冰的深鞠躬应付议事会那些威风十足的摄政者了事。只有当摄政者们推荐的确是一位才干非凡的人——他在用料考究的黑衣和白色的褶边下面怀有一颗战士的心，并具有一位真正的领导者的素质，他才能管理这个国家。若世间没有这样的人，人们就会本能地转向支持执政，希望从执政身上看到他们所认为的统治者应具有的素质。

对共和国的历史作一次简短的回顾，我所说的意思就很明显了。

威廉的大儿子莫里斯在父亲被谋杀后继承了后者的职位。在40年的时间内，他是共和国实际上的独裁者。作为一个将军，他创造了惊人的记录，他是三次重大战役的胜利者，还攻克了38座有城墙围绕的坚城和45个军事要塞，从而把敌对的西班牙人赶出了共和国的疆域。作为联省军队的最高统帅和七个省中六个的执政，他在共和国里是前所未有的最有影响和最有权势的人物。但他不久就陷人了与荷兰省三级会议的麻烦中，后者害怕他的权力沿着君主政体的轨道发展。反对派领袖

是荷兰的老议长约翰·凡·奥尔登巴内费尔特[①]。这场斗争随后出现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莫里斯继续成为赢家，而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在受到法庭判决之后被处以死刑。莫里斯死于1625年，他的弟弟弗里德里克·亨利继承了他的最高统帅和除了弗里斯兰省之外所有省份执政的职位。弗里德里克·亨利继续与西班牙作战，并和他的哥哥一样成功，但他也是过于被军务缠身了，以至于不能多费点心思在内部的政事上。他没有充分地让自己执掌的权力合法化。他统治着共和国，因为他碰巧是整个共和国中最强有力的人，也因为不存在有效组织的反抗。事实上他是荷兰共和国的无冕之王，但从理论上讲，他依然只是三级会议所雇用的人。

1647年，弗里德里克·亨利的职位由他年轻的儿子威廉二世继承。威廉像加冕王子那样受教育，娶了英王詹姆斯二世的女儿为妻，与欧洲所有最有权势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家族建立了联系。但他直接与三级会议、特别是与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富裕的商业城市发生了纠纷。大家认为他会继续他父亲和叔叔的未竟事业，会使自己成为共和国世袭的统治者，但他死得非常意外，没来得及留下继承人。他死后的第11天，儿子威廉三世出生。

此时的共和国没有执政。各省三级会议立即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时机把以前属于执政的所有权力都收为己有。他们现在身兼议员和行政官了。城市急于从省一级的监督下获得完全的独立。市议事会的任命权原来一直掌握在执政的手里，此时由市议事会自己取得，从而成为一个自治和自我延续的机构，实际上是独立于省议事会，就像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样统治自己的城市。

议事会——那些摄政者家族完全统治这个国家已有30

① 约翰·凡·奥尔登巴内费尔特（1547—1619）：荷兰政治家。1586年任荷兰大议长，1618年8月29日突然被莫里斯亲王逮捕入狱，半年多以后，以颠覆国家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在海牙斩首。

年。约翰·德·维特[1]成为了他们的领袖。他现在像奥伦治亲王曾经做过的那样成了共和国的独裁者。他也继续推行他的外交政策，并取得很大的成功。作为一个有非凡才能的政务活动家和非常狡猾的政客，他逐渐但是坚定地加大摄政者的权力，直到好像奥伦治家族已注定永远被排除在共和国的权力和影响之外。威廉二世的那个身体虚弱的遗腹子虽说活了下来，并有一个非常健全的头脑，但身体却非常不健康。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德·维特便设法通过几项法律，不仅使奥伦治亲王不可能占据执政的职位，而且完全彻底地废除了这个高等职位。

17 世纪中叶，共和国看上去像是要遵照威尼斯的例子，打算发展成为一个由合法组成的贵族阶层治理的共和国。只有一件事情妨碍摄政者们确立自己这样的地位，即没有常备军。因为虽然乌得勒支同盟的第 8 款宣称将对所有 18 至 60 岁的人进行人口普查，以便为了整个国家防卫的目的，在他们中间建立一支常规部队，但实际上却从未组织过这样的军队。除了在一个省份，人口普查并未真正进行。人们发现让雇佣军去作战要比对既不具备素质也不情愿的忙忙碌碌的生意人进行军事训练便宜和合算许多。不过，外国雇佣军得由荷兰军官指挥。许多军官属于各省的贵族，相对于做生意他们仍偏爱军旅生涯，他们直接受执政的指挥。执政任命军官，而且作为现役军官他与军人们时有接触，自然他在军队中比支付军队费用的三级会议成员更有声望。再说三级会议成员给钱也非常吝啬，永远试着要减少军费和缩小军队的规模。当没有了执政的时候，三级会议就成了军队的直接统帅。但那时三级会议和军队的关系简

① 约翰·德·维特（1625—1672）：荷兰政治家，17 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1653 年任荷兰首相时年仅 28 岁，一直任职到 1672 年。他辞职后不久在海牙被暴乱群众杀害。

直是糟糕透顶，因为军人们都不喜欢为文职官员所控制或干预。因此不管什么情况，共和国的军队都公开和直言不讳地站在奥伦治亲王一边，而与摄政者们公然对抗。军队散布在沿着边界的许多小城镇里，军人们整天诅咒他们的坏运气，盼望好日子的到来。

为三级会议服务的除了常规部队，共和国还有另一支武装力量，它包括各城市的志愿民兵，属于波士顿的“荣誉老炮队”与常规警察部队之间的东西。要是发生火灾和骚乱，它就受召唤去维持秩序。它还行使保卫城市城墙的职责。然而，后世的人们从当时的画家著名的油画里，知道这支民兵主要是快快活活的社会组织，其成员在画中正参加丰盛的宴会或进行他们愉快的出巡。

这些民兵团体的军官由市议事会任命，因此倾向于从属摄政者阶层。然而普通士兵属于商人和店主这个庞大的阶层。他们平常不穿制服。一旦火灾的警钟敲响，他们就戴上彩色的饰带，拿起一根戟或一支枪，奔赴危险的地带去预防同胞市民趁火打劫或妨碍救火队员的工作。要是发生了骚乱，他们也会受召唤去恢复秩序。1672 年是个例外，当时共和国似乎已一败涂地，城市民兵未被召集去参加任何真正的战斗，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如同未受过训练的志愿者那样不起任何作用。由于经济上依赖于他们富裕邻居的善心，这些士兵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公开表现出对摄政者的厌恶。但有不少证据表明，当摄政者与民众之间发生争吵时，城市民兵不会让自己成为寡头政治集团手中的工具。

这种联系使我们想到拿破仑将自己与波旁王朝[①]成员比

---

① 波旁王朝：波旁家族是欧洲最重要的统治家族之一，产生过 1589 至 1792 年和 1814 至 1848 年间的法国国王。

较，当时他声称自己作为一个高利贷者，需要立即到来的新胜利来维护自己，而波旁家族作为法国合法的王族，也只有胜利才能在失败中拯救他们的王位。总的来说，德·维特政府并不太坏。他确实忽视了军队，对军队他没多少兴趣。但另一方面，他对强大的海军的建设给予了很大的推动，并在共和国舰队与英国、法国和瑞典作战时成功地维护了荣誉。在他20年的统治期内，共和国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高峰，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卓越成就。就其个人而言，德·维特在处理政务时还算是诚实和正直的，这在当时是相当少有的，而在他死后又和他刚当政时一样的少有。

正是国家的繁荣使德·维特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每个人都如此忙于照看自己的事务，以至于没人有时间费心去管国家的那些事情。不管商人们和他们的船只去哪儿，一支强大的舰队都能保护他们。新的工业得以开发并受到政府的鼓励。每个人都有工作，谁也不会赋闲或挨饿。简而言之，所有那些物质繁荣的状况就如同今天的美国，大多数美国人都心感满足，使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关心国家的前途。

因此，无论想做什么，摄政者们都被迫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假如这一阶层的行为方式引起很大且普遍的不满，他们明白要与群众对抗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可到了1672这一年，摄政者犯了错误。德·维特对民众的轻视超过了限度，有点太过分了。他专横的行为引起了强烈的怨恨，而对暴民来说，行为就不免要失控了。

1672年，在多种境况最为不幸的综合作用下，而不只是由于英王查理二世的背信弃义，共和国不得不面临一场与法国、英国和好几位德国亲王的战争，德·维特编织的整个政治结构都破碎了。然而，气候突然转暖面引起的河流解冻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从而挽救了共和国，这场解冻起的作用超过一切

军事力量所能起的作用。但恐慌仍蔓延到整个国土，每个地方的人都吵吵嚷嚷要求任命年轻的奥伦治亲王为执政。他们声称只有这个任命能拯救他们，他们还要求不折不扣和迅速地这样做。德·维特被迫屈服。威廉被任命为最高统帅，而且不仅在荷兰，还在其他4个省成为执政。即使在这个时候，民众的愤怒仍未能控制住。只有在德·维特和他的弟弟被从监狱拖出来，让一伙暴徒私刑处死之后，和平和安宁才得以恢复。暴徒们的行径得到了自下而上的各阶层的完全赞同和协助。

威廉三世以加冕英国国王[①]而在历史上闻名。他身为君王，在英国的权力却不如他在共和国任执政的权力大。事实上他在共和国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如果曾有过一个人能改变共和国政府的话，这个人就是威廉三世。他有整个民族做他的后盾。

这个民族的态度是："我们已委任你，你所能做的就必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永久的利益。大胆做吧，无论你做什么我们都将做你的后盾。"但事实上威廉对这样的改革没有丝毫的兴趣。历史重复着同样的内容。人是改变了，但做法上换汤不换药。从总体上说，事实证明德·维特的政府比起威廉的政府还少一点自私自利。威廉利用共和国就像他利用英格兰，他利用其势力范围里的每一个人为其特殊的目的服务。这个特殊的目的就是抑制好战的法国，防止天主教势力的大规模复兴。

为了这个自欺欺人的事业的成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威廉甘愿采用任何腐败的政治制度。每当他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实施他的意愿，他就肆无忌惮地通过非法的方式实现。他毫无优雅可言，而是在国际政策方面极其野蛮地迫使一切都纳

① 威廉三世：1672年起任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执政。1689年1月，英王詹姆斯逊位，由他即位，同年4月加冕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

入有利于他的轨道。他使共和国的付出超出了其实际力量之所及，而这对于他却是无所谓的。若任其所为，共和国就会走向破产。各省的欠债猛增，海军部被迫以前所未有的透支造更多的船只，而国家的工业也在其恩准之下走向毁灭。只要联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其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付钱，执政就不会在乎这些事。这时的国家政治方面比德·维特统治时期更糟。只有那些对执政惟命是从的人或他的合谋者们才能拥有权势和影响。威廉死于 1702 年，他的事业完成了。法国被抑制在其境内，于是昔日欧洲力量的平衡便得以重建。

但所有这些成就都以耗尽共和国财政的优势为代价。威廉三世没有留下直系的继承人。公众想靠任命一位拥有无限权力的执政来改善境况的企图遭到彻底失败。人们毫无怨言地回过头来接受了由摄政者组成的政府。

2 经济和社会的盛衰

耶稣纪年1713年4月12日，人们在乌得勒支城的商业区目睹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喧闹场面。一大早，两门小型火炮就被放置在市政厅的门前。上午10点整，火炮鸣响。这意味着法国、西班牙、英国、瑞典和共和国的代表已经签订了和平协议。这个和平协议结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①]，同时也结束了伟大的共和国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在以往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共和国曾是欧洲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此时却甘愿从欧洲政治巅峰的活跃地位隐退了。军队被解散，舰队只能在港口里腐烂。它的将军和海军上将则被用养老金打发回家去照看自家的菜园子，他们的职位为那些戴长

①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国王查理二世死后无嗣，对王位继承问题遂起争夺，导致了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701年，结束于1714年。荷兰加入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同盟。

假发的外交官所取代，并有大量的钱财供后者使用。这些钱财被用于购买和平。为和平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蒙受屈辱——这将成为共和国的新的信条。原有的繁荣确实得以延续，商业和工业在几十年时间内仍相当有利可图，但不再有“精英”冒出来。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我们的寻觅纯属徒劳，竟找不到一位能力超群的人。

奥伦治家族在一连产生了5位既有将军也有政治家的才干出众的亲王之后，已没有直系后代。其头衔和高位已为弗里斯兰执政的旁系亲属所继承。但这些被称为亲王的人谁也没能在18世纪出人头地，他们也不过是些平庸之辈。威廉四世和威廉五世都是二流人物，他们有好的愿望却完全缺乏精力、勇气和进取心。

杰出政治家那长长的名单似乎是突然中断了。他们先前的位置现在被政客占据了，这些政客中有的聪明而没有廉耻，其他的就只有厚颜无耻了。他们中没有谁能摆脱其故乡小城的狭隘观念。摄政者又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但他们不再是德·维特时代的摄政者了。他们只是可笑的模仿前辈者。他们不再有为某些确定目的（即便是自私的目的）而工作的劲头。他们令人震惊地迅速变成一个拙劣的模仿前辈者的阶层，不再积极地参与事务，而是用钱财来处理一切。

然而整个民族又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一个世纪以前他们宁可经受饥荒、围困和瘟疫也不屈服于外来的意志和外来的教会。他们也堕落了；他们已心安理得地成了一大帮富裕和自我满足的吃利息者，其充沛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已丧尽。他们的钱用于投资，他们期望所得股息能使他们过舒服的生活。17世纪是财富积累的世纪，而18世纪则是他们享乐的世纪。

好几亿荷兰盾仍用于商业和外贸，但还有巨额剩余资金用在投资方面。18世纪的共和国成了全世界的大借贷国。阿姆



荷兰是由一支舰队守卫的账房

斯特丹的交易市场成为国际股票市场的中心。投资于欧洲、东印度和美洲的外国债券的资金超过3亿4千万荷兰盾。英国国债的很大一部分掌握在荷兰人手里。仅以股息的形式，每年就有超过2500万荷兰盾从英国进人荷兰。从法国获得2500万荷兰盾；从西班牙、俄罗斯、瑞典和德意志几个小国获得3千万荷兰盾。阿姆斯特丹也成为一般银行业务和交易的中心，营业额达5千万荷兰盾。超过1亿4千万的资金投人东印度和南美殖民地的企业。几百万投资在城市贷款和给省、郡的贷款上。共和国公民拥有估算起来价值达5千万荷兰盾的金银和贵重宝石。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积累如此多的财富，是只有在捕获西班牙珍宝船队[1]创造约1200万纯收人的那个时代才有的事情。

18世纪利息的标准比我们这个时代要高得多，12%也并非例外。这样我们也就明白，流进这块小小的国土的是多么稳定的股息源流，以及人口中多么大的一部分人允许自己"有尊严的和平生活"以割取息票为生，就好像这是惟一正当的职业，允许自己把时间都用在琢磨罗马诗人贺拉斯那首以"远离生意诡计的人啊快乐无比"开头的著名颂诗上面。

这幅快乐图景还有另外一面。就国家的特性而言，这个天堂般的休养地并未意味着多少好处。当共和国向每个国家贷款时，这意味着它必须和每个国家保持友好的关系。若与英国或法国开战，则意味着这些国家将立即停止支付大部分的债息，因而对总体的繁荣会是极其有害的。更糟糕的是，不管共和国卷人与谁的战争，将都意味着它在与自己的资本作战。出于这个原因，与任何一个国家的战争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

① 西班牙珍宝船队：指从16至18世纪将欧洲货物运至美洲西班牙殖民地，并将殖民地产品（尤其是金银）运回母国的船队。从16世纪50年代起，船运定期进行。这样的船队对于敌对的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水手们颇具诱惑力。

还有，所有这些资金都投资国外，对国内的产业而言这意味着直接的损失。生活费用在繁荣的尼德兰要大大高于周边国家。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这里的工人比在其他地方能得到更高的工资，而且由于公会组织发展不甚得力，工人有更大的自由去顾及个人的利益。更有甚者，各产业被迫与海运商船竞争。海运商船付很高的工资，而产业主必须付更高的工资才能得到人手。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增加生产成本，也就意味着投入的资本只具有较低的利润标准。不幸的是，18 世纪的荷兰人没有足够的爱国心，当在国外十拿九稳可以得到 6% 或 7% 利润的时候，便不会以 4.5% 或 5% 的预期利润在国内投资。这表明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当来自国外的竞争开始严重影响荷兰的市场时，荷兰的制造商无力扩大生产以迎接这个新的竞争的挑战。

这种新风尚却对公众产生了超乎物质的道德影响。贸易和工业开始不再被看做是“时髦的事情”了。摄政者逐渐都从生意场上退出，完全失去了与其他人接触的机会。许许多多的人在社会等级方面紧追摄政者，他们虽然不属于统治阶层却已同样地富裕。这些人不遗余力地仿效上流阶层，把生意搁置一边。他们的儿子被送进大学，被迫去学习法律学，为能从事某些斯文的职业做准备。其他人则开始认为平淡度日是最美好的生活时尚。从生意场上完全的隐退意味着现有的资本不再增长，而伴随着生活花费的不断增长和新的奢侈品的逐渐引进，要求人们为了紧跟时尚必须有比以往更高的收入。

除了塌实地干活，要增加资本只剩下一种途径，那就是去投机。这里我们想给人这样的印象，即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居民也曾热衷于投机。当塔西佗[①]寻访他们的祖先时，曾提到他

① 塔西佗（约 56—约 120）：罗马帝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编年史》等。

们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他们什么时候都想赌博，而且是有什么赌什么，甚至拿他们的老婆、孩子和自己的人身自由下赌。这种好赌的风气一直存在，而且一次次变本加厉地发作，比如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或者后来密西西比大开拓的幻梦。像印度公司这样的商业机构也更像是空中楼阁，为一些明智的投机提供妙不可言的机会。

然而此时拿股市价格作赌的投机行为是受到限制的。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报告成了很多家庭的精神指导，仅次于摩西十诫。这些家庭的生活经常入不敷出，他们想通过在股票交易方面的审时度势来保持收支平衡。那时候就如同现在，少数深知内情的聪明人赚钱并赚很多钱，门外汉只是付钱让别人交好运，自己则倾家荡产。

我们已经有机会提到“密西西比幻梦”。当约翰·劳[①]向共和国推广他的实施计划时，除了阿姆斯特丹那些谨慎的摄政者，几乎每个城镇每个乡村都随之卷入了投机风潮。接着出现的奢华风潮持续了一阵，暂时的大把赚钱使忘乎所以的人们都偏爱起了奢侈品。紧跟着出现的可怕的失败使所有的人再也用不起奢侈品了，生活比先前更艰难。但由于极少数幸运者在这场赌博中获利，各个家庭所遭受的灭顶之灾很快就被忘却了。

在18世纪的后半段，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令人胆寒地频频发生。先是在1863年，然后是1873年，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881年。每次危机都始于某些外部因素，事态的不稳定状况使危机成为可能。每次危机的直接后果都是一批银行的倒闭。

① 约翰·劳（约1671—1729）：苏格兰货币改革家，开发美洲法属领地的“密西西比计划”的制定者。有几年，劳的计划很有成效，但却与投机倒把和政治阴谋纠缠不清。1720年，他被迫逃离法国。

这些银行的倒闭在投资者群体之中对于那些已对实实在在的生意失去了兴致和能力的家庭来说则意味着毁灭。假如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他们总能设法在东印度群岛的东印度公司业务机构里受到雇用。就最有地位的家庭而言，这是遭遇倒闭时最后的救助方式，他们通常是靠谨慎地利用东印度群岛的当地人来使自己从前面的损失中得以重整旗鼓。然而那些小人物、小规模的投资者，他们则被抛弃了，只好从经济和社会的阶梯的最底层从头再来。

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就像今天的华尔街，成为国土上的统治者。股票交易所对于一个繁荣的国家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奴仆。不过作为主人，它还从未取得什么成功。

商业一直是共和国最大的收入来源，国家的生存依赖于它。当 1781 年的英国战争摧毁了这里的商业时，共和国已注定不出几年就会衰亡。

正如我们先前所见，低地国家的居民先是被迫从事运输业，因为原材料的缺乏使他们不可能大规模发展工业，同时处于许多国家之间的中心位置则为从事国际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但在 16 世纪，另一个重要因素使商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我们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挣脱了西班牙的奴役之后，共和国避免了更多的内部麻烦，而与此同时，周边国家直到下一个世纪仍处于持续的动荡不安之中。

德国因 30 年战争而遭难，这场战争使其人口从 800 万减少到 400 万，并使它在至少 3 个世纪的时间内无繁荣可言。英格兰经受了一系列的内战，严重损害了其经济的正常发展。在法国，16 世纪早期是不间断的宗教战争和好几次严重的内部叛乱的阶段。西班牙被政治化的经济制度毁了，这种制度逐渐耗尽了其全部的黄金储备。葡萄牙曾是共和国争夺殖民地的老对手，让多年西班牙的统治搞得精疲力竭。

相比之下，共和国于1602年与西班牙达成休战协议，做起事来已无后顾之忧。荷兰和泽兰这两个主要的商业省份差不多在20年间未直接遭受敌人的侵害，能在完全和平的环境中开发自己的资源。除了1672年仅持续个把星期的骚乱，并未出现过打内战流血的情况。政治斗争和宗教斗争是有的，但两个敌对派别为掌握政权而发生的争斗从未使国家的商业生活有所停顿。

在17世纪，共和国确实与英格兰打了好几次仗，但这些战争都是为了商业目的，而不是为了宗教或王朝的原则问题。自1600年以来，整个共和国都能用全部力量去发展贸易、商业和工业。1621年与西班牙重新开战，共和国除了花费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给去打仗的人开酬金，并未遭受什么损失。重燃的战火反而给了各个贸易公司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们只要有可能就雇佣军队去攻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这些公司因而获得一大份新领地。

至于宗教问题，共和国还未公开表明任何现代的宽容观念，它当然也不公开承认在有关灵魂的所有问题上存在完全的自由。但它也并不热衷于迫害信仰方式与宗教改革后的国教不同的人们。只要信异教的人不显山露水，只要持不同意见者的方式不对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即使他们坚持信仰也不会有人去管他们，这就使共和国成了因信仰问题而在别的地方获罪受难的可怜人的避难所。大批大批的人从欧洲各地逃往荷兰。这些新公民不久就证明他们是值得敬重的。他们不仅把经商的本领和手段带到了新的居住地，而且他们往往也带来了资本和信用，并将它们融人共和国的商业活动之中。

在前面一章，我们已谈到低地国家从来都有一个极其好学的风气，那里的民众对什么事情都严肃地对待，并对书本学习兴趣颇高。这种攻读和研究的兴趣也使商业的发展（特别是船

运）受益。人们学习外国的语言，连像黎凡特诸国[1]这样遥远的国家，其语言也有人在用心地学习。一种科学的记账方式取代了老式、死板的方式。商业贸易的经营管理得到了改善，比只考虑盈亏的旧方式更有利可图。航海技艺的研究上了新的台阶，还有成套精确的航海图表绘制出来为航海提供帮助。从许多个世纪的航海生活中获得的航海素质，使荷兰人的船员配备只需别国的一半便足够了，从而大大减少了装备的费用。与此同时，造船方式也得到了改进，造出来的船经久耐用。所有这些使共和国大大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列，因而凡热衷于贸易、买卖的人经常跑到荷兰来学习生意经，就像今天的工程专家会去德国和美国求教一样。但这一切到了 18 世纪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英格兰在 16 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终于迎来了和平，开始从事商业和大搞殖民地扩张。在法国，自柯尔贝尔[2]时代起发展起了一个庞大的产品制造系统，而且对舰队和殖民地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西班牙也正竭尽全力改革其内部事务。在德国的某些公国和一些汉莎同盟[3]老城镇，未来的一种生气勃勃的新生活已显露出征兆。瑞典最终被迫终止了弊多利少的对外政策，开始从查理十二[4]招灾惹祸的战争中得以复兴。当时钟在 1699 年 12 月 31 日午夜 12 点敲响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当然还未发生。有些国家是在此后 20 年里觉醒的，其他的国家则要晚得多。

---

① 黎凡特：即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自希腊到埃及各国。

② 柯尔贝尔（1619—1683）：法国政治家，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

③ 汉莎同盟：由德意志北部城市和德意志海外贸易集团创立的组织。13 至 15 世纪，汉莎同盟是北欧的重要经济和政治势力。

④ 查理十二：瑞典国王，1697 至 1718 年在位，曾与丹麦、波兰和俄罗斯作战。

我们希望只是给读者一个有关那个时代的一般的印象，表明在18世纪的进程中那些因内部混乱妨碍了经济上努力进取的国家，此时情况已开始好转并相继开始为在世界生意场上占一份额而奋斗。这些国家因它们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人口数目而完全有资格这样做。这些国家也相继发现，在已经过去的世纪中，当它们自己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无力进取时，荷兰商人已不动声色却相当有效地垄断了贸易。

这些国家发现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完全依赖于荷兰商人，他们当然地对这种状况很反感，便千方百计试图从这种经济依赖中解脱出来。这些国家以一切可能的自卫手段（比如高额保护性关税和对本地企业的高额奖励），开始与荷兰的垄断抗争，想夺回它们的前几代公民丢失的阵地。

18世纪中叶留下数以百计的小册子，它们的目的是想借以引起三级会议注意到可悲的“生意”境况。我们翻阅它们的时候，则倾向于相信种类繁多的商业行为在刚过去的20年间确实都存在突然而严重的衰退。荷兰商人已经十分习惯在运输业和众多的工业领域理所当然地占据垄断地位，因此外国对这些行业的任何侵犯（虽说是无可厚非的）都被他们视为一种严重的侵害行为。他们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即共和国的人口增长已经使每个人所占的利润份额减少了，是难得的有利条件才使他们获得并维持了富裕的境况，而这种境况如今正在逐渐失去。

我们并非是要罗列与共和国历史有关的一长串事例，而是想使一个非常乏味的阶段的历史具有可读性，我们不想用许多无甚价值的东西来惹恼读者。但提供一点数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它们能显示这场渐变是如何发生的。为了描述商业的历史，我们可以将18世纪粗略地分成几个阶段。

从1700至1730年为繁荣时期，那是与法国的战争和西班

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产生的反作用。国内工业蓬勃发展，船只此时不需要在别的国家之间从事运输业，而是装满了出口的货物。但大约在1730年，在来自国外的竞争的压力下，荷兰的工业开始走向疲软。1730至1750年情况很糟糕。随后新的收入来源打开了，英格兰与法国、英格兰与北美的战争为大有赚头的货物走私提供了绝妙的机遇。这一新时期从总体上说是有利的。

但这样的繁荣已不再具有坚实的基础，1780年突然爆发的与英格兰之间的战争，如此彻底地摧毁了荷兰最后的一点点商业，以至于直到19世纪中叶才有重整旗鼓的可能。我们拥有的有关荷兰贸易的最有价值的统计数字是松德海峡[①]通行税的记录。松德海峡是进入波罗的海的门户，向通过该海峡的所有船只征收通行税从来都是丹麦的一项丰厚的收入来源。那时共和国最早和最有利可图的生意是将谷物从波罗的海诸省运往欧洲其他地方。格但斯克和吕贝克，后来还有里加[②]，都是谷物运送的主要港口。

1497年，通过松德海峡的荷兰船只数目是567艘；1597年是3908艘；1697年超过4000艘。但从此以后，数目便下降了。18世纪中叶，只有3000艘通过；1774年（一次危机刚过）有2447艘，6年后有2080艘。随后与英格兰的战争爆发。1781年的数目仅为11艘。1782年运输业稍有好转，但都不能恢复到先前一半的数目。投入这个行业的资金数目最巨。由于这是全线的衰退，商业其他分支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

① 松德海峡：丹麦西兰岛和瑞典斯科纳之间的海峡。1429—1857年，丹麦占据海峡两岸，向一切过往船只收通行税。

② 格但斯克：波兰北部港口城市，为波罗的海重要港口之一。吕贝克：德国东北部港口城市。里加：波罗的海里加湾南岸的大海港。

和英格兰的贸易（部分是转运货物，但绝大部分是国内产品的出口）显示出共和国一方的持续衰退，与此同时是从大英帝国进口货物数量的相应增长。在18世纪，法国是比英格兰好得多的顾客。法国发展起规模很大的制造业，想将其产品运送到殖民地去，但它并不拥有必要的商业海运船队。因此法国只好雇用荷兰的船只。此时荷兰共和国有了争夺运输业垄断地位的对手——丹麦、瑞典和英国，这种令人不快的竞争迫使荷兰人不情愿地谨慎小心地伺候其原先的顾客。为了保持有利可图的法国生意，共和国逐渐与旧日友邦英格兰疏远，被迫成为法国的盟国。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纪里，每当共和国在政治方面不服从法国，法国马上就威胁以增加某些关税或禁止某些进口作为经济报复，对共和国的不服从予以惩罚。这样的惩罚真有效，共和国只好道歉，屈从于法国的要求。共和国再也不能失去顾客了。最后共和国甚至被法国推入美洲的冒险，而这次冒险直接导致了与英格兰的战争和共和国商业的毁灭。

至于西班牙，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共和国无望重获先前在那里的重要地位。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奴隶贸易已于1713年为英国所垄断，共和国逐渐将与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生意丧失殆尽。

和俄罗斯和黎凡特的贸易也显现出同样的状况。并没有出现突然的衰退，甚至也不是为时几年的那种短期衰退，但其他国家，特别是英格兰，加紧了对荷兰商人的步步紧逼，荷兰人失去的顾客都让英国对手获得。在18世纪的早期，我们发现差不多有200艘船从圣彼得堡开往荷兰。50年以后，其数目减少了2/3。1795年只有一艘船了。但在同一年，那个港口里的英国船只却超过500艘。而在一个世纪以前，这笔生意实际上是由荷兰人垄断的。与黎凡特的贸易以及与土耳其和意大利沿岸的贸易有时出现短暂的小增长，但也无一例外地随后出

现多年的持续衰退。英国人在土耳其也逐渐取代荷兰商人，直到后者再无一人留存。

同样有必要提到的是甚至比运输业更早的另一种产业形式，运输业其实是从这种产业中产生的。我们指的是渔业。自从中世纪晚期鲱鱼离开了波罗的海移居大西洋和北海，捕捞鲱鱼就在海岸沿线居民的生活中成为最重要和有赚头的营生。1380年，泽兰的渔民发明了一种腌制鲱鱼的方式，这种鱼便成为出口货物中的一大项，专供天主教会在整个斋戒期内消费。泽兰和须得海边沿的小城镇靠这些渔产品大赚其钱，并凭借其渔业为以后参与波罗的海的贸易和后来在西印度公司占据股份的好运打下基础。早在16世纪，除了捕捞鲱鱼又有了捕鲸业。这里的渔业给国外来访者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因此他们留下了有关成千条渔船、上万个渔民和数十万利润的夸张描述。

而当共和国在国外的许多生意中居于理所当然的垄断地位之时，在国内却并不给贸易垄断开绿灯。除了东印度公司，共和国内单一的垄断都无法维持下去。"自由贸易"和"贸易行为自由"是形成共和国优势地位的两个原则。鲱鱼捕捞业也不存在垄断，因为每个城市和每个乡村能派多少渔船就派多少渔船，它们只是受三级会议总会规定的一般规章制度的制约，而这些规章制度是为了尽一切可能将渔业掌握在荷兰人的手里。

但一到18世纪的前20年，我们看到这些渔业出现了缓慢却是不可遏止的衰退。不断与英国和丹麦的竞争，使捕鲸者陷人一个艰难的时期。无论德国、丹麦、英格兰还是瑞典，它们的国土离鲱鱼出没的地带都比荷兰渔夫更近，而荷兰渔夫在到达渔场之前先要跨越北海，最后是这些国家把荷兰渔夫赶走了。

在某些国家，特别是法国，人们制订专门的法律来阻止荷兰渔船捕捞的鲱鱼进口。共和国政府尝试了各种补救方式。在繁荣时期各省习惯于向渔业征税的职责被废除了。这并未起到

什么特殊的效果。然后便试着给予渔业补助，每年都有大笔钱用在这些补助上。最后许诺一艘船只要出海捕鱼，就可以获得高达500荷兰盾的奖励。即使这样也没能够阻止衰退。1736年有219艘渔船，10年后其数目只剩144艘了。此后数目就再没上升过。英国战争在数年间完全毁掉了共和国的渔业。

不过数目最大的纯收入都是从殖民地获得的，我们必须对殖民地的冒险予以特别的关注。因为这些冒险是共和国所使用的一般方式的最好例证。15世纪有许多贸易公司，所有这些公司只有两家由不少小公司合并而成的大公司生存下来，它们是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前者所扮演的角色是后者远远不能相比的，它形成了垄断，而在今天无论持续多长时间的垄断都是不能容忍的。这家公司于1602年创办，荷兰省大议长凡·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是它的组织者和主要领导者。它开始时只有650万荷兰盾的资金，多半是由荷兰商人捐助和支付的。从一开始它就取得了成功。创办后的5年，它的般票持续攀高，50年间升至380，18世纪时升至570，甚至超过600。创办后的5年，公司支付75%的股息。但这只是早年的情况，这种情况只是因为对新的殖民地采取残酷的掠夺方式才可能出现。公司存在的170年间的平均股息是21%。

当我们注意到每股是3000荷兰盾这个事实，就能确认从该企业落入荷兰商人腰包的数额：70年间公司支付每股的般息不少于107665荷兰盾。只要拥有几股3000荷兰盾一股的股票（一股照例要卖到18000荷兰盾），就能使整个家庭过得舒舒服服。

问题是这一切是如何取得的?取得的方式主要是保持公司在香料方面的绝对垄断。这种香料贸易是如此重要，我们又得塞进来一些数据。1632年，装着香料从印度返回的有7艘船，公司为这批货物花费了200万荷兰盾。它们的销售额却是

1千万荷兰盾。扣除400万荷兰盾的船运、设备等费用，其数字仍大大超过公司原有的资金。1661年，船队从印度装货返回，货物的价值为200万荷兰盾，销售额超过了400万荷兰盾。即使是在1672年，17世纪中最糟的一年，东印度公司也将价值超过4千万荷兰盾的货物运到了共和国。公司常以30分钱一磅的价格在印度购买香料。公司在国内出售它们的价格却是4个荷兰盾一磅，获利1200%。

以下是这些香料产品的年平均数：肉豆蔻30万磅，肉豆蔻干皮10万磅，丁香30万磅。照上面的分析，我们就深知这种贸易的利润了。从公司的观点出发，这种贸易最美妙之处在于公司能够调整香料的供应，以便保持所希望的高价格。在那些只生产香料的岛屿，公司是至高无上的。公司既可以鼓励生产，也可以毁掉多余的产品。当读到为了使肉豆蔻的价格能够上涨，整座生产香料的岛屿是如何被付之一炬的，我们几乎要对现代的托拉斯产生好感了。

至于这个公司的管理，现代的董事会如若效仿它的做法，那不用多久就得进国家的监狱。生意场上的荷兰人也像其政治生活中一样喜欢“委员会”。从来未见有一个人说了算的，什么都是委员会的人们说了算。我们已经看到整个联盟和省份的政治组织由无数的委员会和下级委员会成员构成。商业机构里也是一个样子，而东印度公司也不例外。没有独立的首脑人物，没有现代企业的那种总经理。公司分成4个“议事会”。这些议事会各自代表了一定数量的股东。最大的一个议事会是阿姆斯特丹的股东，他们投资370万荷兰盾。其次是泽兰，投资数为130万荷兰盾。霍伦[①]和恩克赫伊曾[②]的投资数分别为

① 霍伦：荷兰西北部城市。18世纪须德海淤塞前是荷兰重要港口。

② 恩克赫伊曾：16世纪、17世纪荷兰重要的渔业中心。

55 万和 25 万荷兰盾，代尔夫特和鹿特丹分别投资了 45 万和 17.5 万荷兰盾。

其他城市未被提及。因此，虽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得到三级会议总会的恩准，公司也悬挂联盟的旗帜，但整个事务基本上一直掌握在荷兰和泽兰两省的手中。其他省份的居民可以个人拥有股票，但他们不能对公司业务的管理施加什么影响。

每个议事会的成员只照看和自己特定城市有关的印度生意，监督和装备每个城市获准派出的船只，议定总资金中按比例分配的数目。就像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受强烈的地方主义的支配：从代尔夫特或霍伦派出的船必须返回代尔夫特或霍伦。但由于这个公司不仅是一个贸易公司，而且也是一个拥有至高权力的政治实体（它可以以三级会议总会的名义保持陆军和舰队、发动战争、签订条约和获得领地），必须有某个中心机构监督公司总的方针政策。

公司有一个董事会，其中代表阿姆斯特丹的有 20 个成员，代表泽兰有 12 个成员，其他两个城市各有 7 个成员。但就实际作用而言这个人数还是过于庞大，于是权力就被集中到了一个理事会，有 17 个成员组成，被称为“十七先生”。在理事会中，代表阿姆斯特丹的有 8 个成员，泽兰有 4 个，其他两个城市各占两个。第 17 个成员由除去阿姆斯特丹的一个议事会选定。事情又是这个样子。不管是在理事会还是在董事会，阿姆斯特丹凭它的大笔资金处于最有权势的地位，就像它实际支配着共和国的其他事情一样支配着公司。

“十七先生”任命印度群岛的总督，也任命所有其他的雇员、公务员、军官和法官，但这些需经三级会议总会批准。不过三级会议总会很少干涉。除了在总督的人选上，他们从不管东印度公司的任何任命。虽然他们有加以干预的自由，但实际上他们从不妨碍公司的事务。只要公司的股票报价在 500 和

500 以上，就不会有人过问。

可股东在主要的生意计划中又如何起作用呢？我们不是指全由摄政者任命的董事和高级官员，而是指拥有 2 至 5 股、与统治阶层毫无干系的小投资者。他们丝毫没有参与的机会。他们只需去领取股息并为给他们带来如此高额回报的出色经营而感谢他们的大人阁下。至于对他们所关注的公司管理施加哪怕是一点点的影响，那是根本办不到的。没听说过有什么股东会议。在这家公司存在的时候从未发表过有关生意的报告。按照原本答应的条件，公司每 10 年必须向三级会议总会报告一次，出示公司的资金平衡表。公司忘了这回事，三级会议总会也不坚持，一般股东想坚持这一条件也无能为力。

在公司创建的前 50 年，股东们为了在董事会中能有为自己说话的代表发起了一场相应的抗争，但却徒劳无功。他们的异议被搁置了，事实上只要保持高额的股息，股东们就不会深究公司经营的方式，只要这些方式的结果能令他们满意就行了。凡涉及公司的簿记账目都被严格地保密，甚至连“十七先生”的会议记录也不得保存。今天我们无法知道公司经营的详细情况。不过有一段有关他们所作所为的记录，读起来是很有意思的。这些董事沉溺于最令人震惊的金融欺诈来使收支平衡。在 17 世纪中，殖民地出产足够的东西以保持股息的高水平。可到了 18 世纪，有些年头若不举债就不可能使股票保持原来的高价位。为了不让国内的人知道年景不好的情况，公司往往宁可以 3 倍于国内的债息向印度或别的地方借钱，也不让国内的人知道公司缺钱。

在印度，就和当地人的关系而言，公司是严厉的主人。这是相当必要的，没有当机立断和严厉的惩罚，不可能在这世界上建立一个殖民大帝国。我们并不想为公司的做法辩护，因为他们的做法在今天是不能容忍的。而鉴于当时的情况，他们的

做法比拉丁民族由于宗教原因对被征服的人民不加干涉的殖民方式更为有利。公司是一个贸易企业，并想尽可能高地支付股息。

只要当地人能使这样的股息继续保持，公司愿意让当地人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正像我们今天的企业所做的那样，这是一个非常直率的商业协议。凡事只看结果，不必在与结果无直接关系的方面浪费感情。为了赚钱，公司强迫当地人干活。但为了避免叛乱和与当地人发生战争，公司只好保持某种分寸，因而制定工作制度得考虑双方的利益。

现在要谈谈在 17 世纪当总督的人，他们在印度处于军事和民事的高位。他们无一例外具有强者所有的优点和缺点。然而在 18 世纪，行政管理越来越多地落人一无所长的人士之手，他们是由于家庭关系才得到其职位的。正像我们先前说过的，印度成为那些或由于财政麻烦或由于民事丑闻不想留在国内的人去的地方。人人都只有一个念头，即渡过大西洋和印度洋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官员职位高低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为自己挪用的钱财数目的多少。有这样一帮官员，公司的业务日见其坏就容易理解了。1770 年以后公司的信誉已有很大问题。1780 年以后它实际上已经破产了。当共和国于 1795 年崩溃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是第一批垮台的机构之一。不过直到最后的岁月，它仍是股东们极好的收人来源。“大洪水”来临的时候，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们起码已过中年了。

西印度公司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创建于 1621 年，是按照东印度公司的计划做的，所不同的只是股东对公司的管理有较直接的影响。它像东印度公司一样意味着绝对的垄断，但它在这方面是失败的。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除了东印度公司，在共和国此一时或彼一时所建立的垄断就没有成功的。所有其他的，不管是贸易、渔业还是制造业，失败迟早是它们最终的

结果，而它们的位置为一些个人创建的企业所取代。奇怪的是在垄断不成功的地方这些个人企业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西印度公司开业时拥有比它的对手东印度公司更多的资金，人们捐助了整整700万荷兰盾。阿姆斯特丹最多，占总数的4/9，泽兰支付2/9，鹿特丹和霍伦各占1/9，还有1/9属于格罗宁根和弗里斯兰两省。乡村省份因而有了发言权。相比之下，东印度公司则完全掌握在荷兰人和泽兰人的手里。由于三级会议总会拥有价值50万荷兰盾的股票，执政拥有5万，这就使西印度公司更具有全国性。三级会议在拥有两股或两股以上价值6000荷兰盾证券的股东中任命74位董事。由19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直接的管理业务，其中8个成员由阿姆斯特丹任命，10个由其他4个议事会任命，1个由三级会议总会任命。

公司在非洲海岸、美洲东海岸和所有两个海岸之间及南边岛屿取得了贸易垄断。这意味着西印度公司打算把大西洋视为自己的私有地，正像东印度公司想要完全控制印度洋一样。这个公司也垄断了盐的贸易，事实证明这是非常赚钱的生意。

然而西印度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成功，东印度公司则万事顺利。后者发现在印度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已经做完了先期的开创工作。在他们把西、葡殖民者从要塞赶出去之后，发现当地人已有相当程度的文明，已相当习惯于在田地和种植园里干活。

西印度公司的领地也在赤道以南，从地理位置上说可以种植各种热带植物。不过这里没有足够开化的当地人适合做必要的劳动。必须先把当地的土著抓来，然后训练他们做固定的工作，种植园也必须规划，须花费二十来年才能有实际的成果。但那时候的荷兰贸易公司只求近期的效益，不会去考虑后代可能的利益。为他们孙子那一辈的富有而去建立殖民地的想法是荷兰商人所没法接受的。他们在穷乡僻壤开拓殖民地不是为了

自己的国家，而是为了从他们新征服领地的出产中获取股息。

即使他们想照现代的意义开拓殖民地，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可以移居这样的殖民地。整个共和国只有几百万人口，他们照看国内的各种行业还不够用哩。在国内不费多大力气生活就挺能过得去，要他们去一个遥远而且不开化的国家谋生，这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吸引力。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可能如愿得到新阿姆斯特丹[1]，事情不成功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移民。并不是说 17 世纪的荷兰人在沿哈得孙河[2]的定居中未曾看到希望，但国家着手做的事情远远超出其能力所及，因此它在那些短期回报最少的地方遭到了失败。东印度被证明是世间最多产的地方，荷兰的资本在那里大获其利，因此荷兰人利用东印度的殖民地时十分小心谨慎。西印度的殖民地并非首选，因此它们缺乏积极的支持，那里的人只好自己设法过活。西印度公司有过一些辉煌的日子，但那些日子只能说是依靠掠夺的结果，除此我们实在找不到别的说法。

每当该公司的武装力量抢夺西班牙珍宝船队和攻占葡萄牙殖民地时，股息就突发性地猛升一阵，但没有稳定和持久的利润，这些反常的意外之财并不能使公司免于 1674 年的过早破产。但由于三级会议总会以官方的姿态承担了股份，摄政者照例不会让与他们有官方联系的事情上破产法庭。在公司的景况最终无可救药之前，公司仍受到承认，并在新的允准下继续经营。

但这个新的允准实际上意味着它已不再作为一个垄断企业而存在。人们认识到至少在世界的那块地方，搞垄断是一个失

① 新阿姆斯特丹：今美国纽约的一部分。1626 年，荷属美洲新尼德兰省总督以价值 60 荷兰盾的物品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曼哈顿，1653 年设为城市，取名新阿姆斯特丹，成为新尼德兰省省府。

② 哈得孙河：在今美国纽约州境内。

败。公司确实还允许拥有非洲西海岸、西印度群岛、苏里南[1]、埃塞奎博河[2]、伯比斯河[3]和库拉索岛[4]的专有贸易特权，但它已不能保持其专有权。南美有不少殖民地在西印度公司创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当公司按其原先获准的权力，要求对所有这些地区的所有权时，遭到了原先主人的强烈反对，致使公司被迫做出妥协。更为复杂的是，这些殖民地曾被法国和英国占领，荷兰人又好几次收复这些地方。

问题得到最后的解决靠的是典型的共和国方式——不可或缺的委员会、下属委员会和其混杂的拼凑物。有关苏里南这块殖民地，在公司与泽兰三级会议之间进行了多年的争论。后者声称苏里南原本是他们的，他们拥有优先权。最后泽兰三级会议将苏里南卖给了西印度公司，公司支付的数目为26万荷兰盾，然而公司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又将刚买来土地的1/3卖给了阿姆斯特丹，1/3卖给了一个叫科尼利斯·阿尔森的阿姆斯特丹商人。

阿尔森漂洋过海到他的新领地定居，但只住了5年，他于基督纪年1688年被自己的士兵谋杀。其领地由他的家庭继承。他的家庭将继承来的土地以70万荷兰盾的价格（原价为7万荷兰盾）卖给了阿姆斯特丹。因此，在18世纪后半期，阿姆斯特丹拥有并直接控制了这块有价值的殖民地的2/3。这块土地上有约400个种植园，3万多奴隶在那里忙碌。那里出口价值数百万荷兰盾的可可、咖啡、糖和棉花，运输业因此保持着稳定的收入来源。

---

① 苏里南：位于南美洲北部沿海地带中部，1667年荷兰以出让新阿姆斯特丹（纽约）得到苏里南。

② 埃塞奎博河：在圭亚那中东部。

③ 伯比斯河：在圭亚那东部。

④ 库拉索岛：加勒比海荷属安的列斯群岛6个主要岛屿中最大的一个。

埃塞奎博河流域的情况与之非常相似。泽兰的三级会议对这里也要求优先权。最终泽兰三级会议正式承认了公司的绝对权威，但公司也允许这块殖民地仍处于泽兰三级会议的直接控制下。

伯比斯河流域的殖民地是直接由弗拉兴[1]商人的一家公司建立的。他们保留对这块土地的控制，但最后他们同意向公司每一艘用于贸易的船支付575荷兰盾。

加勒比海中相对较小的岛屿，虽说缺少淡水和土地，但它们用作仓库和荷兰走私船行动的基地却是极有价值的。确切地说是荷兰商人在使用这些岛屿，由于作为一个官方机构，公司不能过于放任自己去从事这种违禁贸易，因此公司也不能在这里保持垄断。每当人们的抱怨上达三级会议总会，三级会议总会就会这样予以回答：这些岛屿的贸易实际上对所有去那里的人开放，要当局去阻止走私是极端困难的。

公司在18世纪只在一个方面保留真正的垄断，那就是奴隶贸易，它能使公司的理事们支付所投资金的3%～4%的股息。此外，公司在18世纪时就无所作为了。面与此同时，私人企业正开拓自身的领地并创造大笔的利润。

这里或许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的一些地区在商业、渔业和运输业所有这些分支的缓慢和逐步的衰退中蒙受损失。荷兰省的一些地区大受影响，特别是赞河流经的地区——这是连接阿姆斯特丹和北荷兰省中心地区的水上捷径，该地区的经济依赖于造船业。在这些地区，人们建造船只，制造船的装备所必需的物品。这里也是进口的货物预备出口到别的国家的集散地。

自从1596年建成第一个木材厂，风力（这通常出现在国

① 弗拉兴：现纽约市昆斯区北段，在弗拉兴岬角上。当时那里是荷属新阿姆斯特丹。

内这种海拔低且平坦的地区）运用于各种工业企业。从斯堪的纳维亚和黑林山[①]运来的木头在这里被锯开，经设计造出体积小却速度快的船只。制绳作坊、柏油工场、船帆铺、鱼网工场和木工作坊，为商船和渔船制作多种多样必需的物品。等到各种船只回到祖国之后，鲱鱼必须腌制，鲸脂必须提炼，稻谷必须脱壳，所有这一切都在这里完成。这里河道纵横，降低了运输成本，更便利了运输。

可当渔业开始失去了重要地位后，贸易公司需要的船只开始减少，所有这些与造船业息息相关的小产业便开始遭殃，原先一片繁忙的地区沉寂了。那里的人并未真正陷于贫困。但那些看到利润持续减少的人更愿意丢下他们赔钱的买卖，而将自己的积蓄重新投资，在他们曾经忙忙碌碌的工场所在地盖起了漂漂亮亮的房子，过起了远比实际做活要舒心的日子。

吉本[②]对罗马帝国的衰亡做一番大致的描述用了几千页。荷兰共和国要小得多，但它的衰亡是如此复杂的问题，以至于我们不能希望在这短短的篇幅里做出适当的描述。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读者搞清楚，繁荣逐渐逐渐和非常缓慢地衰退，部分是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更多的却是由人们角色的变化引起的。我们心里应该明白，这种事情不可能突然发生。它是一个为期几十年的非常缓慢的过程，让人难以察觉。只有在一个特定的事例中，我们才能看到突如其来的变化。不幸的是这个意外的衰退发生在最有害的方面，它造成了作为欧洲先进国家之一的共和国威望的极大损害。我们指的是 1715 年以后对海军舰队的全然忽视。

17 世纪末，共和国保留了一支由 120 艘舰船组成的舰

① 黑林山：德国巴登一符腾堡州山区。

② 吉本（1737—1794）：英国 18 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记述了从 2 世纪起到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为止的历史。

队，其中 90 艘是装有超过 74 门炮的主力舰。50 年以后，这支舰队只剩下不到 50 艘，其中只有十几艘能用。1696 年，共和国有 8 艘配有超过 90 门炮的无畏战舰等级的战舰。到 1741 年，这类战舰只剩下了 1 艘，而且船龄已经 42 岁，已完全不能使用了。30 年以后，当时战舰的体积又有很大增长。超过 100 门炮、船员超过 900 人的战舰，英格兰和法国各有两艘，西班牙有 1 艘，它们还有好几艘超过 80 门炮的战舰。共和国拥有 4 艘装有 70 门大炮的战舰，但其中有的已年久失修，老化严重，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由于在海洋上没有足够的自卫手段，共和国便被完全掌握在自己的商业对手的手中，即使共和国的商人有通天彻地之能，也无力保住市场了。

是什么引起政策上这样的突然改变?有好几个原因。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也是人的问题。德·维特和威廉三世两人都对保留一支强大的舰队极有兴趣。德·维特以他攫取的权力、威廉三世以别人及时提供的权力迫使海军部建造军舰，并迫使各省提供造船的经费。乡村的省份不乐意支付他们的份额，但他们还是付了。但威廉一死，国内立即回到了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各省暗地里拒绝为保留和扩充舰队拿出必要的专款。正像我们前面想表明的，三级会议总会不是国会，在国会人们可以辩论建立一支强大舰队的必要性，在那里只要赢得多数就能把其观点强加给整个国家。只要在荷兰没有足够强有力的人威逼其他省份就范，各个省份就死抱着各自特定的利益，拒绝为全体的利益贡献一个便士。

海军部的情况也是如此。共和国的 5 个海军部彼此独立地运作。有执政的时候，执政就是它们的总指挥。这样的话，他可以制订总的政策，并迫使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一旦这个总指挥没有了，每个海军部便拒绝做其分外的事情。过去的混乱又回来了，舰队因而遭了殃。

17世纪晚期的持久战争造成了巨额的开支。在战争最后结束之前，威廉已经去世，各省突然停止提供经费。结果是各海军部立即面临破产。原先储备作为补充的一定数量的进出口税不够使其继续具有偿付能力。1706至1711年期间，各乡村省份不再为舰队支付一个便士，维持舰队开支的全部负担落在了荷兰和泽兰两个省的头上。但这两个省不能只靠他们自己来提供必要的经费。由于战争还在继续，战舰还必须留在深海，海军部便得到允许借钱。一些爱国者愿意取9%的报酬借钱给海军部。但甚至在借了大笔款项之后，仅荷兰省的3个海军部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的时候就欠债达1千万荷兰盾。一旦战争结束了，连荷兰和泽兰也对舰队失去了兴趣。军官和水手被解雇了，他们或者过起了市民的生活，或者移居别的国家，为能付得起报酬的外国海军服役。当军官们因无力还债被投进监狱时，便出现了各种流言蜚语。

荷兰，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很想使他们的海军部免于真正的破产，但他们无能为力。从1713至1770年，在57年的时间里，其他6个省份没有为维持舰队开支付过钱。

以下是发生在18世纪的几个事例。1721年，北荷兰省只拥有3艘战舰，其中两艘分别有20岁和30岁舰龄。在1713至1746年之间，弗里斯兰的海军部造了一艘小型战舰。鹿特丹的海军部在1713至1725年间没造任何战舰，对原有的战舰也置之不管。泽兰在46年间，即1700至1746年，建造了4艘缺乏战斗能力的小军舰。只有阿姆斯特丹受到荷兰三级会议的支持，保留了6艘战舰，它们能够用于保护其商船不受非洲海盗船的袭击，但不能在战争时期征用。人们竟让保留下来的旧舰船泡在港口里逐渐烂掉。曾经是人们热心向往的海军职业，已变得完全不值一提——没有提升的机会，连固定的薪金都没有保证。

最后舰队的状况简直是糟糕透顶，曾是主要航海国家的共和国为了招募到足够的军官，竟然不得不让外国人到自己的海军里服役。荷兰舰队的衰落一再使国人蒙受奇耻大辱。大西洋上的荷兰商船和北海的荷兰渔船面临谁要是费心去拦截它们都可以进行搜查和捕获的局面。英格兰本来就一直保留着搜查战时禁运品的权力，此时则不断拦截荷兰船只，而不管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在阿尔及利亚，必须向海盗行贿才能使荷兰船只免受侵犯。在西印度群岛，海盗抢劫了价值数百万荷兰盾的荷兰货物。

商人们怨声载道。有时候他们将请愿书送到三级会议总会，后来又有了执政，他们就向执政请愿。回应无一例外是：这问题会予以考虑的。这样的"考虑"必需的时间常常要持续整整5年，甚至到了那时候也只有一个推诿的答复。整个世纪里就没有什么时候想认真地改造舰队，并使之具有战斗力。既然不想靠军队和舰队的实力维护其权益，共和国就没有正当的理由抱怨敌对国家摧毁它的繁荣。事实上它是自寻短见。

在统计数字和年鉴的帮助下，我们现在能描绘出这幅图景，然而我们的祖先自己却没法清楚地看到。确实，对那些享受富裕的闲暇生活并吃利息的人来说，对那些感觉自己生活在享有最大恩惠的国家中（那是上天的奖赏，对如此多的公民美德的赐予）的人来说，好像黄金时代终于来临，已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了。少数心怀不满的商人组织请愿，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竟然在这个自由贸易的大本营要求建立贸易保护体系！他们提出的维护东印度公司经营的方式也是相当吃力不讨好和非常令人怀疑的。这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商人们总是不停地抱怨，甚至在年景好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东印度公司也称不上是商业信用的楷模。

至少在那个世纪的前70年，大多数人对那些不断增加的

衰退信号的担忧程度，还不如如今的美国人。18 世纪的荷兰人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一切，只要今天还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就不会去为明天而担忧。

因为谁都知道共和国是“舒服”的居住地。自 1672 年起，没有外来的敌人威胁它的领土或占领任何一块土地。国家总的来说是安全的，哪儿都没有遭遇窃贼或强盗的危险。英格兰旧时的拦路强盗在低地国家找不到其同类。共和国人口稠密，在摄政者措施严厉的统治下，罪犯轻易就会被送上绞架。与西班牙的战争遗留下来的乞丐和衣衫褴褛的流浪者阶层（他们曾被伦勃朗[1]和 17 世纪的同类画家用作模特儿）已完全消失了。携带武器的习惯因被认为是毫无用处和有点荒唐而被放弃。这种总体上的安全感使不同地区之间建立优良的交通体系成为可能。经历“荷兰之旅”的外国人都不会忘记对在共和国旅行的安心和舒服表示惊叹。除了通向汉堡、科隆和布鲁塞尔的主要道路，东部省份的乡间道路和欧洲其他地方的道路相比好不了多少。然而在有复杂的运河水系、几十个商业城市要求有快捷的交通方式的荷兰、泽兰和弗里斯兰诸省，已发展起了运河船运系统。这个系统令光临这个国家的地位显赫的外国贵宾羡慕不已。舒适而且定时开出的运河客船确实不免使人精神振奋，就像我们现在头一回看到美国特快列车时的感觉。也许还是定时最能引发他们的羡慕。除了运河结冰的时候，运河客船的运行就像火车一样准时。它们不受天气、风力或道路状况的影响。打雷下雨的时候则由一匹耐力非凡的马拖船，使船只平稳得就像在好天气里行船。对那些想知道细节的读者，我想谈及提供时间表和票价，以及比较各个公司优越条件的当日乘

---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伟大的画家，他创作了大量令人难忘的油画、蚀刻画，而以肖像画的成就最高。

船指南。

作为当时所提供的优良服务的一个例子，我们要提到每天客船的趟数。如今在代尔夫特和鹿特丹之间每天有 24 趟火车，而那时则有 16 趟客船。当然那个时候乘船 5 个钟头的路程，现在乘火车只需要 20 分钟。但那个时候的人并不觉得需要像我们今天这么匆忙，当时的人们更看重能在运河客船的船舱里舒服地抽着烟斗，悠闲地谈论世界上的事情，而不像今天，人们在电车上一谈便是最新的新闻时讯。

中世纪时旅行通常具有的烦恼，在共和国也像别的地方一样明显存在。那时候旅行者经常被迫绕道而行，因为在耶稣纪年的某个年份，某个小城市设法获得了一点什么特权。但在商业需要的压力面前，这些旅行的烦恼逐渐消失，18 世纪不允许一切都停留在 12 世纪。18 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以政府的所在地海牙为中心，我们找到了以下的时间表：去阿姆斯特丹，10 个小时；去哈勒姆，8 个小时；去莱顿，两个半小时；去代尔夫特，1 个小时；去鹿特丹，6 个小时。由此可见，共和国所有政治问题的处理被无休止地拖延当然不是由于路途遥远造成的。国家首都发生的任何事情，实际上在同一天就为那些最主要的城市所知晓，3 天之内甚至能传到国家的偏远地区，因为在荷兰和北方省份之间有非常便利的交通，那里有往返于阿姆斯特丹和莱默（弗里斯兰的一个村庄）之间定期往返客船的服务。这段路程需要走 10 个小时，有船只直接与去吕伐登[1]和北方的运河船连接。

至于通向东部的省份、德国和欧洲的东部，则要路经乌得勒支。这个城市离阿姆斯特丹有 8 个小时路程，那时候也像现在一样是国家的陆路枢纽。它是将来自欧洲东部的消息传到荷

① 吕伐登：尼德兰弗里斯兰省省会。

兰的某种情报集散地，就这点而言它是共和国国内外消息最灵通的城市。途经安特卫普[1]可以到达南方的国家，特别是比利时和法国。鹿特丹与安特卫普保持直接的联运——先是通过水运到达穆尔代克，然后坐驿站马车经过布拉班特省。

和英格兰的联运须经过荷兰南部地区胡雷岛上的港口海勒福特斯勒斯。从鹿特丹走水路 8 个小时就能到这个城市。开往英格兰的邮船每星期开出 3 趟，一天内便可到达英格兰。

与印度通航则要寄希望于碰巧有商人要派到那里去。在 18 世纪的晚期，人们建造一批体积小、速度快的船，想在荷兰和巴达维亚[2]之间作为期 10 个月的航行，但在这项服务正式确定下来之前，东印度公司就垮台了。

至于美洲，凡想去南美殖民地的乘客都可以乘坐西印度公司的船。那些在北美有买卖的人（这样的人很少）不得不途经英格兰。在阿姆斯特丹与波士顿之间设定期航班的计划虽被考虑，但一直停留在准备阶段。

虽说依照我们的观点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总的来说这种交通体系，特别是与别的国家相比，确实是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它使国家的各个地区和世界上那些想和共和国做生意的国家可以快捷和安全地交往。

与交通体系相联系，共和国邮政制度能够很早便得到发展。不用说，这个邮政制度不直接受三级会议总会的控制，它通常由各城市自己来维持。各城市都拥有将它们的信件带给某人或某公司的特权。各公司都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就像今天美国的私人电话或快递公司。不过尽管最终的目的是自私的，每个邮政公司只是试图尽可能地从这制度中谋取利润，但间接

① 安特卫普：比利时西北部港口城市。

② 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旧称。

的结果是普通民众受益。私人创立的企业和彼此竞争的公司可能不是理想的制度，况且它们经常经营着它们绝对不该经营的业务。

邮政制度像其他的事情一样，在荷兰和泽兰两省发展最快，那里的商业城市早在 15 世纪就建立了信使服务。建立一个体系的最大困难是来自处于大城市间路线上的小城市和乡村的对抗，后者都想通过拦截路过它们的领地的大邮政公司的邮件捞些外快。

然而在 17 世纪，人们发现这种各方面都只顾自己的利益并想损害同业的混乱制度，对优良的服务是很有害的，渐渐地，公众要求改革。但改革可谓姗姗来迟。城市当局通常从邮政体系中获利甚多，因而不愿改变其原来样子。更有甚者，市政当局故意阻碍官方的邮政制度的引人。直到 1748 年暴动之后，新执政获得邮政总督的职位，才决定每年邮政体系中的收人应进入省财政，而不是落入摄政者的口袋。直到这时候，摄政者才与其政治伙伴分享自己原先的特权。

在这里不可能列出成百条不同的邮政线路或 18 世纪开始使用的邮政线路网点。我们只是希望读者注意到这个事实：只要不是一贫如洗，每个人都能利用这个邮政体系。他只要花大约 4 个便士，就可将他的信件在不到 5 天的时间内送到共和国的任何地方，大城市之间一天之内便可送到；花上 12 个便士，就可在一周内将信送到汉堡、巴黎或伦敦。

在荷兰中心地带的一个小村庄——阿尔芬，是 5 条主要的邮政线路汇集的地方。那里设立了一种邮政交换所，来自国外和国内大城市的信件在这里集中和分类。对北方的贸易极感兴趣的阿姆斯特丹，早在 1606 年就与汉堡、瑞典和波罗的海城市有定期的交往。18 世纪来自英国的信件则一周两次途经布里尔和海勒福特斯勒斯。邮路不断得到改进，邮件快捷递送的

要求促成了许多更短的新邮路的开通。

与法国的来往信件由于要通过比利时则一直存在麻烦。当时比利时作为奥地利的一部分，邮政方面为塔克西斯亲王的“皇家信件递送”[1]所专有。他们的殿下永远在所恩准的荷兰信件携带到他们专有领土的数量上与共和国纠缠不清。这场争论从未真正得到解决，但在达成暂时的妥协之时允许问题先搁置下来。不过对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信件服务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争论。去这些地方的信件服务是始终如一的，因而在18 世纪许多荷兰商人一直将他们的船只留在地中海，以便从事各南方港口的运送业务——他们完全靠信件向船长们发布指令。

说了这么多有关商业上的事情，也该说说我们共和国的货币和银行制度了。虽说按我们的观点它是不健全的，在当时却极大地推动了贸易。它既不是全共和国的统一制度，也不在三级会议总会的直接控制之下。省份观念太强了，所以不可能出现统一的制度。这使中世纪的制度得到了改善。面中世纪的制度在许多国家几乎一直留存到今天，这种制度给所有那些与它打交道的人不断带来烦恼和损失，只有那些投机换汇的人才从中得利。在 17 世纪，从各种不同的地方币制发展起一种通用的标准硬币——荷兰盾。但这对于较大的生意来说面额实在是太小了，所以生意界常常用另一种货币来计算，其价值为两个半荷兰盾，相当于我们今天用的美元。

到了没有执政的时候，各省铁了心想从三级会议总会的控制下获得自由，货币流通制度又陷人无序状态，以致在 1681至 1694 年间人们觉得有必要进行全面的改革。在这方面拥有

① 指塔克西斯邮政网，由特恩和塔克西斯家族在西欧和中欧创办的私营邮政网。

最大利益的荷兰省成为领头羊，建议发行3个荷兰盾一枚的新的标准货币，它将保持一个名义上的价值，为流通起见，它还可以分为两个半、两个、一个和半个荷兰盾和几种面值更小的硬币。另外，还确定了两种价值分别为14荷兰盾和7荷兰盾的金币。虽然一些旧货币仍在流通，各省的造币厂通常从较低等级小小的通货混乱中谋取额外的利益，但标准货币和金币的价值得到严格保持，从而使各省之间的贸易变得方便，实际上不必再担风险。

至于银行制度，在这方面首创的荣誉应归于阿姆斯特丹，早在1609年它就建立了第一个城市银行。这个银行经营一般银行业务，最重要的是，它只支付真币。市政当局自身作为其银行存款的担保，只要它们还留在银行里，就不能附属于任何用途。银行对各国通货的储备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会有任何支付不了的风险。这使该银行在18世纪频发的危机中成为最有价值的机构。该银行不仅是共和国，还是全欧洲工商界的重要支柱，其信誉就像它那些到处可以兑现的汇票，极大地推动了外国的商业。

在多德雷赫特[1]和米德尔堡[2]于1616年、鹿特丹于1635年建立了类似的机构之后，荷兰成为欧洲兑汇业的中心，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18世纪后期汉堡和英格兰的银行建立的时候。上述两个银行与共和国的银行在同一业务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前面的段落里已试着描述共和国历史的物质背景，现在我们必须关注人了——在那样的境况下生活的人，那些人从应

① 多德雷赫特：今荷兰南荷兰省城市。

② 米德尔堡：今荷兰南荷兰省省会。

归功于他们的父辈的商业诸多优势中受益，他们自己并未付出多大努力，腰包却装得满满的。

在 18 世纪，共和国的地域内有大约 170 万居民。尽管按神学观点而言，他们在法律而前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而且不承认存在特权阶层，但人们却从名分上分成三个部分：最高的是摄政者阶层，底层是普通民众；在这两个划分明确的阶层之间是一个人数较多的富裕阶层，这些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享有富人的特权，但由于他们不属于摄政者家族，便在参政方面被排除在外。

摄政者都有着血统关系。他们中有些人比其他的富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地位有什么差异。就像在我们的时代，一贫如洗的德国低等级的小亲王的地位并不低于其非常富裕的邻人。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也不比外省某个角落里的贫穷的同阶层人士优越。而其他两个阶层又被分成和再往下分成无数的等级，人们感觉每个等级的明显存在就如同那是神圣的上帝制订的，而且居民们在某些邻居之上和某些邻居之下保持着相宜的位置。

科学和艺术的辉煌成就得不到承认。摄政者对画家的使用方式与对鞋匠的使用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一个是制作鞋子，另一个则是制作绘画。至于涌现出所有这许多画家、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民众群体，这个此时为他们的国家感到自豪的群体，他们似乎也相信这些方面的特殊才华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很不错的，但他们拒绝承认具有这样才华的人由此便能摆脱全能的上帝施恩让其置身的阶层，从而比卑微的同阶层公民优越。结果是任何具有与赚钱无关的特殊才能的人都被迫过一种与其同胞隔绝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或遭受平时不受重视的痛苦。以下的事实将为之作证——为数不少的画家破产，为数不少的文学家贫困交加，为数不少的享誉国外的科学家则根本无人过问。

就日常生活、思想和感觉的方式而言，共和国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国家，在这里，全能的金钱是成功的标准，在这里，“善”的含义就是能还得起债，“恶”的意思就是无力还债。如此奇妙的一个艺术流派竟能在这样令人沮丧的境况中得以发展，共和国在其存在的两个世纪里能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对人类知识宝库作出贡献，凡此种种，只是有助于让这些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无利可图的艺术和学问分支的人士表现自己是多么的敝帚自珍。

这些怀有科学或艺术志向的善良人士总是只占极少数，他们的痛苦不会比美国学者和科学家的悲惨境地更能打动公众。大多数人虽崇敬他们的发现，但务实的人不会让自己太感情用事。大多数人心满意足地过日子，怜悯这样的邻国——在那里只是因为能在一块亚麻布上比别人更能涂抹颜料，或因为发明除了放大水珠就没别的用处的工具便被当作是一个杰出的绅士。

在宗教问题上，摄政者自然是非常保守的，他们都属于正统的荷兰改革派教会，而其他两个阶层却分成众多各不相同的信仰派别。虽说共和国战胜西班牙是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一次胜利，但总是有相当大数量的人对他们的旧教义[1]保持虔信。总的来说他们平安无事。他们属于较为贫困的阶层，只要他们不表现出将他们的信仰带入政治的意图，他们就是完全无害的，就允许他们安心地做礼拜。为使偶像崇拜和香火的摇晃不致激怒正统新教的兄弟们，他们被迫在远离公共街道的偏僻地方或小圣堂里聚会。但当时要是他们愿意给行使维护正确信仰职责的警察官员一点好处，那他们的奉献仪式就可望不受打扰。

---

① 指天主教。

在社交方面，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关系并不非常密切。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打交道没法改变某种不安的感觉：对宗教法庭的所作所为和耶稣会[1]阴谋的幻想使新教徒疑心信天主教的邻居，也牵连了后者的耶稣受难像和所有那些莫名其妙的礼拜形式。另一方面，天主教徒的精神导师悉心教导信徒们，共和国毕竟是魔鬼的发明，它抢掠了神圣教堂所有的财物和动产，现在又想引诱它的子民远离他们原先圣洁的信仰。天主教徒确实从未有过对他们共同祖国的背叛行为，而新教徒也从未试图拐走天主教会的子民。但这样的偏见却得以长存，甚至今天依然存在。

过去路德教派曾在共和国盛行，但从那时留存下来的路德教徒并不多。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后来改投了加尔文教派[2]。然而在国家的某些地方，却有大量的浸礼会[3]教徒。特别是赞河流域，那是北荷兰省高度繁忙和发展的地区，浸礼会信徒构成了居民的大多数。正由于他们在政府里没有任何权益可言，他们便将全部的注意力都用于他们的日常事务；也正由于他们非常节俭和刻苦，他们往往积累了大量财富。财富使他们成为理想的纳税人，因而政府就不去管他们的事了，他们想在什么地方建教堂都行，允许他们保留自己信仰的温床。

由于荷兰人本质上是自我反省的民族，他们沉溺于许多经常是相当奇异的信仰方式。然而在 18 世纪，统治阶层已经变得远离正统，对所有这类事情显得十分冷淡。人们在获得拯救

---

① 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出现于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它是天主教反对该运动的主要集团。

② 加尔文教派：基督教新教的主要宗派之一，是以加尔文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派教会的统称。

③ 浸礼会：基督教新教的主要宗派之一，17 世纪前期产生于英国和在荷兰的英国流亡者中。

的最好途径和手段的问题上尽可以持有与众不同的观念，只要不打扰旁人就行。即使他公开否认耶稣，到犹太教会堂去礼拜更古老的神明，只要他是自己这样做，他仍然可以被接受。

回顾这个小国家的芸芸众生，其中有古老的荷兰血统，有法国、德国和英国移民的后裔，还有闪米特族或爪哇人的血统（至于殖民地的各种族之间则难以划出明确的界线）。其人口状况竟是如此复杂，确实令人相当吃惊。也许最令我们惊讶的是，在至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竟没有出现针对摄政者统治的严重的反抗事件。正像我们前面所说过的，摄政者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寡头政治集团，他们的政府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那为什么当时的民众很少发生反叛、起来摆脱他们的统治呢?看来是因为民众本身没有这种感觉。在和过去的事情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一定别忘了要估计到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观点。在 18 世纪，一般人接受自己无参与资格的政府，就像一般基督徒接受同样没他们的份儿的上帝的统治一样。

上帝在那儿照看太阳、月亮、大地、雨水和星星；而他们的大人阁下——摄政者们在那里保证使城市得到很好的管理，使医院、救济院、当铺和孤儿院得以建立，并提供一千份小工给需要的人。

一些有用的常识使摄政者在方式方法上避免了过于官僚主义或过于迂腐。在与民众打交道时，他们装出显示尊严的和蔼态度，据说这从来都能给卑微的臣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税金很高，而且必须立即支付，但人们总是觉得他们付出的钱得到了等价的回报，而不像许多国家那样，税金只是用来维持几个郡的奢华生活。对于一般公民，他出生的城市就是他的世界——从市政当局雇用的保姆给他裹上第一个襁褓，直到有一天由市政当局雇用的殡仪员在当地的教堂将其埋葬。

为了经商或为了求学，可能会使某个公民短时间离开他的

小世界，但他是属于那里的，他希望回到那里，在那里他认识每个人，别人也都认识他。当我们看到为数众多的应民众要求制作的绘画和印刷品，便能了解他们是多么爱自己的城市。画面上有城市的水泵、官方的鱼市以及与公民们出生在这幸运之地有关的每一点景物。

要是我们走访其中的一个城市，只要不去考虑缺乏格调的现代城市改造，我们就能理解 100 多年前的祖先怎么会对自己的城市怀有如此的感情。即使是在巴罗克和洛可可[①]最糟的时期，其建筑式样也绝非糟糕透顶。外表美观的房屋，运河沿岸的堂皇的树木，公共建筑物表现出公民对自己城市的自豪。城市所呈现的总的景象一定会使观看的人赏心悦目，并因确信这一切或多或少直接属于他以及城市的建设和维护有他一份子而产生感情。荷兰城市的街道很早就铺筑了路面。在别的国家，让那些高贵的绅士和漂亮的女士乘坐自己别致的轻便马车来应付泥泞的街道是不算什么的。但在荷兰的城市，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从船上把货物拖到仓库去，就这个目的面言铺筑路面便是至关重要的了。

夜间街道上点灯照明。牛脂蜡烛或油灯并不是理想的照明设备，但这却能使鬼鬼祟祟的盗贼和拦路抢劫的强盗不敢过于猖狂。增强了公众的安全感，人们便能外出拜访邻人，从面增强公众的社交性。不管是出于天然的本性还是出自教会怕人们不够慷慨而植入人们内心的恐惧，荷兰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创办了医院和为体弱年幼者设立的救济院。务实的心灵使他们从未对建造教堂有多大的兴趣，但建造无数的公用设施的习性早在 9 至 10 世纪之间基督教刚刚取得成功时就已经被赋予了。

① 巴罗克和洛可可：巴罗克是西方艺术史的一个时代，大致是 17 世纪，有庄严高贵的特点。洛可可是 18 世纪初源于巴黎的一种精致的装饰艺术风格。

天主教会失去其权威之后，这样的乐善好施继续得以保持。不管为慈善目的捐献的钱财是否曾遭腐败的侵蚀，也不管是否是为了看到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大理石石碑上的那点虚荣和快感、只好随之捐出大笔的钱，这些都无需加以特别的考虑。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事实是，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老弱病残无须被迫去工作，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们得到照料。这些设施的监督权掌握在由有慈爱之心的年老的先生女士组成的理事会手里，这些女士先生是自愿参与这些服务的。以孤儿院为例，他们注意使院里的孤儿学会一种手艺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成员。

富裕的中产阶级无须成为可怜的救济的受益者，他们可以靠人寿保险制度来保障家庭的未来。这种制度早在 17 世纪就得到了发展，此时在这个国家里到处是商业性的保险公司。

18 世纪，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潮是相当强劲的。乡村地区的年轻姑娘到城里来寻找家庭女佣的差事；年轻小伙到城里想找到能比农村社会所能提供的更具吸引力的职业。

与走向繁荣的进程同步的是生活时尚发生的巨大变化。生意人不再住在他们做买卖的地方。居住区逐渐迁移出了工场或办事处。他们先是把居室搬到了楼上，但要走进居室还要经过楼下的工场。随后居室有了一个单独的入口。零售商和手艺人至今仍守着这种老规矩不放，但商人却把真正住的地方搬到了城里更适合居住的地方，而他们原来的住处只是用作办公的地方。

这种一人需要两处居所的新的生活时尚大大扩展了城市的空间。由于已经不存在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久城市便发展到了远远跨出城墙的地方。房屋本身在 18 世纪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注意到我们所知的最早的遗迹用了“安乐居”这样的名字。卫生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当时就像社会学一样的默默无闻。运河用作排水沟，同时又提供饮用水。人们相当快乐地生活，多年处于这样的境况之下已使他们习以为常。由于他们不

知道怎么样更好，也就没有改善的要求。不过他们已开始懂得什么叫舒适。国外开始使用石砌烟囱的时候，它们很早以前就已在这里成为房屋的一部分。对于中世纪没有烟囱的老房屋，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人们仍继续或多或少感觉到冷，直到18世纪引进了砖炉。木头地板取代了石头的地面，富有的人家用大小不同的地毯铺在地上，而穷人家里则用草垫。卧室和起居室分开了。

乡村也受到了关注。中世纪的人很少知道乡村或自然意味着什么。当时的人知道城门外就可以找到乡村和自然，但去那些地方并不安全。但此时国外的敌人或国内的游民已不再构成威胁，允许较富裕的阶层到乡郊野外建造住处，在夏日城里炎热难当的时候去那儿居住。围绕着每个大城市都有遍布夏日居所的地带。它们通常处于一条运河的岸边，以便生意人能借助运河里的船只自如往来。

更加温暖也相应变得干燥的住房使人们的衣着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必再一年到头穿着毛皮衣服了。暖和的房屋允许人们穿轻便的丝绸和亚麻布服装，不必再穿旧式较重的羊毛衣服。旧式戴起来沉甸甸的帽子，人们曾屋里屋外都戴着，现已逐渐被弃用，只是作为拿在手里的显得彬彬有礼的装饰品。

屋里的家具也变化了，这也表明了人们思想方式的变化。旧时荷兰人在屋子里摆放家具就好像他们几代人都不曾想过要挪挪地方。一只柜子摆放在某个地方不只是为了当时的需要，而且会使其后几代人受益。屋子里摆设的桌子椅子和其他一切的器具都考虑到了未来几个世纪。然而到了18世纪，观念大变了。祖母的衣柜被抬进了阁楼，由于它们能防虫蛀，正好用作放漂亮的现代服装的柜子。此时房屋里的家具都换成更时髦、更流行的新品种，它们不过是当时巴黎正巧流行的东西的廉价仿制品，创造力已丝毫无存。不过没人去寻求创造性，全

方位追求“时髦的东西”远比独创要重要得多。上层家庭在模仿外国生活方式、习惯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他们把自己的语言看作方言土语，更偏好用法语或英语说话和书写。

相对而言，在衣着和家具方面模仿法国人比较容易，而要模仿法国的先生女士穿着那些衣服和在镀金的桌椅间走动的优雅劲儿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是更为困难的事情。比如女士们满街乱窜或每周多次在街上露面，无疑都会被看作是粗俗的行为。荷兰人虽满身是 18 世纪的花边和缎带，并以此为荣，却不幸成为他们刻意模仿的人们的笑料。

18 世纪的人们不仅在居住方面有别于他们的父辈、祖父辈，而且他们生活得也更好。这不是说一个世纪以前的可敬的祖先曾挨过饿，绝不是这个意思，但人们在吃喝方面变得更精细了。原先人们注重数量，此时数量为质量所取代了。在很多国家里，下层民众在吃喝方面确实是乏味之极的，对这样的饮食在我们看来几乎是难以忍受的。而在荷兰，同类人此时却也有不少享受。烟草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对很多人则是相当必要的。在荷兰它是如此普遍地使用，以至于外国人在想到荷兰人时，总是想像他们叼着陶瓷烟斗吞云吐雾。盐和糖是不征税的，这样就使贫穷的阶层也能用得起。咖啡和茶几乎是所有的家庭从早到晚的消费品。

由于农场的人不再有机会为出口贸易工作，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产品拿到离得最近的本地市场出售。黄油、奶酪和鸡蛋的价格贱得我们都不愿对美国的读者提起。由于四面环海和有鱼可捕，由于促使国家向所有的殖民地和外国产品开放的自由贸易制度，荷兰在历史上从物质方面而言从来是富足的。

要说娱乐行业，18 世纪仍像 17 世纪一样不能令人满意。但我们不该忘记当时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大众群体——他们因受教育不足、没有精神需求，而热衷于为一场马戏表演不断叫叫

嚷嚷。

戏院在极端正统的牧师的不断非难下兴旺不起来。偶尔光顾小酒馆和以后作为国外的新事物引进的咖啡馆，是绝大多数人绝无仅有的社会消遣。还有从这一家到那一家的为数众多的拜访，以及大量社会性的吃喝和过烟瘾。家庭圈子以外的娱乐消遣不受鼓励，被看作是不太好的事情。

每年有一次公众欢庆的时节。那是一年一度的集市，每个自尊的城市和乡村都在年历上标出一个固定的日期。到那时，从执政、大人先生们、议事会成员到最贫穷的叫卖水果蔬菜的小贩,都会忘掉自己生活中特定身份的尊严,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当时的娱乐消遣在我们看来确实是够乏味的。它包括通过摊子展示出的世界上各个文明和未开化地区的特色,着迷地骑着老式的旋转木马，或者对暹罗孪生子[1]的祖母或来自婆罗洲[2]的原始野人乱扔硬币。别忘了还有高尚的称作“蒙特”的游戏——它从过去到现在都证明对老实巴交的乡下人的钱包是最具灾难性的。

我们刚才提到牧师对戏院的非难。教士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还起着很多的作用。宗教确实已不像前一个世纪那样扮演异常活跃的角色。上层社会对教会事务的兴趣已日趋减少。但传统的加尔文教派却具有极其非同寻常的手段让人们循规蹈矩，以致摄政者不得不尊重教会的意见，一旦发生争执通常都是支持教士而与会众对立。

至于为数众多的民众，有的人忠实地去教堂是由于虔信，其他人则是由于习惯。对整整几代人来说，比生活本身更为重

① 暹罗孪生子：即连体双胎。在暹罗曾诞生的一对连体儿，他们以展示自己谋生。

② 婆罗洲：世界大岛之一，位于马来半岛东南，属马来群岛的大巽他群岛。

要的教义的影响不会在短短几年中丢失。在传教士中总有一小部分强硬的正统少数派，还有他们的追随者，他们很好斗，不惜一切手段为那些极端观点的至上权威讨说法，而绝大多数人对那些观点都已失去了兴趣。

国教教会的牧师在社会中总是占有一个相当特殊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从中等偏下的阶层中招募的。有聪明过人的脑袋却没有钱的男孩，总是有望得到为培养牧师而设的奖学金的帮助。一旦当上了牧师，尽管他的出身和早期教育都证明他应该做较低阶层的成员，但由于职业的关系他却成了最高阶层的“由职责而定的”成员。

使这个职位更为复杂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牧师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奥伦治家族的热情支持者，就像他们原先所属的阶层的大多数都是那种亲王热心的党徒。此时，由于牧师对民众的影响力依然很强，由于牧师能影响其会众去反对他们想要反对的任何人，摄政者不得不对传道士采取怀柔的手段，即使是这些人经常将事情朝令统治阶层不快的方向发展也是如此。

一般来说，牧师对请求自己关照的人们是真诚可信的，从不过分迎合寡头统治集团，而且把他们在群众中发现的含含糊糊的民主原则放在心上。经常由于疏忽大意或过多的热情，他们站在了有违正义或阻碍进步的立场上，但总的来说，他们始终对其周围保持着有益的影响，这个阶层还能获得大多数人的尊敬和爱戴。

然而就一个方面而言，他们正在失去原有的重要性。他们不再是社会理性的领路人。因为总体的繁荣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更多地被送进大学而不是办公室，这也就免除了牧师原先在其会众中成为“教义阐释者”的特权。

进大学念书的普遍趋势最终完全改变了民众和大学本身的特性。大学本来是用来培养牧师的学校，神学系是最古老的，

而且在许多个世纪里都是最为重要的。拉丁语、希腊语还有希伯来语、迦勒底[1]语和阿拉伯语，毕竟不过是次要的学问分支，只是作为《圣经》研究的补充。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了哲学、法律学，过了很长时间又有了医学和自然科学。这些学科的增加引入了大学群体中思想上的自由因素。大学群体与许多虔诚的新教徒大不一样。在一些乡村省份，善良的人们甚至为使年轻人能呆在家里、不受自由主义的诱惑而创办了自己的大学。

由于大学不直接受任何个人的控制，而是由特定的省三级会议管理，后者认可了它们实际上的自治。各大学可以按教学人员的意愿朝任何一个方向发展。它们逐渐丢失了纯粹职业学校的某些特性，开始成为也就是如今美国学院的角色；它们变成年轻人去接受普通教育和交趣味相投的朋友的地方。只要负担得起，每个人都可以进大学并登记为学法律的学生，那意味着他就可以花上 3 到 4 年时间读他想读的书，和那些在他看来是趣味相投的年轻人交朋友。学期结束的时候，学生为应付考试就接受必修课程的辅导，紧紧张张地花上几个月用拉丁语写论文，然后获得学位。这个学位并不意味着他对法律已知道很多,而是被看作是对学位拥有者的担保,担保他曾在可尊敬的研究学问的座椅上呆了几年时间,已可以被看作是一位绅士了。

在大学教育的这种变化意味着许多表而文章的同时，也意味着有比以前多得多的人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教育。我们不想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即所有对严肃工作的兴趣都突然消失了。正当这些快乐时髦的年轻人只是把自己的大学当作一个俱乐部的时候，各个系仍在做着大量踏踏实实的研究工作。古典语言学和闪米特族语言学的研究依然相当引人关注。能够承印各种语

---

[1] 迦勒底：巴比伦尼亚南部地区，在《圣经》中经常提到。

言的印刷作坊的出现，有利于这些语言的书籍的开发。

自然科学在前一个世纪开始了高标准的调查研究，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现代。由于没有法律妨碍解剖实验，医学上的研究也是同样情况。历史是最受偏爱的研究课题。在 17 世纪，人们头脑里还充满着与西班牙人作战的丰功伟绩，因而他们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是关于这个题目的。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人们到了 18 世纪便不那么认真地对待祖先们的美德了，对“八十年战争”[①]的历史相当忽视。

就像许多人更喜欢做实际的事情，在 1750 年前后，人们常常沉溺于宗谱和文物的研究。古老的文件、古老的城市和省份的编年史和旧的法规特权都被搜集起来，编辑成册，并加上异常丰富和非常博学的注释。我们必须承认这不是能令人提起兴致的工作，但对后世的研究者却是非常有用的。它们也使人了解了中世纪，以及自盛行同业公会的时代起地方政府所发生的变化和同业公会对地方政府的影响。

哲学研究的历程则是相当令人费解的。虽说没人反对研究古代的哲学，但正统的牧师却竭力反对介绍现代的哲学体系。斯宾诺莎[②]是那种最温和的人，他的论文 5000 个人里只有一个人能读懂，却遭到教会不遗余力的非难。教会简直将他视为反基督的人。

进入 18 世纪，由于对宗教事务的冷漠态度更普遍了，牧师的这种非难不那么频繁了。总体上的宽容是出于漠不关心，而不是出于什么坚定的信念。这种宽容决定了人们想研究哲学就可以研究，而拒绝倾听那些虔诚的教会兄弟认定如此自由会

---

① “八十年战争”(1568—1648)：尼德兰各省为摆脱西班牙的统治而进行的独立战争，迫使西班牙最终承认荷兰共和国独立。

② 斯宾诺莎（1632—1677）：17 世纪荷兰著名的唯理性主义哲学家。

威胁同胞的灵魂得救而展开的激烈论争。

就像在别的地方难寻原汁原味的东西一样，原著在哲学研究方面也是非常缺乏的，但法国和英格兰的作品在这里得到精心的重印，而且人们非常细心地、怀着严肃的对真理的渴求进行研究。像洛克和休谟[1]这样的更求助于常识而不是抽象理性的英国哲学家最为流行，他们的学说不断地被翻译过来，不久就从大学校园渗透到民众之中。对所有这些东西的兴趣虽不像原本应有的那么深奥，但感兴趣的人的范围确实要广泛得多。在 18 世纪的后半期，热心研究学问成了时尚。

凡希望别人把自己看作是对更高尚的生活有兴趣的人，都会去搜集贵重的书籍、瓷器、硬币、南美的蝴蝶或其他的什么，只要是罕见的和昂贵的。要是他很有钱，他会雇用某个挨饿的法学博士或神学博士，对他的收藏进行分类并加以描述，还要把目录印得极为精美，配上手绘的彩图和能经受时代变迁而完好无损的封面。

为了不使自己变得迂腐，让自己的头脑保持年轻和有生气，享有物质财产并对非物质的事物怀有兴趣的公民，往往非常喜欢加人某个文学或科学协会。18 世纪的后半期就创办了 20 个这样的协会，它们满足了多种需要——有些从事特定的文学研究，其他的则是有关数学和自然科学，还有的对地方史或省份的系谱学感兴趣。所有这些协会发表有关会议的年度或半年一次的报告，并到处散发这些报告。正因为如此，原先没法取得的大量信息也传播到了范围广大的各阶层之中。良好的邮政系统甚至使那些住在远离中心地区的人们也能及时获悉这

① 洛克即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著有《论宽容的信札》和《人类理智论》等。休谟即大卫·休谟（1711—1776），18 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著有《人性论》《英国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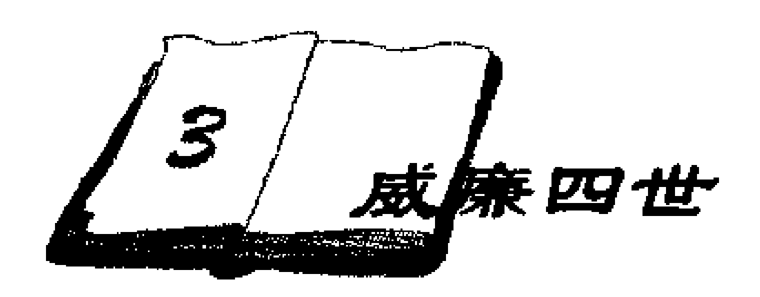
个广大的世界里发生的事情。

民众的另一个信息来源是报纸。要归功于良好的邮政体系，报纸才能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它们使整个国家及时获悉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这些荷兰报纸在国际上扮演着奇特的角色。在18世纪，它们是最时新的报纸，一直为外国提供良好的服务——其他国家的报纸以最为殷勤地使用剪刀[①]来表示其敬意。《莱德公报》在法国出版，在当时享有《泰晤士报》在19世纪所享有的地位。人们在还未看到《莱德公报》就某个话题必定要说的内容之前，就不可能对该话题有充分的了解。我们意义上的“社论”还未听说，但新闻栏目经常配有编者的一点个人看法。

这些报纸不仅刊登国内外的政治新闻和股市行情，而且它们对国内外的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消息也非常灵通。它们新潮至极，就连专利医药广告也不缺少——什么“40年的实践和1000份推荐书”。虽说此时报纸的影响与今天标准报纸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仍然带给每个愿意读它们的人足以拓宽见识的多种多样的信息。

对法国大革命前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社会和经济状况所做的简短回顾到此就结束了。我的意图是对18世纪做一个粗略的概括，这会对认识自前一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主要变化有所启发。我更想为在接下去的章节里将要登台的演员提供舞台场景，而不是仅仅给读者一张详细的地图，让大家在上面追踪演员的一举一动。

① 指转载荷兰报纸的新闻报道。



3 威廉四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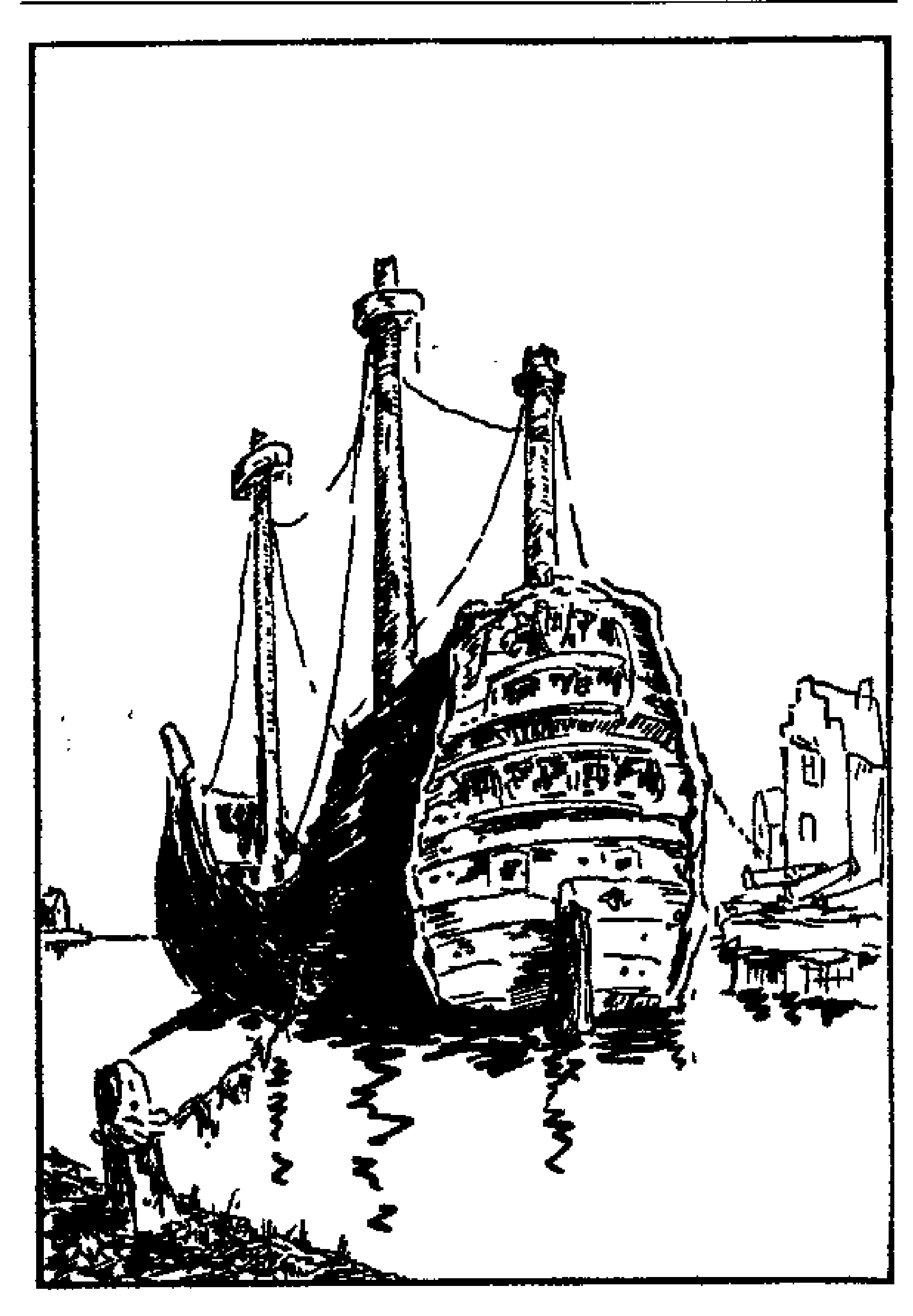
正像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威廉三世之死使共和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家政府由摄政者来把持，除了弗里斯兰，其他省份都不再有执政。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弗里斯兰只要自己行得通，就总是与别的省份保持不同，并且早在1584年就选出了自己的执政。这位执政叫威廉·洛德威克，是“沉默者”威廉最大的弟弟拿骚的约翰的儿子。这拿骚家族的同一个旁支后来在18世纪给整个共和国提供执政人选，并在1815年晋升到尼德兰王国（即荷兰王国）的王位。

我们也看到威廉去世后摄政者首先做的就是尽力把共和国拉出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之中，开始一个“不惜一切代价换取和平”的新历程。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自然仍在继续着，共和国发现自己在相邻的朋友和敌人彼此交战时并不总能完全保持中立。不仅如此，共和国自其伟大的往昔之日起就因各个条约和同盟而受制于许多国家，至今依然如此，但她并不经常依那

些条约所约定的提供援助。每当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共和国总是先以极大的耐心倾听别人要求提供帮助的请求，然后将该请求拿到三级会议总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但提出请求的外国大使自然会明白，在这个自由的共和国，不先将此事通报给所有感兴趣的党派便什么都没法做。因此这件事就从三级会议总会下达到各省的三级会议，由各省的三级会议向各个城市的代表们提及此事。各个城市的代表们必须向他们的市长和市政官员询问意见，然后，经过没完没了的争论，付诸讨论的事情开始一级级地往回爬。等它到达三级会议总会的时候，国外的战争因交战双方均已精疲力竭都快结束了；要是此时已显现出交战的某一方将取胜，共和国就能避免采取冒险的措施。这样的行为方式毫无尊严可言，但却省了共和国很多钱，因而国民对此大为赞赏。

到了1718年，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签订了对付西班牙的三国同盟，它们期望共和国会马上加入这个同盟。事实上共和国也加入了，但时间已是1719年，此时早期的战事已经表明胜利将归于同盟一边。一年以后，欧洲列强在康布雷[1]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各国关心的政治问题。然而三级会议总会却不愿花费派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的昂贵费用，致使共和国缺席了这次会议。这种自动缺席在别的国家看来是共和国不想参与外国事务的表示。此后共和国便被看作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了，只是由于它在金钱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而勉强被予以尊重。与此同时，这个不拿出钱派几个代表参加如此重要会议的国家，却整个陷入对约翰·劳的金融计划的狂热，花费数百万在这无丝毫效益可言的投机上。我们提到这个插曲，是因为它表明了共和国所发生的由盛到衰的演变。

① 康布雷：法国北部城市。



舰船无人看管

康布雷会议之后，欧洲紧跟着出现了十几年的和平。对欧洲政治状况漠不关心的共和国，听任自己剩余的军队走向毁灭，而只保留六七艘舰船在海上保护其与外国的巨额贸易。

1733 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①]爆发，但战争发生的地方离荷兰很远。由于英格兰保持中立，共和国便干脆沉睡不醒。接下去的 7 年总的来说是和平的。共和国除了几支小部队还在沿法国边界已完全被人遗忘的名曰“屏障”的防御工事中，不再有军队留存，舰队也是同样的衰弱。

自从摄政者重新掌握国家政权，到此时差不多已过去了整整一代人。只有一些老人还记得 1672 年的那些日子，摄政者在那一年遭受了惨败。德·维特的断头台和对其残缺的尸体被拖过大街的回忆已成为古老的故事了。能清楚地记得这一可怕事件的，非得是 90 高龄以上的人了。摄政者的年轻一代不再具有其父辈对此类严重暴乱重演的可能性的恐惧，因此他们不像父辈那么小心谨慎。他们是在与父辈所经历的非常不同的生活境况中出生和养育大的，他们自己对公众的怒火没有认识，而这种怒火对他们的祖父辈却是如此真切和令人惧怕。他们在政府中得到职位，并且因职位而获得利益，他们所意识到的责任感比他们的先辈要少得多。国家平安无事。无用的军队和耗资巨大的舰队不再是负担了，国人普遍富有，自然每个人都没有理由不像国王一般快乐，每个人也没有理由吝惜共和国的钱财。

但这欢乐的田园牧歌在 1740 年被残忍地惊扰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②]爆发了。很不幸，共和国是著名的查理六世国

①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8 年，表面上是为了决定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的继承人，结果引起一场席卷欧洲的战争。交战的一方主要是奥地利和俄国，另一方主要是西班牙和法国。

②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 至 1748 年若干次战争的总称，其中两次战争是因神圣罗马帝国查理六世之死直接酿成的。

本诏书[1]的签字国之一,这位奥地利大公确定其女儿玛丽亚·特蕾西娅[2]为他的领地的继承人。不管是共和国还是英格兰（也是签字国之一），当时这样做都不是出于对年轻的公主的爱戴或对年老的父亲的尊敬。作为对他们签字的回报，查理许诺不再继续创办在奥斯坦德[3]的奥地利印度公司——这个企业威胁要成为英国和荷兰印度公司的危险对手。

此时腓特烈大帝[4]开始了其首次海盗般的对奥地利的远征，并投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共和国极不情愿地被人提醒曾在那个国本诏书上签字的草率行为。因为按照这个协议，共和国有义务向玛丽亚·特蕾西娅提供武器和金钱。皇后请求帮助，英格兰立即前往救助，并提醒荷兰有做同样事情的义务。但共和国犹豫了，因为从另一方，支持普鲁士的法国威胁共和国应拒绝提供一切救助而严守中立。

因此麻烦便是如何回答以下这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共和国是应该履行庄严的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去支持皇后（这样的政策会耗费钱财而且不会有什么结果），还是保持中立（这样做既省钱，又能从法国政府那里得到商业方面的有利条件作为酬报）。

照例又是一个折衷方案。三级会议总会没有按照条约的条款尽义务为皇后派出军队，而是给了她一些钱；也没有派出一支舰队，而只是就建造几艘新的舰船开始非常暧昧地初步讨

---

① 查理六世国本诏书：发布于1713年，其中规定哈布斯堡如果没有男嗣，则奥地利的全部领土将传给女继承人。

② 玛丽亚·特蕾西娅（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女王、波希米亚女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西斯一世的皇后，18世纪欧洲的重要人物。

③ 奥斯坦德：今比利时西佛兰德省城市，当时在奥属尼德兰境内。

④ 腓特烈大帝：普鲁士第三代国王，1740至1786年在位，在摧毁神圣罗马帝国和领导统一的新德意志方面起过主要作用。

论。自然哪一方也不会满意这些折衷措施。玛丽亚·特蕾西娅认为共和国做得太少了，而法国却认为共和国做得太多了。

有一阵子，整个国家都颇有兴致地就共和国是否真正有义务照那些庄严的许诺行事这样的纯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不久，这个普遍争论着的社会分化成两个阵营，它们是按旧日党派政治的立场区分的。那些支持皇后和英格兰的人受一直将奥伦治亲王与北海对面的邻居连结起来的往昔友谊的引导。另外一方则是摄政者及其追随者，他们受务实的本能的驱使，认为拯救国家惟一的方式就是与法国保持亲密的友谊。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争论缘起的根本问题被忘掉了，却兴起了执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政治上的争吵。

与此同时，奥伦治家族的为首人物正在弗里斯兰的首都吕伐登过着平静的生活。他统治着这个省，但对共和国的其余地区或其外交政策却无法施加任何影响。此时家族的为首人物是威廉·卡雷尔·亨德里克·弗里索，时年 29 岁。他于 1711 年 9 月 1 日生于吕伐登。两个月之前，他父亲在跨越穆尔代克河的时候淹死了。当时他父亲正从比利时的军营前往海牙的途中，按理应去看看从威廉三世那里继承来的新的居住地。他的母亲是一位德国公主，名叫玛丽－路易丝·赫斯－卡塞尔。和她丈夫一样，她也出生于有非凡心智和体能天资的家族。她丈夫要是没有遇到这样的意外过早去世，是能够在共和国里做些大事的。

但这对夫妇的孩子却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小人物，无论是模样还是气质都不像他的父母。他从小就病病歪歪，因此他母亲在教育他的时候甚是小心，以最温和的方式对待他。他整个的年轻时代都在吕伐登度过。这个城市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无聊的尊严、保守主义和普遍的不整洁。这是一个乡间小城镇，从位置上讲远离外面的大世界，与外界发生的事情不太相干。弗

里斯兰自身是一个小共和国，有一个富裕的贵族阶层和一个富裕的农民阶层，在两个阶层之间不存在另一个阶层。贵族既生活在祖先留下的房产里，也生活在吕伐登。由于对家族古老的名字和光荣的历史非常自豪，他们便固定不变地成为一个仿效大庄园主的相当愚笨却极端傲慢和保守的阶层。在一大帮蔬菜水果商和肉铺老板（他们在荷兰省和共和国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是神通广大的）面前，贵族们显得无能为力。虽说只要一有机会，贵族们就神气活现地以极大的优越感来对待他们，但荷兰省的商人则会予以最强有力的回击。

在这样的气氛中，即将获得“威廉四世”名号的年轻的威廉·卡雷尔·亨德里克·弗里索，带着满脑子相当封建的思想，在他母亲严格的管教下长大。由于他母亲极端虔诚和严格，年轻的威廉的生活没有多少欢乐可言。不过他在许多严肃的学问分支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讨论神学问题时表现尤其优秀。不仅如此，他母亲一定具有一般女人鲜见的机智。当她在这块陌生并不十分友好的土地上成了寡妇的时候，年仅 23 岁。她设法使自己逐渐赢得爱戴，因而同时代人给了她“玛丽妈妈”的昵称。这个昵称即使在今天仍能唤起美好的情感。

1726 年，年仅 15 岁的小亲王被送进了弗兰尼克大学。这所规模很小的大学是由当地的爱国者建立的，与莱顿那所更具国际性的同名大学相对抗。但它在学术界却享有显赫的名声。威廉在那里赢得了“好学生”的声誉，埋头于许多不同分支的研究。相比之下数学和物理学特别让他着迷，虽说我们怀疑这对他想从事的政治家的工作有什么用处。

在弗兰尼克呆了两年以后，他去了乌得勒支，在那里的著名大学里，他又是只对这类课程感兴趣。经过这一通对学问的涉猎，他最终回到吕伐登开始行使执政的职责。而在他到担此重任应有的年龄之前，由母亲代他行使执政的职责。

他担当共和国的领袖角色的前景并不乐观。确实，东部有一些小的乡村省份像格罗宁根、德伦特和格尔德兰逐渐偏向于任命年轻的亲王为自己的执政，而不是继续处于原有的摄政者政府的统治之下。但只要荷兰省拒绝摆脱摄政者的统治，其他的省份就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在荷兰省，亲王当时没有实际的影响。他与上层某些一贯是奥伦治家族忠实支持者的家庭交友，但这些家庭此时已遭人遗忘，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自然，民众和牧师中的大多数人忠实于奥伦治家族，但民众缺乏组织，而摄政者是有组织的。因此大多数人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愿望。

但此时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爆发了，共和国到处盛传自己将被拖人战争。亲王的主要支持者认为到了为推进他们的事业该做些什么的时候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请求英国政府在派往支援奥地利女王的军队中给威廉一个高级军事职位。然后当威廉作为攻城拔寨的英雄凯旋而归时，由他掌权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但这个不幸的年轻人是鸡胸，患有慢性哮喘，并缺乏一切成为军事英雄的资格，于是这个计划只好放弃。他只有在吕伐登继续过他那平庸的生活。

也就在这时候，由于继承了相当数量的遗产，亲王变得很富有。家族里好几个旁系分支没了后嗣，亲王因而获得了他们的领地。致使到了 1742 年，他成为一些德国小公国的统治者，其权力不下于他担任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和格尔德兰的执政。这使他处于一个奇特的地位，因为他既是统治吃苦耐劳的条顿人的绝对君主，又是三级会议任命的、好寻衅的“生来自由”的弗里斯兰人的行政官。然而对于亲王来说，更多的领地意味着更多的钱财，他逐渐成为他的国家最为富有的人。

与此同时，有关遵守既定诺言是否可取的争论还在继续，好在拥护讲究真诚的谨慎、稳健政策的人们占了上风。1744

年，在英格兰一方施加了更多的压力之后，三级会议总会终于赞成前去支援皇后，并开始集结一部分军队。他们甚至已经讨论了给奥伦治亲王中将头衔的可能性。但威廉就像许多迟钝的人，有着最为固执的天性。在他之前他父亲曾是总司令，要么他也将成为总司令，要么他什么也不当。这便是他所关心的，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三级会议的建议因而被谢绝了。派出的军队由另一个中将统帅，亲王则留在了吕伐登，安心地等待此后的事情降临到他头上。

然而国际政治局势可谓瞬息万变。英格兰严格遵守了所有对查理六世的许诺，派了一支军队去支援玛丽亚·特蕾西娅。这支军队在代廷根击败了法军。法国为了报复，装备了一支舰队，打算把英格兰王位觊觎者查理·爱德华[①]带入其合法的领地。载有王位觊觎者和许多军队的法国舰队确实从法国起航前去进犯英格兰，但由于糟透了的天气使舰队无法登陆，因而这次征讨一事无成。但这次不幸的征战已足够将共和国确定无疑地拖进混乱的局面之中。因为共和国和英格兰之间有着两个防卫条约，一个签订于 1678 年，另一个签订于 1716 年。这两个条约规定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受到侵略威胁的情况下必须予以援助。现在英格兰正受到侵略的威胁，因此遵照条约上的诺言，共和国必须派出 6000 名士兵。然而派出这 6000 人意味着与法国开战。这回麻烦可大了。英格兰叫嚷着要求援助，法国叫嚷着要共和国保持中立。共和国又一次想取悦双方。6000 人的军队确实集结了，但要把他们装上船运过北海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人们发现连 20 艘舰船都不可能征集到。可以

① 英格兰王位觊觎者查理·爱德华（1720—1788）：英国斯图亚特王室最后一个认真要求王位的人。他是詹姆斯二世之孙。1744 年参加法国舰队进犯英格兰，但为风暴所阻。1745 年从苏格兰海岸登陆，并跨越英格兰边界向伦敦进发。次年被击败逃往法国。

统帅这个舰队的海军官员实在难找，最合适的一位虽德高望重，却已是73岁高龄，近15年来他一直领取养老金。总司令的第二人选也已69岁了。

没等援军最终登船，法国人的征讨已经受挫。英格兰不再受到入侵的威胁，已不再需要荷兰军队了。但这个插曲足以显示共和国不守信用，法国和大英帝国两方面因面都疏远了共和国。共和国此时已堕落到如此地步，它在为英国的远征集结必要人员的同时，还向法国派了一位特使，后者在巴黎解释说共和国只是在极大的压力下才支援英格兰的，这种支援并不能看作是针对好朋友法国的敌对行为。即使是在法国军队进犯比利时（当时它是奥地利的一个省），占领了名曰“屏障”的尼德兰防御工事之后，共和国仍推行与法国修好的政策，宁可把脸面丢尽了也不愿公开履行庄严的条约规定的义务。如此这般，当1745年来临时，欧洲所有别的国家对共和国不再好心相待，共和国已失去了别人的尊重，更有甚者，它最终被拖入战争，并处于最为不利的境地。

法国拒绝接受特派使节的抚慰，对共和国宣战，并立即侵人了尼德兰的领土。尼德兰的防御工事因破败而坍塌，而且只配备了少量拿养老金的退伍军人，敌人一来，不发一枪一弹就投降了。仅仅几个星期，法军占领了斯海尔德河南岸更大部分的尼德兰领土。自1672年以来，还没在共和国的家门口发生过战争。有关法国人烧杀抢掠、肆意破坏的故事尚在流传，此时萨克森的莫里斯所指挥的军队的残暴行径证实了这些故事的真实性。这位莫里斯虽曾受到法国政府特别告诫，要他“谨慎处事”，但他所理解的征服者的权力和“战争的需要”就是恣意妄为。

到了1747年的春季，法国军队已准备继续向尼德兰领土渗透。极度的恐慌在共和国里蔓延。谁只要有能耐就都跨过斯

海尔德河，逃避到沃尔切伦和贝弗兰诸岛。绝大多数难民拥向沃尔切伦岛上的米德尔堡。米德尔堡是泽兰省的首都，它是最早摆脱西班牙统治的尼德兰城市之一，但自从西班牙军队离去之后，这个城市的居民就没有机会看看外国军人是什么模样。现在从斯海尔德河那边过来的同胞的伤心故事使他们陷入极度的忧伤之中。这个岛是整个共和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此时看到自己已处于入侵敌人的手掌之中。

弗利辛根和维勒与奥伦治家族一直有不同一般的情感的纽带相联系。奥伦治亲王在弗利辛根和维勒身处侯爵的高位，一直对这两座城市有很大的影响。现在这两个城市的民众聚集在闹市区，引起相当大的混乱。弗利辛根仍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有大量的殖民地贸易。维勒却已大大地衰落了，正从中世纪重要的城市变成一个乡间村落。在维勒至今仍留存一个哥特式的大教堂、雄伟的市政厅和几幢美观的房屋，它们都在默默地述说旧日的荣耀。

令人惊奇的是，恰恰是在有1000多居民的维勒首先发生了暴乱。就在1747年4月24日的夜里，传来了阿尔登堡陷落的消息。阿尔登堡是通向共和国境内的佛兰德[1]地区的门户。人们聚集到了市政厅，发表演说。几乎与1672年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同，人群爆发出叛逆的喧嚷，把一切都归咎到了摄政者的头上。看起来惟一获救的希望就是马上任命一位执政兼总司令。愤怒的民众半夜里去见维勒的市长。为了使自己免遭暴力，市长被迫许诺明早他会去劝说泽兰三级会议任命威廉亲王为执政。

从维勒到米德尔堡只要走半小时的路。次日早晨，维勒的

① 佛兰德：包括今法国的北部省、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荷兰的泽兰省。

骚乱就蔓延到了泽兰的首府。摄政者照例是束手无策，他们没有可以支配的武装力量。3天之内，整个泽兰省都在呼吁任命威廉为执政。到了4月28日，省三级会议决定提议奥伦治亲王担任该省的执政。

上述民众暴乱的消息最先是从鹿特丹传到荷兰省的。鹿特丹的人是从每日清晨从泽兰诸岛往回运新鲜蔬菜的小船的水手嘴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当这些悬挂着奥伦治旗帜的小船一出现在马斯河上时，沿岸的人群就爆发出一片欢呼。人们在什么地方制作了奥伦治缎带！没过多时一支大都佩戴着缎带的队伍开始向市政厅挺进，许多支类似的队伍也向这个目标进发。一些心惊胆战的摄政者正在市政厅里召开会议。由于无力自卫，市长们决非本愿地被迫接见了一个示威者的代表团。一个面包师和一个马车工匠是这个代表团的发言人。他们措辞强硬地要求市议事会对任命威廉四世亲王为荷兰省的执政提供支持。市议事会出于无奈只好同意了。不到一个小时，奥伦治旗帜就在古老的劳伦斯教堂的高塔上飘扬了。这天其余的时间都在欢庆中度过，小酒馆生意兴隆。

多德雷赫特、海牙、哈勒姆和莱顿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同。到处都有示威者的队伍，市议事会被迫服从，在教堂最高的塔楼上升起了亲王古老而光荣的旗帜。

这场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持续了3天。只有少数几个不得人心的摄政者遭受了诸如打碎窗玻璃这样的财产损失。不过事情也就到这个地步了。但荷兰三级会议还是于5月3日提议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和格尔德兰的执政为他们省的执政，次日，他们又任命威廉四世为共和国陆军和海军的总司令。年轻的亲王终于看到自己重新得到了原先属于祖父辈的所有职位，他的耐心得到了酬报。尽管他自己没有为此做过任何努力，人们还是将他召唤到了如此的高位上。

由泽兰三级会议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跨越须德海[1]，于5月5日抵达吕伐登。他们请亲王立即前往他们的省份。5月10日，亲王带着他年轻的妻子安妮（英王乔治二世的女儿）依依不舍地与母亲告辞，出发前往荷兰省。

这尊贵的一家于耶稣升天日[2]到达了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们受到市长以及由各个有影响的商业和市民团体组成的代表团的欢迎。至于民众，他们已经好久都没有呼喊"奥伦治万岁"了，现在他们可以报复性地喊个够。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亲王所到之处都受到英雄凯旋般的迎接。

几乎过了半个世纪，人们再次摆脱了摄政者的压迫。他们就像老一辈那样感到奥伦治亲王将使国家免遭外敌的入侵，将会终结所有那许多在摄政者统治期间逐渐出现的难以忍受的弊端。

威廉四世如今是整个共和国所有省份的执政，但那些支持他的人觉得还不够。他可能未留下后嗣就死去，那时候国家就会重演威廉三世去世后发生的一切。虽说当时还没有一个组织良好的政党做执政的后盾，但大多数民众在某些事情上一下子都有了相同的感觉。为了从由少数几个特权家族统治造成的灾难性的体制下拯救国家，人们普遍而模糊地感到必须着手进行某些根本性的变革。说得更简单一些，大多数民众表现出对君主立宪基础之上的权力更为集中的体制的偏爱。

这一时期许多当代的历史学家都在谈论由"暴徒"、"贱民"以及"亵渎神明的刁民"造成的暴乱和公众热情。把这视为这类事件的主要起因肯定是大可怀疑的。但在这些事件背后

① 须德海：13至20世纪伸入荷兰的北海海湾。

② 耶稣升天日：据《圣经》，耶稣于复活后第四十日升天。复活节后第四十日（5月1日和6月4日之间）为此节。

都存在非常强烈的公众情绪，人们认定显然有必要改变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总体构成，而威廉四世作为被推上改革派候选人职位的人，必须给予他很大的权力，以便他能带来人们所期盼的改革。因此在1747年10月7日，威廉成为所有七个省的世袭执政，他的权力实际上已相当于共和国的君主。

现在该是威廉履行职责的时候了。他得到这样的权力，得归功于拥戴他的人们。但在履行人们要求他履行的职责的时候，他却无可救药地失败了。他不具备一个真正的改革者的天赋，也许只能胜任忠诚而有耐心的行政官一职。但他完全缺乏进取精神，不久便放弃了对绝对力不能及的事业的尝试。用现在美国人的说法就是“他一事无成”。

正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前50年在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不少的弊病，如今却要求立即予以纠正。首先是邮政系统情况恶化。我们已知道邮政公司都是私人企业，它们的岁入不是用于公共利益，而是落入那些组成当地市政府和控制行政任命的摄政者的腰包。这些岁入经常是数额巨大的，在阿姆斯特丹每年不少于20万荷兰盾，在海牙约有4万荷兰盾。现在人们不再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邮政公司的岁入不该用于中饱少数个人的私囊。因此民众要求整个邮政系统都处于执政的直接控制之下，其岁入应该归入公共财政。

由于亲王的绝大多数支持者都来自中产阶级，他们要求为同业公会做些事就不足为奇了。从政治和经济的观点看，这个要求成功的希望不大。同业公会的时代已经过去，商业贸易的个人主义和手工业的自由权成为产业形势的基调。然而当时的人们看不到这些，他们只知道在摄政者的统治下同业公会逐渐失去了它们原先具有的对城市和省里事务的影响和控制，因此他们希望新执政的干预会对复兴在经济上注定灭亡的同业公会产生效果。

他们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的要求与城市民兵有关。城市民兵原先自己选举自己的军官，渐渐地，摄政者让自己的支持者填补军官的空缺。这样一来，人们不免要担心城市民兵最终变得过分受统治阶层的影响，一旦发生政治上的动荡就可能会被利用。因而人们要求城市民兵回到原来的样子，允许他们在没有市政厅干预的情况下选举自己的军官。

最后，人们抱怨最多也最强烈的是收税的方式。在我们看来，当时的税很高，但不算太高。税并不是由政府直接征收，而是被承包给了收税人。这些先生保持着自人类历史开端之日起就享有的卑鄙和冷酷的名声。执政会好心地注意使这个声名狼藉的行当有所好转吗?会的，阁下会照看一切的。可人们愿意给他几个星期时间去熟悉新环境吗?人们给了他几个星期，而且星期变成了月，月又变成了年，可什么也没改变。

邮政系统确实有了一点改变，从那里得到的岁人如今流入了省的财政。其他几项改革开始了，却无法完成。还有的根本就没有开始。一些最不得人心的摄政者被撤了职，但他们的职位立即由同一阶层的人占据了。人是换了，但体制还是原来的样子。拥护奥伦治家族的摄政者在经历了许多清苦的岁月之后，如今终获允许在个人特权的领域中捞点油水。而反对奥伦治家族的摄政者则被有礼貌地要求暂时离开那些有利可图的领域，回家去享用掌权捞好处的岁月给他们带来的财富。

至于大众的要求，很快就被忘却了。我们当然不能期望威廉四世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式的政府，这样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再说民众也不想要这样的政府。当时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与民众政府有些类似，这个国家就是英格兰。但英格兰在这个特定的时候由非常腐败的政客把持着政府，因此没有人愿意去仿效他们的制度。不过执政可以做的是确立与仍被排除在政治事务之外、在这方面没有丝毫影响的但人数可观的知识阶层的合

作。后者的境况与普通平民一样没有什么改善。

人们渐渐地发现，他们寄予厚望的改革候选人并不比他所取代的人们更强。人们厌恶地掉转脸去，失望使他们的爱戴变成了憎恨。当他们看到亲王如何只从摄政者中选取他的主要顾问，他身边如何围绕着弗里斯兰贵族极端保守的成员的时候，不禁自问：这就是自己费了好大的劲儿选举他上台的结果？

执政撤换市政府成员时是彬彬有礼又犹豫不决的。就好像他是为了迁就公众报复的要求才撤他们的职的。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他的名誉，人们觉得他似乎不曾撤换该撤换的人。更有甚者，亲王好像在不断地向这些公众愤怒的牺牲品道歉，解释他们被迫下台实在不是他的过错，在这件事上他所做的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他自己的意愿，他请求他们不要和他作对。于是很快他就常去和他们一起吃饭，以此表示从他这方面讲对他们并非冷若冰霜。

年轻的亲王统治的时间并不长，但在这些岁月中他明显地表现出他既不了解其职位的真正含义，也不了解人们对他寄予的合理期望。在他自己看来他是尽了力了，但他吃惊地发现他遭到了失败。他逐渐被迫投入拥护奥伦治的摄政者的小党派，这些人由于他的任命重新掌握了权力。但这个党派不再受到拥护奥伦治的广大民众的支持。后者此时已自顾自了。他们并未马上形成我们所熟知的那种正式的党派，但他们与执政保持距离，以许多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方式表明已不再支持他。

因此在18世纪中叶，共和国分为三个政治派别。虽说它们的划分并不明确，但它们却是分别存在的政治群体。首先是拥护分权制的由摄政者组成的三级会议派。其次是由执政和几个拥护奥伦治的主要家族组成的想要实施集权制的党派——他们主要是为亲王和自己的利益考虑。第三派别是为数众多的民众，他们想改变集权化的统治，又想避免广泛的混乱局面的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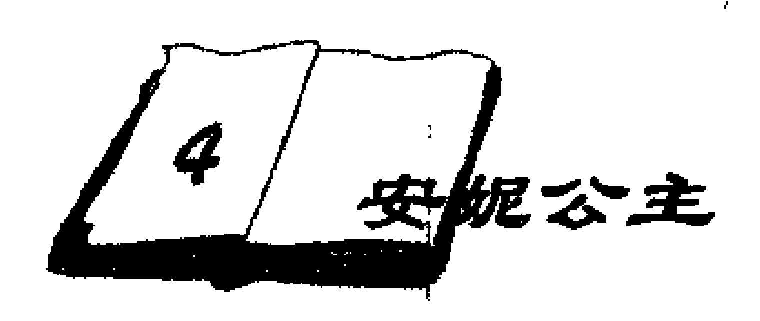
现。他们发现自己被他们选择的领袖冷落了，此时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

到了 1748 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了。现在不再有外敌入侵的危险了。从形式上讲，曾亲临战场的亲王，现在该回去行使一般执政的职责了。不能否认他工作很卖力，为了抑制商业的迅速衰退，他试图着手进行某些必要的改革。他甚至提出了一系列提交三级会议总会考虑的非常有价值的建议，但它们很快便迷失在毫无益处的“将来考虑”的荒漠里了。

但在所有这些事情中，亲王往往会因小失大，让琐碎的细节搞得昏头昏脑。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遭受了各种疾病的侵袭，这令他心烦意乱。照他自己的看法，他已经尽力而为了。但他的尽力而为并不能令其臣民满意则是使他伤心、令他费解的事情，这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还不到 3 年，他似乎已经精疲力竭，不能再履行职责了。1751 年 9 月，为了便于治疗，医生把他送到艾克斯莱班[①]。健康状况稍有好转他就回来了。但在同年 10 月，他又病倒了，这次得的是丹毒。通常这种病不至于要人的命，但他虚弱的体质经不起这番折腾。1751 年 10 月 22 日，威廉突然病逝。这个 4 年之前被欢呼为“国父”的人物在普遍冷淡的气氛中下葬。连不管奥伦治家族是盛还是衰都站在它一边的忠实的正统派牧师，都不知道该在悼词中说些什么。当谈到举行悼念仪式以示对他的敬意时，竟有许多人高声表示反对：有什么可悼念的?

① 艾克斯莱班：法国东部萨瓦省城市，位于日内瓦西南，临布尔日湖，是冬夏的旅游胜地，也是著名的矿泉疗养地。



4 安妮公主

威廉四世去世时留下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才3岁，因此真正掌握行政权力的是孀妇汉诺威的安妮公主。她是英格兰国王乔治二世的女儿。直到她去世时的8年时间里，安妮是国家的摄政者，或者按照人们通常的叫法，她是"女长官"。

不仅对国家，而且特别是对女长官本人，这8年都是最为不幸的。这位英国公主在收养她的土地上一点也不快乐。殷勤地对待陌生人在一个排外观念非常盛行的国家里并不是人们共有的德行。但公主遭受的是别的方面的委屈。她是王室血统，在她出生的国家里已经习惯于样样高人一等。在共和国里她丈夫的地位总有点值得怀疑。因为他虽然是共和国的首席行政官，但实际上受雇于任命他为执政的各省三级会议。因此便不断地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三级会议成员的老婆等着这位公主先去拜访她们。她们坚持认为执政是她们丈夫的雇员，执政的妻

子应该记住这个事实。只是在啰啰唆唆的争论之后，她们终于被说服在公主光临她们的住处之前，先去住在伍兹的公主那里呈递她们的请柬。富裕的中产阶级从不会忘记向公主表明她在这个自由的共和国的真正地位。她有王室血统这个事实也无助于改变这种地位。正相反，她的王室血统只会激发富裕的中产阶级的敌意和不信任。

但她的不快乐很大程度上要怨自己古怪的性格。她首先该做的是建立围绕在她自己和年幼的儿子身边的群体。仍有不少人急于想向执政表示极大的忠心，但公主看不到笼络他们的必要性。在她接触的人中极少有她喜欢的，对他们一般都不怎么信任。每当有人毫无私心地向她提出忠告时，她却往往怀疑这人的动机，结果只是勉强接受。许多一直忠诚于奥伦治家族的老贵族，因她非常傲慢无礼的举止而与她疏远了。她不久就发现自己被冷落了，身边只有几个想要奉承她、只说她爱听的话的卑贱小人。

事请更糟的是，公主和她婆婆的关系非常不好。这位年老的女士仍住在吕伐登，从那里她不断地给自己的英国媳妇找麻烦。两位公主没有一点和好的希望。首先，在儿子的生活和政治生涯中已结束使命的老公主，自然不愿意看到另一个女人在她儿子的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原来是属于自己的。不仅如此，两个女人的性格完全不同，年老的那位看到年轻的公主出发去了海牙，竟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快。

威廉四世一死，在吕伐登的年老的母亲便开始担忧在海牙的孙子受教育的方式。德国人不可能赞同英国人的方式。不幸的是，这位祖母固执于自己的偏见，开始公开与媳妇作对。在这方面，她实际上是受到了弗里斯兰老贵族的支持。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了，这些人形成了共和国惟一的宫廷。如今在海牙另有一个要显赫得多的宫廷，他们自然很不高兴。他们在奥伦治

家族的顾问班子里不再扮演以前那样的重要角色了，他们感到自己降了一个等级。当然他们可以在海牙的宫廷中轻易获得地位，但由于他们具有强烈的外省人的狭隘习性，对商业化的东西本来就具有封建领主式的厌恶，所以宁愿呆在自己的小城市里。

来自北方的反对意见最初的表现是三级会议总会中有人提出一个建议，要求为小亲王任命一个私人教师班子，所有的亲戚都应该在其中扮演角色。由于当祖母的已对自己的儿子——小亲王的父亲行使过这种职责，因此，组成私人教师班子时应考虑她有权对孙子的教育施加同等的影响。但就像我们曾看到的，出于对北方的弗里斯兰同胞多管闲事的回报，荷兰省的人们不愿在任何程度上满足他们的请求或在亲王的教育方面给他们任何机会；他们想照自己的方式培养他。虽说私人教师班子未被任命，但这个插曲足以向每个人显示在执政的阵营中没有合作可言，这样也就极大地妨碍了小亲王的成长。

别的误解不久也随之而来。总有许多人觉得执政对太多的事情负有责任，他不可能处理所有引起他关注的事情，因此他该有一大帮行使秘书职责的助理，这些人应该形成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责任内阁。这样的话执政就可以有必要的时间去照料更为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核算无足轻重的账单或权衡对某个乡村地区镇长的任命。威廉四世不会有时间倾听这个建议，他过多地忙于本该留给他的下属去关心的琐碎事情。

顾问班子里最聪明的几个成员现在对女长官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本廷克伯爵是奥伦治家族坚定的支持者，他搞了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长篇报告。然而报告被恭恭敬敬地搁置到了一边。本廷克不是那种愿意看到自己的建议被如此处置的人，于是，他便告退归隐，从公主的顾问班子里消失了。

但由于公主对共和国的政治状况毕竟没有熟悉到可以自己做主的地步，所以她不得不更多地将事务的管理留给人数不多

的书记处去做。书记处都是些不起眼的人物，他们无私地为执政和执政的家庭成员服务。

随着本廷克及其忠诚分子的逐渐离去，摄政者们此时突然惠顾了这个无助的家庭。他们聪明地设法让公主觉得他们是必不可少的，而此时公主正茫茫然无所适从。并不是他们突然变成了执政的支持者，正相反，此时在他们看来，设立执政这个显贵的职位还像以前一样地令他们反感。但只要还将有一个执政存在，他们就要兴致勃勃地对这个显贵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

几年以后，留在公主身边的随从中只有一个人可望或多或少无私地为她服务，这人就是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路易斯·恩斯特公爵，简称"布伦瑞克公爵"，他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扮演着一个奇特的角色。他起初是一位德国亲王，后来他多年出任奥地利的陆军将官。此后他成为尼德兰陆军总司令和共和国实际的独裁者。他的最后岁月是在德国度过的，最终死在家族祖传的城堡中。生于1718年9月25日的他属于一个又大又穷的家族，这样他就只好到国外寻找出路。他加入了奥地利军队，在塞肯道尔夫手下服役三年，参加了与土耳其的战争。1747年，玛丽亚·特蕾西娅为表彰他的功劳，授予他陆军将官的军衔。他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是个活跃人物，曾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军医都认定他没救了，但他却躲过一劫，活了下来，被送到艾克斯[1]休养了一段时日。

公爵在艾克斯的时候，法国入侵比利时，由于他离战场很近，便被派去当尼德兰的佛兰德地区军队的首领。他在那儿遇见了刚当上执政的威廉四世，此时后者正沿着边界视察防御设施。他似乎给执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致使威廉马上试着说服

① 艾克斯：即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法国南部罗纳河口省城市。当地温泉可治疗风湿和血管疾病。

他接受自己的雇用。劝说玛丽亚·特蕾西娅允许她的将军效忠于别的主子确实费了许多口舌，但最终事情还是成功了，布伦瑞克公爵去了荷兰省以便重建尼德兰的陆军。

坦率地说，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个人。人们写他写得如此之多，这在尼德兰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物中是少有的。关于这个人的小册子有一大堆，使他无数次成为讽刺画和讽刺诗的嘲笑对象。如此臭名昭著而又劣迹斑斑的人物中很少有像这位“胖公爵”那样被公开谈论和不断出现在印刷物之中。他晚年时雇用了一位德国教授为他写传记，针对人们对他的攻击，试图为自己辩护。那位教授整整记了六大册的详细笔记以便从中获取材料。但这部为自己的一生辩护的书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胖公爵”一直是使共和国走向衰落的替罪羊。据说他从道德上和肉体上腐蚀了威廉五世，还说他扼杀了亲王的卓越才智，使之变成了白痴，以便能保持对这位无依无靠的人儿的影响，等等等等。

最近20年，人们试图为公爵恢复名誉——证明他的同时代人过于忘恩负义地对待他，借指摘亲王最信任的顾问的过错来掩盖他们自己的罪恶。还有人试图证明在既定的环境下公爵是惟一的能从毁灭中挽救共和国的人。正像一般惯有的情况，真相总是需要把两个极端加以折衷。

一个能在20年间在共和国这样难统治的国家保持首脑地位的人物，也许他有许多别的过错，但他不可能是一个傻瓜。不仅如此，他还必须具有良好的精神品质，因为靠他体能的优势是不可能使周围的人深受影响的。他这人异乎寻常的丑陋，中年时他变得十分肥胖，以至于都没法骑马了。他从小就口吃，到年老的时候，口吃更厉害了，他想清晰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都变得很困难了，大多数人很难听懂他究竟在说什么。

然而，他所有的敌人都认为他把人的天性认识得很透彻，

在政治方面确是位行家里手。处于共和国土生土长的许多渺小的政客之中，这个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他从早年起就已习惯于高贵的奥地利宫廷的环境。他整个一生要么纠缠在某个国际阴谋中，要么对在他周围耍小手腕儿的人冷眼旁观，且洞若观火。

至于他的军事才能，曾引起他的同时代人的痛快淋漓的嘲笑。人们这么嘲笑他必定是以他某些时候的表现为依据的。根据一般的原则，当然是有亲王血统的人往往被任命为陆军将官，但这样的军人很少冒险被派到异教徒的土耳其去作战，或被投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这样血腥的战斗之中。实际上玛丽亚·特蕾西娅是在犹豫了好长时间之后才让公爵去了共和国，对他的才干还是挺看重的。

确实，到了共和国之后，公爵就没有多少机会显示他作为一个军人的价值了。他清楚地看到，无人过问的尼德兰陆军在目前的境况下已无法挽救了，因此他甚至都没有试着提出要进行改革。他认为他的首要职责在于作为首席政治顾问，为威廉四世、那位寡妇和后来的小亲王服务。说他扮演这个角色完全是出于对奥伦治家族的柏拉图式的奉献是缺乏真实性的，就像他的同时代人申诉他来共和国供职是为了毁掉这个国家、从而满足国外敌人的愿望一样不真实。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有一种简单得多的解释。公爵是个缺钱缺地位的德国亲王，他不得不为生计打算。共和国先是付他每年两万荷兰盾，后来是每年给6万荷兰盾作为他任职的酬报，那是相当可观的，这也正是公爵来共和国并呆下去的原因。

不过总的来说，这位前陆军将官认真履行其职责，忠实地为他的主人们服务。假如没有他独特的贡献，奥伦治亲王是否还能自已维持这么久就非常值得怀疑了。威廉四世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对公爵的忠诚完全信任。但威廉一死，公爵就发现

自己处于一个为难的境地。女长官对他一点也不重视。实际上，先是荷兰省三级会议，随后是其他省份的三级会议制订了一种预防措施，提出一旦女长官在其儿子达到法定年龄之前去世，就任命布伦瑞克公爵为威廉五世的监护人，但这无助于女长官阁下与她已故丈夫的追随者之间的沟通。

那位英国公主也不愿向这位微不足道的德国公爵请教，因为这样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在政治方面缺乏贤明的头脑。但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不出几年公爵就成为海牙小宫廷中惟一似乎还知道想要做什么的人了。不仅如此，他还是惟一一个没有侄子外甥堂表兄弟需要供养的人，因此他很乐意拿自己与别的宫廷顾问比较，那些人都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家族寻求好处。渐渐地，公主被迫在她真的需要做点什么的时候去找公爵请教。公爵从不把自己的建议强加于她，而是极其巧妙地使公主相信这些建议都是从她自己的脑子里冒出来的。这样不用多久，他就设法完全消除了公主对他的不信任。女长官与公爵之间的关系变得彼此友好和互相协助了，这样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前者去世。

但即使有他的支持，公主的日子仍然不好过。许多长期处于衰落状态的产业此时都已不复存在了。每个月都有一两份请愿书递交上来，请求她为国家的商业利益做点什么。没有舰队保护的商船不断在外国（尤其是英格兰）被扣留。但女长官到哪儿去找建造军舰的费用？当时最富有的省份荷兰拖欠的款项就有7千万之多。

当1756年“七年战争”[①]的爆发使局势变得更不稳定时，

① “七年战争”：法国革命战争前欧洲所有主要大国（土耳其除外）都卷入的最后一次大冲突。其中英法冲突是北美和印度爆发的殖民斗争的继续。七年战争主要是1756—1763年的奥普战争。战争主要是由于奥地利企图收回普鲁士所夺取的西里西亚而引起的。奥地利组织有萨克森、瑞典、俄国和法国参加的反普联盟。普鲁士则与英国、汉诺威结盟。

处境就更加困难了。不久欧洲列强都卷入了这场争端。法英两国为美洲大陆北部殖民地的霸权在美洲土地上发生了战争。共和国再次被请求按照1678年条约的规定援助英格兰。女长官像以前她丈夫那样支持英国政府的要求，那正是反对势力期待的时刻。摄政者们又感到他们已足够强大，可以出面公开反对年轻的执政以及充当其监护人和国家摄政者的那位母亲。他们这么说：“女长官当然支持英国的要求。我们对一个英国公主又能期待什么别的呢?”

此时就没有什么真理可言了。女长官不会对她出生国家的利益坐视不管，但她也记得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共和国犹豫不决的态度造成了多大的恶果，于是相当正确地认定一个国家要是不想遭受毁灭，就必须遵守其庄严的诺言。

但反对派装作看不到她的真诚的用意。实际上国家正经历的困难时期也使反对派得到数以千计的心怀不满的商人的支持。商人们强烈反对将钱花费在军备上，他们还提醒公主的支持者以前帮助英格兰就意味着与法国交战的境况，没有哪个真正的爱国者希望这样的经历重演。人们争论说，这是一次殖民地战争，只要不是在欧洲打仗就不需要给予英格兰什么帮助。

就在这时，反对派接纳了一个很有用的盟友——法国驻海牙的大使。法国的旧政体可能对很多罪恶负有责任，但它确实造就了非常聪明的外交官，法国驻共和国的代表德阿弗雷伯爵就是其中之一。他受命派到共和国就是要对共和国与英格兰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尽可能地造成损害，并劝诱共和国与法国签订一个友好条约。共和国并不被认为是具有多强的作战力量，但这个国家仍很富有，而对于已在走下坡路，正面临金融崩溃的法国，对钱财的需要显然要胜过对军队的需要。

这位法国大使从很早起就与摄政者们接近，而对执政的宫廷尽可能地保持距离。他知道他的尼德兰朋友更看重物质上的

优越条件而不是感情上的体谅，因此他提出法国将给予特惠关税问题，这个美好的前景正合尼德兰人的心愿——要是共和国的所作所为令人满意，可能会获得这样的奖赏。他所谓的所作所为令人满意意味着再一次拒绝遵守与英国的条约的规定。但英格兰期待尼德兰援助的期限快到了。由于共和国假装无法拥有运送其6000援军必需的船只，英格兰便提出自己派船来接。

1751年3月，英国船只真的开到了尼德兰海滨，但三级会议总会请求继续延期，以便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这件事。审议进行了整整三个星期，这时英国司令不愿再等下去了，便起航离开了。

英格兰认为共和国这样做的意思就是明确地拒绝援助，从那以后，他们将共和国视为不忠实的盟友，对待尼德兰的船只就像对待别的外国船只一样，任意予以搜查和没收。然而摄政者们（还有那位法国大使）则认为他们对女长官（还有英格兰）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们似乎全然不顾他们玩的游戏有多危险，也似乎不明白一旦发生战争两个国家的力量彼此依存的重要性。

但当美洲的战争持续多年、尼德兰商人不断遭受英国私掠船[①]的袭击时，有关所有这些损失的非难很快就落到了女长官的头上。请求帮助的请愿书越来越多，全国各地都有代表团来唱尼德兰生意人遭受巨大损失的悲哀的挽歌。但这些人只是想来责难，因为他们对如何改变这种事态似乎并不太上心。

正当他们在荷兰抱怨自己损失巨大的时候，他们也正在美

① 私掠船：又称“武装民船”，为交战国征用以攻击敌人船只的私有武装船只。船员工资不归征用国政府支付，但他们有权利为谋求自身利益而出航，因此常常很难分清武装民船和各种海盗船的区别。

洲殖民地干着非常有赚头的走私生意。交战双方都需要枪支弹药，而尼德兰商人将货物出售给交战双方。计算的结果表明这项贸易非常有利可图：要是派出去三艘船而只有一艘船到达目的地的港口，贪得无厌的商人依旧能有巨额的赚头。

可怜的女长官遭到来自各方的谩骂，而谩骂的方式大大违背了体面的政治争论的标准。她开始显现出患病的迹象。她原本就不是非常健壮，却像她丈夫那样努力工作而不讲究生活规律，在完全是徒劳无益的议题上耗尽心力。1759 年 1 月 12 日，她终于熬到了生命的尽头。

公主一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那些来自有固定商业利润一方的源源不断的抱怨就突然停止了。显然摄政者正打算要统治国家，至少可以统治到威廉五世达到法定的年龄。他们小心翼翼地停止了以往他们所热情鼓噪建造一支舰队的动议。现在他们可能有义务不得不自己来承担所需的经费，于是他们转而宣告，也许说到底舰队并不是绝对必需的。



母亲去世时，威廉五世 11 岁。要等到他可以当政的年龄，还得要 7 年多的时间。安妮公主在遗嘱中指定她的父亲英王乔治二世和她的婆婆玛丽·路易丝为小亲王的监护人。正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荷兰三级会议对让未来的执政一直处于他们直接的看护之下很关心；两位尊贵的亲戚除了远距离的影响就不让他们做什么了。而住在海牙的布伦瑞克公爵却将成为威廉直接的私人教师和监护人。

公爵还当上了陆军和海军的临时总司令。我们该记住这时候公爵仍是摄政者所偏爱的，他对国家有价值的服务常常受到各三级会议特别的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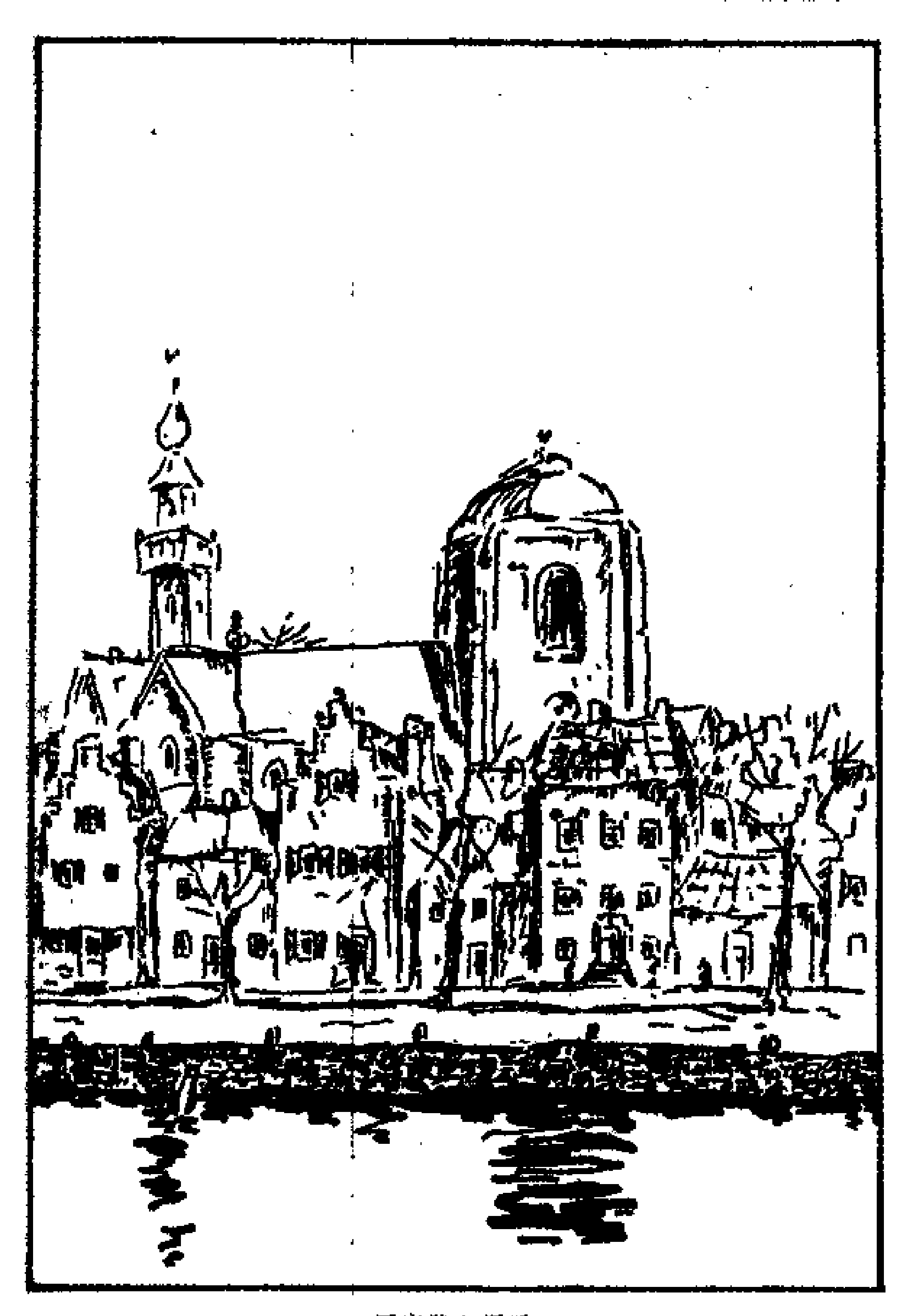
对文职官员和军事官员的任命权是个麻烦事儿。执政被授予这个权力，各城市的议事会给予他这个权力。一个孩子不能很好地行使这个权力，也不能放心让一个外国人去行使。因此三级会议声称，为了安全起见，在威廉达到法定年龄之前，这

个权力应该回归到他们自己的手里。由于此时已经没有能与三级会议相对抗的制衡力量，结果他们如愿了。在接下去的7年里，立法权连同行政管理权又掌握在了摄政者们的手中。

不过在弗里斯兰，玛丽公主保留了独立的执政职位，而且在她的孙子长到18岁之前，她一直行使任命权。

几年前当威廉四世去世的时候，这位老公主曾试图以一个监护人的班子立即取代她媳妇的地位，她本人会在其中施加很大的影响。现在当事情似乎表明至少在7年中公爵和荷兰三级会议将控制她年幼的孙子的命运时，玛丽公主便试图以建议设立由威廉的姐姐卡罗琳娜公主把持的摄政团来消除他们的影响。这位年轻的公主17岁，人们认为她比她弟弟要聪明得多。她已与一位德国的拿骚－威尔伯格亲王订了婚。这个拿骚与尼德兰的拿骚没有亲戚关系。她在弟弟未成年时被任命为摄政者自然能使她的祖母在国家事务中充当领袖人物。她未来与德国亲王的婚姻将会把另一个外国人带进共和国的事务中。由于考虑到布伦瑞克公爵，人们不想再要别的外国人了，这个计划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

该计划最后的成功机会最终被恰在那时发生的一桩极可怕的丑闻给毁了。这桩丑闻发生在弗里斯兰一个最有名望的家族。奥诺·兹维勒·凡·哈伦是弗里斯兰奥伦治党人的领袖，是这个省地方政治的重要人物，对共和国的其他省份也有影响。他被自己的女婿指控为犯有滔天的罪恶。这是一个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件，而我们至今仍对事情的真相一无所知。对于执政及其追随者相当不幸的是，凡·哈伦家族坚持要将一切都公之于众，而一般人认为这样的做法在专登耸人听闻消息的小报问世之前是不会有的。不久，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确信，在吕伐登的那些被认为是老公主最忠实顾问的最有名望的家族中确有腐败堕落的情况。以后每当玛丽·路易丝的追随者企图对与



国家陷入沉睡

她孙子利益有关的事务谋求某种影响时，人们便会提起这个不幸的事件，还暗示再好的内阁也不免施舍先及亲友。

随着那位祖母权势的消除，布伦瑞克公爵可以自行其是了。后来公爵被斥责为忘恩负义的人，他的敌人声称是他引发了丑闻，他将它公之于众是为了使自己施加于小亲王的教育方式能不受任何妨碍。这项指控没有确凿的证据。很显然，他对凡·哈伦离开政治生活的舞台并不感到遗憾。他们两人之间从未建立起过友谊，而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公爵并没有多少过错，倒是凡·哈伦自己，他的骄傲自大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作为亲王的监护人，公爵意识到自己的首要职责是完全重组其被监护人的财政，于是他着手整顿威廉作为惟一的继承人从一些死去的亲戚那里继承来的许多领地的行政管理。这些领地遍布德国各地，而且管理不善。公爵重组的努力非常成功，不出几年，这些领地每年的收人都达到200万荷兰盾。这个数目使威廉成为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亲王，在国内更是无人可比的最富有的人。

作为总司令，公爵也试图在军队里开始几项改革。腓特烈大帝在与奥地利的战争中运用的新战术促使旧方式完全被废弃了。但由于事实已经表明军队已无法挽救了，公爵对拯救军队已不抱希望了。他没有强行推行他的改革，仍在为共和国服役的少量军人也就没受到打扰。

布伦瑞克非常高明地处理国内的政治事务。摄政者又被赋予任命权这个事实被证明对执政的事业是非常有益的。任命权给其拥有者每带来一个朋友，同时就要面对十个敌人。得到职位的幸运儿自然会歌功颂德。面那十个徒劳地发誓要进行可怕报复的人赶紧就转投到对立的派别。只要执政自己行使任命权了，就会想到这些失望的、心怀不满的想当官的人。过去曾有大批这类与当政者势不两立的人投靠了摄政者，此时他们的命

运依赖于摄政者，其中失意的人们又被迫回到了执政的阵营。这样的话，威廉在年轻时就享有宁静的心境，而且颇受公众的拥戴，而这一切在他庆祝了 16 岁生日之后就统统消失了。

至于外交政策问题，从 1759 至 1766 年这一时期无人提起过。三级会议总会谨慎小心地避免使国家卷入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英格兰继续搜寻尼德兰的船只，没收那些被认为是战时禁运品的尼德兰货物。对付这种待遇的惟一补救方法就是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但没有人愿意为这样一支舰队支付费用。尼德兰商人不是以体面的防卫，而是以继续扩大走私业务的规模来弥补他们的损失。

1766 年 3 月 8 日，威廉五世到了自己掌权的法定年龄，布伦瑞克公爵也就从亲王监护人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人们对公爵在职期间的工作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三级会议总会对其可贵的服务正式表示感谢,并赠予他由各省分担的 60 万荷兰盾。三级会议总会还指示共和国在维也纳的代表设法劝说玛丽亚·特蕾西娅允许她的陆军将官留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再服务几年。皇后犹豫了一阵后恩准了。虽说布伦瑞克不再担任监护人,但他还像亲王未成年时那样继续指导这位年轻执政处理事务。

乔里森在他写的那部有关威廉五世的出色的传记著作中，驳斥了常常被人重复的关于布伦瑞克必定是腐蚀了这个对其关怀完全信任的孩子，而且让这孩子畏畏缩缩以便能对他施加更大的影响的说法。乔里森这么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假如威廉得到最有能力的教师的指导，就能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说实在的，由于其父母的原因，威廉五世作为他们的孩子也只可能是这个样子。他的父亲母亲身体都不强壮，也没有堂堂的外表。他母亲一直带着童年时毁坏其娇好容貌的出过天花的痕迹。他父亲童年时则患有癫痫病，是个缺乏活力或耐力的

相貌平常的人。

威廉五世继承了他父母虚弱的身体状况。他容易疲劳，花一点力气就犯困。他模样呆笨，遇事便手足无措。这种笨拙造成了他的羞怯。羞怯常使他不想笑的时候脸上也带着笑意。和人谈话时他动不动就叫喊，而他咧着嘴不停地傻笑使人们更加深了他愚笨的印象。

无可否认，亲王具有某种智力，但不幸的是这样的智力对他没有一点好处。就像他的绝大多数先辈那样，他也非常喜欢数学研究，在这一领域有超出常人的能力。这种心智的数学倾向对莫里斯或弗里德里希 - 亨利[①]这样的将军是极有用处的，但威廉五世却难得有机会将他的知识运用于解决战略问题。他非凡的记忆力只是用来将杂七杂八的各类知识填满他的头脑。但由于他从未学过遗忘的艺术，他的头脑不久便像一个货仓了，让各种内容装得满满的，随时可以取用。除非经过长期的学习、研究，一般人是难以达到这样地步的。

亲王生来就爱好琐碎的事物。他想自己照料一切，为了作出决定，他细心查证由此产生的各个问题的细枝末节。杰出的政务活动家通常能做很多事，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选择部下，明智而有条理地将所有非本质性的事情留给这些助手去做。威廉则正相反，他让他的顾问去决定大部分的国事，自己则包办别的一切。因为他对人的天性懂得很少，不能判断他召集的顾问们的特性，众多的议题往往是以极度损害执政威信的方式决定下来的。正像他的同时代人所说的，“亲王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条理不清地做每一件事。”执政花费一生的绝大部分时

---

① 弗里德里希 - 亨利（1584—1647）：奥伦治家族成员，1625 年其兄莫里斯死后，他接任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执政。他和莫里斯一样，也是个有战略眼光的军事家。

间去做那些每周挣 10 个荷兰盾的年轻职员也完全可以胜任的事情。

威廉五世非常骄傲，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奥伦治家族总是骄傲的。在 16 世纪、17 世纪，该家族成员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属于一个相当特殊的人种。然而第一代执政却是非常普通的人。他们的骄傲并不妨害他们的利益。但在这类事情上，拿骚的弗里斯兰旁支似乎与到威廉三世便已绝嗣的分支有一点不同。这个旁支的成员不断允许他们的骄傲妨害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他们在许多方面是第一个伟大的威廉的刚强子孙的滑稽的模仿者。莫里斯和弗里德里希－亨利在军营和马背上度过他们的大半生。他们的日子很艰难，爱什么恨什么从不想掩饰自己的情感。包括所有的缺点在内，他们的个性是自信的和有创造性的。该家族北方分支的成员总的来说似乎没有另一分支先辈的缺点，但他们也缺乏后者的优点。除了后来的威廉一世国王[①]，他们都缺乏人格的力量。不很好也不很坏，不很傻也不很聪明，既没有忠实的朋友也没有死敌。他们都是不引人注目的平庸之辈。

威廉五世无疑是该家族成员中最糟糕的类型。极为不幸的是，他生活在一个过渡期。在他活着的时候，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从中世纪的社会造出一个现代世界。至于威廉是否认识到了发生在他周围的所有这许多事情的重要性，倒真是值得怀疑的。他甚至无法辨清自己在周围发生的这些事情中的真实处境。

最后我们必须提到亲王的另一个不幸的特点——他轻易不

① 威廉一世（1772—1843）：尼德兰王国国王和卢森堡大公。奥伦治亲王威廉五世之子，法国人侵时移居英伦。一度参加奥地利军队对拿破仑作战。1813 年成为荷兰共和国首脑，1815 年成为包括比利时、列日和卢森堡大公国的荷兰联合王国国王。1840 年退位，出走柏林。

原谅人。他不喜欢报复人，他的性格还未自信到这个地步。但在平时，要是有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持反对意见，他就绝对不会原谅这个人。假设几年之后，经过政坛的一片混战，这同一个人忽然转到了执政的一边，那执政也不能忘掉过去，肯定拒绝在任何程度上与这个新的支持者合作。不幸的是，这位亲王每时每刻都要顾及自己一丝一毫的自尊，却转眼就将那些为他的事业牺牲了一切的人忘到脑后。

在接下去的令人苦恼的岁月里，一些男人女人对执政表现出极大的忠诚，往往为他们的领袖而蒙受流放和没收财务的苦难，而他们的执政却从不去救助他们。他认为这些人对他及家人的所有服务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对其忠实的臣民予以酬报。这就很容易理解这样的性格和这样的个性（或者说相当缺乏个性）的一个亲王在18世纪的后半期之所以陷于不利境况的原因了。

威廉的执政生涯一开始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说直接的责任全在于布伦瑞克公爵也未免不能服众。事实表明，他的第一个正式举措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身份。威廉是惟一一个生来就有世袭执政身份的人，因此他的父亲一死，他就自动继承了执政的职位，就像在君主政体的国家里，国王去世便由加冕王子继承一样。但事情却并非如此，布伦瑞克公爵多此一举地去请求各省的三级会议给予威廉以正式的任命。这样一来就表明，是三级会议而不是执政拥有共和国的最高权力。

为什么公爵要这样做呢?他一定知道这样的举动实在是没有必要的。事实是公爵想要同时为执政和摄政者们服务，这样他就能和两边都搞好关系。通过请求给威廉一个正式的任命，他为摄政者们做了件事，他希望后者将来不会忘记。

在这个糟糕的开端之后，另一个举措使公爵有了负罪感，虽说它被保守秘密达20年之久，但最终泄露出去后，给执政

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过去，这样的情况只会发生在继位的王子不堪重负，只好处于可信任的御前顾问的控制之下。但一个亲王几乎在还未被任命为执政的时候，就让宫廷中某个人束缚住他的手脚，并且实际上是放弃了将来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这样的事情简直是闻所未闻。

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1766 年 5 月 3 日，亲王签署了一份文件，只有一份，没有备份。该文件由代尔夫特的议长凡·布里斯威克按正式的格式起草。在文件中，亲王表达了他真诚的愿望，即让布伦瑞克公爵一直留在他的身边，作为他军事和民政事务的顾问。布伦瑞克公爵也立誓许诺在任何情况下给予亲王忠告，在需要的时候支持他维护他所有的世袭权力和特权。然而，这个协议致命的部分是在快结尾的地方。亲王许诺绝不要公爵为按此契约的规定可能给予的任何忠告负责。换一句话说，布伦瑞克公爵被任命为荷兰省执政的机要顾问，同时他得到许诺不必承担他可能给予的任何忠告所造成的后果。即使不把不良的动机归咎于公爵，且充分认识到他必须与一个特别无能的年轻人一起当政的情况，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文件是一个高度危险的实验。

公爵自己也承认这个事实，他请求对他与曾监护过的亲王的交易保守秘密。但这是不可能的，起草这个文件的凡·布里斯威克是知道这件事的，荷兰省三级会议的大议长斯泰恩也知道，还有在海牙的英国大臣和亲王派的忠实成员本廷克伯爵也知道。在共和国泄密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国家错综复杂的机构的作用，摄政者的首要人物不久就知道了这个文件的存在，但由于在那个时候捅出来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他们便封锁了消息。人数众多的平民自然要到 18 年之后才听说这件事，到那时这个带有明显政治意图的协议的存在将提请泽兰省三级会议付诸讨论。既然公爵已经以这种方式挽救了自己“不可或缺

的人物”的地位，现在他便把注意力转向为威廉找一个合适的妻子。

直到那时候，奥伦治亲王通常还是与英格兰国王的女儿结婚。公爵是个德国人，便鼓动亲王与一个德国公主结婚。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候，英格兰已经不得人心了。那时腓特烈大帝正享有崇高的名望——他在 20 年的时间内把普鲁士变成了强大的国家。与普鲁士的公主联姻似乎是密切了共和国与英格兰一个敌人的关系，这样做不会不受欢迎的。1767 年 10 月 4 日，威廉五世与腓特烈大帝的弟弟普鲁士的奥古斯特亲王的女儿弗里德里希·索菲娅·威廉明娜结婚。

公主 16 岁，漂亮而活泼。她曾远离伯伯的宫廷过宁静的生活。事实上那位著名的伯伯对女人不太在意，而且相当害怕女人参与政治事务，他谨慎地一直不让他年幼的侄女过问国家事务。只是到了此时她要与富裕的共和国的富裕的执政结合了，而且这样做使她成为对外政策的一部分，腓特烈才给予这个年轻女人一些关注。

腓特烈对共和国并不怎么尊重，他对其军队和舰队衰败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共和国还拥有普鲁士缺少的一样东西——现款，因此对这个国家仍不可轻视。至于共和国内部的政治状况，普鲁士国王和别人一样知道，这个国家正在法国和英格兰之间摇摆不定，虽说还未正式与其老盟友英格兰关系破裂，但这种破裂随时都可能发生。他也知道奥伦治家族传统的政策是与英格兰站在一边，而摄政者们此时正偏向于和法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在普鲁士国王看来，自己的侄女在新的环境中如何行事至关重要，需要受到指导，于是他给了公主一个年老的普鲁士贵夫人作为陪伴。这位贵妇人是冯·丹克尔曼男爵夫人，对公主来说她是尊贵的夫人和心腹顾问；同时她不断向腓特烈报告共

和国发生的事情。

同年 11 月，这对幸福的新人离开柏林前往海牙。那位据各种报道说是脾气古怪、不会给海牙的宫廷生活增添一点魅力的贵妇人陪伴他们一同前往。

然而亲王的婚姻却是很幸福的。公主在所有的方面都超过自己的丈夫，无论是性格、能力，还是精力和勇气。但不管他的生活兴衰变迁，她始终忠实于他，当他年纪轻轻就病倒时，她照顾他，后又跟随他一同流放。她使亲王多活了许多年，并作为一个出色的母亲，她活着看到自己的大儿子登上新的尼德兰王国的王位。她婚后最初的几年相当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在这对年轻夫妇的日常情景中含有某种幽默因素。一个年老的奥地利陆军将官和一个普鲁士男爵夫人是尼德兰执政家庭的真正管理者。然而这种幽默似乎对这对夫妇没什么影响，他们正忙于把注意力放在生儿育女上面。国家很安宁，股息令人满意地定期得到支付，人人都很快乐。但随后令人震惊的可怕事件就来临了，它粗鲁地将国家从酣睡中唤醒，突然将其投入严重的国际争端之中。



6 美国独立战争

在美洲的英国殖民地，有长达 15 年的一个时期，殖民地与英格兰本土（即所谓“母国”）或由英国坚持派驻大西洋彼岸领地的管理当局之间的误解不断加深。只要法国还是加拿大的主人，对大西洋沿岸的 13 个英国殖民地仍是有威胁的邻居，英国政府就不得不保持对大洋彼岸的臣民的良好态度，被迫认真地考虑他们的许多要求。另一方面，殖民者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英格兰本土的军事援助，因此也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欲望使之较为适度，并不再像往常那样过多地发泄不满。

但英格兰在加拿大取得胜利，将这个法国殖民地占为己有，在美洲的英国人与在英国的英国人之间就不再有什么合作了，双方都自由地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不幸的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乔治三世国王登上了英格兰的王位，聚集在他周围的大臣们的顽固和愚笨使不满的星星之火燃成了燎原之势。

我恐怕一定要说明白，身在文明世界边缘的美洲殖民者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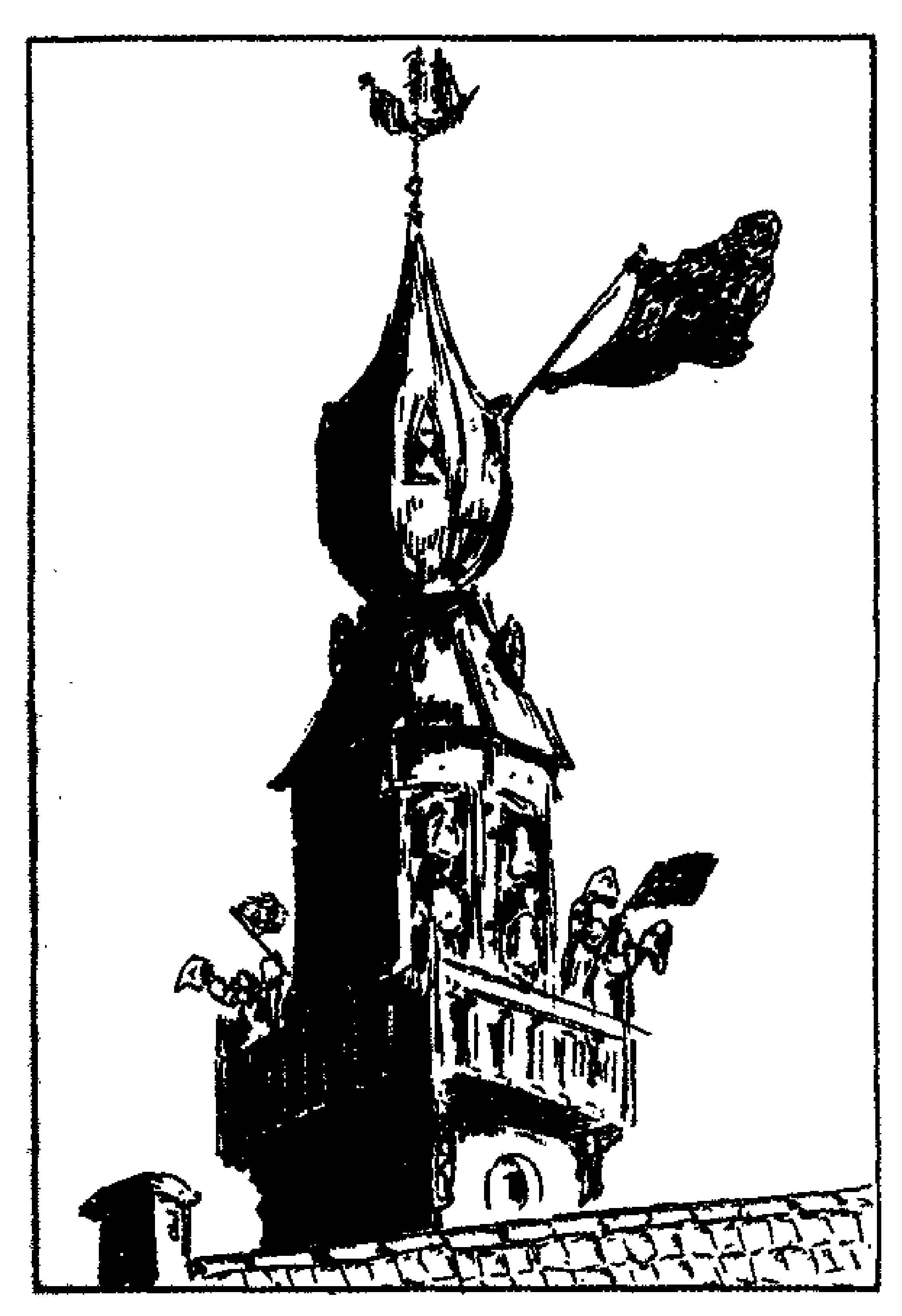
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英国之间的争吵，是如何与共和国的历史必然地扯到一块的。

美洲的这场争吵太特别了。绝大多数革命的发生都是长期遭受苦难的结果。革命的最终目的都是从不堪忍受的非正义之中解救被压迫的民众。而美洲在革命之前并没有全民族遭受苦难的时期。别的革命者从没有这么顺利过，也从没有在政治约束方面如此宽松。美洲的革命者发起了一场运动，并在 1776 年 7 月 4 日的《独立宣言》中到达了其合乎逻辑的结局。

殖民者与英格兰本土之间交恶的起因之一自然是情感上的。当时的英格兰基本上是一个贵族政治的国家。殖民地在生来富裕的人士建立起财阀统治之前，基本上是民主政治。两个政体中一个政体的许多特性必然招惹另一个极端的反感。绝大多数殖民者平时能接触到的故国同胞只有英国在那里的驻军，那些军人的行为举止都那么傲慢和固执。另一方面，呆在家里的英国人得到的有关大洋彼岸同胞兄弟的消息，都是把后者描写成在交易中总是占上风、不能当即得到百分之一百或更多的回报就不愿花一个子儿的狡猾的马贩子这样的内容。至于英国的大臣们，他们遵循对国外无论是朋友的情况还是敌人的情况都一无所知的历史悠久的英国传统，对待他们在美洲大陆的臣民既漠不关心又蛮横无礼，这种态度确实比直接的压制给英格兰带来更多的麻烦。

在殖民地居民和英格兰本土之间存在的矛盾并非如此的不可补救。正相反，殖民地的大多数人是坚定地倾向于对英国保持忠诚的。但英格兰方面长期以来奉行的一系列愚笨错误的政策逐渐扩大了裂痕，直到最后彼此的分离成了惟一可能解决问题的方式。

此时只要任何事与英格兰有关，特别是任何事似乎表明对英格兰会有所损害，都会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引起人们的热



国人再度拥护奥伦治家族

情，就如同今天英格兰对德国人那么幸灾乐祸，反之亦然。

我们只需要读一读当时的小册子就可以看到英格兰是如何触动共和国民众的神经的，任何有关骄傲的不列颠人陷入了什么新的麻烦的一点点迹象就令他们那么的欢欣鼓舞。美洲殖民地居民任何表示其不满的行动都会引起尼德兰共和国所有读报的人们的极大兴趣，并对绝大多数人产生着影响。

美洲殖民地的领袖所喋喋不休的自由、人权和民权，听起来有点夸大其辞，不过比起几个世纪以前由共和国煽动起来的类似情绪，他们的宣传更能赢得同情。而在联省共和国把西班牙国王视为非法统治者之时，他们的激情更多只是停留在了口头上。当共和国获悉美洲社会暴风雨的征兆已经显露时，也正是人们能尽情欢呼的时刻，因为那时刚刚隆重庆祝过解除西班牙人对莱顿的围困200周年纪念日。这一代人自己没能表现什么英雄行为，总是非常喜欢详细描述先辈的丰功伟绩，以昔日的强盛为荣。为莱顿解围举行的纪念活动搞得极具排场，这次活动也是为了纪念奥伦治亲王为回报莱顿市民的英雄行为而创办了莱顿大学。执政和他的家人都到了场。适用于这种场合的许多特定的渲染方式被那些最有名的教授和政客尽情地运用。自由是所有这些演说的基调，在对最早创立这种自由的先辈表示敬意之后，有许许多多溢美之词是对此时正以可敬的方式享受着先辈劳动成果的后代人而发的。

也就在第二年，人们的热情还未完全消退，有关列克星敦战役[①]的最早的稍稍有点夸大的新闻传到了共和国。“暴君豢养的走狗在怒火燃烧的乡村被卑贱的农夫击败!”没有比这更

① 列克星敦战役：列克星敦今为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城镇。1775年4月19日，77名民兵在帕克上尉指挥下阻击向附近康科德进发的700名英军。传统上认为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次战事的发生地。

好的消息了，尤其那被击败的暴君正是北海彼岸的死敌。

至于那放了“震惊世界的一枪”的农夫，此时在欧洲备受关注。在广阔的美洲大陆海岸边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欧洲人只是隐约听说一点罢了。但这一时期社会的最高层人士正在涉猎有关“自由”和“公民美德”的理论，与今天的这类人要涉猎一点社会主义理论是非常相像的。卢梭[1]和法国百科全书派[2]的著作并未白写，他们的理论为当时每个装作在理性方面趣味广博的人士所拥有。美洲的农夫和操纵这场对英格兰革命的政治家不久就被赋予了所有崇高的美德。这样的美德是只有那些一直过着远离腐败社会、身处高度纯净的原始森林的自由自在的人才会具有的。

然而对于共和国，除了这些情感上的考虑，还有其他更为务实的习性的作用。当然在最初的几年，人们一点也不清楚美洲的反叛会如何结束，是殖民地的人被击败还是演变成一场无休无止的游击战，殖民地的人最终取胜似乎是无望的。

几年之后，当美洲殖民地似乎真的要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从所属国完全地独立，新的商业优势的远大前景便展现在尼德兰商人面前了。

直到革命开始之前，美洲殖民地的人仍被迫只与英格兰直接通商，英格兰小心谨慎地不让殖民地的人进人会与国内臣民的生意构成竞争的商业范围。要是他们得到了独立，殖民地的人就能自己选择做生意的对象了，共和国希望在美洲的贸易中得到自己的份额。在最近的30年中，共和国许多的产业领地都逐渐丧失了，所以人们都热盼着有一个新的开端。

① 卢梭（1712—1778）：18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著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和《忏悔录》等。

② 法国百科全书派：指法国18世纪后期一批启蒙主义哲学家，因他们致力于编撰《百科全书》而得名。

这种务实的想法在美洲得到了回报。殖民地这些杰出的人士总是远比欧洲多愁善感的人们所能想像的要实际许多，他们是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们的革命理论每时每刻都不允许他们忘记日常生计的那一面，经历过苦难的他们决不会放弃“一美元加一美元等于两美元”这样有坚实基础的立场而去走极端。由于对生活的物质方面的极端冷淡和将整个人类提高到理想高度的夸张观点，法国大革命则受到完全不同的原则的指导。

美洲的革命者比他们之前或之后的别的反叛者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做，不操之过急，不在对遥远将来没有意义的梦想中浪费精力。那时候他们最必不可少的是枪支和一般的作战物资。他们没有正规的舰队，只有很少的商船。在海上，他们无力对抗英国的舰队。因此，尼德兰走私船在供应战事必需品方面使他们大大受益。西印度公司拥有的安的列斯群岛的一个叫圣尤斯塔修斯的小岛，与美洲港口保持了定期的走私贸易。该岛有一个良好的港口，那里的货仓装满了准备运往西班牙或美洲遭禁运的口岸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货物。

这种贸易对英格兰是相当有害的，就像美国对南非的骡子出口损害了前德兰士瓦共和国[①]的利益。于是在1775年8月，英国政府指示其在海牙的代表向三级会议总会发表讲话，要求立即停止出自尼德兰港口的这种走私。

三级会议总会对发生这种事表示遗憾，许诺立即进行处理。他们颁布了一个为期6个月的禁令，禁止从尼德兰港口出口枪支和各种作战物资。该告示威胁要对违反这项禁令的人征收1000荷兰盾的罚款。6个月以后，该禁令又延长了半年。

至于该禁令的实际效果则等于零。这个生意赚头实在太大

① 前德兰士瓦共和国：德兰士瓦为今南非最北一省。1852年英国承认德兰士瓦的布尔人独立。1902年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

了，靠威胁和罚款来制止它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这项特别贸易的诀窍众所周知。三级会议总会又怎么能猜到直接运往法国的奶油桶里实际上装的是火药，而且要开往一个美洲港口？当然要是他们真的想发现的话也是能发现的，但他们不愿意过于认真地去干预一种商业行为（尽管这会遭到英国的反对），况且这种商业行为能给许多本国公民和他们自己带来丰厚的收益。

当英国政府注意到三级会议总会对这种走私生意的防范、控制是徒劳无效时，便决定自己动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加勒比海的英国舰队因一些新的舰船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强大，所有的尼德兰船只都将受到搜查，一旦发现装有战时禁运品，就会被带到英国港口，并就地将货物出售。当然，这种事不可能增进两国的感情。英格兰对共和国的漠不关心很不满，共和国则怨恨英格兰的干涉。

然而法国却怀着兴趣和欣喜旁观着。法国驻海牙的大使前所未有地忙碌着，他游说道，但愿共和国放弃许多年来名存实亡的与英格兰的条约，那对共和国的真正利益将会有多么大的好处，等等等等。

这些过去的条约不久造成了伦敦与海牙之间的另一场误会，而这一次具有非常严重的性质。事情就这样一再重演。

由于在美洲作战，英格兰需要军队。英格兰国内不能为英格兰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所卷入的许多军事行动提供全部必要的人力。因此正像人所共知的，英格兰向德国亲王购买军队。数千名德国军人被送到美洲，他们在那里卖命换来的钱，都进了黑森选侯[①]的腰包，使他能继续过奢侈的生活。

人们也同样知道，这些出色的德国人对这场以多少马克一

① 黑森选侯：选侯又称选帝侯，是神圣罗马帝国时代有权参与皇帝选举的邦君。黑森－卡塞尔于 1803 年起被确认为选侯。

个人头来论价的战争，不管从哪方面讲都没有太大兴趣。作为德国人，他们只是履行他们的职责，只要能与他们的朋友（即他们的敌人）和平相处，不发生冲突，他们就从战场上退避到安全的地方。因此，英格兰便考虑去找更令人满意的军队，于是就想起了驻扎在共和国的苏格兰旅。

苏格兰旅于 1577 年开进荷兰帮助抵抗西班牙人，从那时起就留在尼德兰服役。其士兵已不再全是苏格兰人了，不过军官都是苏格兰人，从总体上说，这个旅保留了原有的特色。这个旅在战争时期估计有 3000 人，但经历过多年的和平时期后，由于经济上的问题，人数已减至不足 1000 人。

现在英国政府请求借用这些军队。获得 1000 名士兵显然不是他们惟一的动机，通过向三级会议总会借这个旅，他们可以有机会检验一下他们的尼德兰邻居的真实感情。在圣尤斯塔修斯岛走私贸易这件事情上，三级会议总会的表现令英国人觉得不可信任。现在尼德兰人有机会向英格兰证明他们确实不抱有敌对的态度。1775 年 10 月，驻海牙的英国大使通知执政，英格兰国王请求“同意”借用苏格兰旅。11 月，执政通知三级会议总会，英格兰国王通过驻海牙的英国大使，请求借苏格兰旅用于与美洲殖民地的战争。与此同时，执政告诉三级会议总会的成员，他已建议英格兰国王用一个团的汉诺威军人代替苏格兰旅为共和国服役。等战争结束，苏格兰旅的剩余部队将立即返回，到时从人数上讲也许只能冠以苏格兰团或别的什么名称了，而汉诺威人将开回他们的德国老家，一切都将恢复到原先的样子。假如三级会议总会对这些汉诺威人无所谓的话，英格兰国王准备提供必要的钱装备一个尼德兰团。从英国的观点看，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建议，这样的表达方式实在叫人无法拒绝。英国大使深知共和国无穷无尽耽搁事情的策略，便请求对这个要求立即予以答复。相对于共和国通常的办事效

率，这意味着要速办；而在这个国家，“在一个月内予以答复”，就已被认为是特别快的速度了。

三级会议总会这部错综复杂的机器开始以它出名的方式运转起来了。一个月以后，英国政府的请求到了各省，提请后者特别加以考虑。两个月以后，也就是1775年12月，全国各省份中的四个，即格尔德兰、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和奥弗赖塞尔送回了它们的答复。由于它们并不直接地对美洲的走私贸易感兴趣，所以提议答应英格兰的请求。虽说有的省份的三级会议大多数赞同这个决定，但少数人出于理想而不是物质方面的考虑，强烈反对这种会损害反叛的美洲人正当权益的政策。

在奥弗赖塞尔，这种性质的反对意见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其发言人是琼·德克·凡·德·卡佩伦·凡·德·波尔男爵。他是奥弗赖塞尔贵族的成员，在当时，像这样在三级会议中拥有一个位置的人物是相当引人关注的。就当时的时局而言，完全可以说凡·德·卡佩伦男爵在这个议题上显得相当有说服力。他所发表的那篇演说，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瓦根纳》（第一卷第55至59页）中找到它的全文。这篇演说的基本论点如下：答应英国政府的请求并允许英国借用苏格兰旅将意味着在损害美洲人的情况下违反了中立，将意味着共和国在一场应保持中立的争端中支持了其中的一方。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自己也曾经享有“反叛者”的令人自豪的名声，现在却要被拖进一场与勇敢和善良的人们对立的战争。他们所维护的权利并不是从英国政府那儿，而是从全能上帝那儿得到的。假如英格兰国王想要雇佣兵，更应该选择雇用土耳其卫队，而不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的军队。要是我们能相信报纸的话，连野蛮人都拒绝卷入这场争端。共和国当然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坦率拒绝英格兰要求的义务。

事实上凡·德·卡佩伦是用这激情洋溢的演说来抨击省内

当地的情况。他离开全能的上帝和人权的崇高地位，下降到对省份和国家政治的直率斥责，但这样的上天入地并未加强他的论点。他没有获得多数票，奥弗赖塞尔继续以赞成英国的要求记录在案。

然而在其他省份，对这个计划普遍存在敌意，虽说这种敌意是基于直率的物质上的考虑而不是感情上的因素。在荷兰省，反对的呼声来自各个方面。执政的意见不必问了，但他身边的顾问布伦瑞克公爵对这个计划持反对意见。他担心苏格兰旅一离开尼德兰海岸，英格兰会忘记用别的军队来替换它，那样的话已处于可悲境地的尼德兰军队将进一步被削弱。

阿姆斯特丹城虽然动机与他不同，却强有力地支持公爵。阿姆斯特丹想要在答复之前先等一等。其理由如下：英格兰正经历着由殖民地引起的极大麻烦，不久它甚至可能会比现在更需要军队。我们一点也不想要这个苏格兰旅，因为它每年要花我们很多的钱，而我们并不需要士兵。因此让我们等待，等到英格兰急于要得到这些士兵，到那时我们再把这整套的军人和装备卖出去，大赚他一笔。幸运的是，其他城市的表现比阿姆斯特丹要得体得多，共和国至少避免了这种可耻的交易。

但即使没有这些实际的考虑，荷兰三级会议也强烈反对这整个的计划。此时，法国的影响力已深达受到密切关注的共和国内部事务，法国驻海牙大使也能随时施加影响。现在他劝告他的朋友们明确自己的立场反对英国的要求。

然而就另一方面而言，三级会议总会害怕过于公开地冒犯英格兰，只要共和国在海上完全掌握在英格兰的手中，就不能不担心这一点。因此经过适当长时间的仔细考虑，他们通知英国政府：七个省的意见倾向于赞成国王陛下的请求，共和国很乐意将苏格兰旅借给英国盟友。共和国只附加了一个条件：这个旅不得在欧洲以外用于军事目的。此时由于尽人皆知英格兰

要将军队专门用于欧洲以外的战争，共和国的答复不仅包含了拒绝，而且还是带有无故侮辱的拒绝。

此时距英格兰提出其原来的要求已经过去有四个月了，英格兰决定不将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英格兰国王对这件事所添的麻烦向执政正式表示了感谢，并声明不再需要军队了。假如国王陛下重新提出其要求，会审慎地记起所附加的条件的。

那时候无需再说什么和做什么了。苏格兰旅在1795年以前一直留在共和国，英格兰国王被迫到别的地方去雇用他的“近卫军”。但英格兰忘不了这次侮辱性的拒绝。共和国无视与大不列颠之间业已存在的各个条约所赋予的职责，这已是第三次了。这是共和国重建与英格兰友好关系的最后机会。从此以后，英格兰只是在等待报复的机会了。整个交易最大的受益者是新崛起的青年民主党的成员。他们完全被有关人权和人类自由的神圣义务的新概念所吸引，以热情赞许的态度（这是他们更加务实的同胞所无法理解的）观望美洲殖民地的斗争。在共和国，这样的人遍布各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未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新的学说和一个新时代的先驱。没有谁比凡·德·卡佩伦男爵这位奥弗赖塞尔省三级会议里人权的鼓动者更具有荣誉感的了，他通常被称作卡佩伦·凡·德·波尔，以区别于其堂兄弟卡佩伦·凡·德·马希的琼·德克·凡·德·卡佩伦，在他所在的省份是个重要人物。卡佩伦男爵1741年11月2日生于蒂尔[1]，是奥弗赖塞尔一个古老家族的成员。正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奥弗赖塞尔和格尔德兰的贵族比其他任何省份的贵族享有更高的地位。也许弗里斯兰有几个家族是个例外，他们的地位也不同寻常。在对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中，弗里斯兰的贵族身为将军或外交官，忠诚地为共和国服

① 蒂尔：今荷兰海尔德尔省城镇。

务。战争结束后，军人生涯曾产生的优越感或荣誉的光环已消退，这些家族便宁愿引退到自己的庄园过乡村绅士的宁静生活，也不肯为政治事务方面的权威去与富裕的荷兰商人竞争。他们不是在自己的圈子里通婚，就是在法国或德国的贵族中选择妻子。他们中许多人在执政的宫廷中拥有某些荣誉职位，每当执政离开海牙，到他们这个省份住上几个星期时，他们便可行使职责。作为贵族的成员，他们在所居住地区的议事会和由各地区议事会组成的省三级会议中也拥有席位。

他们在教育方面用心良苦，要么将他们的儿子送进尼德兰的大学，要么让他们到国外去读书。地处不得人心的荷兰省之外的乌得勒支大学，吸引了绝大多数的贵族青年。与有着自由主义坏名声的莱顿相比，乌得勒支还具有较少世界主义倾向、虽有点古板却更加高贵的优点。在极端保守和极端正统的善良人士眼里，莱顿是直通更干燥更炎热地带（即自由主义盛行的地区）的接待室。

然而当卡佩伦和他的堂兄弟去乌得勒支时，这所大学正洋溢着相当健康的学习气氛，这是前所未有的，而这只持续了一个短暂的时期。这里的年轻人通常被迫要通过极端乏味、极端学究式和完全无用的罗马法课程，随后所接受的是被认为着重于广泛基础知识训练的大学教育。有那么几年，一个叫特罗兹的教授开了一门有关共和国民事法的课程。特罗兹是在弗兰尼克大学开始其教书生涯的。弗兰尼克大学是弗里斯兰当地人自傲的产物，这所规模不大的学校遵循质朴的办学方针贡献出一大批出色的学者。

特罗兹离开了纯理论探讨的范围，他的授课更注重于法律的实际应用方面。当时已经出版了尼德兰以往法律的汇编，有大量的关于以往民事法律实践和中世纪一般法律的查证探究。他的讲课内容因此而大大地丰富了。这些研究表明，18 世纪

和 15 世纪的法律有着极大的不同，但这些研究也表明，下等阶层和中等阶层的地位在许许多多的方面比 300 年前更为糟糕。中世纪末期的手工业者和一般行业公会的成员在他们所在城市的政府管理中具有的影响，自摄政者也就是世袭的寡头政治集团当政之后便已不复存在。

人们不会满足于对这些问题的纯理论研究，不可避免地要用它来分析实际问题。凡·德·卡佩伦决不是一个天才。从他的书信上判断，他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受着想像力和理想主义的摆布。而理想主义在他那些务实的和一帆风顺的同乡中是非常少见的。既然他具有这样的思想倾向，不用多久便会将共和国过去的境况与此时美洲 13 个殖民地的境况加以比较。

通过阅读有关美洲殖民地情况的出版物和与美洲政治家通信(如果对方有空答复他的长信)，凡·德·卡佩伦渐渐地开始相信他自己受命于天，在自己周遭小小的范围内成为在大洋彼岸正为之而战的高尚事业的捍卫者和鼓动者。他在奥弗赖塞尔省三级会议发表了第一篇演说。这篇演说在我们现代人听来是非常夸张和唱高调的。但我们不要忘记他发表演说时人们正喜爱这种东西，而且这个国家还不习惯于进行议会讨论。除了在教堂里，共和国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发挥演说的才华。三级会议的会议完全不同于我们现代议会的会议，雄辩的演说毫无用武之地。要是某人想让一个措施被采纳，惟一可行的方式就是跑到与之有关的人士的下榻之处，和他们讨论这件事——非常像现代游说议员的说客的所作所为。缺乏有才能的演说者使凡·德·卡佩伦易于取得成功，他的天赋虽然不高，却靠他在奥弗赖塞尔省三级会议那篇不长的演说制造了不小的轰动。

共和国有不少人和他的想法一样，不过他们没有组织成一个党派，他们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凡·德·卡佩伦靠他的演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使他突然成了他们非正式的领袖。

他一直充当这个角色直至他生活的最后岁月。在考虑他所有的缺点的同时，我们至少必须公正地承认他完全是出于诚意。他死的时候还比较年轻，他的国家的内战还没有爆发。这只是让他避免了真正的暴力。亲王党人对他的报复只能是炸毁了他的坟墓。然而其家族中跟他持同样观点的成员，则在肉体和经济上都为他们的学说遭受了苦难。凡·德·卡佩伦自己则不断被各种各样的人想方设法拿来出气。他们认为他是自己所属阶层的叛徒和最危险的煽动者。

我们不应忘记在当时的共和国，倡导人权和对普通民众示以敬重还完全是新鲜事。几个非常优秀的人对此怀有审美的兴趣，但这无论是对富人还是穷人的大多数心灵来说，则是毫无吸引力的。这些新的学说在摄政者眼中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危及国家基础的异端邪说。

在他们看来，“民众”都已经很不错了，他们是需要谨慎对待和给予相当关注的不可或缺的群体。除非绝对必要，对待他们不得太严厉，他们应该受到医院、济贫院和孤儿院的关心。然而，也没有必要跑到大街上去和他们称兄道弟以表示如何赞赏他们。要是众多的屠夫、菜贩和农夫喜欢在美洲某个地方闹一场革命，那确实非常不错，可以提供给他们所需要的和能买得起的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反叛应该受到直接的鼓励。假如他们取得了成功，又怎么预防阿姆斯特丹的屠夫、菜贩和面包师也叫嚷要和法定的统治者享受同样的权利、要求代表权和声明自己与“摄政者”地位平等呢?

当我们认识到当时凡·德·卡佩伦男爵是在什么样的偏见和贵族的观念包围之中脱颖而出的，我们最终就能理解他必须有多么大的勇气来与自己的阶层和种族所有的传统和天性作对。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心怀遗憾地拒绝将凡·德·卡佩伦描绘成光荣的勇士，尽管他的热情的支持者相信他是这样的

人。他能在我们的历史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生活在一流人物绝对缺乏的时代。他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使他很容易居于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而且由于找不到别的人来捍卫新的学说，他自然、差不多是非本意地投人了这个他本人原本不足以扮演的角色。

由于凡·德·卡佩伦在苏格兰军队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使他成了闻名全国的人物，这更让他感到自己负有在大不列颠与反叛的殖民地人民之间争端的实质性问题上启发他的同胞的使命。因此他将多米尼·理查德·普赖斯[①]写的一本小书的译本奉献给公众。这本小册子题为《论公民自由的性质、政府的原则和对美战争的正义和政策》，皇家学会会员 D. 理查德·普赖斯博士著。这本今天已为人忘却的书，在那个时候却非常著名，曾印了许多版，在欧洲大陆比在英格兰更出名。它不仅想要证明英格兰对其殖民地行为上的不正义，而且通过一个满是统计数字的附录试图证明这场战争不可避免地要以英格兰的失败告终。然而英国的公众对于最终的胜利过于自信了，对这些悲观的预言毫不在意，不愿读一读这位可敬的绅士的规劝。

凡·德·卡佩伦极为仔细地翻译这本小册子，并在莱顿把它印了出来。在长篇序言中，他告诉公众一些有关他自己的事情。他请公众原谅可能有的翻译错误，因为他不是一个熟练的文学家。他接着向读者吐露这只是他在翻译方面的第二次尝试。一年前他为了让他的同胞了解规范化的城市民兵的优点，曾匿名出版了安德鲁·弗莱彻的小册子的译本。而翻译普赖斯博士的著作是着力于向尼德兰的民众展示英国国家财政不稳定

① 多米尼·理查德·普赖斯（1723—1791）：英国道德哲学家、财政专家，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热情支持者。1765 年当选皇家学会会员。文中提到的著作发表于 1776 年，出版后在英美甚为畅销。

的状况和那个国家即将来临的官方破产的危险。

用历史的眼光看，读一读18世纪末几位业余经济学家的著作是相当令人惊奇的。他们都着力于证明英格兰面临金融崩溃，也预言法国将有一个辉煌的未来。事实上法国年复一年地一直有破产的危险，而英格兰毫不费力地设法增加国家的债务并保持像以前一样稳定。

凡·德·卡佩伦的译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又分为三个段落，分别命名为："自由的一般性质"、"公民自由和政府的原则"和"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霸权"。第二部分查证与美洲战争的正义性和检验英格兰相关的政策。第三部分充满了统计数字，作者确信这提供了大不列颠确实面临经济崩溃的证据。

大多数读者最感兴趣的正是这第三部分。那些想了解新学说有关内容的可把前两部分当作一种入门书。但带有结论性的统计数字的第三部分，则被人们当作福音书的真理来接受，因为他们希望看到共和国的商业对手(英格兰)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

与此同时，事态仍在继续发展。三级会议总会对作战物资出口的禁令未收到一点效果。事情正相反，西印度群岛走私贸易的中心——圣尤斯塔修斯岛的新总督海利格先生自己就对这个买卖极感兴趣，并竭力加以鼓励。最后，英格兰在海牙对他提出严厉的控告，致使西印度公司被迫将其召回。海利格受命立即返回国内，一个叫德·格雷夫的人领命接替了他。德·格雷夫还不如他的前任。他属于那种18世纪目光短浅的商人，这种商人只注意自己眼前的利益，只要他得到了股息就不在意更远的结果了。他既不去约束以圣尤斯塔修斯岛为总部的尼德兰走私贩的行为，同时也不给这个岛提供任何防御手段。英格兰与共和国之间关系公开的破裂既没有发生在1775年，也没

发生在1776年。这是两国之间不断产生误会和彼此都挺恼火的时期，但英格兰因过分忙碌而顾不上开始一场新的战争，共和国因而保持了安宁。

那时候旅行是很费时间的。凡·德·卡佩伦那篇伟大演说的名声传到了大洋彼岸，演说者接受了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对其为一般公民自由、特别是美洲自由所做的值得称赞的努力的正式感谢。从那以后，稍有点自负的凡·德·卡佩伦又精神振奋地投入到传播他的学说的工作中，出版了布道者普赖斯博士著作的一个新译本。然而不久他就受到了挑战。其他写政治小册子的作家也开始运用印刷机器向急于了解真情的公众报告在他们看来这些反叛的殖民地居民该做些什么。

就像在法国，首先对当时那些引起热烈辩论的问题感兴趣的是最高阶层的人士。臣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人类对某些事情与生俱来的权利或这种权利的缺乏等问题，早在下层群众对它们产生兴趣的好多年前，就在社会的领袖们中引起了讨论。被赋予世界上所有的特权和荣誉的人士，早在受压迫的公民为自己受到的奴役而焦虑之前，就为人权发愁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从最高阶层中逐渐向下蔓延，直到最终到达普通的民众并引发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法国大革命。这个过程在美洲有所不同，在那里这样的讨论开始于最底层，这并不是因为那里的朴实民众生来就优越，而只是因为在其经济史上这有福的时期，13个殖民地的所有民众都生活在同样的层面上，这比起有富裕的邻人居于他们之上或有穷人住在地下室里要省许多事。

在有关苏格兰军队的争论之后的几年，出版了一系列既从实际上也从理论上讨论美洲事务的小册子。在1777年和1778年，奥伦治家族的一个成员写下了一系列的“关于美洲纠纷的公开信”。他是路易斯·西奥多，拿骚·拉·莱克伯爵，莫里

斯亲王许多出众的私生子中的一个。拿骚伯爵平静地生活在格尔德兰的小城市库莱姆堡。那时候社论还没有发明，他的书信占据了报纸上文笔一流的重要文章的位置，非常公正地谈论美洲的事务，提出问题的各个方面仔细地加以考察。

这些书信展示的问题曾令那些对美洲殖民地的争端有兴趣的人深感忧虑。东印度公司的弱点正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相当多的人对东印度群岛可能发生叛乱的后果感到不安。人们问道：“一旦尼德兰在印度、美洲或非洲殖民地的居民听说美国的自耕农的成功，将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会不会模仿美国的例子，使自己摆脱尼德兰的束缚?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为了防止将来其他殖民地同样性质的暴动，难道没有义务帮助正处于困难之中的英格兰?”

拿骚伯爵认为有必要在第五封信中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表明这种焦虑必定曾是相当普遍的。然面照他的说法，尼德兰殖民地不存在这样的危险。不错!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由于是由文官和教士的审判法庭统治着，这样的暴动有可能发生。但他确信尼德兰殖民地的居民决不会忘却生育他们的祖先，决不会身为子孙却任性到要闹到与自己的祖国对立的地步。不过作者似乎对殖民地的自治权并不完全信任。正相反，他对英格兰在现在的冲突发生之前，允许其殖民地的居民具有的远远超过其他殖民地居民的很多自由，以及允许美洲人创建自己的地方政治联邦的做法甚感担忧，认为这必将激起美洲的革命。

拿骚·拉·莱克所写的这些在数年中印了许多版的书信，在当时的专题出版物中属于最为审慎的行列。它们几乎是有关美洲争端的文章中惟一没有因激烈谴责英格兰而忘乎所以，或者是惟一试图使自己的主张建立在真情纪实的基础之上的。

不幸的是，没有多少可靠的文件可提供给公众，没有蓝皮

书或任何种类的统计数字，也没有多少美洲人到欧洲口头介绍情况。伯爵信息的主要来源是托马斯·潘恩[1]的《常识》。这本书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却不是一本可信任的指南。这本在美国流行的书不久在欧洲也享有同样的厚遇，早在1776年在阿姆斯特丹就印出了它的法文本。在这以后它被所有研究13个殖民地事务的研究者用作参考手册。照凡·德·卡佩伦的说法，“那些贫穷的家伙是为饥饿感所驱使才伏案写作的”。这造成了令人惊奇的后果，即众多的作者都担心殖民地的人管理自己政治事务的能力。潘恩先生出于对自己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尼德兰”人口的天然的自豪感，试图证明这场反叛不只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事情，也是在他那个崇高的国家占很大比例的德国人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一般欧洲人便马上关注起这场斗争的结果。于是这位尼德兰小册子作家推论道：“如果这是真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事情不是这样），我们看不出来有那么多德国人存在，这个美洲国家还能保持它的独立。”在那个历史阶段，没有人相信具有不求助于他人、只信赖自己特性的德国人会谅解或能够生活在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政府领导下。

在1776年和1777年间，诸如此类的直接或间接讨论美洲问题的小册子约有34种。当然，这个数目与以后数年内难以计数的小册子相比较未免显得太少了，这表明人们对凡·德·卡佩伦和他的朋友们热情关注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我们决不要忘记我们只是处于这个我们历史上的古怪时期的开端，进入这个时期之后几乎是一年里有多少天就有多少新的小

① 托马斯·潘恩（1737—1809）：政治新闻工作者，出生在英国的美国作家，其《常识》和《危机》等著名文章对美国产生巨大影响。50页的小册子《常识》出版于1776年1月，数月内销售量超过50万册，为当年7月通过《独立宣言》铺平了道路。

册子问世。在随后的岁月里，只要有话要说或以为有话要说了，谁都赶快跑到附近的印刷作坊，将其深奥的见解赐予这世界。经常的情况是公众拒绝接受这种赐予，拒绝购买作家的文字作品。这样的话，后者最终回到造纸厂，被分解并还原成纸浆。

靠这种产业过得不错的只有印刷者，他们要求预付印刷费用。印刷者在经营方面贪得无厌，为此他们使用极其廉价的纸张，这也使我们免去了先辈笔耕的那番劳苦。虽说菜贩和屠夫对包装纸的不间断的需求也消耗了无数的印刷纸，但剩下的纸张已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在 1778 年和 1800 年间有多少油墨被浪费掉了。

小册子产业在共和国还是受到关注的。在通常情况下，比如像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约翰·劳的“泡沫狂热”或执政的任命，都会有成堆成堆的小册子将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付诸讨论。然而在我们将要描述的那个时期，在当时摆在书店里出售的大多数书籍中，《死蛙颂》之类的东西已可算是严肃的文学作品了。谁都试着去印书。牧师刚做完日常的布道，就一定得跑到最近的书商那里，让后者把他的那番规劝印刷出来。那些生活困难的诗人，曾为某个家庭庆祝出生、结婚或悼念死亡时以一行诗两个便士的价钱而创作颂歌，现在开始创作押韵的喜剧，其内容无非是将背信弃义的不列颠人当作嘲笑的对象。多愁善感的人们想像自己来到战死美洲的德国雇佣军人的墓地，在那里难过地挥洒眼泪，因为是冷酷无情的黑森选侯把他们卖作了奴隶，当了英国人的炮灰。

业余政客纷纷炮制出内容庞杂的国际条约的新体系，据说共和国能把这样的体系用作针对英国可能发动的进攻而提供自我安全保护的屏障。这类国际条约大多都建议与法国结盟，但其他的则偏向于到别处去寻求拯救，甚至去与早就不被看做是强大国家的可怜的老西班牙结盟。

务实的人出于客观考虑，建议马上与新的美洲共和国签订商业条约。他们争辩道，这个条约越早签订，共和国就越有望获得更多的利益。

各方讨论问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方式。首先出现的是《伦敦一位绅士给阿姆斯特丹朋友的信》，随后是《阿姆斯特丹一位绅士给伦敦朋友的信》。下一本小册子的标题是《伦敦一位绅士给阿姆斯特丹朋友的回信的回信》。标题上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一个"不带偏见的观察者"或一个"心胸开阔的爱国者"随时都可能加入这场通信讨论，出版其《对伦敦一位绅士给阿姆斯特丹朋友的回信的坦诚观察》，如此这般无休止地继续下去。

一旦国内的文章显示出减少的迹象，便有人从国外的市场提供新的材料。可怜的雇佣文人受聘翻译几本法国或英格兰的小册子，他的作品将以新的、醒目的标题面世。公众买这些标价三至五便士的小册子就如同今天我们买报纸的号外。甚至在我们知道它们不可能登载任何真正的新闻时，我们买它们只是出于一种"获得最新消息"的神经质的欲望。

大多数小册子自然是非常反英的，有维护英国政府正当权利倾向的非常少见。这样的小册子不仅没人读，而且还会受到嘲笑，被认为是由只为牟利而听任无情的暴君支配的堕落作家写下的可耻作品。（至于无情的暴君，则是指乔治国王或他的朋友——共和国的执政。）由于两个国家经常性的交往和阿姆斯特丹与伦敦之间良好的邮政业务，英国人充分了解这种不断的羞辱性的诽谤是不足为怪的。这类诽谤为数甚多，可以在共和国每个啤酒店的桌旁找到。英国政府不可能不对这些来自所谓友好国家的厉声斥责大为恼火，何况这个友邦还享有最惠国的特权。

更糟的是，英格兰派驻海牙外交代表的人选极不令人满

意。约瑟夫·约克阁下属于英国傲慢的外交官群体，他们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家都以极为专横的行为致使他们的祖国没法与他们派驻的国家达成良好的谅解。他非常忠实，忠实到总是在最有害和最不需要的时候说真话。他代表正处于巅峰的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国家，而他派驻的却是当时正迅速走下坡路而而临空前衰落的国家。约瑟夫阁下不幸又是那么缺乏头脑，他不断让荷兰人感觉到他们的境况已经大不如前了，而且他对荷兰三级会议总会摆出的态度，也仿佛这个议会只是因英王陛下的宽容才得以存在。

许多个世纪的传统使英国大使在海牙确立了特权地位。他经常应邀成为与英国国王关系非常亲近的执政们非正式的顾问。然而约瑟夫阁下从一开始就不能与年轻执政的朋友们搞好关系。不久后，他还认定执政这个人能力低下得可有可无，他必须不时对后者加以保护以对付既是执政的也是英格兰的敌人。

执政本人挺害怕这个爱发牢骚的不列颠老头，后者对他说话时很没礼貌。那老头经常十分直率地提问，执政几乎不可能对他撒谎或斗斗嘴争取点时间以便给一个适当的回答。威廉也不愿让人认为自己是为了保全高位而任何时候都完全依靠英格兰。公主此时还没有充当重要的政治角色，她把精力过多地放在育儿室里。但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英国人，总是离他远远的。

约瑟夫阁下与摄政者们更难以相处。这些大人先生每个人都是各自小圈子里的小霸主，必须极为小心地与他们打交道。称呼错了头衔也会造成没完没了的烦恼。约瑟夫阁下只顾他自己，从不在意别人的感觉，他不断触犯每个人的敏感神经。他不去恭维摄政者们，诱骗他们上钩以实现他自己的愿望，却常常生硬地告诉他们他想要什么，随后就期待他们照他希望的去

做。一旦他的要求没有马上得到赞许，他往往暴跳如雷，以英国式的愤怒对共和国发出威胁：要是英国国王政府的正当要求被置之不顾的话，将会有可怕的事情降临这个国家。

摄政者们在与约瑟夫阁下打交道时用最令人恼火的拖延加以回敬。他们决不说“不”。他们决不给他大发雷霆的机会，那样会毁了他们。但他们也从不说“是”。他们让阁下知道“正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给他几个月的时间去平息怒气。但这种做法通常是适得其反，这使两个国家间的误解不断加深。从共和国这方面看，人们怀着相当大的傲慢和带偏见的愿望，用尽可能坏的观点去看待英国的一切。从英格兰那方面看则有相当多正当的理由感到恼火，但他们也傲慢地无视其邻国的感情。

在所有这些争吵中受益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法国大使。德阿弗雷已被召回，接替他的是一个年轻的外交官德·沃格因公爵。德·沃格因公爵名叫保罗·弗朗西斯·德·古伦，路易十四的前总督的儿子，他被派到海牙时只有 30 岁。他以迷人的个性和大量的个人财产来弥补经验的不足。他极慷慨地将自己的财产用于外交目的。他从不去打搅执政，甚至都不想去和他作对，而只是让他享清福。他把其所有的影响力都用来与摄政者们建立一种牢固的友谊。对于摄政者，他的公馆和钱包任何时候都是开放的。他通过举办盛宴的方式，尽可能多地网罗想和他结交的摄政者。

他对凡·德·卡佩伦和这类讲民主的朋友们敬而远之。那时候确实有很多法国人对美国人怀有和共和国公众同样的热情，连帽子和衣服都有“美国式”的。但这样的热情被看做是时髦人的消遣。对于那些不追求时髦的人，上帝恩赐的既定制度则是足够好的，应该严格加以保持。甚至在 1778 年，法国与美国人缔结条约的时候，法国人的出发点并不是多么喜欢美

国人所捍卫的抽象原则，而只是想借此如愿以偿地报复一下英国人，正是英国人当初让他们失去了加拿大。

法兰西大使阁下派驻共和国不是出于情感上的理由。他的职责是让共和国疏远英格兰，并迫使它与法兰西结盟。因为法国需要钱，即将进行的对美洲的远征需要更多的钱，而共和国拥有那些必需的资金。因此，德·沃格因费尽心机要与国家的金融股份（指尼德兰）缔结正常的关系。他在阿姆斯特丹有许多朋友。他逐渐在所有那些反执政的摄政者中为自己确立了非正式的首领地位。然而，他在表面上保特着与威廉礼尚往来的关系，因为奥伦治亲王是他用来威胁摄政者们的最有效的武器。一旦他们表现得不够顺从，德·沃格因总是威胁要把法国的影响转赠给摄政者的死敌——执政。

总而言之，法国大使在不同的党派之间非常聪明地取得了一种平衡。约瑟夫阁下在什么地方以他的粗鲁造就了新的敌人，德·沃格因必定在那里出现，以他行为方式的魅力把遭侮辱的党派变成了他坚定而持久的朋友。什么时候尼德兰的商人大声抱怨英国，斥责他们对待走私贸易的粗暴行径，法国大使便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愿意离开行为已经出格的盟友，将他们的命运与宽容大度的法国相联系，就会得到很多利益。

形势对法国人极为有利。在西印度群岛，尼德兰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恶化。英格兰不仅增强了它在加勒比海的舰队，还暗示国内外的英国商人在受尼德兰损害的情况下干一点私掠船的买卖将不会上绞架，甚至有可能得到国家当局的赞许。而来自布里斯托尔、普利茅斯和英国沿海多数海港的爱国船主心领神会，一旦发现有尼德兰船只就开始追赶它们。加勒比海不久就到处是可敬的海盗了，他们为了祖国的利益拦截和掠夺落在他们手里的任何船只。让我们至少给他们一个公平的说法。他们所掠夺的法国、西班牙和丹麦船只的数量与尼德兰

船只一样多。一旦在海上找不到什么了，他们便会扩大他们的行动计划到南美大陆。英格兰仍拒绝承认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无论在尼德兰哪个港口发现有美国船只，英国便暗地里宣布捕获它们的奖赏。

有一次，英国海盗船碰上一艘从苏里南开往弗吉尼亚的美国商船。美国商船逃向它出发的海岸，后来被英国人在一个尼德兰要塞和一艘尼德兰军舰的眼皮底下捕获。对于这种“对尼德兰主权的侵犯行径”和对尼德兰舰长的侮辱（当这位舰长想要求英国船长做出解释时，后者叫他“滚出去，不然的话小心挨炮弹”），尼德兰报纸发出一片悲痛的喧嚣。

这件事情马上引起了约瑟夫阁下的关注。大使阁下只是等待这么一个机会说出他的心里话。于是他对三级会议总会说，他们人人都该知道，他威严的主人英格兰国王已决定将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行使惟有他才具有的正当权力。因此国王想在其权力或舰队所及的任何地方打击反叛的美洲人，并将给予所有支持这些美洲人或对他们友好相待的人应有的惩罚。最后，国王陛下认为既然共和国向他反叛的臣民提供战时禁运品，与其继续把这个国家认作盟友，还不如干脆宣布与之为敌。

约瑟夫阁下从不做半截子事，他所给的暗示再明白不过了。共和国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上扮演了可悲的角色。它为了赚钱公然给盟友的敌人鼓劲。它如此忽视自己的防御工事，以至于自己的港口处于任何冒险驶过大洋的英国掠私船的掌握之中。作为不忠实的政策的恶果，当共和国最终陷入麻烦时，它知道除了让雇佣作家中伤英国和骂英国大使是个粗人，就没有别的补救方法了。

与此同时，共和国人人都在互相问着这样的问题：“干吗不做点什么？”“为什么执政不派一支舰队去保护我们的利

益?”“我们就一直受傲慢无礼的英国佬的气?”当斯巴达人毁掉了雅典的繁荣，当柏柏尔人[①]突袭罗马的偏远省份，雅典人和罗马人都曾问过这类问题。

“干吗不做点什么?”事实上执政想有所举动。他曾计划和讨论过派一支由20艘船组成的舰队前往加勒比海，去守卫尼德兰的殖民地和保护商船免遭英国海盗船的袭击。问题是：首先去哪儿找这20艘船；其次是去哪儿找配备这20艘船的水手。不仅缺少建造船只的资金，而且走私买卖的再度兴起，使参与走私的水手可以获得高额薪水，这就使得拿不出多少钱来招募水手的舰队更加缺少人手。

然而，在许多个月的耽搁之后，8艘战舰修得基本适合航行，并为跨越大西洋的航行装备了起来。1777年的最后一个月，这支小型舰队在路易斯·凡·拜兰特伯爵的指挥下，以保护合法贸易为惟一原则开往南美。拜兰特也没接到命令要压制“非法贸易”，因此，在他保卫尼德兰商船免受英国海盗船的袭击的同时，并未阻止作战物资出口到美国。因此从英国的观点看，尼德兰舰队只是构成对大不列颠的又一次侮辱，其目的只可能是鼓励乔治·华盛顿先生继续其反叛行为。当时只是由于偶然的因素才避免了公开爆发战争，双方的所作所为都增加了相互间的敌意。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圣尤斯塔修斯岛堪称美国革命的大百货公司，那里的一位总督因英国人相当多的抱怨而被召回，为一个名叫德·格雷夫的人所取代。正像我们也曾提到的，这个德·格雷夫是非常一般的人，他以为自己惟一的职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谋取最大的利润。由于他是一心要谋取私利的

① 柏柏尔人：北非沿海地区的居民。活动区域东邻埃及，西临大西洋，南接撒哈拉，北濒地中海。

人，没有什么真诚可言，其所作所为只能是更加损害这个他碰巧成为总督的小岛的声誉。

他最初的一个行为激起了英格兰无法平息的愤怒。1776年11月16日，一艘飘扬着美国国旗的船驶进了圣尤斯塔修斯岛的港口。总督虽然知道北美殖民地还未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却命令他的手下找一门能打响的炮，鸣礼炮以示对这新的国旗的致敬。由于美国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一切都像美国大多数热情的爱国者所能希望的那么顺利，德·格雷夫的这一行为作为世界各国第一次向美洲大陆自由而开明的共和国表达的敬意，在美国受到赞美。然而在当时，德·格雷夫的行为明显违犯了共和国对一个友好国家所做出的保证，英格兰对此不满是不足为怪的。

当这事情通过伦敦通报给海牙当局的时候，约瑟夫阁下以他惯常的方式着实忙碌了一通。但即便是在他发出最为正当的抱怨的时候，他那惹人不快的本领也激恼了共和国的每个人，使人人都觉得是他们而不是那位大使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事实是不可抵赖的。三级会议总会遵循惟一可进行的程序，下令把德·格雷夫召回。对他行为的调查按惯常的方式拖拖拉拉地进行。当局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各方都请求不要失去这么一个有价值的人物。不久德·格雷夫抱怨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这么多年住在热带，他实在适应不了尼德兰的气候。随后他就被允许回到老家，并恢复了圣尤斯塔修斯总督的职务。不管是英格兰的抗议还是约瑟夫阁下狂暴的言语，都没能起到一点作用。

一切都保持先前的样子。尼德兰人继续在走私，英国人仍在当海盗。执政脸色苍白，结结巴巴说着道歉的话；约瑟夫阁下则满脸通红，叫嚷着要报复。最终事情顺其自然地进行，共和国与英格兰之间的战争爆发了。



7 最后一次英国战争

1778年2月6日，法国与美国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准确地说在公之于众之前守了一个月的秘密。3月，法国和英格兰公然宣战。这令共和国的人欢欣鼓舞。法国租用尼德兰商船运输大量的战时必需品，几年之内尼德兰的船运业可谓生意兴隆。法国最需要的是建造船只用的木材，而尼德兰的货仓里堆满了这种货物。最近几年由于人们纷纷谈论要建造一支新的舰队，尼德兰商人们出于投机的目的，从斯堪的纳维亚和黑林山买进了大量的木材。当事情表明尼德兰不会建造新船时，这些商人发现自己存货太多了。如今他们有望将这批存货全部卖出大赚一笔。

在海上，英格兰比法国要强大得多。正像我们说过的，18世纪后期是木制“无畏战舰”的时代。相对来说，16世纪时更容易装备一支舰队。在小帆船或两根桅杆以上的纵帆船的甲板上装几门炮，一艘战舰就装备好了。在西班牙与荷兰之间的

许多次大海战中，荷兰人就是以装有几门低等火炮的单桅小帆船参加战斗的。在德·维特当政的时代，以往业余性质的舰队为500至700吨级的战舰所取代。从那以后，海军战舰的吨位不断增加，一直到19世纪铁制战舰的出现才彻底废弃了旧时木制的庞然大物。

当1778年英法战争爆发的时候，英格兰的战舰不少于295艘，其中的137艘船上炮的数量在50到100门之间。战争开始的时候，英格兰雇用了约6万名水手，但这个数目逐渐增加，到了1780年，数目增加到了整整10万人。这个数目是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相对而言，法国只有217艘战舰，其中68艘属于较大的战舰。在现代战争中，只有那些较大的战舰才能真正在战斗中起作用。因此在那场战争中，法国的战舰在数量上被英格兰大大超过，几乎是一比二，形势极为不利。要是西班牙不久加入其阵营的计划无望实现的话，法国是不会贸然开战的。西班牙那时正经历着那些经常性的力求进行政治和经济改良运动中的一次(这类改良运动频繁发生于18世纪)，其新组建的舰队恰好赶上了英法战争，虽说数目只有134艘，但其中许多是分别装有自60至120门炮的大船。

把西班牙和法国的舰队联合起来就可以与英格兰相抗衡了。法国很明智地从一开始就克制自己不单独与英格兰作战。7月27日在韦桑岛[①]的战斗是个例外。法国让英格兰完全掌握着海面控制权，而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在建造新船和加固陆上阵地方面。

法国和美国的联盟对于在欧洲的美国代表团是一次巨大的

---

① 韦桑岛：法国菲尼斯泰尔省的岩石岛。岛上的灯塔是英吉利海峡南口的标志。1778年7月，在韦桑岛外英国和法国舰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个人成就，而且特别是本杰明·富兰克林[1]的个人成就。现在代表们在法国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他们腾出手来向别的国家扩大他们的业务。1777 年，就在法国与英格兰战争爆发的前夕，富兰克林为与共和国建立较亲近的关系作了一次尝试，但他很不成功。尼德兰由于非常想向美国出售货物以获取现款，所以极不愿意将他们的钱冒险借贷给美国人。

一年以后，就在法国与美国之间的秘密联盟尚未公之于众之前，这三个美国特使——富兰克林、赛拉斯·迪恩[2]和阿瑟·李[3]在给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信中说，他们已被告知要是他们中的一个前往共和国访问，事情可能对他们有利；因此，一旦法国与美国之间的联盟公开了，在冬天过完的时候，富兰克林和迪恩中的某一个将访问荷兰。

不过在他们中的一个来荷兰之前，法国驻海牙的大使前往巴黎与美国特使反复磋商。大使建议他们作出切实的努力建立与共和国的友好关系。他保证给予美国人道主义上的支持，并许诺非正式地给予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

1778 年 4 月 10 日，三个特使致信荷兰大议长凡·布里斯威克。信是以负责与共和国外交事务的干事的名义写的，注明某日写于巴黎。信中说，美利坚合众国现在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已经得到法国的承认，已与法国缔结了联盟并签订了商务条约。他们愿意随函附人一份这个条约的抄本，供大议长阁下考

①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 18 世纪名列乔治·华盛顿后的最著名人物。曾参加起草《独立宣言》。1776 年被派往法国寻求经济和军事援助。

② 赛拉斯·迪恩（1737—1789）：美国第一个派驻国外的外交官，在美国争取迫切需要的法国援助方面作出了贡献。

③ 阿瑟·李（1740—1792）：美国外交官。美国革命期间为寻求欧洲承认和援助大陆会议而不懈努力。

虑。要是阁下认为它可取，就请将此文件传达给美国对之怀有深切敬意的三级会议总会。阁下是否愿意赞同他们所表达的真诚，并希望看到两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否愿意赞同不久在两国之间缔结互惠互利商业关系的愿望?

这位大议长阁下不是英雄，这封信实际上让他极为窘迫。他立即把他遇到的麻烦告诉了执政。执政马上去见布伦瑞克公爵。没等他们作出决定，阿姆斯特丹的好朋友——法国大使已将信的细节告诉了这个城市的上层人士。于是阿姆斯特丹建议不把事情交给三级会议总会讨论，但各个城市应获悉信的内容并同意保守秘密。这个建议通过了。富兰克林、迪恩和李写来的这封信的抄本被送到各城市代表团，后者又将此信呈送给他们所在各自城市贤明的议事会。这样的话，一个秘密传达给了数百人。不出一个星期，英国报纸登出了全部的细节。

约瑟夫先生对海牙发生的事情经常比执政本人知道得更多。美国人的那封信刚寄到大议长那儿，他就已经获悉信的到达了。这位英国大使没有花时间去向布里斯威克或布伦瑞克公爵咨询一下，就赶紧拜见了亲王，直截了当地向亲王询问事情的真相。亲王很尴尬，结结巴巴地予以否认，然后向大使表白他本人是如何喜欢英格兰国王，最后他坦白英国大使刚才提到的那封信是存在的。

照约瑟夫先生自己的证言，他吹嘘自己在拜见时“该说的话都说了”，后来他声称“留给亲王一个既强硬又友好的劝告：别再让自己落人圈套”。由于英格兰已掌握了全部的事实，三级会议总会惟一能做的就是对美国人的来信置之不理。它被放人冰凉的档案柜。

然而这个过程不大符合阿姆斯特丹人的胃口。当我们提到阿姆斯特丹时说的是市政长官；不是住在城内的 20 万居民，而是市议事会和几个组成世袭政府、统治城市就如同这是他们

的私人财产的家族。当时的阿姆斯特丹在所有的尼德兰城市中，对与美国的商业条约最感兴趣。它对事情有这么一个结果深表惋惜。由于不再可能公开由三级会议总会考虑这个问题，阿姆斯特丹决定自己来做这件事，自负其责地继续与美国特使谈判。它提出不与美国特使在巴黎直接交往，而是通过一个叫杜马的人进行接触。后者是呆在共和国的一个全能型的美国人。这位杜马先生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产物。从职业上讲他是富裕家庭的家庭教师。作为一个业余外交家，在驻巴黎的美国代表团中他照管尼德兰事务。在共和国与美国之间的早期谈判中，他一直行使这个职责。随后他成为美国驻荷兰的代表亚当斯的私人秘书，后又离开亚当斯去为法国驻海牙的大使服务。

1778 年 9 月 23 日，阿姆斯特丹的市政顾问凡·伯克尔给杜马写了一封信。凡·伯克尔在信中这么写道，阿姆斯特丹单独与美国签订条约而不通报其他城市和省份，这样做自然是非常傻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阿姆斯特丹是共和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城市，没有阿姆斯特丹的同意和合作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因此，最好是由阿姆斯特丹来开始为将来的条约铺路。一旦英格兰与美国之间的战争结束了，这里所有的准备工作早已做完，条约马上就可以签字生效。

这个计划既简单又完美。在同一天直接写给美国特使的一封信中，凡·伯克尔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可以按照美国与法国之间业已存在的联盟的样子来建立共和国与美国之间的联盟。当然首先必须是美国与英格兰之间缔结和约。但在期待和平的时候，为什么阿姆斯特丹与美国国会的特使不现在就开始做准备工作呢?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会善意地保守这个绝对秘密，使那些一心想阻碍这个计划的人不能够加以妨碍和破坏吗?

这封信在美国人的阵营中大受欢迎。回信毫不迟延地就送

到了。美国人为之欣喜，随后是几句恭维话。美国人问道：可为什么要等到宣布和平的那一天?为什么要等到英格兰承认殖民地的独立?那些殖民地此时此刻不是实际上已经独立了吗?等待对共和国可能是危险的。那些殖民地任何时候都可能与英格兰缔结和平，到那时候共和国就会冒风险了。因为英格兰在这件事情上希望给自己保留某些商业上的特权而损害了别的国家的利益，共和国可能碰巧就是这类受损害的国家。

从这以后，书信来往频繁。杜马报告说他见到了凡·伯克尔，阿姆斯特丹的人非常渴望与美国人进行谈判。但正在这时，约瑟夫先生又在尼德兰走私船的问题上小题大做，阿姆斯特丹被迫谨慎行事。于是美国人建议阿姆斯特丹派一位全权大使去某个外国城市，以便能在那里与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会面，更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

然而阿姆斯特丹不愿意冒险派出一位市政府的成员，而让某些对美国贸易感兴趣的有影响的商人参与这个秘密使命。其中的一个叫让·德·诺伊弗维勒，是美国商人协会的负责人。他被非正式授权去与美国代表团讨论缔结商业条约的可能性。那时候在巴黎的三个美国特使都脱不了身，他们派负责美国在德国和奥地利利益的威廉·李作为他们的代表。

1778 年 9 月，在时髦的温泉疗养地艾克斯莱班，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为秘密会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李和诺伊弗维勒起草了美国与尼德兰共和国之间商业条约的草案。这份草案包含了 34 项条款，它将在英格兰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独立之前保守秘密。那时它将被呈送给美国国会和尼德兰三级会议总会提请批准。

在他们双方都满意地结束了这些谈判之后，这两位绅士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艾克斯莱班。李前往法兰克福，从那里取道巴黎向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报告他成功地完成了使命。德·

诺伊弗维勒回到阿姆斯特丹把条约草案送给市长们仔细审阅，市长们建议做一些小的改动。事情做得真够漂亮的，整个交易真的保守住了秘密。一个初具形式的条约文本安全送到了美国，在接下去两年的时间内，除了个别几个官员有所了解外，没有人知道这个条约的存在。后来，纯粹是出于偶然，它被英格兰发现了，导致了与共和国的战争。

但我们得简略地提一提在其间的两年中发生的事情。此时尼德兰商人不仅把战时禁运品运往美国，还运往法国。正像前面说到的，木料是他们首要的出口项目，但英格兰已宣布木料为战时禁运品。英格兰捕捉所有运送木料的尼德兰船只，在英国的港口卖掉船上的货物，然后允许这些船带着拍卖后的收益回国。这样的被迫出售没什么利润可言，船只遭扣的尼德兰商人蒙受了极大损失。

由此惹出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木料是不是战时禁运品?"共和国指出两国于 1674 年签订的条约中木料没有被列为战时禁运品，英格兰不能否认这个条约的存在。但英格兰声称情况已经变化了，他们辩解道：你们出售木料给法国，你们所出售的这类货物正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最需要的。

不过，就相关法律的道德观开展讨论是没有用的。尼德兰商人在自己的独立战争中还一直向西班牙人出售火药和枪支。我们不能期望他们一下子变得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观念。在英国舰队不断监视之下，只要有可能，尼德兰商人仍会继续他们与法国的贸易。一切都是老样子。

读一读 1780 年灾难性的英国战争爆发前几年的书信和报纸是很有趣的。好像在共和国还没有人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只具有末流实力这样的事实：共和国靠自己那十几艘战舰无法与英格兰几百艘战舰对抗。那时候，来自国外的情报是极端缺乏的，海牙政府从来都消息不灵通，而大多数人对每件事情所持

的见解通常都不是以事实为基础。

由于绝大多数荷兰人坚信英格兰应对共和国由盛变衰负责，因此他们根本不明白事情的真相。他们这样推理道：只要放弃与英格兰结盟，与法国缔结一个新的联盟，一切都会变好的。却不知在那个时候，法国正开始遭受持久而难以克服的饥荒，并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正是这种茫然无知使法国驻海牙的大使轻而易举地胁迫共和国屈从。

在英格兰发出一连串抗议之后，三级会议总会于 11 月 19 日被迫正式宣布“从今以后，凡装载适合于造船的木料的船只不得受共和国战舰的护送”。法国立即通知共和国它决不赞成这样的规定，认为三级会议总会的决定违背了中立原则，要是共和国打算通过颁布这样的法律使自己与英格兰站到一边，法国将被迫剥夺曾赋予共和国的所有权利和其商人所享受的一切特权。

法国大使于 12 月 7 日递交了这封信。12 天过去了，三级会议总会还没有做出答复。12 月 19 日，法国重申它的要求，再次发出威胁。11 天以后，三级会议总会通知法国大使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然而这不能令巴黎的政府满意。由国王签署的取消所有优惠荷兰人的法律的诏书被送到了海牙。法国大使得到命令不要立即向海牙政府递交这份诏书。他受命向三级会议总会的成员和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出示这份诏书。因为法国大使把它揣在口袋里四处走动，不久尼德兰商人都知道了这份文件，他们大为恐慌。次年 3 月 28 日，尼德兰七省联盟独立共和国的三级会议总会收回了于去年 11 月 19 日作出的决定。

我们不打算详细描述次年共和国所遭受的众多同样性质的羞辱，它们都是类似的情况引起的。某一天，出于对英格兰的惧怕，共和国采取了某项措施，后来又由于害怕冒犯法国和丧

失其商业利益，便收回了它的决定。它完全为拥有强大海军的英格兰和提供更多收益的法兰西所控制。它试图用妥协措施来抚慰两个国家。这种措施是共和国为了讨好交战中的两个国家，而不得不采取的求得暂时解决的方法。这样做的结果是逐步削弱了自己的威信，最后使两个国家都藐视自己。只是在浪费了许多年时间和最终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到了那种地步，靠拖延或找借口都已不再有希望解救自己）之后，它才最后决定做些什么来维护自己的独立。然而事情都在拖拖拉拉地进行。首先是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并报告舰队的情况”。1779 年 1 月，来自不同的 5 个海军部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在海牙开会，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革的计划。

在持续了三个月的慎重推敲后，这个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他们发现共和国没有一艘符合当时海战必需规格的战舰，而这样的战舰在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却各拥有许多艘。他们建议共和国马上开始建造 12 艘装配有 70 门炮的战舰、36 艘 60 门炮的战舰和 42 艘 20 至 50 门炮的战舰。这个委员会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一旦那些战舰造出来了，又该为它们做些什么。共和国不再拥有可停靠一个大舰队的港口。由于须德海沙滩的缘故，阿姆斯特丹一直存在入港困难的问题。若要停靠一艘军舰，必须先卸掉船上的火炮和绝大多数的装备，才能被拖引到海岸附近。后来被拿破仑用作军港的海尔德[1]，当时只能在夏季用作港口，而在夏季也只能是天气良好的时候。马斯河流经鹿特丹时带来大量的泥沙，只有吃水少于 12 英尺的船才能进达港口。惟一适合于停泊大船的安全地方是泽兰省的弗拉兴。威廉三世曾把这里建成重要的海军基地。但威廉死后，随

① 海尔德：即登海尔德，今荷兰北荷兰省港口城市。原为阿姆斯特丹市外港。

着泽兰省海军部的破产和其他城市的嫉妒，这里的港口、船坞和仓库都渐渐失修、毁坏了。

至于和船的装备有关的许许多多物资，委员会发现根本无法提供。没有火炮用的火药；没有船帆；没有绳索；没有储备物资；弹药库是空的。委员会问道：哪里去找这些军备物资？哪里有建造新船和修理旧船必需的木料？

还有一个不久被证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所有的木料和各形各色的军备物资都在法兰西参战之时被尼德兰商人卖掉了，绝大多数都已到了国外。留在国内的物资，尼德兰海军部现在只能以极高的价格采购了。此时作为一个徒劳无益的举动，海军委员会于 3 月 10 日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在报告中提供了需要建造的战舰的数目，应该扩建的港口的名字，指明应该重新储备的仓库和列举应该付给水手的佣金——为了吸引为商船服务而挣钱很多的水手。

使欧洲的政治境况变得更为复杂的是，西班牙站到了法兰西的一边，也向英格兰宣战了。据报道，法西联合舰队往北朝英国海岸的方向航行，他们威胁要进犯英伦诸岛。按照 1678 年和 1716 年的条约，英格兰有权利向尼德兰要求派出一定数量的士兵和战舰。

7 月 21 日，约瑟夫阁下提醒三级会议那些条约的存在，并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请求援助。这一次三级会议总会不能再拿战争在欧洲以外进行作为借口了。他们以不作任何答复来逃避这个难题。不久，法西联合远征毫无结果，而共和国至少在这方面没进一步陷入麻烦。但每次遭受新的拒绝之后，英格兰就更肆无忌惮。现在它对待联省共和国的船只就像它们属于一个交战国，并且拒绝再听来自海牙的叽里咕噜的抗议。英国大使对尼德兰的一切抗议只有一个回答："要是共和国想公开地做那些就像它已站到法兰西立场上的事情，它不该期待其不友好

行为的主要受害国会给予任何优惠的对待。”

摄政者们谴责亲王显而易见地玩忽职守，因为他没有加强舰队的建设；而亲王也指控摄政者们显而易见地玩忽职守，因为他们不给他用于造新船的资金。看吧，正是在所有这些喧嚣之中，拥挤的人群却在为驶入尼德兰港口的美国革命者的战舰呐喊欢：“打倒英格兰！”“法兰西和美国万岁！”作为北美殖民地最好的宣传者，谁也比不上登上欧洲大陆的约翰·保罗·琼斯[1]船长。富兰克林对社会中时髦分子有号召力是因为他自己具有博学和不赶时髦的气质，而琼斯对下层群众有号召力是因为他的天性。他是海盗和绅士、骗子和勇士的混合体，这样的人总是能引起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民众的幻想，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民众一向呆在家里，只在梦中闻到过战争的硝烟。

1778年，琼斯才30岁，他连同一艘装配有18门炮叫“游骑兵”的战舰受命从美国驶往欧洲。他在爱尔兰海开始实施作战行动，捕获了一艘有20门炮叫“雄鸭”的英国战舰。随后他去了布雷斯特[2]，到达后，他让“游骑兵”驶回美国，自己则被任命为富兰克林在法国港口为他装备的一个海军中队的司令。琼斯在曾经航行于法兰西与印度群岛之间的一艘旧船上升起了他的旗帜，这艘船被重新命名为“邦·霍姆·理查”，为的是纪念富兰克林笔下的“穷理查”[3]。“邦·霍姆·理查”号配备了38门炮和380名船员，其中约有100人是美国人，其余的船员来自欧洲各国，少数几个还来自亚洲。琼斯

① 约翰·保罗·琼斯（1747—1792）：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海军英雄。1779年9月23日在英格兰东海岸大胜英国军舰，因而举世闻名。

② 布雷斯特：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的港口城市。

③ “穷理查”：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年鉴》中塑造的一个角色，他有一套深思熟虑、言简意赅的警句格言，专述节俭、勤劳和简朴生活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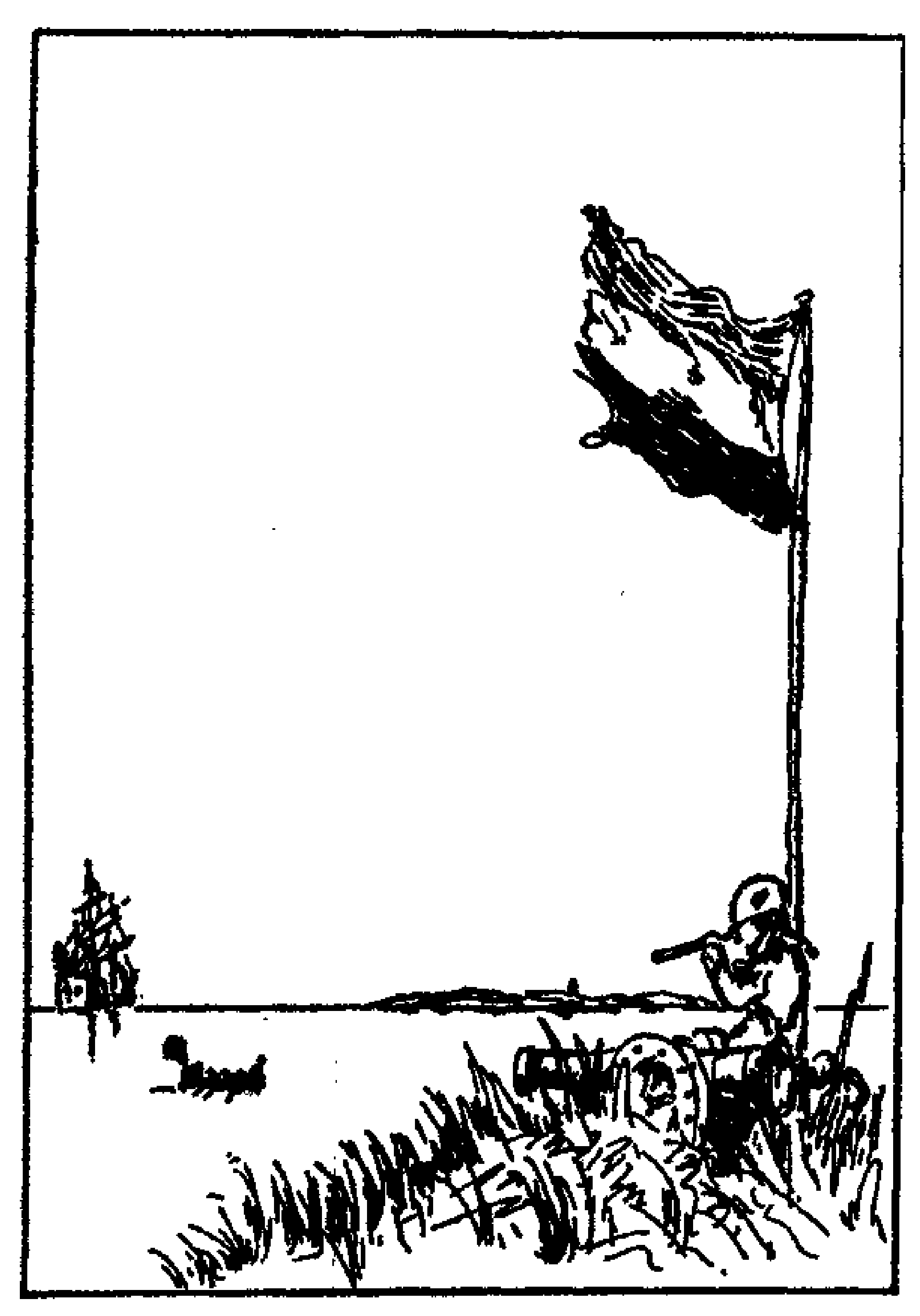
的舰队还包括“联盟”号，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法国和美国的联盟，还有配备有 12 至 32 门炮的 3 艘法国小型战舰。

琼斯率领这支装备齐全的舰队驶过英吉利海峡，进入照例到处是英国船只的北海。他好几次在英国领土的苏格兰登陆，并捕获了几艘英国船。9 月 23 日，他与护送一批商船去波罗的海的一个英国海军中队发生了冲突，其中两艘英国战舰是装有 44 门炮的“塞拉皮斯”号和“斯卡伯勒女伯爵”号。他们让商船逃离，自己则留下来与美国人作战。

读者们自然对接下去的那个战役都很了解。许多出色的美国历史学家都对那场战役作过描述。交战的结局是“塞拉皮斯”号投降了。当那天晚上“邦·霍姆·理查”号沉没时，琼斯将他的旗帜移到俘虏的战舰上，带着其舰队剩余的船只启航驶向法国。然而没过多久，当时的事态表明，带着这么多伤兵驶过充满危机的英吉利海峡是太冒险了，因而琼斯决定驶向最近的港口，这样碰巧就到了尼德兰的特塞尔岛。

1779 年 10 月 4 日，美国的旗帜第一次出现在共和国的港口，他们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欢迎。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特别是先前与李进行谈判的德·诺伊弗维勒，立即与这位美国将官进行了接触。凡·德·卡佩伦一向喜欢给著名的人物写信，告诉他们自己的情况和自己一直怀有的崇高的情感。他给琼斯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琼斯船长能原谅一位美国可靠的老朋友唐突地写了这封信。他表达了听到琼斯先生许多胜利的消息时所感到的难以形容的满足，并想得到包括“与这场在以往世纪的书本中远比现在更容易找到的海战有关的所有细节”的“可信和详细的”叙述。信尾的附言这样写道：“请琼斯船长原谅凡·德·卡佩伦男爵贸然向他提问他是否生在美洲。”

无论他的身世如何，琼斯船长都是一个文笔优雅的书信作者。他给卡佩伦的回信是这样开头的：“大人——由于您的爱



美国革命者的战舰驶入荷兰港口

国主义和友谊，人的天性和美洲都领受了您不同寻常的恩惠，对您慷慨而彬彬有礼的赐书我充满了感激之情。"随后就英国舆论界对自己所进行的非难发泄了怨恨。他附上一些书信让凡·德·卡佩伦男爵审阅，为使男爵能看到对他的指控都是些不实之辞。他确实不是生在美洲，他生在英国，但幸运的是他没有继承那个堕落的民族退化的灵魂，同时他对此感到悲哀并加以藐视。他从 13 岁第一次看到美洲大陆时起，就喜爱并选择了这片土地。在表达了对两个共和国携起手来以便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愿望之后，琼斯先生署名他自己是凡·德·卡佩伦男爵的深受恩惠和非常顺从的谦卑仆人。

就在琼斯船长的访问大受“自由的朋友”和数目不断增长的民主党人的欢迎之时，海牙政府此时感到非常尴尬。这种处境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尚未得到英格兰承认的国家的海军司令，率领正与英格兰交战的国家的一些战舰，来到尼德兰的一个港口，船上还满载着英国战俘。他在来到那儿一周之前就已成为公众眼里的英雄，他的画片到处散发，他的姓名在街上的流行歌谣里传唱。三级会议总会又能做什么呢?琼斯以他的突然造访不给他们一点阻止他在共和国任何港口出现的机会，可他又是那么彬彬有礼。

恰巧那些海军部为保护商业船队而征集来的战舰此时正在特塞尔岛集结。琼斯船长刚到达这个港口，就向尼德兰的海军上将致敬，并请求允许他在岸上租一所房子用作治疗受伤水手的医院。当局火速通知尼德兰海军上将不得回访，命令琼斯先生把他的伤员留在船上。

法国水手也不允许上岸。这立即招致法国大使的抗议，他正希望这支舰队的到来会迫使共和国卷入与英格兰的战争。他提出控诉后，约瑟夫阁下却突然光临三级会议总会，粗暴地表示意见。他去过特塞尔岛，但他未获允许和美国船上遭拘捕的

同胞见面。他想与美国船上的英国战俘联系的一切努力，都因尼德兰当局的固执己见而泡汤了。约瑟夫阁下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某个英国臣民现在变成了海盗，他捕获了国王陛下的两条船，把它们带进了尼德兰的港口。显然三级会议总会有职责去看望特塞尔港口的英国战俘，马上释放他们，并迫使琼斯向英国法庭投降，以便将他以国家叛徒的罪名吊死。

对这种粗暴的发作，三级会议总会没有给予答复。不过他们允许受伤的英国战俘可以到岸上治疗。同时命令在特塞尔的尼德兰海军上将向美国伤员提供医疗帮助和医疗用品。因为共和国此时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凡给了英国人一点恩惠，接下去就得给法国人同样的好处；反之亦然。

几个星期以后，当这次不同寻常的来访的最初新鲜感逐渐消失后，严禁美国和法国水手上岸的命令便逐渐放松了，美国人甚至被允许修理他们损坏的战舰。对琼斯来说，禁令的消除正中其下怀。特塞尔岛周围此时到处是英国的船只，这支法美联合海军中队想躲开它们是不太可能的。能在中立的国土上多呆一段时间，则是琼斯最好的选择。修船的工作的确开始了，但两个月以后，除了“斯卡伯勒女伯爵”号装上了新的保护船头的圆材，别的什么都没有完成。正当水手们装那个新圆材时，琼斯先生在共和国转了一转，让自己成为公众热情欢呼的对象。

但在掀起琼斯狂热的那段时间里，三级会议总会在禁运品问题上无法达成最后决议。乡村省份依旧支持英格兰的要求。然而荷兰省则威胁说，要是其他省份不停止抵制法兰西的政策，它将自己采取行动了。这个威胁很有效。考虑到所处的困境，共和国不能冒险让最富的省份脱离出去，必须做点什么来挽救。三级会议总会像往常一样做出了妥协，但各方都感到不满意。三级会议总会决定征集尽可能多的战舰，将它们分成三

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护送前往法国的商船，一部分前往波罗的海，第三部分护卫那些驶往地中海的商船。对英格兰所提要求的让步不过在于：声明凡接受官方护送的商船不得装载木料。不过它们可以装载铁、大麻，这两种商品也是法国人造船所需要的。这支舰队打算在快到12月底的时候离开特塞尔岛。

与此同时，约瑟夫阁下为了表示英国政府对这个决定的看法，又提出了一些共和国不可能赞同的要求。共和国有义务派去援助英格兰的军队怎么样了?没有答复。为什么共和国允许保罗·琼斯一直呆在它的港口里?没有答复。然而后一个质问产生了效果。尼德兰政府暗示琼斯该是他结束修理、惠顾别的国家的时候了。但琼斯先生并不着急，依旧等待着他认为可行的时机。终于，在1779年的圣诞节那天，他带领舰队悄悄地溜出了港口，朝法国方向驶去，并安全地抵达那里。

琼斯离去的3天前，尼德兰舰队在司令凡·拜兰特伯爵的率领下开始了其航程。直到出发之前，尼德兰当局还担心琼斯会加入他们的舰队，那样的话就会造成没完没了的麻烦。这个麻烦倒是省掉了，但还是有别的麻烦，而且还有很多。

曾请求护送的商船出现在会合地点的只有半数。另一半商船选择了自己去做冒险的航行。由于非常害怕英国人会阻拦船队、搜查船只，受护送的船只的保险费比那些自己去冒险、不受保护的船只要高许多。有4艘以上来自鹿特丹的战舰，已经说好在凡·拜兰特的海军中队到达马斯河口时加入他们的舰队。但凡·拜兰特在泽兰诸岛等了相当长的时间，还是未见这些战舰的影子。后来这些失去踪影的战舰的司令给自己找了个借口，说是“一股逆风使自己留在了格耶利港”。这类道歉和借口在我们历史的下一阶段是不胜枚举的。凡·拜兰特不愿再等下去了，便继续自己的航程。12月30日，他驶入了英吉利海峡，很快他就接近了英国海岸。在这个海域游弋着不少英国

人的小型快速帆船，他们主要是用来监视尼德兰舰队的活动。这时他们发现了凡·拜兰特的舰队，就马上报告了英国舰队。

第二天，也就是1779年的最后一天，尼德兰船队通过了英吉利海峡，来到了怀特岛[①]附近。他们在这里遭遇了由8艘大军舰组成的英国舰队。英国战舰上的炮从28门至90门不等。凡·拜兰特命令商船退后排在他的5艘小军舰的后头，继续向前航行。英国舰队转向右边，保持一定的距离跟随着尼德兰舰队。双方都不想开始敌对的行动。英国仍希望只要可能就避免与共和国公开地对抗，尼德兰的司令也接到非常严格的命令，要他克制任何可能导致与大不列颠作战的行为。但在那天的上午，英国舰队经过调动最终形成了对尼德兰海军中队的包围，而且后者已没法逃脱了。到了下午，英国海军上将查尔斯·菲尔丁派一艘小船去凡·拜兰特的旗舰，通知他说，菲尔丁受命要对尼德兰的船只进行搜查。

而对占优势的英国战舰，抵抗是没有用的。于是凡·拜兰特试着与对方谈判。他发表声明，发誓他所护送的商船没有携带任何战时禁运品。菲尔丁回答说，他对凡·拜兰特先生的名誉非常尊重，而且非常乐意听从他，但他接到的命令是非常明确的，必须亲自进行搜查。两位司令之间又进行了更多的磋商，但没有产生结果。菲尔丁坚持要搜查尼德兰船只；凡·拜兰特宣称英国船只一有实施搜查的企图，他就下令开炮。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不少尼德兰船只熄灭灯火从英国军舰的队列中逃出去，驶向某个尼德兰或法国的港口。不过到了早晨，双方的舰队仍在原先的位置。天一亮，菲尔丁就准备搜查一艘尼德兰商船。凡·拜兰特像他说过的那样朝摇向尼德兰船只的英国船开了炮。英国军舰立即掉转头来以一通齐射作为回报。尼德

① 怀特岛：位于英吉利海峡、在汉普郡岸外，隔索伦特海峡与主岛相望。

兰人尽力予以回击，一场公开的海战便开始了。这场海战准确地说只持续了5分钟。凡·拜兰特知道他正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便认为他已为旗帜的荣誉做了该做的一切，于是停止了炮击。双方都没造成多大的损伤。英国人开始仔细地搜查所有的商船，发现其中有9条船装载了大麻和铁，按英国的法规，这两种商品都属于战时禁运品并应予以没收。这9条船被带往朴次茅斯，其余的则被放行了。由于尼德兰舰队属于英王陛下和睦友好的国家，因此被允许返回自己的祖国。然而凡·拜兰特拒绝这样做。他与那9条不走运的商船呆在一起，陪伴他们去了朴次茅斯，并从那里向海牙当局提交了一份有关事情经过的详细报告。

和往常一样，有关这事的消息早在别人知道之前就先传到了股票交易所。股票交易所传播信息总是有其特殊的方式，某个消息灵通的商人先把事情说了出来："你是否听说了那些英国人……"但不幸的是，别人把他当作试图影响市场的搞阴谋的投机者而把他轰了出去。人们对待这个消息的方式，表明这个时候共和国的人所具有的古怪的心理状态。当时即便是最爱国的荷兰人，经过了一个世纪之后，也必须承认多年来共和国不择手段地激怒了北海对岸的强大邻国。就英国政府而言，我们的先辈不停地激怒自己盟友的做法，完全超出了他们能够谅解的限度。他们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责骂英国政府。他们甚至都不对请求解释的信件作出答复。只要是大不列颠的敌人，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他们都相当公开地予以支持。他们吵吵嚷嚷地要终止旧的友好条约，要求马上与英格兰的死敌——法兰西缔结联盟。不仅如此，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城市与北美殖民地的反叛者秘密进行谈判，只是在等待最先的机会获取这个阴谋的酬报。随后，当英格兰为这些不间断的恼火的事情和长期对善意的信任的违背所激怒，最终决定自己动手来处理这些事

情时，共和国对英格兰的所作所为确实发出了一片抗议之声。

事情按其预定的方式发展，当途经奥斯坦德[1]的邮件带来了有关怀特岛外战役的可靠消息时，天国的上帝便没日没夜地忙碌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一个不漏地听取众多爱国人士的祈祷，他们都恳求迅速对乔治三世国王统治下的不可信任的无赖臣民施以公正的报复。

小册子作者怀着热情写作，这种热情只有西班牙—美国战争[2]的煽动性的报道者才能超过。德·勒伊特[3]和特龙普[4]的幽灵被从坟墓里招了出来，为尼德兰国旗刚遭受的侮辱报仇。其他的小册子则是对真实事态更为实际的构想，它们嘱托共和国女神迅速赶往她那些杰出的水手的墓地，在那里为她如今悲惨的处境挥洒泪水。卡托·巴塔弗斯和其他假冒的古典主义诗人（哎，这些巴达维亚人的诗歌是多么糟糕！）请求公正的耶和华惩罚如此恶劣背叛的坏蛋。所有这些六个便士一本的小册子使许多贫穷的小文人大大受益，但并不能使此时停泊在朴次茅斯港的 9 条商船回归。

接下去的便是有点歇斯底里的公众表演，他们把指责的矛头对准某个人。海军上将凡·拜兰特是充当替罪羊的第一人选。他被召回海牙，面对军事法庭的讯问。然而由于他能证明自己是遵照离开特塞尔岛之前接到的密封的指令行事，军事法

---

① 奥斯坦德：比利时西佛兰德省城市。濒临北海，在肯特－布吕赫运河终端。

② 西班牙—美国战争：1898 年美国和西班牙两国之间结束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并使美国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获得新领土的战争。

③ 德·勒伊特（1607—1676）：荷兰海军上将，曾在第二次（1665—1667）和第三次（1672—1674）荷兰战争的海战中取得辉煌胜利。

④ 特龙普：马滕·特龙普（1598—1653）和其子科尔内利斯·特龙普（1629—1691）都是曾在 17 世纪荷兰战争中发挥过卓越作用的著名荷兰将领。

庭只好将其开释。是谁给了他那些明确的指令?阿姆斯特丹向可敬的公众指出，那个世袭的和依照宪法规定当上海军统帅的人可能比任何别人更知道这些指令。

但执政尽管风暴临头却没有屈尊作出答复。于是可敬的公众便谴责他“对国事无所用心”，并且固执地相信，要是没有那些命令尼德兰海军上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的秘密指令，那5艘老掉牙的战舰在海军上将的指挥下就能把强大的英国海军中队统统打翻到水里去喂鱼。

那么谁最终在整个事情中大获全胜并拥有纯洁的爱国主义的光环呢?只可能是善良的阿姆斯特丹城。但愿它的建议已被遵从；但愿与英格兰的可厌的联盟早已破裂而代之以与伟大的法国的条约（虽说那时候那个国家的公民刚进入了被迫节衣缩食的漫长的困难时期，并最终导致了可怕的大革命）；但愿共和国已经听取了真正爱国者的忠告,并拒绝听从那个由于传统和倾向性的原因与共和国的死敌联系紧密的人，等等等等。现在，阿姆斯特丹以其能付出的所有精力（这股劲头儿一直保持到共和国的末日），鼓动人们支持撤销1778年11月19日在禁运品问题上认可英格兰要求的决定，三级会议总会又不得不面对这个重大的问题。

英格兰表现出比以往更少妥协的意愿。3月28日，约瑟夫阁下递交给三级会议一纸新的警告。“英国国王陛下的政府极为迫切地想知道共和国是仍把自己看作是英格兰的盟友，还是希望自己得到像其他中立国一样的待遇。要是它选择断绝联盟，英国国王陛下将被迫取消共和国迄今还享有的一切特权。”三级会议总会将这封信归入档案，未作答复。很快，英国国王陛下失去了耐心，于4月17日宣布他不再认为自己受他的国家与七省联盟共和国之间任何古老的条约和联盟的约束，从今以后他允许所有忠诚的战舰（和那些忠心和热情丝毫

不少的海盗船）拦截和搜查他们可能在外海遇上的尼德兰船只，无论是战时禁运品还是运送给法国客户的其他货物，都一律予以没收。

英国舰队此时完全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尽管法兰西的港口向尼德兰货物自由开放，但除非做又长又危险的绕过苏格兰北部的航行，就不可能将货物运到这些港口。不出几个星期，他们就开始感觉到招惹英格兰怨恨的直接后果了。在经过长时间的挑衅之后，英格兰不再受国际法的良好意愿的妨碍。只要是尼德兰的船只，不管装载什么货物，不需要任何正常的程序，就被宣布为战利品带往英国港口。并没有一支舰队用来保护尼德兰商船。三级会议总会于 1779 年 5 月 2 日发布政令，要立即组建一支包括 52 艘战舰的舰队。但这看起来完全是纸上谈兵。迄今为止既没有钱，也没有建造和装备战舰所必需的木料和人员。

此时英国将其行动扩大到了荷兰海岸。英国海盗船严密地守卫在尼德兰诸河的河口。曾在海勒福特斯勒斯港寻求庇护的一艘法国海盗船，试图驶往北海。但在它驶出河口之前，就遭到了两艘英国船只的攻击。由于找不到安全的港口，法国人让自己的船冲上了岸。英国船耐心地等到大潮把法国船托起，然后登上船，把它当作战利品带回国。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引起了岸上一场大骚乱。两百年以前，缺少船的荷兰人，由于并不经常能捕获到西班牙的船只，他们会涉水前去攻击并捕获英国船只。然而在 1779 年，他们只能怀着深深的愤慨旁观，求助于公正的上帝的惩罚，然后回去花费半年时间来讨论这个事情。三级会议总会傻透了，竟然去伦敦抗议这种“对共和国主权的侮辱”。我们很容易猜到，对这样的抗议英国人会以何等的敬意来听取。

现在，荷兰省的权贵们（他们同时也是共和国的权贵）不

是从这许多不幸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而是任意地做着种种不合理的尝试。不过考虑到公众对英格兰的情绪，要让大多数民众相信与其专横的邻国有必要至少签订一个暂时的协定（直到有一天共和国又强大到靠实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即使这不是完全不可能，也会是很困难的。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俄罗斯那位成功地谋杀了自己的丈夫、在其即位的国家已建立起了秩序的叶卡捷琳娜二世[1]，着手在欧洲的文明国家中开创一个历程，发明了在历史上名声显赫的“武装中立”。

英格兰在国际法方面反常的概念和它固执信奉的在搜查船只事情上强权先于公理的准则，不仅对连自己都为信用上的不断背叛而有负罪感的共和国，也对只想在现有的复杂政局中老老实实挣几个钱、对英格兰较少冒犯的中立国造成了损害。“武装中立”是迫不得已的，宣称其原则是“中立的商船谋取中立的利益”。由于伦敦城那班戴假发的贵族老爷控制了能控制的一切，由于这些爱挑剔的绅士们有权利颁布他们想颁布的任何法律，因此，除了那些就其性质而言属于战时禁运品的货物，“武装中立”的各缔约国坚持无权没收其他的并无违碍的货物。

这个“武装中立”开始时是北方政权的一个防卫联盟，对此有兴趣的各方都可以成为这个联盟的成员。它对英格兰来说是一个令他们非常不快的意外产物。因为英格兰暗地里希望在另一个非常不同的计划中得到俄国女沙皇的支持。俄罗斯舰队数量很少，而且已经有了那种最为不幸的凭借火药和白兰地自

① 叶卡捷琳娜二世：俄国沙皇，1762 年至 1796 年在位。1762 年 7 月 9 日，她在近卫军军官的帮助下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其丈夫彼得三世，登上俄国沙皇的宝座。一个星期后，彼得三世即被害。她确立了俄国作为欧洲一流强国的地位。

吹自擂的习惯。然而在陆地上，俄罗斯具有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实力，而且事实上自1763年以来，几乎有20年了，英格兰在欧洲大陆就没有一个朋友或盟友。

在共和国看来，“武装中立”是最受欢迎的变革，简直是上天的恩赐。只要自己能加入其中，将会如同房屋已经失火却得到保险金的人那么幸运。由主要缔约国制订的用作国际法正当原则的五项条款，将会对尼德兰商人极为有利。法兰西建议共和国立即加入这个联盟。但即便是危在旦夕的时刻，海牙当局也不能让自己办事利落些。由于他们在圣彼得堡没有保留一位正式的外交代表和缺乏有关那位极为轻浮的女沙皇这样做的意图的可靠消息，海牙当局便先派两位特命大使去俄罗斯的首都讨论有关事宜。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好几个月过去了，谈判没有结果，女沙皇越来越不想接受尼德兰这个“破产的公司”了，而尼德兰却希望靠加入一个更有实力的财团来重新树立自己的信用。至于英国政府，它不需要隐瞒自己的意见。尼德兰驻伦敦的大使被直截了当地告知，假如共和国加入“武装中立”，这样的行为可能造成影响广泛和严重的后果。又是这么一个情况。法兰西说“做”，英格兰说“不做”；而且两方面都威胁说要是不服从就进行报复。

正当人们为走哪条道路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最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夺走了共和国扭转其危急局势的机会。细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在1778年秋天，让·德·诺伊弗维勒作为拥有最大权利的城市——阿姆斯特丹的非正式特使会见了美国国会的正式代表李先生，这两位绅士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和平和商业条约的草案。一旦英格兰与殖民地之间宣布和平，这个草案将马上送交他们各自国家的议会。

这个条约草稿的原件已被带往美国，在那里受到权力机构的审阅，此时正在回归欧洲的途中。它夹带在美国国会前主席

亨利·劳伦斯[1]先生的私人物品中，此时他正以临时特使的身份在前往海牙、阿姆斯特丹或任何能寻求到北美殖民地最佳利益的地方的途中。其使命的主要目的就是筹集钱款——北美革命者迫切需要的东西。

9月10日，劳伦斯乘“水星号”邮船启程。两天以后，在纽芬兰附近的海面遇上由克佩尔船长指挥的英国军舰，被招呼停船。这位英国船长并不知道劳伦斯就在这艘船上，但按照一般程序他派一个军官去“水星号”检查证件。劳伦斯很清楚他携带的那些文件足以用来定罪的性质，便回到船舱，将装有文件的皮箱扔到海里。接下去的故事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皮箱没有沉没，而是快快活活地在水面上漂游。一个英国士兵发现了它，便把它从深水里打捞上来，交给了船长。船长读了那些文件，庆幸自己的好运。因为他认为（在此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其他的人也都这么想）这些文件包含了敌情的关键内容——既有他们的作战计划，也有各种外交谈判。劳伦斯被关押在英国军舰上，这艘军舰马上返航，于10月1日到达达特茅斯[2]，在那里将囚犯连同他那不幸的皮箱押上岸。美国人被送到伦敦塔[3]，当作国家危险的敌人对待。皮箱也被送到了伦敦，里面的东西受到仔细检查。令国王陛下的大臣们颇为遗憾的是，这些文件并没能揭露出国王陛下的敌人种种的邪恶。但文件中包括一些信件，这些信件的公开会令它们的作者感到非常头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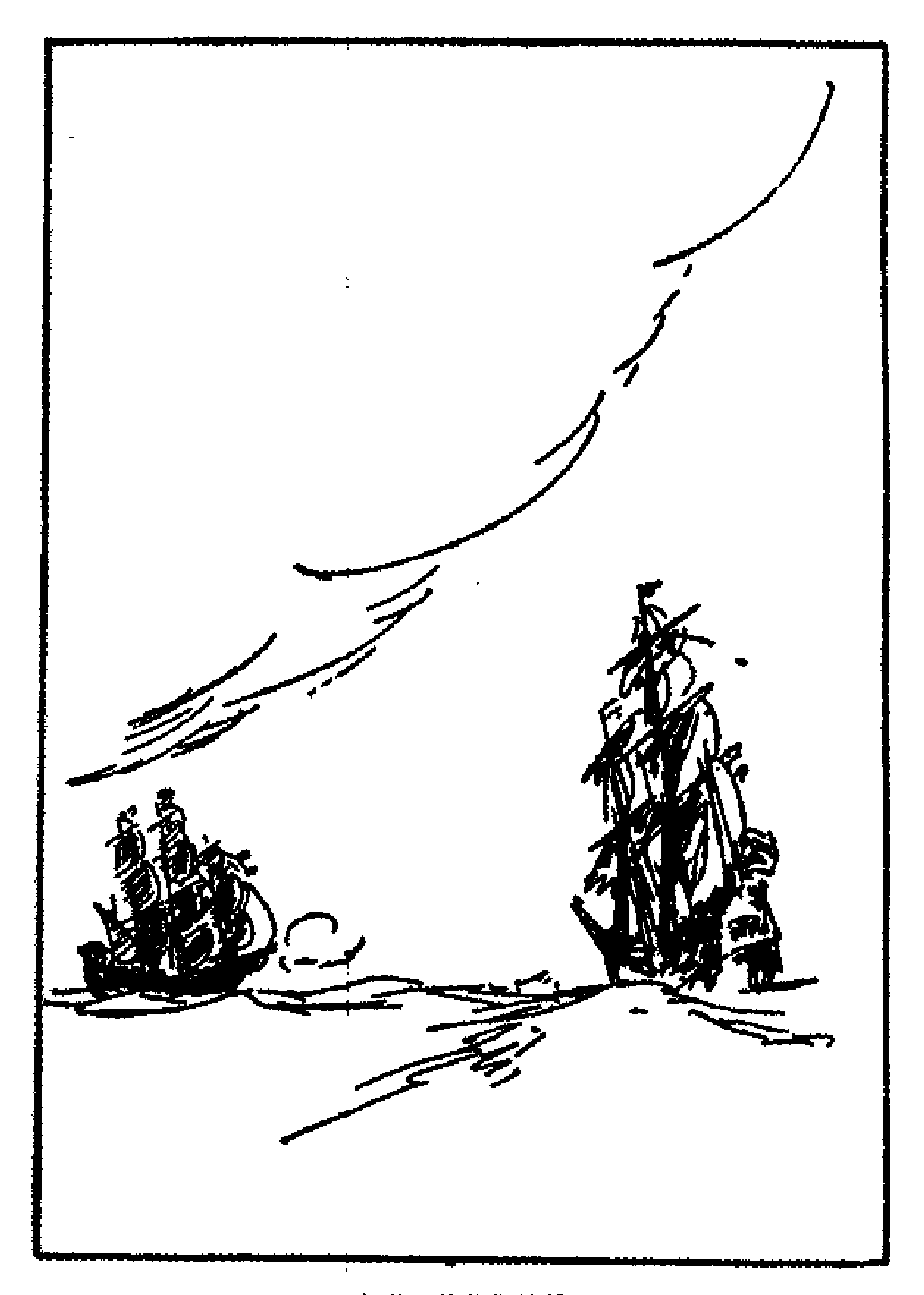
由于劳伦斯的行为笨拙，共和国不幸大难临头。在发现的

---

① 亨利·劳伦斯（1724—1792）：美国早期政治家，1777年至1778年大陆会议主席。1780年秋天代表大陆会议乘船前往荷兰洽谈1000万美元贷款，在海上被英国人捉获。他于1781年12月31日获释。

② 达特茅斯：英格兰德文郡南哈姆斯区的城镇。濒临英吉利海峡，在达特河口湾西岸。

③ 伦敦塔：英国皇家要塞和伦敦的标志。它长期用作国家监狱。



亨利·劳伦斯被捕

文件中，泄露共和国对北美事务感兴趣的有7份之多。在这7份文件中，不幸落入敌手的有两年前由阿姆斯特丹的代理人和美国国会起草的商业条约的原件。还有一封由为阿姆斯特丹进行这些谈判的德·诺伊弗维尔写于1779年7月28日的亲笔书信，信是写给美国国会主席的。在这封信中，德·诺伊弗维尔又一次保证阿姆斯特丹的高级官员将继续予以支持，并向他通报阿姆斯特丹在三级会议总会中为美国利益说话的热忱。第三份文件是阿姆斯特丹某个叫斯托克顿（这个人的情况不详）写的一封信，信是写给《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普林斯顿学院前院长威瑟斯庞[1]牧师先生的。斯托克顿先生想当然地以为威瑟斯庞先生知道秘密的商业条约的全部情况，并大大地恭维了德·诺伊弗维尔先生一通，“他对自己国家的最佳利益有如此明确的概念，并且懂得最有利的是与法国和美国结盟，而不是与英格兰结盟。”接下去是对民主人士（即所谓“爱国者党”）的颂扬。照斯托克顿先生的说法，这些不幸的爱国者正经历着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要对付作为英格兰国王最亲密朋友的执政的阴谋诡计。照最近的报告，这位执政实在像英国国王那么“爱好自由”。执政被指控对降临共和国的每一个灾难负有责任。他个人要对无视共和国拥护北美事业的热情负责。

第四份文件从性质上讲更为实际。它列举了可能有钱用来作为给美国贷款的富人名单。准备这份名单的是一个叫德克斯的富有的军人，他曾是美国陆军的军官，被视为某种美国事务的专家。他曾受凡·德·卡佩伦男爵的恩宠，两人保持书信来往直到他们的友谊因一场激烈的争吵而中断。

---

① 威瑟斯庞（1722—1794）：苏格兰长老会牧师，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惟一教士。

排号第五的书信是某个叫吉伦的人写的，他曾去欧洲监督两艘在法国港口建造的美国新军舰的制造。在写给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约翰·拉特利奇[①]的报告中，吉伦写道，建造计划已经失败，但为了买火药和其他作战必需物资他已经花光了存款。他是从两位可敬的阿姆斯特丹商人尼古拉斯·凡·斯特普赫斯特和简·凡·斯特普赫斯特那里购置这些物资的。这批货物已经沿着一般走私货的路线，途经圣尤斯塔修斯岛运往美国。吉伦先生也对阿姆斯特丹商人投资给美国的贷款抱有很高的希望。他这样指出，要荷兰人公开站到北美的立场上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很想用他们的钱秘密地支持正义的事业。因此，他认为最好是美国国会向共和国派一位大使，而只通过居住在巴黎的美国外交代理人，在尼德兰是做不成什么的。

最后的两封信是出自凡·德·卡佩伦的手笔。它们没有写明收信人。第一封写于兹沃勒[②]，时间是1778年4月28日，表达了作者在听说北美人的胜利时所感受的喜悦。接下去是罗列他自己为了北美革命者的正义事业所做的卑微的努力；他如何翻译普赖斯博士的著作；他如何在共和国孤身一人为美国人的权益而战斗；假如没有弱妻幼子的拖累，他将如何乐意为正义的自由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他只能在家里以微不足道的方式靠笔和口中的言词来战斗。然后我们回到了现实世界，发现了一句对读者来说远比前面浮夸的言辞更能引起兴趣的话。因为在信的结尾，凡·德·卡佩伦给美国人得到贷款的最佳筹集方式、如何作出认真的尝试去劝诱民众卖掉英国的股票而代之以美国的股票对通信人提出了建议。

---

① 约翰·拉特利奇（1739—1800）：美国初期的宪法制订者。1779年当选南卡罗来纳州州长。

② 兹沃勒：荷兰城市，今上艾瑟尔省省会，临兹瓦特河。

凡·德·卡佩伦的第二封信写的时间较晚，是9月份写的，是在美国人遭受了一些挫折之后。在这封信里，他对此时比以前更难从荷兰人那里得到钱表示担心；他还建议美国人向欧洲公众提供比现在他们能得到的更可靠的消息，以便让他们知道大洋彼岸的大陆上真正发生的事情，而不受英国报道的误导。

这7份文件毕竟都是以前的事了，但它们显示荷兰人给予北美反叛者的实际的参与和直接的鼓励，这不可能期望激起英格兰人任何程度的赞同。这使国王陛下的大臣们有足够的证据相信，在执政表示真诚希望与英格兰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阿姆斯特丹城却把与威廉想遵循的完全相反的政策强加给整个国家，他们处理起国家的政治事务就如同他们是整个共和国的主人。

因此，英国政府不急于向共和国宣战，它决定先试着利用这个罪证挫败三级会议总会中阿姆斯特丹的权势，同时加强执政的地位。于是在10月11日，那些文件被送到英国驻海牙大使那里，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

10月16日，约瑟夫阁下将它们呈送给执政。威廉接受了，却未能迅速作出决定，在他拿定主意做什么之前已经耽搁了4天。这种耽搁对很快得知此事的阿姆斯特丹是极为有利的，这使他们有时间准备如何为自己辩护。

阿姆斯特丹竭尽全力为在加入“武装中立”问题上迅速作出决定进行鼓动，而事实上，荷兰三级会议于10月19日以绝大多数票同意接受俄罗斯在允许共和国加入此联盟之前所加的条件。在荷兰省作出决定之后，即便其他省份一心想反对这个计划也无济于事。

次日，也就是10月20日，执政光临三级会议总会的外交事务秘密委员会和荷兰三级会议的会议，向与会成员宣读了英

国大使交给他的文件。与此同时，他板着脸宣称他自己从不知道和北美殖民地的这份商业条约的存在，也没听说有关这个条约的谈判。事情确如他说的那样。荷兰三级会议赞同他的意见。他们感谢执政对国家利益的慈爱关怀，并郑重表示对他刚才念的条约的存在他们也一无所知。他们还声称他们甚至都从未承认过美利坚共和国的独立，而在他们就此事作出反应之前，他们必须听取真正犯了错误的阿姆斯特丹对自己的行为如何解释。执政履行完了让自己也让有关各方感到满意的职责之后便打道回府了，阿姆斯特丹城被要求在5天之内对其行为作出解释。

在接下去的几天里，有关阿姆斯特丹最近行为的消息传遍了全国，人们对其行为很少有表示赞同的。抽象地憎恨英格兰，在小酒店议论时说要去拧英国狮子的尾巴是一回事，因同一头动物的利爪而遭受金钱上的损失就是另一回事了。此时有如此多的尼德兰船只落入英国的手中，就人们的意愿而言，谨慎从事几乎已胜过了歇斯底里。要是英格兰就在这时候真的向他们宣战，他们又会怎么样呢?把这个国家直接推向冲突的阿姆斯特丹，到时候会站出来对付英国舰队以保卫这个国家吗?

但那些期待那个骄傲的城市低声下气地予以道歉、悔恨自己危及所有省份安全的轻率行为的人算是错了。在作出解释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该城的市长们很愿意把和美国缔结临时条约的责任归咎于自己。他们以无礼的方式和无辜受了伤害的腔调，声称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总体的利益，为了一旦英格兰和殖民地之间缔结和平，共和国就可以先从美国的贸易中获利。

这个解释以“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的腔调说出，没法为英国政府所接受。可怜的执政不去利用那些文件摧毁阿姆斯特丹的势力（这正是英国大使的企图），倒把事情搞得让阿姆斯特丹从这件事情中套上了某种爱国主义的光环，让他们赢得了

其行为是为了祖国利益的声誉。英国政府现在不再去打扰执政了，而是直接向三级会议提出抗议。这实际上是一份最后通牒，要求阿姆斯特丹政府进行道歉，严厉惩处那些批准这个秘密条约谈判的市政顾问。

与英格兰的战争此时已迫在眉睫，因此人们期待着不仅在回答英国大使的最后通牒方面，而且在加入“武装中立”联盟方面得到迅速处理。后一个问题在荷兰三级会议通过赞成的决议后，再次迷失在国家复杂的政府机构的各种委员会和下属委员会的迷宫之中。

真是一事无成。11 月的前两个星期在进一步的审议中度过。7 个省份中的大多数陆续表达了观点。也许明智的做法是指示在圣彼得堡的尼德兰代表，签署允许共和国受益于“武装中立”同盟的文件。但为了使所有的事情能体面而不必太仓促地完成，考虑到事情可能还有在最后的时刻发生变化的一线希望，境况可能会奇迹般地改善，三级会议总会决定在六个多星期内不把这一步骤通知其他的欧洲国家。

至于要不要惩罚阿姆斯特丹，意见分歧很大。一向按自己的意见行事面不必向中央政府咨询的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毕竟只是采取了每个城市和乡村一向所习惯的做法。中央政府充其量只是不可或缺却令人讨厌的东西，它工作起来极度地笨拙，因此越少向它咨询越好。

在这个问题上讨论了三个星期之后，仍未达成明确的决定。这时荷兰三级会议和三级会议总会宣称他们已经准备正式指责阿姆斯特丹的行为，并把这个决定通知英国政府。

然面约瑟夫阁下明确表示，他的国家不会接受这样的折衷措施。他以很快的速度连续向三级会议递交了一批含义明确的照会。无一例外的，这些照会都未得到答复。又一个月过去了，此时都快到 12 月中旬了。由于事情日益明确地表明将不

会“发生什么了”，三级会议总会认定在加人“武装中立”问题上神神秘秘再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了。于是，12月10日，各欧洲国家都得到通知，共和国已经加入了中立联盟，希望他们能友善地注意到这个事实。

然而这个信息到达伦敦太晚了，未能在任何程度上受益。此时正是冬季，一场强风暴袭击了北海。邮件耽搁了好多天，当尼德兰政府的信最终到达伦敦的时候，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向共和国宣战了。做出这个决定只是因为尼德兰政府拒绝对阿姆斯特丹的行为作出赔偿。没有及时向其他国家通报自己已加入“武装中立”同盟是不可饶恕的，这样就使英格兰有机会在宣战时假装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样的话，国王陛下的政府就避免了因向一个盟友宣战而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为敌的危险。现在英格兰可以说：“我们是在得知共和国已是沙皇陛下联盟的成员之前向它宣战的。”同时这也给叶卡捷琳娜一个机会——不再准许共和国加人联盟，因为后者已经“不再是一个中立国，而是参战国了”。

在这场外交游戏和接下去真正的战争中，英格兰各个方面都比共和国占优势。英格兰有一个真正的政府——目标明确的指引者。而共和国则是无政府状态，二十来个有权势的小人玩弄着小阴谋，只为自己眼前的利益考虑。

同一场风暴也耽搁了驶向尼德兰的邮船，那艘邮船本来要带来约瑟夫阁下马上离开海牙的命令。12月23日，他离开海牙前往奥斯坦德，没有人为此感到惋惜。尼德兰驻伦敦的大使则在这个职位上多干了一个星期。12月29日，他试着再次约见英国外交事务秘书，然而后者表示抱歉不能接见他。英国外交事务秘书交给那尼德兰人一篇临别致辞，阐述了他的观点。

他这样写道：“多年来，通过许多条约和联盟与英格兰紧

密联系起来的共和国，暗地里帮助英格兰的敌人，顽固地拒不履行由于上述条约的存在而有义务履行的事务，一直拒绝满足英格兰的愿望。最终共和国竟允许它的一个城市独掌整个国家的统治权，而三级会议总会既不能也不愿迫使这个城市遵从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条约的条款。”

尼德兰大使离开了伦敦，到了1781年年初，整个国家的人都知道，与英格兰的战争又要爆发了，这将是历史上第四次与英格兰作战。此时他们对这个消息有何感想呢?虽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人们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普遍地感到心满意足。毫无疑问，商人们知道在战争的开始阶段不能期望共和国取胜。但在尼德兰海军和陆军因缺乏准备而遭受的最初的失利之后，他们希望由于法兰西的援助和仍在不间断地为自由而战的北美殖民地的合作，将迫使英格兰接受停战条件。

民主党人把这当作是跟英格兰算账的机会而欢迎战争。犹豫不决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没有必要再耐心地忍受侮辱和伤害，而公开的战争将决断长期争吵的是非曲直。他们甚至在幻想中把共和国看作是人权的保卫者，虽说不列颠人以往背信弃义的行径逃过了上帝正义的怒火，但现在他们将受到惩罚。

但最感到欢欣鼓舞的要算摄政者们了。他们近些年的反英国政策实际上是针对执政的一场运动。国家的福利比起他们自己阶层的利益则算不了什么。他们预见到（实际上事情也是这个样子）一旦战争爆发，亲王完全没有精力来指挥作战，将在不重要的琐碎事情之中迷失方向，以至于不能着手做任何重要的事情。执政越是把海军的事务搞得一团糟（身为总司令他要承担责任），就越能提高摄政者的威信。

有史以来第一次，共和国的大多数民众不再完全站在奥伦治亲王一边。弗里斯兰执政们所属的那个拿骚家族分支的亲王们十足无能，他们在政治上无贤明可言，他们与人们打交道时

显得怯弱，他们愚蠢的傲慢使他们没法与最忠实的追随者友好相处，简而言之，他们平日的喜怒哀乐与民众毫不相干。所有这一切品性开始产生后果了。普通民众对那个著名家族成员的爱戴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他们将国家的独立和繁荣都归功于这个家族。此时他们的爱戴终于开始显现出减少的迹象。这些亲王坚持要与臣民之间保持一道永不消失的鸿沟，他们过着体面的生活，星期天上教堂，身边围绕着一群同等优越、愚笨和顽固的朝臣，教他们的孩子读《海德堡教理问答》[①]，带头在家里举行祈祷会，可这一切对国家又有什么益处呢？

那种只要奥伦治家族的亲王当政，就一切都很好的普遍感觉仍不易根绝。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更愿意听从威廉，而不想接受摄政者的命令。他们并没有冷落执政；是执政故意地冷落了他们。

当时一位善于无中生有的报界人士在文章中说，英格兰之所以向共和国开战是因为需要金钱。他这么解释道，经过许多年在世界各地的战争，这个国家已负债累累；税收很高，而税的增加则以不扰乱公众的生活为限；看起来已很难找到愿意借给英格兰新的贷款的人了；而一场与富裕的共和国的战争提供了摆脱困境的便利的方式。这个异想天开的故事即便没能给予战争真实的起因，也确实描绘出了它即时的效果。

英格兰在损害荷兰的情况下变得富裕起来。首先，在战争仍在进行的时候，英格兰无需支付尼德兰人投资其国债或私人企业的钱款的利息，这样就使尼德兰股票持有者损失了好几百万英镑。这笔钱现在由英国政府的财政留用或进入了英国制造商的口袋。

① 《海德堡教理问答》：基督教归正宗许多教会所采用的信仰纲领，撰写于1562年。

其次，英格兰通过在别人意想不到的时刻宣战，完全控制了北海和大西洋，这样便可以捕获到大部分尼德兰商船，后者只有在落人英国海盗的手中之后才会知道战争已经爆发。按照保险单上写明的，阿姆斯特丹在战争爆发之时有大约1500万荷兰盾投资于仍在外海的船只和货物；其他尼德兰城市所占的份额加起来大约达到5000万荷兰盾。这向我们显示了有多么大数目的资金前途未卜。

第三，英格兰现在可以彻底制止北美的走私贸易，使北美殖民地丧失其所有作战必需品的主要供应源。

最后，完全成为加勒比海主人的英国舰队便可占领它想占领的尼德兰殖民地，一旦战争停止可以借此要挟，迫使尼德兰租让这些殖民地。

驻伦敦的尼德兰大使反应迟缓，未能及时向本国政府通报事情的经过。在战争处于倒计时的时刻，他却花了几个星期才发出他的公务通报，因而想警告仍在北海的尼德兰舰队已是不可能了。在宣战之后的6天之内，有60艘尼德兰船只落入英国人手中。截止到2月1日，损失船只的数目超过200艘，其价值差不多相当于2500万荷兰盾。

此时共和国能仅以2.5%的利息借款1400万荷兰盾，并且可以授权海军部把在舰队服役者的报酬增加到50荷兰盾。但这一切都不会有太大效果。由于保证有2.5%的利息，借款马上就筹集到了，但即便是支付更高的报酬也找不到给战舰配备的水手。凡到外国港口寻求避难的尼德兰商船，都只好听天由命了。他们要么尽可能把货物卖个好价钱，闲着等待战争结束；要么把船卖给外国公司，从今以后飘着外国的旗帜航行。

沿海居民对旧时盛行的海盗行为的热衷似乎是不易根绝的，但此时共和国已对海盗行为明令禁止。在英格兰则是另一种情况，沿海地区的每个城镇和乡村都参与了捕捉尼德兰船只

的有利可图的营生。仅仅几个月，就有超过500艘的英国船在北海游弋，它们所造成的恐慌使尼德兰船只不敢冒险驶离马斯河或特塞尔的河道。

波罗的海的贸易完全终止了。原先有数千艘尼德兰船只通过松德海峡，而在交战的第一年，通过的船只记录在案的只有11艘。封锁是如此奏效，连西印度公司也没法有一艘船只通过，他们的一些船只也遭到捕获。其他船只及时接到了警告，沿着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北部海岸继续他们返回尼德兰的航行，并花上几年在挪威的港口避难。一个半世纪以来这是第一次，东印度公司没有举行定期的印度产品的拍卖。最终再也没有船从印度驶出，公司的产品烂在了仓库里。

东印度公司至少可以认为是值得庆幸的，它没有丧失在亚洲的殖民地。由于英格兰忙于在美洲争夺霸权，因而无力兼顾在印度的征战。而当时印度海德尔·阿里[1]的暴动，已牵制住了英国在当地的全部兵力。

然而西印度公司的日子就非常难过了。英国舰队的大部分汇集到中北美的海面。刚一宣战，英国政府立即传令给在加勒比海指挥的乔治·罗德尼[2]阁下，要他向尼德兰殖民地进军。这个命令于1781年1月27日由巴巴多斯传到了他那儿。3天以后，罗德尼统率他那由18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出现在马提尼克[3]的罗亚尔港附近。在这里他留下6艘战舰交给德雷克海军上将

---

① 海德尔·阿里（1722—1782）：印度迈索尔的穆斯林统治者和军队司令。1780年，他在卡尔纳蒂克击败英国军队，夺取阿尔果德。翌年在三次战役中战败。

② 乔治·罗德尼（约1718—1792）：英格兰海军上将，在对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海战中赢得几次重大胜利。

③ 马提尼克：法国海外省。位于加勒比海东部，为小安的列斯群岛中向风群岛的一个岛。

指挥，用于监视停泊在港口里的法国海军中队。在罗亚尔港，坚固的防御火炮构成了港口有效的防守。罗德尼率领其余战舰继续航行。

2月3日的清晨，由塞缪尔·胡德阁下指挥的先遣船队到达了圣尤斯塔修斯岛港口附近。这里的人不知道战争已经爆发，正准备以应有的礼节接待不受欢迎的英国客人。不过胡德没有上岸，而是等到下午罗德尼舰队的其他船只到达后一起包围了这个小岛。圣尤斯塔修斯岛港口原有一艘尼德兰战舰，舰上有36门炮，由弗里德里克·凡·拜兰特指挥。这位有经验的军官曾在和他同姓的路易斯·凡·拜兰特手下服役，经历过怀特岛附近的遭遇战。这天下午，凡·拜兰特派一位军官去见英国海军上将，正式表示欢迎，并表示愿意为他效劳。当时海军上将告诉荷兰人两国间的战争已经爆发，圣尤斯塔修斯岛必须立即投降。港口引为屏障的是一个叫做奥伦杰的古老要塞。这个要塞没有一门炮打得响，只配备了几个留在岛上领取养老金的老兵。在这种情况下，凡·拜兰特仍指挥他那艘战舰企图进行防卫，但立即被6艘英国战舰包围起来，它们数量上的优势迫使他缴械投降。

没遇到什么更大的麻烦，英国人就占领了这个岛，占有了岛上的一切。这块殖民地多年以来都是西印度公司名副其实的“金矿”，但该公司如此忽视这里的防守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罗德尼占据圣尤斯塔修斯岛之后，发现港口内有150艘船只，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船只。这些船上的2000名美国水手也成了阶下囚。港口成排的仓库里装有价值不少于4000万荷兰盾的货物，现在它们已为英国所有。罗德尼让尼德兰的旗帜继续在古老的要塞上飘扬。这样的话，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就会有一些尚不知发生了什么的船只毫无疑心地不断驶进这个港口当俘虏。

但战事还没有结束。英国海军上将登陆后听说在他到达之前，有 24 艘尼德兰船只（其中有 23 条商船和 1 艘护卫军舰）离开圣尤斯塔修斯岛驶回尼德兰，便马上派他的两艘最大的军舰去追赶。

尼德兰船只漫不经心地行驶着，英国军舰很快就赶上了它们。尼德兰舰长想进行自卫。不幸的是他的战舰设计上有问题，较低处的炮组根本不能使用，要是使用它们的话船就会同时沉没。尼德兰的司令一交战即被击毙，当时他还来不及换掉晨衣和拖鞋。战斗进行了 40 分钟，有一些伤亡，船开始下沉。于是尼德兰人降旗投降。23 条商船只有一条逃走了，其余的被带回了圣尤斯塔修斯岛。

这是战争的开始，可到战争结束时也未见战况有所改观。人们曾对“武装中立”寄予极大的期望，但现在证明它是完全不管用的。丹麦和瑞典倾向于帮助共和国，条件是俄罗斯也作出同样的允诺。但叶卡捷琳娜一点也不想为了只是把加入她的联盟当作最后避难所的尼德兰的利益开战。她愿意在英格兰和尼德兰之间进行调停，但由于战争开始于共和国真正加入“武装中立”联盟之前，她不能提出做任何别的事情。丹麦和瑞典随即表示它们不想干预，这样共和国就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了。曾迫使尼德兰陷入战争的法兰西，正集中全力使自己免受伤害，因而对共和国所遭受的苦难漠不关心。

以上这些事情发生（准确地说是 3 月 5 日）约一个月以后，才有由德·鲁克船长指挥的尼德兰军舰出现在西印度群岛，通知尼德兰殖民地的人，他们的祖国与英格兰之间的战争已经爆发。而此时德·鲁克所能做的就是立即返回，通知政府当局他们在美洲的绝大部分殖民地早已沦入英国人之手。准确地说，殖民地沦陷的时间是在他首次接到渡过大洋的命令之前。

在战争的最初六个月，尼德兰政府对英格兰最初的打击所造成的损害无力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被人为荒废的舰队，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得到修复。没有资金，没有木料，没有人管理。亲王日夜忙碌却毫无成果。当天发出的命令，第二天又被撤销。这场战争在军官和水手中丝毫不得人心，他们担心自己的船只被用作法国舰队的辅助分队。最多的时候是表现为水手的无能和军舰状态的无可救药，军官们以种种借口拒绝服从离港的命令。三级会议总会不断地抱怨舰队的消极态度，叫叫嚷嚷说那些为数不多的状态良好的军舰至少能把此时停泊在邻近外国港口的许多尼德兰船只带回国内。人们明白波罗的海贸易的断绝是一次重大打击，各方面都要求做点什么来保护装载大米和木料开往俄罗斯和瑞典的船只。

4月，亲王为了表现其良好的意愿，前往特塞尔岛与舰队的统帅们就作战和保护尼德兰贸易的最佳方式进行协商。结果还是没能做成什么。只有8艘小型战舰能够出海。5月以前不可能有足够的军舰实施成功的行动。

各方面的责难都落到了执政的身上。大城市的人口完全依赖贸易生活，因而苦不堪言。物价上涨，低于10%或12%的利率就难以贷到现款。鉴于所有这些苦难，为什么执政不叫舰队出海去把虽然为数不多、却非常需要的船只带回国?

这时阿姆斯特丹说了些维护他的话。执政不得不照料如此多的事情，以至于无法适当地处置他的许多工作。为什么不任命一个顾问班子以帮助阁下处理事务?这个计划由阿姆斯特丹在荷兰省三级会议的会议上提出，但绝对称不上是个新鲜的主意。许多年之前，本廷克就曾向安妮公主建议组成责任内阁。从那以后，这个建议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来。但好像不管是安妮公主还是她的儿子都不愿让别的人帮助他们。他们太多

疑了。他们宁愿留下无数的事情不做，也不愿与别的人共同履行职责。

该计划这次也未获实行。威廉不去任命一位海军部长或组成一个顾问班子行使同样的权利，而是自己做主和只听从布伦瑞克公爵给他的忠告。但这位顾问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由于公爵试图和各方面保持友好的关系，他逐渐失去了各方面的信任。在执政与阿姆斯特丹之间的争论中，他不敢劝执政给予阿姆斯特丹的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即便只是将后者作为促成国内安宁的牺牲品。他自己错过了机会，但由于阿姆斯特丹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他不能期望受到仁慈的对待。罢免他成为一场反执政运动的第一步骤。

在那些日子里，一场既反对某个个人也反对某个惯例的风暴的临近，总是由小册子数量的激增来宣告的。布伦瑞克公爵曾是国家最好的朋友，其有价值的服务怎么嘉奖都不过分，此时却成了“不受欢迎的公民”，“一个异己分子”。他通过自己与英格兰的友好关系，给他曾尽力效劳过的国家带来严重的危险，诸如此类，一下子沦落为最讨人厌的丑闻。然而公爵对这类谴责并不在意。虽然他在共和国难以找到别的朋友，但他仍能依靠亲王的信赖。亲王夫人极为由衷地厌烦公爵，但亲王违背她的意愿，不顾别人的反对去支持他原先的监护人。甚至在一次气氛严肃的会见中，当阿姆斯特丹通知威廉，只要布伦瑞克公爵仍是他的顾问，在执政与这个国内主要城市之间就不可能和睦相待时，亲王竟拒不听从。正相反，这一次他出于义愤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叫阿姆斯特丹的代表团哪儿来回哪儿去，并将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公爵。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争论不休的社团”，争论的焦点是：通过一个决议以罢免布伦瑞克公爵执政顾问的职务。阿姆斯特丹的争论，是由一本内容包括该

城市曾在亲王面前提出的罢免公爵的各项指控的小册子引起的。公爵印行一份辩护书作为回答，回敬阿姆斯特丹的指控。这个地方到处都在进行争论，这种表白或那种表白，以事实为根据的或缺乏事实根据的，争论进行得异常激烈。

亲王想向一直对他友善相待的人表示一次感激，此时却发现自己是两面受敌了。正当与英格兰的战争仍在继续，国家经济陷入困境之时，公民们咬牙切齿地彼此询问该拿这个在最近20年中受他们的允许在幕后操纵政治舞台的德国公爵怎么办。亲王和公爵试图通过他们所要求的由三级会议总会组织调查来公开反击阿姆斯特丹的指控。这是寄希望于在这个机构中亲王对乡村省份的影响能促成有利于公爵、对抗阿姆斯特丹的决议。但看来一些最为贵族化的省份，甚至包括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威廉的祖先一直在那里任执政的弗里斯兰，人们的想法正在发生变化。

三级会议总会开始进行调查，按照事情一般的程序，这事又被提交给各省的三级会议，这使得执政面临又一次失败。这时公爵意识到再争斗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便决定不再等待最后的决议出来。1782 年 3 月 24 日，他离开海牙去了他曾在那里驻防的博伊斯勒迪克。在那里他停留了好几年，仍抱着渺茫的希望，期待事态会朝有利于执政和他自己的方向发展。

现在，当政治丑闻竭力被公开抖搂出来的时候，战争又怎么样了呢?战争几乎被忘却了。人们不去与敌人战斗，更愿意与自己的执政斗争，而把英国人用作有利于自己的背景。确实，伴随着战争造成的流血和杀戮的情景，对亲王的攻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许多执政的敌人祈求这场与英国人的冲突能继续下去，以便他们能更好地与执政的权势作斗争。

作为这些自私自利的政治争吵中一个愉快的调剂，我们有必要提到美国驻共和国的第一任大使的到来。他受命取代了劳

伦斯。此时劳伦斯仍被关押在伦敦塔里，并倍受英国人关注。这位大使名叫约翰·亚当斯[1]，177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他于耶稣纪年1781年到达共和国。其身份颇有些尴尬，因为还只有弗里斯兰承认美国的独立，三级会议总会那时还未能这样做。但亚当斯作为心怀渴望的来访者，并未因名义而烦恼，而是立即为实施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开拓空间。他直接来到阿姆斯特丹，那正是他要找的共和国的所谓奢华之地，开始为大笔的美国贷款进行新的一轮鼓动。他起初并未获得多大成功。有关查尔斯顿城投降英军[2]和英军进犯佐治亚的消息刚传到共和国，弄得人们对殖民地人民的事业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看好了。正当尼德兰人被激烈的派系斗争和政治争论搞昏了头脑的时候，他们还不想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拿他们的钱去冒险。

前而多次提到的那位凡·德·卡佩伦男爵此时刚从岳母那里继承了一些钱，他愿意拿出几千美元去冒险。他也给朋友写信，请他们做同样的事情。但一考虑公债利息由何处出，他们便没了热情，亚当斯只好等到来年，等到殖民地的状况有了根本的转变，等到确定他们会得到独立和能支付他们合法的债务，以便向尼德兰商界证明给美国的贷款不再需要冒特别的风险。

在战争期间，英格兰不止一次地试图说服共和国缔结和约。它提出的条件尚可接受，说实在的，这些条件比衰弱的共

① 约翰·亚当斯（1735—1826）：美国第二任总统（1796至1801年）。曾参加《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1777年底，大陆会议指派前往法国，与富兰克林一起担任联合特使。1785年成为首任驻英国大使。华盛顿任总统时他任副总统。

② 查尔斯顿城投降英军：查尔斯顿为南卡罗来纳州历史名城，大西洋海岸主要港口之一。1780年5月12日，英将克林顿率军猛攻该城，美将本杰明·林肯被迫率守军5400余人投降。

和国有权利期待的要好多了。但每次英国派往共和国提议停战的秘密使者都碰了壁。摄政者们仍旧抱着法兰西会来援助他们的幻想。

威廉现在完全自行其是了，他仍在组织舰队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在没完没了的争论之后，终于集结了保护驶往波罗的海商船的一支小型海军中队。1781 年 7 月 20 日，这支由 7 艘各装有 24 门或 26 门炮的战舰组成的舰队，在祖特曼的统率下，护送着驶往北部港口的 71 条商船离开了特塞尔岛。8 月 5 日，它在多格滩[①]遇到了保护刚离开波罗的海的 200 艘英国商船回国的一支英国舰队。英国舰队的司令是海德·帕克。两支舰队的舰船数量相同，但英国战舰的吨位要比尼德兰战舰大得多，前者每艘船装有 40 至 80 门炮。在这场战斗中，尼德兰水手表现得非常英勇，并非总是处于下风。所有的商船都逃避了战火。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双方的舰队都伤亡惨重，以至次日无力再战。它们各自驶向附近的港口。尼德兰一方损失了 142 人和 1 艘战舰，403 人受伤。英国一方伤亡人数与尼德兰差不多，但没有损失战舰。祖特曼的战斗在共和国引起空前的欢乐。他的部下在公开的战斗中抵抗了占极大优势的敌人。热情的浪潮传遍了全国，它表现在对英勇的祖先幽灵的爱国主义颂歌里，表现在给真正参加这场战斗的水手的剑和勋章之类的奖品里，表现在为那些为国捐躯者举行的庄严的葬礼上。连亲王也得到了一些赞美。然而就实际成果而言，这场战斗算不了什么。尼德兰战舰处于如此无能的状态，以至于在两个星期之后，当祖特曼最终回到特塞尔岛的时候，有证据表明至少在那一年，舰队没法再离港远航了。非常小的一点荣耀成为商船队没法进入波罗的海的惟一的安慰。

① 多格滩：北海孤立的大沙洲。距英国东北岸 60 英里。

可几个星期以后，人们又恢复了惯常的做法。英雄们刚被捧到了天上，又被拖回到了地上。这次共和国遇到的麻烦来自完全不同的地区。正当罢免布伦瑞克公爵的喧嚣处于高潮的时候，共和国很荣幸地接受了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1]的来访。约瑟夫刚对他的比利时省份进行了国事访问，他化名法尔肯斯特恩伯爵走遍共和国作了一次短期的考察性旅行。共和国邀请他观看如何“洗烫”政治的“亚麻布”，而约瑟夫很快就看出这些联合省份完全构成不了威胁。因此，他一回到国内就遍知尼德兰三级会议总会，“屏障”已不复存在。“屏障”包括沿着法国边界的一些防御工事，自1715年起，尼德兰军队为了保护荷兰抵抗法国的未来的入侵，占据了这些防御工事。但这个初衷几乎已被忘却，眼下共和国和法兰西成了亲密的朋友，这些防御工事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它们的防守很松懈，防御工事已变成母牛吃草的牧场和漂白布料的地方，为节省起见，多年来它们已渐渐荒废了。约瑟夫认为在比利时的土地上驻扎这些尼德兰军队，是对他个人创建的荣誉的侮辱。于是他突然光临这些防御工事，把尼德兰军队赶回家，毁掉了堡垒，未作任何解释就宣布废除了“屏障”。由于没有可能的补救方法，三级会议总会只好尽力承受这不可避免的事件。令他们感到一些安慰的是，奥地利皇帝并未同时决定开放斯海尔德河[2]。开放这条河流几乎每时每刻都是足以令他们忧虑的事情。

对于英国战争余下的情况，我们将说得非常简短。除了多格滩的那次遭遇，在外海再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在尼德兰贸易遭受可怕的打击时，汉堡、不来梅和一些斯堪的纳维

---

① 约瑟夫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年在位）。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娅之子。

② 斯海尔德河：西欧河流。源出法国北部，经比利时，在荷兰境内注入北海。奥地利皇帝若开放这条河流，荷兰本来脆弱的防守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亚的城市趁机占据了尼德兰商人空出的位置。以如此重大的牺牲换来的与法兰西的友谊，共和国付出很大的代价却没带来什么收益。1782 年 9 月，一个法国和尼德兰舰队联合行动的计划出台了，尼德兰舰队将去布雷斯特与法国舰队会合。但尼德兰军官又出来反对这个计划，他们担心会受一位法国海军上将的指挥，便为自己找了一些借口，拖延出发远征的时间(一些主要军官甚至请了很长时间的假)：诸如战舰没有作好准备，船上人员未受过训练，又是暴风雨频发的天气，或者风力实在太小了，等等等等。12 月，舰队仍停泊在特塞尔的锚地。法国和尼德兰舰队的联合行动未能付诸实施。这番经历引起了法兰西的极大不满，从此以后便对不够意思的尼德兰朋友的愿望不闻不问，1783 年与英格兰缔结和约也不在乎共和国的意见。

7 个月以后，英格兰承认了北美殖民地的独立。由于期望在英格兰和美国的对抗中获益，也由于一向对英格兰怀有敌意，美国革命的这个结局带给共和国的只能是失望。1782 年 4 月 19 日，三级会议总会承认亚当斯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大使，同时任命了尼德兰驻美国的大使。首位获得这个光荣职位的是皮埃特尔·约翰·伯克尔，阿姆斯特丹市政顾问的兄弟。

当初那个商业条约不幸被揭露出来，曾引起人们极端激动的情绪，并成为英国战争的直接起因。它于 1782 年 10 月得到正式批准。亚当斯最终担保了 500 万荷兰盾的贷款，离开共和国前往马赛，作为美国代表团的一员，参加当时正在进行的英格兰与殖民地之间的和平谈判。

至于商业条约，它并未取得任何人们曾经希望的结果。人们曾经希望美国会与其先前的敌人中断贸易，会给予那些曾经支持过它的欧洲国家优惠关税。现在证明这种希望完全落空了。美国和英格兰的通商在战后继续保持，因为它们之间的贸

易已持续了几个世纪了。阿姆斯特丹的金钱市场继续对美国人有极大的吸引力。但当尼德兰的资本家发现这个新的共和国在债权人的义务方面想法古怪，这使他们在给予新的贷款时就变得非常不情愿。他们更愿意投资那些不像美国那样不断威胁要取消他们的合理债务的国家。

1783 年 9 月 3 日，美国与英格兰之间缔结了和约。共和国此时享有某些极端的爱国者曾经希望的荣耀——孤单单地与英格兰作战。事实上它在周边地区也付出了代价。在它最终于 1784 年 5 月 20 日与英格兰缔结和约之前，它曾卷入与邻居约瑟夫二世的新的麻烦之中。

1783 年秋天，未经预先的宣战，奥地利军队进攻并占领了斯海尔德河河口的尼德兰防御工事，把那里的尼德兰军队打发回家。三级会议总会一方提出的正式抗议没有结果，而且约瑟夫准备为日常的航海开放斯海尔德河。就在共和国与英格兰签订和约的同一个月，约瑟夫向共和国递交了列满了要求的长长的单子。人们发现与共和国完全和平相处的奥地利皇帝提出的要求，比战胜国英格兰提出的要求要多得多。他不仅想要开放斯海尔德河实际的收益，而且还想要林堡的一块地方——马斯特里赫特城[①]，以及 200 万荷兰盾。所有这些要求都只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即奥地利拥有军队，它有军队就可以强迫别人接受这些要求，而共和国则是完全不设防。约瑟夫是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个讲求实惠的理想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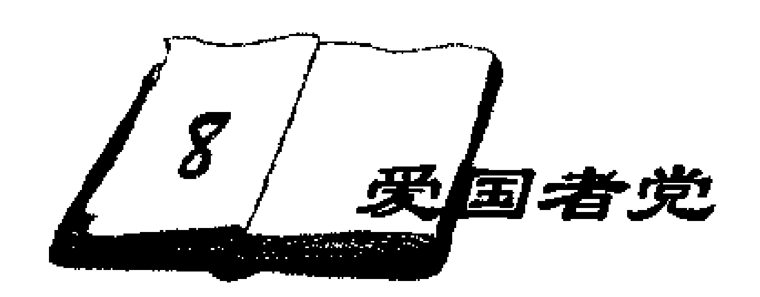
在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处境中，共和国被迫向别处寻求帮助。正当约瑟夫在尼德兰边界集结 4 万士兵的时候，共和国同

① 马斯特里赫特城：今荷兰林堡省省会。位于朱丽安娜、列日 – 马斯特里赫特和南威廉斯 3 条运河汇入马斯河处。历史上曾多次被西班牙和法国占领，并遭比利时人的侵犯。

意接受法兰西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以回报它的友谊和良好愿望。900万荷兰盾的现款（法兰西许诺支付其中的一半）不是个小数目，约瑟夫接受了贿赂，便放弃了为数众多的各项要求。

与英格兰缔结和约一年后，共和国签订了与法兰西亲睦的攻守条约。一旦发生战争，共和国有义务以一支9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和6000名士兵支援法兰西。法兰西也将以8艘军舰和18000名士兵履行同样的义务。

摄政者和民主主义者终于得到了他们曾倾全力追求并热盼的东西。执政和他那由于传统原因支持英格兰的派别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的与英格兰的友好政策，此时明确地被放弃了。从此以后，共和国出于自己的意愿，将与强大的法国共命运。它为这个错误付出了政治上完全覆灭的代价，这个错误造成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萧条时期——这种萧条直到上一代人生活的时代才让位于原有的理智和商业活动的复兴。



8 爱国者党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简短地描述了 1775 至 1784 年间共和国的外交事务，提到了一些外部事件——它们直接导致了共和国商业最终的毁灭和那种把自己当作重要政治力量的自负的终结。我们也曾想表明从那时起，共和国惟一能激发起邻国热心的就是它作为借贷者的殷实和那永不枯竭的财力。共和国历史中其他的基本事实是很简单明了的：

1. 执政是不称职的。

2. 在英国战争期间，摄政者和所有那些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反对执政的人组成一个政党，这个政党被称做“爱国者党”。

3. 这个反对党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在英国战争结束的时候，执政的势力至少在主要的省份里已在实质上被削弱。

4. 执政被迫离开海牙，退隐到不太重要的偏远省份。

5. 执政刚一离开，爱国者党的不同派别就因为分赃而争

斗得你死我活。

6. 因此他们无力抵抗普鲁士国王[①]的军队。后者凭借武力重建国王陛下的妹夫[②]作为世袭执政的原有的权力和特权。

7. 这场复位引发了不可避免的连锁反应。

8. 爱国者党的极左翼此时已变得极其激进，致使极右翼被迫去与执政合作。

9. 由于执政愿意接受由外国势力插手而获得的拯救，爱国者党做同样的事情也并不感到内疚。

10. 在普鲁士人促成这场复位之后，法国人则引发了一场革命。

这些事情众所周知，其结局也非常简单。我的任务是叙述什么引发了这些事件和它们是在什么境况下发生的。我们必须承认这并不容易。绝大多数参与发生于1780至1795年间事件的人都没有留下回忆录。他们活着看到了由于他们自己缺乏政治上的明智，致使不幸的岁月降临他们的国家，而且他们不想让后代准确地知道他们是如何造成自己的祖国灭亡的。他们的信函要么丢失了，要么被故意毁掉了，因此能搜集到的信件不多。荷兰历史学会以其出色的工作将它们编辑起来，但它们并没能告诉我们最想知道的事情。

留给我们的还有当时的报纸和小册子。这两股信息源泉相当丰富，但它们是如此鱼龙混杂，如此受到强烈的派性情绪的污染，以至于我们在能够从中受益之前必须将它们蒸馏和消毒许多次。

---

①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于1786年8月17日去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即位。同年，威廉五世被迫离开海牙，其夫人也被禁止进入荷兰省。普鲁士国王派兵干涉，阿姆斯特丹抵抗不过只好投降。普鲁士军队开进海牙，重新扶起执政，并和英国一起保证他的职权。

② 威廉五世的妻子威廉明娜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妹妹。

威廉五世住在海牙，日子过得很不错。自从最早的执政在代尔夫特定居以来，奥伦治家族就事事顺利。杰出人物“沉默者威廉”在征用的修道院四壁萧然的房间里宿营，而且欠了许多债，经常不知道去哪儿弄到日常必需品。威廉五世则以贵族的派头，住在海牙宾尼霍夫[①]舒服的宅第里，饮食极为丰盛。

奥伦治家族一向特别缺乏创造性的天赋。不管是国家的管理还是他们新建造或长期使用的建筑物，都具有同样的性质。他们就共和国国内政治所付出的努力不过是些东拼西凑的货色。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某一时刻仓促地拼凑这类法规，却从不致力于将复杂而无用的共和国政府机构重新构造成某种令人满意的体制。

他们对具体种类的建造也从没有任何兴趣，比如对用砖块和灰泥建成的房屋。没听说他们建过某个自成一体的新王宫成任何造型的大厦。他们更愿意占据现成的房屋，修修补补以适合他们这样身份的人居住。

威廉五世在海牙的住处是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不同风格和不同时期建筑的大杂烩。小房间是由大房间加隔墙分隔而成的，而大房间又是将小房间之间的墙推倒而形成的。室内按时髦的风格装饰。威廉像其家族成员那样缺乏品味，把他所拥有的任何值钱的东西都保存在一个单独的博物馆里。我们实在搞不清楚奥伦治亲王们怎么能接触到如此庞大的画家军团，后者的名字在门外汉那里享有在这个小国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声誉。

执政们用来装饰他们宫殿的这类艺术作品，都是他们从国外订购的。伦勃朗在其漫长一生中较得意的时期曾与作为统治者的执政有所接触，但对执政的情况根本谈不上了解。他亲身体验到的无非是从执政阁下那里讨回拖欠的钱有多么困难。这

① 宾尼霍夫：意为“内院”，为海牙城市的核心部分。

类此一时或彼一时归执政们所有的绘画，在 19 世纪被他们的后代大批地出卖。

除了在海牙有一所府第，威廉五世还在各省的首府拥有好几处房屋。特别是在奈福亨，他在这个城市具有很强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共和国的末日。他也保留了一些避暑的行宫，其中最有名的是坐落在格尔德兰省的“卢”宅。它在威廉三世的时代开始出名。威廉三世把它从简陋的狩猎窝棚改造成适合居住的宫殿。这位亲王还在吕伐登拥有以往执政们住的旧宫殿。

执政通常住在海牙，只在某些国内行政事务必须要到场时，才走访其他的省份。海牙是一座令人愉快的小城，在爱国者党惹出麻烦之前，威廉在那儿过得相当舒服。假如他想逃避城市并不太大的喧嚣声，他可以驾车出城到属于他的丛林别墅，将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开。

不过威廉不是隐士。他喜欢人们围绕在他的周围，然后冷眼旁观。伺候沉默者威廉的是他的卫兵，他们同时行使管家和侍者的职责。威廉五世享受着全套的、最高级别的王室待遇：上至寝室级别高低不等的侍从官，下至级别高低不等的厨师，体现了从属于一个编制完备的宫廷的官员等级制度。级别较低的官员绝大多数是外国人。地位较高的是荷兰人，他们要么属于旧贵族，要么属于长期以来已为宫廷所乐于接受的家族。由于他们中没有谁曾在共和国历史上起过任何作用，我们没有必要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点缀着宫廷，却又是令人乏味的一群。亲王和他的宫廷彼此就像盒子里的豌豆一样滚作一堆，至于小盒子外面发生了什么，他们一无所知。

存在于盎格鲁 - 撒克逊国家的社交生活，在尼德兰共和国从未听说过。在海牙，外国使节们保持着某种社交，但荷兰人很少参加进去。随便聊聊会使他们阴沉的心灵不舒坦。执政的

宫廷从来不像其他国家的统治者的宫廷那样是娱乐中心。不多的几次官方舞会和晚会构成了整年的娱乐活动。受邀请参加这些聚会的人无一例外地属于极端保守、极端受尊敬和极端乏味的社会阶层。

极端复杂的尼德兰社会中其他层次的人（商人就更不用提了），在执政的宫廷里是看不到的。这些人被认为是不懂如何用叉子吃饭、不懂如何穿着打扮。最接近执政的是那种无聊之至的人。年老的普鲁士女管家冯·丹克尔曼男爵夫人受弗里德里希国王之命到荷兰负责照看公主。有一次，她遇到一个孤单单地游荡于“卢”宅的人，这位先生极为无聊。男爵夫人对同伴说：“看那个人，他一定是我们的朋友。”

执政是个非常忙碌的人。有一帮秘书帮助他处理信函和急件，但就像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他喜欢什么事都亲自过问，把一天的许多时间都花费在完全无效的工作上。

中午吃饭之前，他常常外出视察他的卫队。其实，威廉一世的安全保卫非常松懈，在他的住处谋杀他并非难事[1]。威廉五世未受到任何具体的生命威胁，却像其他每个好表现的君主那样保留了一支卫队，并非常引以为荣。他太喜欢在卫兵制服的细节上大惊小怪了，这儿换一粒纽扣，那儿换一枚帽章，乐此不疲。

每天对卫队的视察堪称海牙的一个景观，聚集了亲王住宅尊贵的来客和亲王党的乌合之众。视察后的午餐也是乏味的事情。总有几个知名人士、某个来访的政治代表团或当天布道的牧师一同进餐。亲王吃得很多，吃完饭按惯例总要睡一觉。当天余下的时间用于处理各种工作或到丛林中游玩。人夜后，大

---

① 指1584年7月10日“沉默者”威廉在代尔夫特自己的寓所遭刺客枪击，重伤而亡。

家便都闭门不出了。

海牙有法国歌剧演出，但水平低劣。音乐嘛，除了外国音乐家的偶尔表演就非常少见了。海牙没有上演尼德兰戏剧的剧院。不仅是因为戏剧舞台总是不断遭受国教教会[①]的攻击，而且还因为在18世纪的这个阶段，尼德兰语言在有教养的人的圈子里不再被认为是符合时尚的，显贵人士只对仆人用这种语言。在上流社会人们讲法语。他们孩子的家庭教师讲的则是德语。

无论亲王在哪个省，情况都是非常相似的。每个省都有几个按惯例被邀请来共进午餐的家族，其首要人物在亲王的宫廷里通常享有荣誉地位。执政是从不与他的小圈子以外的人会面的，更不能听取没什么社会地位的寻常百姓的意见。

公主受到了所有认识她的人的尊敬，但她并不具有令人爱慕的个性。她倾其全力想把有力量和有个性的人聚集到她丈夫的周围，但她好像总找不对人。她对待不属于自己小圈子中的人的骄傲自大和生硬态度，吓跑了许多有才之人。一般情况下，处于执政宫廷小圈子以外的人，由于不能忍受无故的侮辱，宁愿选择呆在家里。

在那些与执政关系密切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的才干、个性或精力能超出平庸之上，这是这段可悲历史中的一个可悲的事实。本廷克家族由于在威廉三世的时代颇受奥伦治家族的青睐，此时仍继续充当阁下身边顾问的角色。老本廷克·凡·卢恩曾为威廉四世和安妮公主服务，没有人对他的费神费力表示一点感激，当然他已经死了。他的孙子威廉·弗里德里希·古斯塔夫斯正想保留其奥伦治党首领的地位。但因为这年轻人欠了许多债，本人具有非常容易失控和鲁莽的性格，而且在与政

---

① 国教教会：指当时在尼德兰被奉为国教的基督教加尔文教派。

治有关的事情上都具有坚定的封建观念，所以完全不胜任他要担任的角色。

拥护执政党派首领的另一个人选是荷兰大议长凡·布里斯威克。不过这位老绅士却经常地为自己的失信而产生负罪感，并竭力想与任何人保持友好关系，因而所有的人都不信任他。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领袖人物。当城市的麻烦到了不能再糟的地步，爱国者党年轻的领袖之一、某个叫皮埃特尔·保卢斯的人，一度出现在公主的顾问班子里，他许诺充当几年之后米拉波[①]在法国大革命中所充当的角色。他是个才华出众的人物，他看出他的党派所遵循的道路以后将导致灾难。他一度愿意试着克服将执政与爱国者党隔开的障碍。但他与奥伦治党的谈判毫无结果，而且发生了普鲁士人参与的复位，这破坏了所有其他的计划。

关于领袖就说这么多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仍然追随亲王、信奉执政至上制度的人们。正像我们刚才说过的，每个省份都有一些尊贵家族，他们由于传统和习惯而成为奥伦治亲王的支持者。再说说陆军和海军。官兵们从摄政者那里已难以期待什么了，因为摄政者讨厌陆军和海军，把它们视为代价昂贵却无效益可言的组织。官兵们的利益取决于亲王，亲王是惟一可能需要他们并因此愿意善待他们的人。但陆军和海军都处于极端声名狼藉的状况，此时它们的支持无甚意义。我们还必须提到国教的牧师。由于利益都归了国教教会，其他教派在分享利益方面受到排斥，处于各方包围中的牧师一直感到与执政紧密联合的力量所在，执政是共和国惟一能支持他们抵抗敌人的

①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初期统治国家的国民议会中杰出的演说家和富有才智的政治家。他愿意成为代表法国国民向国王发言的喉舌，却并不赞成国民议会废除封建制度。他曾充当路易十六和王后的秘密顾问。

力量。作为对这种支持的回报，他们特意向会众宣讲仆人应对主人顺从的福音，强调臣仆承担着服从上帝挑选的统治者的义务。当灾难最终来临时，他们至少有勇气忠实于亲王党。当这种行为要使个人冒生命危险和使家庭遭受许多骚扰时，只有为数极少的人仍在支持执政，这样的人中有不少是牧师。

不过支持执政的巨大力量存在于社会较低的阶层。群众，一般人，普通人，他们通常过于把精力用于如何保持收支平衡这样的眼前困难，以至于不能为政治事务操心。没有人关心他们，他们也不在乎有没有人关心他们。他们分享国家管理权的期望，并不比现在家养的母牛想在农村议会中争得发言权更为迫切。只有当由于当权党派的失误造成他们收人的来源断流时，他们才会意识到统治他们的政府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往往竭尽全力，通常受为了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目的的人向他们提供的足量的白兰地的影响，常常冲到市政厅要求改变既定政策。一旦对政府施加了足够的压力促成了所期望的改变，繁荣景象又回来的时候，他们非常乐意重新去做他们卑贱的活计，将政务方面的困难问题留给上头的人去处理。他们直接的主人是摄政者们。摄政者们是从来不受下属们欢迎的。

亲王的有利条件在于，他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远远地生活在海牙与世人隔绝的神秘人物。因为他有时候甚至能撤换全能的摄政者，使人们以为他权力广大。由于他从不损害普通人，而且经常给他们好处，民众本能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他，甚至直到国家末日来临都以极大的忠诚支持他。因为缺乏政治方面的智慧，他们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但没有威廉的引导，他们为他的利益所做的努力从未取得任何成功。对可以算作是执政支持者的人们的情况列举到此结束。总之，亲王党由陆军、海军、国教牧师和普通民众组成。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构成对立面的爱国者党的不同成分。这

里我们要做的远比前面要困难得多。

我们必须立即抛弃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构成的概念。在过去的时代，由于执政与摄政者彼此对立，这个国家笼统地被分为两个党派，其中一个是当政的，另一个企图当政。但总的来说，没有一个党派代表了民众。然而在18世纪稍后的时期，反抗执政的不再只是那些也想拥有最高权力和种种特权的人们，而是相当多的政党、小帮派和个人，所有这些人都有其特定的理由希望能插手统治他们的政府。

在每个单独的省份、在每个不同的城市，甚至在某些较大的乡村，我们将发现有的个人和小团体在极为不同的动机的激发下，先是反对执政，后来又反对摄政者。

阿姆斯特丹在反执政的运动中起着主要作用，无疑这首先是由于它的经济实力。荷兰的其他大多数城市，特别是该省北部的那些城市，在许多方面都依赖阿姆斯特丹，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在省三级会议的会议上反对它。阿姆斯特丹首先反对的是传统上与英格兰友好的政策，而它鼓动的最主要内容就是与法兰西结盟。又是阿姆斯特丹，为它自己的利益打算，在共和国承认美国的独立之前就开始与美国谈判。

在所有的国内政治事务中，这个城市的政府已习惯于按凡事都用钱来买通的目空一切的方式行事。这个城市在许多方面远远走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前头，并因为这些地方跟不上它的速度而恼火，而且它没有丝毫同祖同宗的感觉，只知道独自往前走而不把邻居们放在眼里。假如其他地方不赞同阿姆斯特丹的行动，对其他地方来说情况会更糟。在荷兰三级会议就像在三级会议总会，阿姆斯特丹在所有事情上的表现就像它只知道自己的利益而不知道还有别的法律。该城市的发言人是市政务顾问凡·伯克尔，这个曾经违反法律的人在婚姻方面却很得意，由于妻子将大笔的钱供他随意支配和受到阿姆斯特丹一位市长

的保护，他的一生真可谓飞黄腾达。

阿姆斯特丹对执政的行为常常是带有极大侮辱性的。在与亲王的直接交往中，阿姆斯特丹的摄政者经常操着专横无礼的腔调。

阿姆斯特丹的中产阶层只是逐渐被拉入反执政的阵营的。他们就像其他地方的同类公民，对统治他们、向他们征税的政府没有丝毫的影响。他们付钱并服从坐在市政厅里的“大人”。出于对政治生活的不断增长的兴趣，中产阶层开始形成争论不休的社团，在他们的聚会场所，他们谈论自己不满的各种理由。由于执政没有表现出支持他们的事业的愿望，他们便相当自然地被迫进入反对派的阵营。摄政者对此持欢迎的态度，在他们与亲王的斗争中欢迎任何人加盟。

阿姆斯特丹的第四等级就像其他地方的民众一样，都是过于亲执政的分子。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从贫民窟中起来捍卫他们的亲王，因此招惹了大人先生们的不快。这些大人先生是他们严厉的主人，能当即判决一个人是该吊死在城市法庭的窗户外面，还是只该遭受一顿鞭打。

在发生爱国者党人骚乱的日子里，这些穷人仍然忠实于亲王。他们首先要听命于他们的主人——摄政者，后来他们还曾受到爱国者党的城市民兵的惊吓；而当执政复位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他们受允许破门闯入所有曾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人家。最后，法国大革命扰乱了整个现存的秩序，普通民众与他们上面的所有那些高雅的绅士都接过了波拿巴先生的衣钵，并有机会证明他们是否比忍受先前的主人更愿意忍受西班牙或俄罗斯的时尚。

在鹿特丹这个第二大城市，情况就有点不同了。由于其特别的境况和容纳了许多英国和苏格兰的侨民，鹿特丹一向与英格兰关系密切。该城市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阻止与英格兰的战

争，并且与别的城市一样被拖入了爱国者党运动。但这里的摄政者不同于阿姆斯特丹的同僚，他们反对执政不是出于个人恩怨。

保卢斯是一位爱国者党人，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他曾企图在他的党派与亲王的支持者之间达成一种谅解。此时他身为马斯河海军部的负责人住在鹿特丹。鹿特丹的中产阶层都是爱国者党人，他们读过卢梭，议论过孟德斯鸠[1]，在他们爱国者党人俱乐部聚会，为了日后的荣耀以极大的热忱受训、行军，捍卫他们城市的自由。下层的人则拥有对奥伦治家族最为热忱的爱，如果说在共和国有一个地方，在那里亲王比他在自己的宫廷更受欢迎，那就是善良的鹿特丹城的鱼市了。

哈勒姆城和多德雷赫特城所显现的情况与鹿特丹非常相像。上层和中层是反执政的，下层则是执政的朋友。较小的城市只是听从大城市的指令，它们都与一种不断增长的反抗精神保持一致，只要是来自执政那一边的，不管是好是坏都加以反对。代尔夫特则是一个例外，它长期以来都是执政的居住地。在泽兰省，身为韦尔和弗利辛根侯爵的亲王一直保持着某种影响力，不幸的是，威廉在该省三级会议的代表是个相当傻的家伙。不过他在泽兰的摄政者中，受到由能干的人组成的规模虽小却很重要的党派的支持。这个省追随爱国者党的中产阶层因而不能与摄政者携手一致。在省三级会议里，三个城市仍站在执政一边，它们连同亲王的代表，得票数要多于其他三个听从荷兰省指令、支持爱国者党人计划的城市。

在乌得勒支省，反执政的倾向相当普遍。该省的省会乌得勒支城，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它地处国家中心，产业兴隆，又

① 孟德斯鸠（1689—1755）：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他所著《论法的精神》是政治理论史和法学史上一部巨著。

有一所优秀的大学，使乌得勒支人也许更了解一点时事，并对此较他们的农民同胞具有更为理性的兴趣。自从 1674 年法国人撤离乌得勒支，乌得勒支作为被征服的地区再次加入联盟，该城市就在臭名昭著的“管束”下遭受苦难。威廉三世为了牢固建立自己的权威而把所谓“管束”强加给这个城市，并使执政成为市政府实际的主人。因此对这个城市的社会各阶层而言，执政是最不受欢迎的官员。

接下去要说到的省份是格尔德兰，那里的人分为许多不同的党派。在这个省，执政由于拥有绝对的任命权而在城市具有极大的影响。不过在格尔德兰，有土地的乡绅形成一个大的阶层，他们既不受执政控制也不受摄政者支配。在凡·德·卡佩伦家族的领导下，这些人跻身最早采用流行的现代观念的人的行列，因此他们是反对执政的，他们认为执政在他们省的权力绝对是太大了。不久城市里的中产阶层也加入他们的阵营，中产阶层因执政和他的副手的错误任命而吃尽了苦头。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只有那些执政经常留驻的城市才对执政表现出好感。与这位比其他人家里吃掉更多糖和面包、用掉更多蜡烛、有更多的马需要钉蹄铁的显贵对立，岂不是要造成那些城市商人钱袋的直接损失！因此当他们为亲王再次回来留驻在他们中间而欢呼时，我们根本就不能责怪他们。

格尔德兰的大部分人口保留了他们对天主教会的信仰。这些人与不信国教的新教徒一样反对执政，因为借助于执政的权势，他们的敌人对共和国里不属于国教的教派维持严重的歧视。

在奥弗赖塞尔省，反对执政的主要是大城市和一些贵族。正是在奥弗赖塞尔省的三级会议，我们的朋友凡·德·卡佩伦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发表的热情洋溢的演说使自己一举成名。但他没法在该省的三级会议中得到一个位置，因为他的家族属

于格尔德兰。因此他在奥弗赖塞尔租了名义上的住处，两年以后他便能在奥弗赖塞尔省的三级会议中获得一个席位。

德伦特省[1]不算在内。该省人口稀少，非常贫困，虽说允许它支付它那一份儿共和国的费用，但它在三级会议总会中从没有代表权。

在格罗宁根，持续了一个世纪的乡村与城市的争吵仍在继续。城市是爱国者党人的中心，那里有一所风行自由主义思潮的大学和一帮开明的教授。乡村是奥伦治党人的控制区。然而城里人的票数要多于来自乡村的成员。而当威廉不明智地卷人一场争论时(当时牧师们对一位无视正统观念的格罗宁根教授大肆攻击，威廉对牧师表示了支持)，他在城市的最后一点威信也荡然无存了。

弗里斯兰基本上是务农的乡村。大部分农民是在政府管理中占一份子的自由人，除了个别的例外，他们对爱国者党人的新观念没什么好感。不过爱国者党人在城市很有代表性，其行列中有一些非常能干和精力非常旺盛的年轻人。后者遵循凡·德·卡佩伦和他的朋友们所宣讲的民主教义的总路线，激烈地反对亲王。

居住在共和国的许多犹太人分成了两派。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家族坚决主张贵族政治，站在亲王一边。其他对政治感兴趣的人，程度不同地接受最为极端的现代观点。

现在我们意识到，这段简短的描述并不像我们本该希望的那么一清二楚。问题是出奇地复杂。在发生爱国者党人骚乱的岁月里，各形各色的人物浮起在波涛起伏的政治海洋的水面，扮演他们微不足道的角色，随后又消失了。相当多的以往只关

① 德伦特省：今荷兰东北部省份。1796年取得省级地位。

心他们在交易所的声誉的公民，人们却发现他们出版了用最低层次的激烈言辞写就的小册子。

多年来，牧师们以极其虔诚的责任感尽力满足忠实的信徒，此时却突然放弃了他们的信徒、妻子、孩子和名誉，着手训练店家的伙计和理发铺的学徒，以便他们能有力量保护他们的人权不受暴君的侵犯。

摄政者的自高自大和傲慢无礼是众所周知的，现在人们却看到他们与遭轻视的下等阶层的成员亲密无间，公开接待那些一年以前除了后门还不允许进入家门的人们。

所有的固有观念，所有以往的利益分配，好像都暂时没了踪影。多年来彼此关系极为亲密友好的家族，突然停止了交往。同一家族的成员在那个时代的黄色报刊上愤怒地互相攻击，这对他们所属的这个不善于动感情的民族来说是难以想像的。

那些人今天是反对派，明天就是政府当局，后天又成了反动分子。这个星期的人权捍卫者，下个星期就成了打击人类自由的暴君。如此这般，整整 15 年都是如此。15 年间国家呈现出的十足混乱的局面一直令人羞愧。

爱国者党人计划的第一部分包含了所有心怀不满分子对亲王的联合攻击，因为后者应对尼德兰舰队在与英国人交战中的惨败负责。正像我们在前一章里简要地提到的，这场攻击在直接指向执政的同时，也特别指向布伦瑞克公爵。公爵在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中坚持不了了，被迫离开亲王的宫廷，隐退到了博伊斯勒迪克。这是反对派的第一个伟大的胜利，他们为此感到自豪不已。

在这样的境况下，反对派和其领导者——阿姆斯特丹为 1781 年 3 月传播开的一则消息极度恼火就不足为怪了。依照这则消息，新出版的一本小册于以非常严厉的言辞谴责阿姆斯

特丹在与英格兰的战争爆发前夕的行为。这个传闻是真实的。小册子确实存在，它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每本书现货交易时付的银子与书的重量相等。假如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普通卖文为生的小文人，阿姆斯特丹就不会被这消息搞得焦虑不安。但这次攻击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来自以前乌得勒支大学的“神童”——凡·戈恩斯教授。

里克劳夫·米基尔·凡·戈恩斯生来属于乌得勒支城的统治阶层。他母亲是个英国人，是驻荷兰的苏格兰旅的一位军官的女儿。她儿子受的教育一半是荷兰人的，一半是英国人的。凡·戈恩斯更愿意当个英国人，他为由于父亲的原因不得不呆在令他许多出众的才华得不到赏识的国家而感到懊丧。他少年时期即开始探究通常适合于年龄较大孩子的各种各样的学问，17 岁时他被授予乌得勒支大学教授的职位。他被当作格劳秀斯[①]的继承者受到人们的欢呼。格劳秀斯也是在别的男孩学着抽烟斗的时候，将其空闲时间都用在写作拉丁语和希腊语诗歌上而。

18 岁的时候，凡·戈恩斯已显现出极端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状，但他仍在所住城市的大学中教授历史、古典作家、修辞学和希腊语言学。10 年间，他教的学生两倍于他的年龄，此时 28 岁的他已变成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利己主义者。他搜集图书建立了一个著名的图书馆，编辑了许多经典作家的著作，并接受所有那些对文学感兴趣的人的崇拜和敬意。后来纯属偶然的，他陷入与牧师的麻烦之中。几年前，由于他为“苏格拉底的美德”辩护，惹怒了正统派教友。凡·戈恩斯在他的一本

① 格劳秀斯（1583—1645）：荷兰著名政治家、法学家、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其法学巨著《战争与和平法》确立了国际法的标准。他天资独厚，8 岁便写拉丁文挽歌，11 岁进入莱顿大学文学院，16 岁开始从事律师职业。

书里，暗示苏格拉底有可能进天堂。这个见解触犯了某个无名的神学作家，但后者很快就为年轻的乌得勒支教授巧妙的文笔所折服。

此后，政党的派别之争对所有善良公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伴随着无神论的传播和对教会的冷漠态度的增长，极端正统的牧师为自己教义辩护的激烈程度也在增强。当时出现了一股复兴相当守旧的加尔文主义的思潮。这场运动的为首分子是一个叫霍夫施德泰的牧师，他是执政重要的朋友。为了宣传他的观点，霍夫施德泰创办了一份小报，同时他任命自己为所有本国公民宗教感情的“宗教法庭庭长”。如果发现谁由于任何原因在信仰方面有所疏忽，便要被拖进他那小期刊的正义法庭，在那里遭受公众的谴责，按情节轻重受到惩罚。凡·戈恩斯被列入“嫌疑犯”的名单已有很长时间了。作为希腊语的教授，凡·戈恩斯必须教授和讲解《新约》里的章节，面对于那些反对一切激进言论的人来说，对这些章节的解释总能引起极大的关注。

恰好是在1776年，凡·戈恩斯翻译了一本完全无害的小册子，作者是一位叫摩西·门德尔松[①]的德国理性主义者。更巧的是，这个译本落入了霍夫施德泰牧师之手，并引起这位可敬的先生极大的不满。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只有几页对耶稣和福音书的论述带点现代某种不庄重的表达方式的味道。于是牧师坐下来写了一篇文章，以极为慈爱的笔调告诫凡·戈恩斯决不要忘记他从可敬的父母那里得到的那些贤明的教训。

但事情还没有完。霍夫施德泰以高高在上、自以为公正的

① 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德意志境内出生的犹太人哲学家、评论家、《圣经》翻译注释家。著名论著有《斐多——论灵魂不死》、《耶路撒冷——论宗教权威和犹太教》、《晨更》。

腔调发问：那些极端崇敬伏尔泰[1]、狄德罗[2]和休谟著作的年轻人，是否对摩西和先知们保持应有的尊重?此时任何批评都不如这封慈爱的信令凡·戈恩斯不快。他忘掉了应有的小心，控制不住情绪大光其火。与牧师争论从来都是致命的错误。凡·戈恩斯不久就发现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他卷入了一场荒诞的争论，结果使他不到30岁就不可能在大学里当教授了，他只好提出辞职。

因为他已把个人的钱财投资于他那著名的私人图书馆，他不得不去寻找职业谋生。由于执政的影响，他在市政府里得到了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一点也不适合他，从一开始他就无所用心。他渐渐地对本省的政治产生了兴趣。在他有关“称职的政府”的观点里，他确实是个保守派。“当局”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其余的人只是服从，什么都不必过问。

当意外的事情发生，当英国人被美国人打败的时候，凡·戈恩斯（我们前面提到他认为自己是半个英国人）非常生气，他的怒气直接朝向他先想到的能与他烦恼的理由联系上的人。那时阿姆斯特丹与美国的秘密谈判刚刚被揭露出来，从那时起，凡·戈恩斯就把阿姆斯特丹当作所有对国家利益造成最大伤害的势力的化身。

正像我们前面曾看到的，阿姆斯特丹没有因其行为面受到惩罚，而是从它迫使国家卷入的事务中带着爱国者党的荣耀光环露了脸。这个城市甚至雇用了一位叫卡尔克恩的职业作家，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批判精神、机智俏皮和揶揄嘲讽的风格。

② 狄德罗（1713—1784）：法国文学家、哲学家，由于主编《百科全书》并在哲学、伦理学、戏剧及美学理论、文艺批评、小说创作、科学思辨及政治学诸领域作出杰出贡献而成为启蒙时期的巨人。

为它的行为编造辩护词。

这一切对那位容易激动的前教授来说真是太过分了。他开始写一本小册子，它在当时成百上千的小册子中几乎是惟一值得一读的。他不打算把他的感想告诉给普通民众，而只是为他同类人的利益写作。为了不让街上的民众读到他的作品，他把书的价格定为 10 个荷兰盾。但这本小册子很快就供不应求了，因为它将价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引发了一场轰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接连出现了好几种新版本。一种法文译本使海牙的外交使团也了解了小册子的内容。

对于那些懒惰的读者，336 页的书真是读不下去，于是出版了一种篇幅较短的缩写本。小册子的第一版出版于 1781 年，具体时间是 3 月 11 日。书上没有署作者的名字，只是在简介里印上了他的画像。

我们可以简短地谈谈书的内容。凡・戈恩斯先是简要地回顾了共和国国内外的政治情况，并细致地描述了与所有这些历史事件相关的阿姆斯特丹的态度。他得出的结论是，无论何时、无论何种境况下，阿姆斯特丹做事都只为自己的利益。他简略地提到导致最后一次英国战争的一系列事件。在凡・戈恩斯教授看来，不值得对琼斯船长表示敬意，后者只不过是一个“在谋杀了一个同伴水手之后逃离祖国，然后为北美反叛者服务的苏格兰人”。最后，作者将国家陷入的悲惨境地和与最好的朋友灾难性的决裂（照他的说法，这种决裂只是因为阿姆斯特丹希望增加自己的收益而一手造成的）直接归咎于阿姆斯特丹。

由凡・戈恩斯出版这本小册子惹出的风暴非常可怕，他自己将在其中遭受毁灭。他很快发现他孤立无援。亲王的朋友们不敢站出来支持这个非常不讨人喜欢、已经引起牧师不快的人。执政本人对书中对他进行的辩护不仅不感到高兴，反而感

到窘迫。布伦瑞克公爵自己还有与阿姆斯特丹的麻烦，没有劝说执政公开给凡·戈恩斯鼓劲。

另一方面，阿姆斯特丹城马上准备捍卫自己了。在三个月之内，出版了6本小册子分别为该城的行为辩护，对凡·戈恩斯诽谤性的指控进行攻击。它们也公布了许多有关这位前教授个人性格和习惯的情况。这既取悦了当时的读书界，同时又破坏了凡·戈恩斯充当新的公正学派倡导者的机会。

由于对这种攻击和执政的冷落感到难过，凡·戈恩斯先是没有表现出多少写东西进行回击的欲望。后来，在四个月以后，他突然获得了灵感，几个小时就创作出一篇有关共和国状况的讽刺作品。和他其他的出版物一样，这篇作品与当时从印刷铺出来的大量劣等货格格不入。

同年7月，正当亲王再度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时，一本题为“七个村庄因行政长官的渎职而着火，以及炸面圈的秘密或历史；关于前天的故事，C.P.L.P. 译自马来语，由巴达维亚城堡印刷”的小册子问世了。缩写字母 C.P.L.P. 的意思是“Constant pour la Patrie”（对祖国忠贞不渝），小册子在乌得勒支印刷。

在这本32页的小册子中，凡·戈恩斯描述了属于一位“领主”（执政）的“七个村庄”（七个省份）的复杂历史。其中一个村庄（阿姆斯特丹）的重要性几乎同其他村庄加在一起一样大，因此其他六个村庄害怕它、尊敬它。这个大村庄的居民逐渐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狂妄，同时他们是如此疏忽大意，以至于不止一次险些让自己的村庄和其他六个村庄遭受火灾。

这联合起来的七个村庄的“领主”是一位好心的老人，除了那个“大村庄”的居民，他与其他所有的臣民都和平相处。“大村庄”的居民讨厌他，同时他们对其他村庄居民的利益漠

不关心。既然不能消除他们对自己的怨恨，“领主”至少试着保护其他的臣民不受“大村庄”邻居的傲慢无礼的伤害。

此时，由于他确定地感到有朝一日因“大村庄”的无所用心会在他的领地内发生一场大火灾，就建议购买完备的救火设备（指舰队）。但“大村庄”的居民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他们说，一旦发生火灾，他们自己会注意使各村庄免受损失，他们不需要救火设备。于是什么都没有做。因为“领主”没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权力，所以就没有购买救火设备。当然，最终火灾是发生了。

“大村庄”的居民为他们对社区所做的出色的服务感到非常自豪。他们经常骄傲地指出，他们所拥有的能干的本村成员多次把事情做得非常漂亮。但他们忘记提到在这样的场合，他们自己总是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比如，当他们的面包师发现储存的面粉太多了，就会举办一次面点的“盛宴”。社区里所有的人都来吃糕点，但吃完之后他们必须为那些糕点付钱——面包师用掉了剩余的面粉，而且在这场买卖中赚了点纯利润。同样，一旦卖食油的商人发现他拥有的桶装油超出了他所能处置的数量，他也会计划用食油炸面圈招待所有的人。这又将是一场盛宴，每个人都将感到快乐（这里指的是与美国人的秘密条约所带来的利益）。

后来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菜籽油引着了火，不等“大村庄”的居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一半的村庄已被烧掉了。陈旧的救火设备已被闲置了多年，无法使用。这时，火势已蔓延到了其他的村庄。

各村共同的“领主”来了，他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应受谴责的党派借口说他们只是想为阁下所有臣民的利益安排一次小小的庆祝活动。随后相当偶然的，火灾突然发生了，人们却发现没有有效的灭火设备来制止这场火灾。于是“大村庄”

的人问道："谁该为救火设备负责呢?除了领主还能有谁呢?""他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这么多年来对救火部门不闻不问吗?"

虽说领主能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他自己一直在鼓动建立更好的救火部门，但当然没有人会听他的，每个人都责备领主阁下的粗心大意。同时，人人都深深地感激"大村庄"善良的人们——他们曾努力使整个公社进人其"繁荣时期"，如今得到的却是如此忘恩负义的结果。

凡·戈恩斯的俏皮风格立即受到一些卖文为生的小文人的模仿。他的"七个村庄"被用作一些同样性质的讽喻文字的固定格式。他那本小册子受到不同方式的嘲弄，还被改写成拙劣的诗歌。不久，街上的下等平民用流行的曲调唱起了他的故事。仍然没有人出来支持他，执政（许多村庄好心的"领主"）对这位单枪匹马为他而苦斗的人漠不关心。

不仅无人关心，凡·戈恩斯还受到漫画的攻击。政治漫画的艺术很早在共和国就得到高度的发展，19 世纪不管发生什么重要的事件，我们都能找到一些出自最好的画匠之手的漫画。和 19 世纪的其他事情一样，漫画的技艺是非常低劣的。在这些漫画里，看不到任何艺术的痕迹，对 20 世纪学画的人来说，它们只不过是些粗俗猥亵的东西。

既然此时已成功地使自己成为共和国最遭人恨的人，凡·戈恩斯便决定干些更有影响的事。1781 年 8 月，他创办了一份报纸。共和国还没有人敢创办一份舆伦治党人的报纸。这一行业的产业都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凡·戈恩斯设法筹集了必要的资金来开创他的事业，开始印行《老式尼德兰爱国者》。在同时代的许多报纸中，这是惟一一份有点文学价值的报纸。可是，天哪!没有人愿意读这份报纸。

最糟的爱国者党报纸之一的《低地莱茵邮报》在非常短的

时间内，订户名单就超过了24000户，与此同时，凡·戈恩斯仅有700订户就该感到满足了，从订户那儿得到的钱还不够付纸张和印刷费用的。

不足为奇的是，凡·戈恩斯不仅攻击阿姆斯特丹，而且还与“愚蠢的民众”苦斗。在他看来，“愚蠢的民众没有能力对政府提出有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他们对政治事务的看法只可能是荒谬绝伦的，他们应该乐于将政府管理这一行当留给那些无数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这项复杂工作的人们”。这样的看法实在不能使一个人成为18世纪后期受人欢迎的英雄。

几个月以后，凡·戈恩斯不仅没在众多的磨难中改改脾气，还与他的助理编辑发生争吵，致使报纸暂停出版。该报夭折的消息令众人欣喜万分。有人安排了假葬礼，人们应邀出席在附近埋狗的墓地举行的隆重葬礼。

这类非常粗俗的机智大发作激怒了教授，致使他重新开始出版他的报纸。但这于事无补。渐渐地，他连最后的一批订户也失去了。一年以后，《老式尼德兰爱国者》真的寿终正寝了。

这儿我们该对它的出版者说再见了。没有执政的鼓励（他不敢公开予以支持），又遭到同一阶层成员的遗弃（他们不满他攻击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摄政者同仁是贫民窟里孩童讥笑的对象），凡·戈恩斯甚至都不能在自己的城市呆下去。34岁的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作为自愿的流放者去瑞士定居。只有英国政府对凡·戈恩斯所做的工作给予了某种认可。英格兰提议让他当英国在瑞士各州的代表。凡·戈恩斯因而请求执政解除他在进入乌得勒支政府时效忠祖国的誓言。然而执政没有及时给他回信，等到他回信时已经太晚了，凡·戈恩斯已失去了接受这个职位的一切机会。英格兰国王陛下后来对他不能很快予以答复表示了遗憾，而凡·戈恩斯先生的回信却“意外地丢

失了”。1810 年，凡·戈恩斯死于韦尔尼格罗德[①]，他在那里靠施托尔贝格－韦尔尼格罗德的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克亲王提供的养老金生活。

1781 年秋天是与英格兰战争最为灾难性的时期。生意方面完全停滞了，税金很高，现款缺乏。人人都心情阴郁得如同他们头上乌云密布的天空。装备舰队的工作没有进展。一般的舆论都认为是亲王在故意拖延，因为他依旧反对促使国家与友好的圣詹姆斯宫廷（英国）交战的政策。

就在这样令人灰心丧气的日子里，9 月 25 日的晚上，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传遍了共和国最重要城市的大街小巷，其激烈的言辞和情感宣泄超过了以往的同类出版物。这本小册子只有 76 页，题目是《致尼德兰人民》。它标明的地点和日期是“奥斯坦德，1781 年 9 月 3 日”。上面没有作者和出版者的名字，而且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无人知晓这一秘密。

这本小册子不久赢得了与其真正价值不成比例的声誉。终于有人将许多民众模模糊糊感到那是真实的、却不能准确表达出来的感想印了出来。不管这位作者是谁，他完全是在期待着自己的作品遭到起诉。至少他在前言里这么说，在书中他对“不愿听到有关他们自己的真话的最高当局”作了一些令之不快的论述。不久，事态的发展证明作者的预言是正确的。

无论三级会议怎么不喜欢执政，但他们不可能愿意在某个晴朗的早晨，在他们门前台阶上发现把矛头直接指向自己的匿名文章，因此他们决定设法扑灭小册子作者们的热情。他们悬示巨额赏金来寻找写那本小册子的嫌疑犯。为了获得有助于逮捕作者或出版者、能给他们定罪的情报，各省的三级会议相继

① 韦尔尼格罗德：1429 年成为施托尔贝格伯爵驻地，后又成为施托尔贝格－韦尔尼格罗德伯爵驻地。今德国城市。

悬赏数百杜克特[1]。连行动迟缓的三级会议总会也对此事表示了兴趣，悬赏1000杜克特以查找需承担罪责的派别。由于他们猜想这本小册子是几个人合作完成的，便提出对背叛同谋者的人给予完全的保护，并将对作者处以不低于终生流放和6000杜克特罚金的惩罚。那些出售这本小册子的人要冒遭受同样惩罚的风险。几个星期之后，连拥有这本小册子也变成了严重的犯罪行为。尽管如此，每家每户都读了它，只有少量的书落入执法者的手里，被后者一本正经地烧毁了。

所有那些针对这本可怜小册子的极端严厉的法令成了十分出色的广告，这本小册子马上被翻译成一些外国文字，并总共出了7版。

除了米拉波，没有别人被提及是小册子的作者。然而真正的作者没有那么有名。真正的作者是我们的老朋友凡·德·卡佩伦。他得到好几位能人的帮助，其中一位不久便会臭名昭著。后者是这个非常时期的典型产物，他是弗兰西斯·艾德里安·凡·德·肯普牧师。他属于一个牧师世家，出生于尼德兰正统派大本营之一的坎彭[2]。他18岁时被派往格罗宁根大学——一个强硬的加尔文教派的中心。在那里他开始偏离正统教义狭窄的正路。

当时格罗宁根正巧有位法律学教授叫凡·德·马克，他自1758年起一直安分地讲授他那门特定的科目。1771年，他在所教的科目中向他的学生教授“自然法则”，发表了有关人类与生俱来和普遍的堕落的演说。他的言论令格罗宁根城的某些牧师感到震惊，便指控他的学说缺乏依据。他们向大学的评议

① 杜克特：欧洲大陆曾经使用的一种价值不等的金币或银币。

② 坎彭：今荷兰上艾瑟尔省港口城市。在艾瑟尔河西南岸和注入凯特尔湖处附近。

会提出一份正式的控告。评议会问那位教授有什么需要申辩的。教授在两本小册子里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辩护。牧师和评议会宣称对他的答辩不能表示满意。在人们知晓牧师和评议会的意见之前，政治因素就已经渗透到事件之中，谁是谁非成为整个国家争论的话题。自命为一切非正统观念的审判长的霍夫施泰德（就是后来攻击凡·戈恩斯的那个人），利用他的一切影响来劝诱身为该大学理事之一的执政支持牧师。这自然意味着执政所有的敌人都赶紧去援助那位教授。不过取胜的是牧师。在有权势的理事的帮助下，他们迫使教授提出辞呈。作为对他许多年忠诚服务的奖赏，凡·德·马克被匆忙地解雇掉了，他被禁止参加圣餐礼，还险些被虔诚的教友私刑处死。那些教友一走进教堂就受到与他们圣洁信仰的敌人作斗争的措辞激烈的煽动。为了躲避人身伤害，那位前教授被迫离开国土去德国居住，直到 1795 年发生了革命，他才被召回到原先的职位。

这段插曲的整个过程发生在凡·德·肯普正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这使他感到极为厌恶。他渐渐脱离了其父辈的教会，加入了浸礼会——这个教派在尼德兰的所有教派中产生过从比例上来说数量非常多的具有很高文化程度的思想开明的牧师。

1776 年，凡·德·肯普被任命为阿姆斯特丹附近一个小村庄的牧师。不久因他的能力受到赏识，他被召到有大量浸礼会教徒的莱顿。一到那里，他就积极投身于政治生活之中。他接受这个新任命的几个月之后，布道坛对他来说只是用来传播其政治观点的地方。他宣讲人的权利，言辞激烈地谴责海牙执政宫廷的复辟行径。

他的叫嚣声音是如此之大，他的主张是如此坚定，致使他引起了许多同样是新近冒出来的政治名人的注意。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凡·德·卡佩伦经常的通信者。作为一个非常感情用事和喜欢冒险的人，凡·德·卡佩伦选择他参与出版那本著名小

册子《致尼德兰人民》的危险工作，而且他被选定去散发它。该小册子本身以那个时代惯常的肤浅方式，对从古到今的尼德兰历史作了一般性的描述，特别提及奥伦治亲王们所扮演的角色。凡·德·卡佩伦的历史描述从开天辟地开始，将他的国家的历史建立在当时没有多少确切知识的古代巴达维亚传说的基础之上。啊，光荣的巴达维亚人，他们自由自在以自然的方式生活，通过召集公众集会以全体民众的意愿管理自己！在这类集会上，每个到会的人就如同其君王应该做的一样都是“全副武装的”，处于不受支配的地位。他们的后代——爱国者党人请注意这个事实好吗？

接着顺便提到查理曼[1]。在他的统治之下，人们通过行业公会和城市民兵仍然保留了部分古老的权利。作者把我们带到了查理五世[2]的时代。在查理五世之子腓力[3]统治的时代，真正的痛苦开始了。腓力想用他的宗教裁判所毁掉人们的最后一点自由，这样就引发了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们得到来自一位德国亲王——拿骚伯爵威廉的引人关注的服务，然而他帮助他们并非出自纯粹无私的动机，而是因为通过这样做他能为自己和他的家族获得荷兰伯爵这样显赫的地位。纯属偶然，这个计划因威廉被谋杀而未能得以实施。他的继任者是觊觎这个高位的莫里斯亲王，这是个可怕的暴君。正当国家濒于毁灭的时候，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拯救了这个国家。而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努力所得到的回报却是斩首。接着就是由于莱斯特

① 查理曼(约742—814)：法兰克国王，800年称帝，即“查理大帝”。

② 查理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年在位。他15岁开始统治尼德兰，1516年成为西班牙国王。

③ 腓力：即腓力二世，西班牙国王（1556—1598在位）。1555年，查理五世将尼德兰赐给腓力。腓力二世自认为其功绩在于为天主教会赢得了重大胜利。

伯爵[1]不幸插曲引起的英国人的背叛所带来的无故侮辱。

然后是弗里德里克·亨利，这个专制暴君是靠窃取其堂兄弟威廉·弗里德里克的格罗宁根和德伦特执政地位的阴谋得以继位的。为野心所驱使，他为自己的儿子娶了英格兰国王的女儿。这个儿子威廉二世（不错，他的执政生涯虽短暂却极为狂暴）是作者笔下的妖魔。只是由于上天的干预，国家才没在这妖魔的统治下遭受更严重的损害。此时作者说到了奥里弗·克伦威尔先生，有点跑题地谈到由于雇佣军的存在而使国家面临的危险。听起来作者是用了警告的口气："留神点！把军队的指挥权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中。这个国家，整个社会，属于全体民众，而不只是属于某个亲王和他的几个党徒。"

注意一下作者有关政府理论的观念是很有意思的。照他的说法，一个国家就是一个股票公司，与东印度贸易公司没什么区别。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股票持有者任命了一位总管和一个理事会。不过所有这些官员都只为股票持有者的利益而工作，反过来则不能成立。

威廉二世之后，到了德·维特的时代，人们便读到了对这位杰出的政务活动家任职时期的神化的描述。奥伦治家族的阴谋和由于摄政者变得权势过大而引起民众的不满，便有了对威廉三世的任命。

法国曾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曾在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帮助我们，我们却在1648年单方面与西班牙缔结和约，背叛了它，共和国现在还与这个善良而尊贵的法国开战。作者回顾了战争的历史，提醒人们战争刚一结束，威廉三世如何篡夺了法

[1] 莱斯特伯爵（1532/1533—1588）：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1585年，女王派他率兵6000人去尼德兰支援那里的反西班牙起义。由于指挥无能，他于1587年被召回国。

国人刚刚撤离的诸省的统治权。这位亲王死去的时候，国家处于最为悲惨的境地。

该注意一下大西洋彼岸的国家了，只有在美利坚合众国那独立的13个州和瑞士的几个州，真正的美德才能得到发扬光大。在这些国家，社会的所有成员凡希望取得高位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如愿。所谓条件就是某个社会成员先要凭他一贯的善心和思想，并通过他的行为证明他有增进国家的繁荣和维护自由的愿望，从而得到周围人们的赞许。而在尼德兰共和国，则是按照另一个路子行事。为了步步高升，你首先必须拍执政的马屁，当你恭维得这位官员乐于与你相处时，你就肯定会飞黄腾达了。

有关威廉四世统治时期的简短描述,使历史的回顾得以继续。在作者对这位亲王的许多指控中,对威廉禁止以往常有的在其私人土地上偷猎的看法显得尤为突出。作者认为威廉的目的是不让民众熟悉枪支的用法。威廉四世的寡妇是个英国公主,这个事实足以向我们证明她本质上是收养了她的共和国的敌人。

令上帝喜悦的是共和国最终摆脱了这位耶洗别[①]的统治，但随后共和国又落入了受雇只照看奥伦治家族利益（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利益）的布伦瑞克公爵之手。接着回顾的是威廉当政岁月中的整个痛苦的时期。凡·德·卡佩伦男爵在其中扮演人权的支持者，并因为美国人的事业辩护而名扬天下的那个插曲，在书中相当引人注目。

小册子最后在通常的神化的气氛中结尾。其中威廉五世被召到上帝的宝座前，在那里为自己所遭到的占了整整6页的一

① 耶洗别：《圣经·旧约》中的人物，以色列国王亚哈之妻。她阻挠希伯来人对耶和华上帝的崇拜，无视百姓的权利，蔑视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挑起希伯来人互相残杀，使以色列在几十年中逐渐衰弱。

系列指控辩护。接下去，场景又从天国回到了地上。受到尊重的公众在恭敬而最为热切的吁请下武装自己，在他们之中选出那些派往三级会议总会的特别代表，去帮助三级会议的成员从由于执政不可饶恕的疏忽而造成的困境中拯救国家。

这本将事实和幻想混合在一起，不分青红皂白攻击与奥伦治家族有关的一切的小册子，不幸对许多想领略他们身边的政治鼓动的人成了一种政治原理的入门书。许多人正是从这本不成熟的小册子里获取了有关人民代表制度和城市民兵这类概念的。当我们明白了公众舆论是以何种方式得到启蒙，以及人们从哪里学到有关新的政治理论（当时整个欧洲都在讨论这种理论）的第一课，那么当时的整个改革运动将以一团糟收尾似乎就毫不奇怪了。

此时新学说的宣传也破天荒地进入了先前从未进入过的领域，它甚至进入了教堂。布道坛用作传播政治见解的场所极少有取得成功的。在共和国，教堂和国家彼此关系牢固，从很早以前牧师就曾利用他们的布道词赐予信徒们有关时局的看法。为各种场合安排的祈祷或感恩祷告，往往给牧师提供了不是责备就是称赞他们的教徒，以及评说国家日常事务的上佳机会。在这些骚动不安的日子里，教堂成为激烈争论公众关心的问题的地方。那些本该有责任去安抚众人激动心情的人士却对公众的情绪尽情挑拨。

凡·德·肯普因宣讲其政治信念的热忱而扬名。各种想得到的言辞都用来证明现有统治形式的邪恶。《诗篇》第 109 篇[①]是

① 《诗篇》第 109 篇：据说为大卫所作，诗的开头几句是："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地攻打我……"

② 《撒母耳记上》第 13 章：《撒母耳记上》在《圣经·旧约》中，第 13 章的内容包括刚登基的以色列国王扫罗率民击非利士人、扫罗献祭等。

最中意的圣歌。《撒母耳记上》第13章[2]的故事被用在了共和国和暴虐的执政的身上——希伯来人正经历可怕的时期，耶和华允诺了他们的期望，给了他们一位国王。

迄今还没有人敢触及《圣经》的基本真理，但信徒们还受到告诫，要借细读洛克和休谟的著作来充实虔诚的沉思。这样的话，他们不仅将成为更好的基督徒，而且他们还将通过学习对自己的权利有更多的认识，一旦有必要就能知道如何维护它们。

但小册子、布道和咖啡店里的争论并不能满足人们议论局势的渴望。他们想得到更为直接的信息，他们从一系列的报纸中得到这类信息。这些报纸就像谚语里说的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蘑菇，这个晚上长出来，下一个晚上就不见了。战争所造成的普遍的无秩序，削弱了对出版物的严格监督。在和平时代，坐在市政厅里的大人先生保持严格的警惕，不让不合需要的新闻出现在城里印刷的几份报纸上。过高的罚金和连续不断的流放的威胁，使报纸编辑和印刷商不敢越雷池一步。可现在，国家正被封锁、被剥夺了通常的收人来源，同时税收又异乎寻常地高，并且对每样生活必需品征税，整个国家正处于混乱之中。人人都在议论而没有人愿意俯首听命，此时很难对令人不快的新闻消息实施原先严格的法规。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报纸开始在“社论”里讨论当前的事务。

原先的报纸不过是杂乱无章的信息的集成，既缺乏条理也没有评论。写报道的人听从热切的关照，不要对读者表露他们个人的看法。但由于人人都变得对政治感兴趣，报纸编辑被允许对某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发表见解，引导读者们走上需小心谨慎的政治之路。

在以往的日子，尼德兰的报纸在国外非常受欢迎，因为它们有出色的采集新闻的系统，它们能快速掌握商业和船运的信

息，而“社论”这个新发明出了共和国国界就一点不受欢迎了。由于编辑们对国外的当权者也像对国内当局那样随意发表见解，结果是三级会议总会不断收到由某个外国大使或大臣递交的一些出自一份爱国者党人的报纸的剪报，并伴有愤怒的控诉书。他们要求对冒犯的报纸编辑立即予以惩处。

对任何政府来说，惩罚报纸都是很麻烦的事情。三级会议总会犹豫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们注意到，惩罚的要求不仅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一些本国国民要求抑制新闻界的狂热。然而1782年却出现了一次尼德兰当局与一份报纸之间个别的冲突。

爱国者党人方面传播最广的报纸是《低地莱茵邮报》。它开始出版于与英格兰的战争之初，不久就在争取读者方面超过了所有的竞争者。它在乌得勒支印刷，编辑是一个叫特·霍恩的人。在其生涯的某一个时期，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学生，但他放弃了读大学，而以写作为职业。他专门写儿童读物，他干这种温和的职业只得到一点小名气。在许多次冒险经历之后，36岁的他成为《低地莱茵邮报》的编辑。出版这份报纸的商人叫帕登伯格。

特·霍恩先生有一些助手，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非常年轻，他有着不同寻常的姓名，叫做奎因特·翁达阿杰。他父母都很虔诚，还是许多代都呆在当时仍属于尼德兰的锡兰岛①的福音传教士的后代。他之所以光临乌得勒支，是因为事实上他已被指定要进入牧师的行列，于是他被送到乌得勒支学习神学。他对那些与他所学专业无关的事情像着了魔般倾注了强烈的情感，迅速地滑向了政治。此时他正享有令人艳羡的地位，正像

① 锡兰岛：今斯里兰卡。1645年葡萄牙和荷兰在锡兰划分了领土范围。1658年，荷兰代替葡萄牙成为锡兰的主人，统治锡兰至1796年。

我们时代一些出身名门的青年为宣传激进主义学说到处发表演说所享有的地位。

在那些日子里，一点点叫声就会引起大的反响。翁达阿杰这个年轻人虽在当地体育俱乐部的会议上一上台讲话就发憷，而他却以一个政治演说家的身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除了这个叫叫嚷嚷的年轻人，特·霍恩的报纸编辑工作还得到20来个非常严肃和尊贵的绅士们的帮助，只要他们的姓名不被提及，他们很愿意向他提供贬低执政这个人的资料。这些人是阿姆斯特丹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摄政者，他们向《低地莱茵邮报》供应攻击执政大人的弹药。没有人听说过的村庄里的一个最微不足道和最无聊的质问，只要能使奥伦治亲王在某个方面、从某个角度受到责备，都被认作是值得上头版头条的大丑闻。假如被派上用场的小官员恰巧是奥伦治家族的朋友，那么在某个边远的角落雇用一个城里的保姆也可以上新闻。假如未被雇用的保姆（受雇用的保姆的对手）恰好是个爱国者党的信徒，这样的事也可以上报纸。

《低地莱茵邮报》已经发现了一条基本真理：大多数公众，甚至是绝大多数的公众，他们都非常喜欢读丑闻。于是这份报纸就尽可能地制造这类东西给他们看，并以一种非常引人入胜和传播流言蜚语的方式，把各种各样的有关执政的荒唐故事拼凑到一起，以此取悦他的主顾们，增加它的发行量。它就这样快快活活办了有一年左右，后来事情就变糟了，致使海牙当局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根除这份可恶的报纸。1782年春天，执政向乌得勒支城发出一份正式的抗议照会，质问那些非常高贵的市议事会成员，怎么能允许在他们的城市里出版这种一个星期连着一个星期非议亲王、他的家人和朋友的极为可耻的报纸。

非常高贵的市议事会成员回答说，他们并不知晓刊登在这

份报纸上的消息，迄今为止他们还未听到有关这份报纸刊登的消息有损于真正的国家利益的抱怨。不过他们愿意考虑这个问题，他们请帕登伯格先生来一趟市政厅，向议事会成员报告有关这份报纸的所有情况。

帕登伯格先生来了，他说他不认为曾刊登过任何违背共和国根本利益的东西。他还示意假如不允许他在乌得勒支城里出版他的报纸，他将收拾收拾搬到别的城市去，那样的话别的城市就能获得如今乌得勒支城所获得的收益。

当执政被告知事情的上述进程时，他大为恼火。不过由于他的精力不足以充当其怒火的后盾，他只是发表了一个声明，声称只要出版商许诺不再继续议论他本人和他的家人，他不会将此事诉诸法律行动。

出版商对此表示遗憾，他认为自己对祖国真正利益的无私奉献得不到应有的感谢。他心安理得地继续刊登丑化亲王的消息。由于怕失去一个生意兴隆的印刷所，市议事会支持这位同城公民。

事情到最后是亲王真的对冒犯他的报纸提请诉讼，而法庭在对各项指控进行正式的调查之后，却宣布出版商和编辑“无罪”。

公众对法庭宣判无罪大声喝彩，报纸的所作所为还与打官司前一个样子。执政与乌得勒支城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地恶化了。

令我们吃惊的是，亲王的顾问们竟允许他采取这样的行动。一旦法庭作出有罪的判决，当局便会得到与出版自由为敌的恶名。一旦法庭宣判无罪，当局便会显得荒唐可笑，丢失他们仅存的一点威信。

执政要么就以这样的方式起诉，并有把握判对方有罪和处以罚金，要么就别去管这件事情。那些半吊子的行动显得毫无

益处。在此之后没过多久，一些匿名的小册子纷纷亮相，它们的卑鄙程度是先前的文章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不久，谋杀暴君被宣讲成至尊的美德，有人公然宣称希望有布鲁图[①]第二来终结那个自由的敌人的生涯。不管是巨额的罚金，还是不愿意看到最亲近的家族让人拖入泥潭的普鲁士国王的威胁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在同一年中，爱国者党的民主派取得了在他们看来的巨大胜利。他们非正式的领袖凡·德·卡佩伦长期以来在他所在省的三级会议里遇到麻烦。在奥弗赖塞尔省存在着某种封建劳役的残余，大庄园的佃户们每年都被迫给地主们服劳役。由于佃户们只需花一点钱就可以免除这种劳役，一般来说这种劳役也并未让人感到是多大的负担。然而凡·德·卡佩伦却极为猛烈地攻击这些"徭役"的存在，而且他在这个场合下使用的语言与他反抗英格兰国王时的言辞如出一辙，这使那些高贵的三级会议成员极为震惊，致使他们暂停了他参加以后会议的资格。从那以后他一直试图恢复自己在三级会议中的席位，但他的书信在劳伦斯的文件中被发现，这又把他的机会给毁了。

但由于和英国的战争使人人皆可参与反对执政的斗争，凡·德·卡佩伦的家人和朋友竭尽全力想撤销开除的决议，倒也并非一无所获。1782 年 11 月，男爵再次为三级会议的会议所接纳，受难的光环使他的知名度大增，他立即恢复了原先与各种自由的倡导者为友的角色。

在环境的压力下，反对派此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但已经有证据表明，不同的派别和平共处、密切合作的岁月快要到头了。与当局作对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事情。去做建设性的工作不

① 布鲁图（公元前 85—前 42）：公元前 44 年 3 月刺死罗马独裁者恺撒的密谋集团领袖。

知要难上多少倍。作为一个反对当局的党派，爱国者党的成功令他们自己喜出望外。只是一点火力不足的攻击已足够显露执政阵营的极端虚弱。

全国的人都听说亲王是个无能的傻瓜。这种话如此经常地被一次次重复，致使它被当作社会舆论的第一号真理加以接受。现在人们转向传播上述谣言的人，对他们说："给我们看看，你们自己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

然而，由于挤进爱国者党阵营的人们怀着各不相同的意愿，要有所作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同一年，荷兰大议长的任期已满，在是否应该重新任命的问题上，人们的意见存在很大分歧。现任大议长是老凡·布里斯威克，正像我们经常指出的，他是个老古板，和所有的人为友，一般来说他是爱国者党人利用的工具。问题在于：是把他当作一种傀儡留任他，还是任命一位公开承认的反对派成员。阿姆斯特丹的市政顾问凡·伯克尔很想获得这个职位。但人们认为他太鲁莽了，而且法国人担心他会过于自行其是，而与老凡·布里斯威克还有商量的余地。还有两位候选人。一位名叫凡·齐伯格，是哈勒姆城的市政顾问，另一位名叫德·吉斯莱尔，是多德雷赫特的市政顾问。再加上凡·伯克尔，每当他们在海牙一起出席荷兰三级会议的会议时，三个人经常会面，形成了反对派非正式的执行委员会。因此，他们三个都熟知爱国者党人的目标和愿望。但后面两个人并不是生来就属于这个专门的圈子，虽然他们从才干上说是非常够用的，但他们不被认为具有与因他们的服务而受益的摄政者同等的地位。不仅如此，听说德·吉斯莱尔还沉溺于非常民主的观点，不管是不是反对派，摄政者对他们党派的左翼已没有更多的兴趣了。在摄政者看来，左翼人士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比执政更危险。

为了避免一切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一切还都保留原来的样子。凡・布里斯威克继续担任大议长，执政们传统的三头政治使事情转危为安。就当前而言，这三位市政顾问都忙得不可开交。对执政的战斗再度由报纸和小册子引发，并出于务实的理由得以进行下去。

执政从他在绝大多数城市所享有的对市议事会的任命权中获取其最大的权力。他可以往那些非常有影响的机构塞进自己选中的人。但他很少从自己利益的角度运用这种权力，因此和他作对的城市的利益并未受到多大损害。然而政治思想的新学说推论道：因为各城市曾经是自愿地赋予执政这个权力，所以他们也有资格在他们愿意的任何时候剥夺他的这个权力。

弗里斯兰做任何事情总要与别人有一点不同，此时这个省通知执政，他们认为任命权已归属摄政者。荷兰城市鹿特丹、多德雷赫特和斯洪霍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在这个步骤上民主派支持摄政者。出于他们自己利益的考虑，城市的任命权应直接归属地方，在本地他们通过暴力的威胁便可施加影响，而这对许多英里以外的执政则不太灵验。渐渐地，绝大多数城市也都跟着做了，并且准备宣布他们自己更为完全的自治。

此时执政可以有两个选择。他可以对他们说：“我把任命权赠送给你们吧。拿着它，希望你们会高兴。”他也可以对他们说：“我不能允许这种事，我将不让这样的事发生。”这两个做法都可以保持尊严，并可以以明确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执政并没有这样做，他控诉了一通这种剥夺其先辈所拥有的权力和特权的可耻行径，就把事情丢下不管了。正像尼德兰的格言所说的，受一顿训斥并无伤害。各个城市很快就将亲王阁下的控诉归入各自的档案，继续做他们想做的事。结果是共和国政治生活惯常的混乱局面甚至更为恶化了。在许多年中，在任命权的问题上就根本不能取得一致。执政在一些城市继续行使这

个权力。而在其他的城市，市议事会使自己完全取得了自治。在荷兰，三级会议“在就这个严肃的问题做出决定之前”，擅自作出任命——在此之前都由执政来任命，并在亲王阁下的眼皮底下行使这个权力。

用古罗马编年史作者的说法就是“万物寻求圆满”。反对派继续做他们计划的下一步。执政是共和国军队的总司令。以这样的身份，他能对最高军事法庭（所有军队的案子都在该机构上诉）施加极大的影响。由于厌恶一切和军事有关的事务，摄政者几乎从共和国刚建立就反对这个法庭，因为它常常与民事法庭相抵触。有如此多的案子，执政的裁决与似乎是正确、公正的民事法庭的判决相对立。大本大本的卷宗装的都是这类案子。尤其是在军人和平民之间惹出麻烦时，便会在解决涉案公民诉讼方而冒出各种各样的难题。

据说，如此大的权力掌握在一个官员之手，对国家的安全会是极其有害的。当然，这种争论纯粹是政治方而的。但确切地说，它是被反对派巧妙地利用了。凡·伯克尔因其对执政在军事司法领域的权力的猛烈攻击，而使自己具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凡·德·肯普牧师收集了千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案例，印成极有分量的大厚册。荷兰三级会议此时以禁止最高军事法庭在该省的范围内开庭和拒绝支付维持该法庭必要开支的份额，对整个事情迅速予以了结。其他省份也照着做。亲王发现自己在没有任何借口和解释的情况下被剥夺了这部分的执行权。

由于在短短的时间内就遭受了两次羞辱，对执政来说，此时感到有必要做点什么进行回击。因此，亲王阁下某个愚蠢的追随者想出了一个主意，立即去平民百姓那儿，请他们表示对亲王阁下的不可动摇的信任。

正像一份由一些公民和士兵发起的致词所说的，“他们惊

恐万分地注意到，有关一个人在国家事务中尽其全力施加强权的可怕的诽谤正到处传播”。正好是圣尼古拉节[1]期间，这份文件为征求签名而流传开来。正当人们既没有钱也没有情绪浪费在狂欢的聚会上的时候，在这个战争和衰落的年头，往常的公众庆祝日显得格外冷落，令人沮丧。

由于住在海牙的人或多或少依照执政宫廷的惯例行事，亲王的追随者期待能获得大量的签名。但亲王的朋友所做的每件事都以笨拙为特征，他们竟雇用了 3 个城里臭名昭著的游手好闲分子去挨家挨户地征集签名。这份致词的言语因过于恭敬而令一些人感到厌恶。于是他们自己弄出了一份言辞不同的致词。不到一个星期，两个不同的党派流传开两份不同的致词。他们在做此事时彼此是如此反感，致使当局开始害怕引起一场公开的骚乱，最后由市长（他同时也是城市民兵的司令）下令禁止这两份文件继续流传。

不幸的是，这个命令是在圣尼古拉节那天下达的。城市里到处是来自附近乡村的人们。人人都出了家门，去看商店橱窗里特别的商品展示，去逛设在主要街道上的摊子。按往常的惯例，执政在这天下午出来为家人买礼物，按惯例下层平民也把自己灌个烂醉。对于市长颁布的布告来说，这是最为不幸的时刻，由于不可能对它做任何解释，它只能被理解为是对奥伦治亲王阁下的侮辱。不过那天什么也没有发生。人群有一点喧闹，他们前往执政的宫殿，向阁下和他的家人欢呼。其中部分人也去了大议长的住处，朝他哄笑。但令所有人惊奇的是，没有那种可以称之为混乱的事情发生。

---

① 圣尼古拉节：即圣诞节。圣尼古拉（活动时期为公元 4 世纪）是基督教东西方教会共同崇敬的圣徒。把尼古拉当作圣诞老人或新年老人的风俗，首先出现在德意志境内，然后传到以基督教归正宗为主的国家（如荷兰）。

尽管如此，爱国者党把圣尼古拉节晚上发生的一切说成是一场大骚乱。他们指控奥伦治党人煽动乱民闹事，为造成对所有爱国者党人的屠杀，干下了严重的挑拨行为，等等等等。凡·伯克尔和德·吉斯莱尔恰巧在海牙，他们不愿意浪费一分钟，决定立即召集三级会议。三级会议的大人先生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返回海牙，讨论他们刚刚侥幸逃过的严重危机。

讨论的结果是，他们指控执政没有采取适宜的步骤去平息骚乱。可怜的执政以个人身份在三级会议举行会议时到场，想让众人相信并没有任何骚乱发生；圣尼古拉节的庆祝与以往并没什么两样，因此没有理由去惩罚任何人。

三级会议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这件事，想尽办法也没有找到证据。然而这个故事起到了混淆视听的作用。有关蓄意策划对所有爱国者党人的圣巴托罗缪之夜[①]、三级会议要从海牙迁往哈勒姆以及亲王这个海牙城市警备司令被停职的暧昧谣传，使人们纷纷猜测事情的真相。

从那时起，反对派的领袖们做起事情来就好像执政不再居住在他们中间。当新年（这一天因民众大灌烧酒狂欢而臭名昭著）到来的时候，海牙忙于预防圣尼古拉节那样的“骚乱”复发。整天都有士兵在进行额外增加的巡逻，尽管有爱国者党人在大肆煽动，但仍然没发生什么。

那个冬天是所有光临荷兰的冬天中最令人不快的。生意都处于停顿状态。传统工业作为许多小城镇的主要支柱和骄傲都一同消失了，也不会再复兴了。

更糟糕的是，流感开始在共和国流行。那时候这种病远比现在要能够致人死命。在阿姆斯特丹，那个冬季死去的人是平

---

① 圣巴托罗缪之夜：法国1572年发生在“圣巴托罗缪节”（8月24日）前夜和凌晨的屠杀胡格诺派教徒的大惨案。

时的两倍。特塞尔岛的舰队宣告完全停用，因为有半数的官兵病倒了。就连凡·德·卡佩伦有一阵也不得不停止写信，直到“医生的新发明”（他友善地这么说）使他的骨头不再疼痛。在这样抑郁的处境中，在这个名副其实的“凶年”，人们愿意相信任何事，愿意走任何极端，以便有个发泄受到压抑的不满和绝望情绪的地方。

只要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个人愿意并有能力激励执政去做“积极的”事情，就不可能一败涂地。有许多人，说实在的是大多数人，他们仍然对极端的爱国者党人缺乏同情。虽然他们愿意承认共和国当前的状况是反常的，采取改革措施是极为迫切和必要的事情，但他们不敢信任这样的党派——他们只是不间断和苛刻地提出批评，未表现出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风度。我们很清楚所有这样的历史推测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连第一流的人物也会屈服于因几个世纪的失政积累而成的困境。也许像波拿巴先生这类激进的“医生”，是惟一能改变现有秩序的人物，但他首先必须清除旧时代的废墟。

但当行动是惟一可能的拯救时，没有什么比这一时期的半吊子措施和这种愚笨和自我辩解的慌乱挣扎更能使事态加剧了。我们完全有理由为善人威廉的好心而洒下同情的眼泪，他不让他的任何一个臣民流洒一滴血，但在他最终做出决定之前，当时若动用一点兵力就能避免后来成百上千人的鲜血流淌。威廉五世那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性格，与路易十六[1]完全相同。

以 1783 年发生在鹿特丹的事情为例。鹿特丹的情况与共和国所有主要城市的情况非常相像。在社会的最上层，除了少

---

① 路易十六：法国大革命前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代国王，1774—1792 年在位。1793 年 1 月 21 日，他在巴黎革命广场被送上断头台。

数几个显贵家族，都是爱国者党人；在社会庞大的中间阶层，富裕的非摄政者家族、律师、医生和小商人都是爱国者党内民主派的成员；底层的民众，成千上万在船坞和港口干活的劳力、小店主、手艺人和士兵，他们都是执政热忱的支持者。

社会的上层人士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最下层则过着非常不稳定的生活，平时都是枯燥乏味的工作日，只有很少的消遣，他们中的一些人极为粗鲁。一年里只有那么几次，凡是有与奥伦治亲王家族的某个事件有关的庆祝活动，民众便过开了节，在狂野混乱的饮酒作乐中忘掉他们日常的烦恼。

鹿特丹是尼德兰所有的城市中最为直接地得益于与英国贸易的城市。它在共和国与英国的战争期间遭受了可怕的损失。底层的人因他们在那些苦难日子里的可悲命运而心怀怨恨，脾气非常暴躁。从海牙传来执政在爱国者党人的手掌中不断遭受新的侮辱的传言。他们自己的城市当局也插手其中这个事实，使他们产生了对当地的摄政者和其盟友民主派的痛恨情绪。作为一种反示威，民众决定以不同寻常的隆重方式庆祝亲王的生日。

这里有一个传统习俗，贫民区的居民前往城市的居住区为他们的公共庆祝活动募集钱款。这是一个不坏的做法，城里的人常常给下层百姓东西，偶尔的一点小礼物可以使后者保持愉快的情绪。这一年的情况也是如此。离 3 月 8 日还有好多天，募集活动就已开始了，庆祝日的夜晚也以惯常的方式度过。贫民区装饰着奥伦治的旗帜，募集来的钱款都落入了酒店老板的钱箱。

没有发生什么事。没有砸碎窗格玻璃的情况。没有人受到暴力的威胁。不存在任何一种骚乱的情况。

但当地的爱国者党人照海牙的例子行事，把那天的事情夸大成一场大骚乱。他们向市议事会提出抗议，并把他们的不满

登在报纸上和写进小册子里：他们至为可贵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的财产曾有遭毁坏的危险。

市政厅的大人先生们不愿为了他们尊敬的辅助者的利益而让自己家的窗玻璃去冒险，他们宣称民众自娱自乐是其固有的权利，拒绝对任何人采取惩罚措施。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国家的许多地方。没有一个地方采取果断的措施，所有的讨论只是让混乱的现状持续下去。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反对派要想达到目的，必须按一个更为确定的方案行事。爱国者党运动逐渐沿着完全不同的路线发展，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各个单独的省份，还差不多发生在每个城市。荷兰那三个市政顾问指出总的方针政策，其他省份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遵循也可以不遵循。别的省份常常拒绝听从荷兰的领导，只是在非常少有的情况下才会有一致的行动。爱国者党内部较为保守的成员已开始对更加激进分子所实施的手段表现出厌烦，并寻找某种方式借以摆脱这些有可能比敌人更为危险的朋友。

1783 年 4 月 26 日，70 位摄政者和爱国者党领袖们聚会阿姆斯特丹，庆祝凡·德·卡佩伦兄弟的成功——后者刚赢得了胜利，恢复了他在奥弗赖塞尔三级会议的席位。不过据说反对派的保守成员选择离那个民主派的凡·德·卡佩伦被奉为上宾的地方远点儿。该党派更为激进的成员，像德·吉斯莱尔那类的政治家在这个场合尤为显眼。

在这首次集会之后，来自全国的爱国者党人全体会议在这年稍晚的时候召开，党内的意见分歧甚至表现得更为明显。虽然有了更多的来自弗里斯兰、奥弗赖塞尔和格尔德兰的贵族成员，至关重要的荷兰摄政者却没有到会，而仅属于平民阶层的凡·德·肯普和他的朋友们有很多话要说，并受到与会者的关注。

这些更为彻底的成员逐渐从言辞转为行动。他们感到自己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况，在他们之下是大量的民众。民众对爱国者党人的哲学讨论或最终目标一点也不理解。在他们之上是摄政者，摄政者支持他们是因为需要他们，实际上却害怕他们和极度厌恶他们。最后是住在海牙的执政，像以往一样他是军队的首脑，他拥有忠于他的军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制服这场运动。爱国者党人需要某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他们找到了一种，那就是建立他们所谓的“自由军团”。

正像我们先前看到的，旧式的城市民兵逐渐失去了其作为地方武装力量的全部实力和声望。它已演变成一个餐饮的社团，只是在发生火灾或骚乱危及城市的少有的场合下，才被召集起来协助当地的警察。

然而在中世纪，这些民兵做过大事情。对这种军事组织的兴趣最近又被北美农夫士兵的光荣业绩所唤醒，人们感到这个旧组织的再生将会赋予年轻一代如他们光荣先辈般的固有的勇猛。

“乌得勒支同盟”作为共和国的大宪章①，与其他国家的类似文件在以下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即它似乎给每个人的任何愿望都提供了有根有据的论点。就某种程度而言是一切人的一切愿望。它包含了一个真正的可引为先例的内容的宝藏。比如该文件没有人曾注意到的第八条规定，要对凡年龄在 18 岁至 60 岁的男人进行人口普查。这项普查只在一个省份进行过。共和国认定让雇佣军去打仗比动用不情愿的臣民更有利可图。但这条规定是白纸黑字地存在着，现在爱国者党的领袖们指出这一条来作为建立他们自己的所谓训练团的正当权利的依据。

国家确实处于危险之中。英国人控制了外海，奥地利人又

① 大宪章：1215 年英王约翰因惧怕内战而给予臣民自由的宪章。自颁布之日起就被英国人民利用来反抗压迫、维护自身权益。

以陆地上的进犯相威胁。有什么比组织志愿兵团和学习战争技术更能证明年轻人报效祖国的热情呢?

他们没有向当局正式提出申请,“自由军团”成员的不断增加就像南美革命者的涌现。在一些爱国者党人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当地的城市民兵完全变成了爱国者党的军团,军官们无一例外都是爱国者党人。在其他执政或摄政者依然保持控制权的城市,组建起来的爱国者党的军团成了现存的城市民兵的对手。在不少乡村也是同样情况。乡村地区照例对这种事情没什么兴趣。农夫付税支持三级会议总会的常规军,他们期望用这钱抵御一切外敌。至于炫耀可笑的制服和打鸟的枪支,等等等等,简直是让自己傻乎乎地出丑。

但自 1783 年年初至复位时期,整个国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了训练、行军和游行。事情起于德·吉斯莱尔充当精神领袖的多德雷赫特。乌得勒支自路易十四占领时期起,就一直在不公正的“管束”下受难,这样的“管束”给予执政超越当地政治组织的绝对权力。它照多德雷赫特的样子做,把城市民兵变成了爱国者党的军团。鹿特丹也这样做了,在那里许多富裕阶层的商人担任了军官。

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军团”的组成进展不太顺利。那里的摄政者对允许社会中存在这种危险因素可能导致的后果深感不安。在他们看来,虽然这种成分现在很明显是与执政直接对立,但它任何时候都可能转而与他们作对。但“自由军团”的运动来势很猛,很难加以抑制。到了 1784 年,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捣蛋鬼便有了一个新的可以展示辱骂、扔石头和泥块的多方面才能的组织。

这些爱国者党的军团对腓特烈大帝久经沙场的老兵的抵抗未能持续一个星期,便被他们的德国统帅出卖了。这个事实似乎足以证明组织这些军团缺乏意义,从而使每个抽着雪茄悠然

自得的批评家都有权力责难当事人的自负和可悲的失败。

但这些军团却把一个相当新的成分带进了昏昏欲睡和因循守旧的尼德兰社会，在带有所有缺陷的同时，它们具有某些值得称道的品质。当它们的队列向所有的宗派小团体开放时，它们也就打破了所有的先例。不信国教者也和正统教会的忠实成员一样有权登记入列，这本身就意味着一场革命。不仅如此，这些军团的成员给予平民百姓许多他们特别缺乏的东西，那就是自尊。尼德兰社会以其永存的谦逊、傲慢的仁慈方式以及“善良的人”与“大人阁下”的差别，敲打掉了普通人最后一点独立自主的痕迹。

多少代人的耳朵里灌满了“市政府的大人先生”有别于社会其他成员的说法，致使社会其他成员已开始把这个表述当作既定信仰的部分条款加以接受。

然而，通过加入爱国者党的自由军团，小人物发现自己逐渐进入了有点不同的境况，事情都朝着好的方向转去。过去的城市民兵从未穿过正规的制服，把一条奥伦治饰带束紧在平时的衣服上面，就从平民变成了士兵。但新的军团有正规的制服，就这点而言，它就成为更加民主的组织。军官是众人选举的，不管这个做法对良好的训练多么有害，它却给了普通人第一次怀有对大团体的责任感的机会。

到了那时，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政治俱乐部，但“自由军团”则是具有同一政治信念的人们扎堆儿的地方。就像绝大多数新出现的组织，它也有很多夸大其辞的地方。每个军团都设计出自己的旗帜标语，都沉溺于与他们的军事游戏相关的大量的胡言乱语之中。

“自由军团”最终走出了打破国内不可救药的省份主义的可喜的第一步。借在不同城市的自由军团之间安排射击比赛，许多从未把脑袋探出自己小城市边沿的人们，生平头一回意识

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其他地方也有和自己一个模样的人。当这个运动逐渐具有了较好的组织时，还举行有不同省份的“自由军团”参加的演习。官兵们有机会看到邻省居民的情况，一种整体感开始取代了以往的省份主义。

从此时起，我们大体上知道反对派的中间派和左派究竟想干什么了。许多年以后，法国大革命最终赢得了胜利，人们习惯于认为爱国者党的计划已预示了后来法国大革命强加给欧洲的那些政治原则。现在看来这决不是真的。早法国十几年就发动自己的革命的荷兰人，从未想过走得像法国人那么远。除了个别激烈的极端主义者，他们在政治要求方面相当温和。

他们反对执政，但只是反对在目前境况下的执政。目前的境况使执政变成了专制君主和顺从的臣仆的混合体，并把他一直置于极为异常的地位。

尼德兰爱国者党人似乎在许多事情上都受到美国人的范例的启发。他们想留住执政担任最高行政官，很大程度上参照美国设立总统的那种模式。然而真正的立法权应该掌握在三级会议总会的手里。三级会议总会的成员仍从摄政者中选取，但中间阶层也将具有某种影响力。那时的执政将遵照新的三级会议总会的意愿行事。这样的话，可望结束有关执政和三级会议总会之间旷日持久的权限之争。

至于陆军和海军，由于执政总是不适合这项工作，它们将不再由执政统率，而由职业军人统率，军官将由三级会议总会任命。

三级会议总会将以相同的方式行使文官任命权，执政则失去了按自己愿望挑选市议事会成员的权力。

这个计划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化”。为数众多的民众从中受益，但程度很小。不过这是朝好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要是继续下去的话，终将会造成从旧制度到新制度循序渐

进、较少灾难性的最终变化。

这个计划从未正式公布。该党派未曾自告奋勇印行一本小册子，对众人说："同城公民们，读一读这个吧。要是你们同意这个计划，就来加入我们的行列。"然而这个所谓的秘密计划，一般人都已知道，并常常议论它。它非常准确地向我们显示，那些仍然希望在还不太晚的时候对共和国进行改革的人士怀着如何的见解，哪些人士既不过于保守也不过于激进，仍对在更稳健的基础上展开的逐步建设保持着信心。

当我们留意爱国者党人的言论和文字时，会惊奇地发现在所有缺乏头脑的表面文章底下，有着某些稳妥的共识。在爱国者党人的行列中仍有一些认真负责的人士，他们判断问题是依照其本身的价值，而不是他们可以从中获取的政治资本数量的价值。一些爱国者党会议的记录传到了今天，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会上讨论了什么问题。除了纯属政治性的问题，会上还认真地讨论了重组舰队的可能方式、国家财政和东、西印度公司。东、西印度公司作为垄断公司已经很长时间不起作用了，给人的感觉是它们最终将完全由国家来接收。

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但我们不该忘记，我们必须面对的人们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被严格地挡在了政治事务的门外，他们不懂如何去应付公共性质的问题，但他们现在开始涉足实际的政治领域。

不仅如此，当他们决定把这些问题带到公众面前自由讨论时，他们朝好的方向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为了这个目标，他们讨论建立一个中央机构，它将设在海牙，开展宣传运动。他们甚至考虑要干一番具有更加惊人的性质的事业，编辑一部包括各省份所有旧法律和特权的全集，以便让公众更好地认识他们的共和国，并从中逐渐了解事情的发展形态。

老天爷呀，曾经支持这些改革的反对派中的保守分子不久

就完全失去了对该党的控制。那些表现突出、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整个反对派的人士，具有全然不同的才干。

执政和他的朋友所显现出的不可原谅的软弱，不可避免地使爱国者党人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斗争是如此轻而易举，谨慎是毫无必要的。只凭吵吵嚷嚷和蛮不讲理就能如此成功，许多人自然感到再叫嚷一阵、再来点辱骂，就可以完全战胜执政。

接下去再用什么去折磨可怜的执政呢?他已被剥夺了他那位忠实的监护人的亲密友情，但那位监护人不是还在尼德兰境内，不是还与其以前的学生经常保持通信联系吗?情况确实如此。他呆的地方离海牙也就两天路程，对执政官邸所发生的一切一直了如指掌。

人们决定要让他完全迁出尼德兰的边界，只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借口都可以用得上。因此，3 位市政顾问从内阁的档案中挖出了一件必须借助于 6 年前的一份报告才能起作用的旧事。这份报告是关于尼德兰边界防御工事情况的。作者是杜默林将军，他视察了被荒废的要塞。这位知名的工程师与布伦瑞克公爵私下为敌。工程师发现防御工事因无人过问已处于极度毁坏的状态，便在报告中指控代替未成年的亲王行使总司令职务的布伦瑞克公爵严重失职。

他写报告的时候，公爵仍受宠于亲王，整个事情就被压下去了。当局不愿让杜默林把他的秘密调查告诉给别的人，但按照当时的惯例，他把整个事情说给几个市政顾问听，甚至还把他用作那份报告素材的笔记交给了德·吉斯莱尔。

德·吉斯莱尔把这些以不合法的方式获取的证据都递交给了三级会议。当时由于圣诞节的缘故，到会的人为数极少。要一点议会的把戏，荷兰三级会议便立即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布伦瑞克公爵听任防御工事破烂到散架的地步，而且从

不想着去充实空荡荡的军备库房的指控。这个对公爵的新的攻击，使 1784 年的前两个月群情激愤。

不过到了 3 月，这件事就被忘却了。因为有另一件事在令众人吃惊的程度上远远超过讽刺胖公爵的诗文，这就是鹿特丹臭名昭著的卡埃特·摩丝尔事件。卡埃特·摩丝尔是最平常不过的卖鱼妇，但按如下的方式，她被用来充任殉道者和女英雄的角色。

自从去年执政生日的庆祝活动出现了骚动，鹿特丹就没再平静过。打扮得就像普鲁士军人的爱国者党的士兵神气活现在街上行进的情景，成为新近令下层民众窝火的起因。这些士兵像一旦受到攻击就在城里行使职责的美国城市民兵一样知名。在士兵与乱民之间并未发生真正的冲突，但他们双方之间都极为反感。3 月 8 日成了难过的一天，不过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只是下午的时候，一个并非出于恶意的醉鬼一直走到了股票交易所，在那里叫嚷道："亲王万岁!"鹿特丹商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坚定的爱国者党人，因此那个醉鬼很快就让人扔到了交易所外面的大街上。他所遭受的羞辱必须进行报复。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第二天下午，6 个人高马大的水手，都穿着被认为是有奥伦治特征的外套，光临了交易所。他们大步穿过人群，用身体碰撞了不少聚集在那里的可敬的商人，高呼亲王万岁，然后未受打扰地离开了。

平民百姓为此感到大快人心，而被伤害了自尊（这在荷兰人的内心是最可贵的）的交易所成员则感到极大的屈辱。

此时鹿特丹拥有两支彼此敌对的城市民兵军团。一支是原有的不穿制服的军团，他们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另一支是爱国者党的自由军团，除了政治他们对别的都不感兴趣。后者包括 9 队人马，其中有一队包含所有讨人厌的成分，不断与街上的人群惹出麻烦。某个叫艾尔采维尔的人在这个队当队长。每

队士兵按要求在夜里规定的时间站岗。3 月 22 日，当轮到艾尔采维尔队长的士兵站岗时，颇有要发生骚乱的危险。但骚乱并没有发生。士兵们受到嘲笑。一帮男孩唱着奥伦治党的歌曲一路上跟着他们，但士兵和市民没有干起架来。爱国者党人次日照例又聚到一起，严肃地讨论他们前一天晚上所处的危险境地，发誓一旦受到攻击，要为保卫他们自己而流尽最后一滴血。这誓言听起来很不错，但实际上毫无意义。

4 月 3 日，又轮到艾尔采维尔队长的士兵站岗，这一天恰巧是礼拜六。这个礼拜六晚上与往常的礼拜六晚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个时候水手上岸，这个时候粗鲁的家伙跑出来找警察的麻烦。

爱国者党的士兵在市政厅的前面集合。市政厅前面地方不大，却拥挤着喧闹的人群，他们不想让士兵们排成队列。人们都在说着“巧克力士兵”这样难听的话。当自由的巴达维亚人被要求往前走走、给爱国者党人腾出地方时，许多人又开始说：“他们打扮得活像猴子，这种傻瓜有呆在街上的权利，只是因为他们打扮得像只猴子。这个世界太不正常了。”

那队士兵最后集合起来开走了。当他们走过一座小桥时，劈头盖脸遭到一顿石头的袭击。队长命令部下一齐放空枪警告。但这不起作用，相反，这使人群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人们又开始嘲笑说：“当兵的害怕了，他们决不敢真的发射子弹。”又是一顿石头砸过来。接下去就发生了在此类情况下总要发生的事情。士兵们用实弹回击，人群中有个人被当场击毙，其余的人慌忙逃散，丢下了 20 来个伤员。

这是第一次，政治激情对一个公民的流血送命负有直接责任，随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鹿特丹“大屠杀”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在各处都激起了非常混杂、却同样紧张的情绪。爱国者党人的辩解惹人注目，他们声称只是进行了自卫，因此艾

尔采维尔的士兵中没有任何人受到惩罚。但由于他们的存在一直会对城市的安宁构成威胁，自由军团便被解散了，爱国者党人被禁止在城里穿他们的制服。与此同时，为了对所有的党派都一视同仁，市政厅的“所罗门”[1]们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佩带橘黄色的缎带、花朵、领带或其他装饰物[2]。

然而连这些明智的措施也没有带来期待的安宁。在这最不合时宜的时刻，最荒唐的谣言传遍了城市。此时正由英国人的炮击引起了一场恐慌，接下去的恐慌便是听说爱国者党人正谋划对所有亲王支持者的大屠杀。到了7月，又是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在下层民众与爱国者党人之间有了更多的麻烦。爱国者党人此时在市政厅里拥有10个以上的席位，他们向荷兰三级会议发出了告急信，抱怨受到奥伦治乱党的暴力威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再有保障。

于是，（请注意当时境况的可笑方面！）善良的亲王应荷兰三级会议的请求，派遣一批常规军前往鹿特丹城，保护他最为可敬的敌人的可贵生命。但因为在共和国，非得有一个委员会提交报告才能做出最终的裁决，三级会议就同时任命了一些绅士前往出事的地点调查这个事件。这个委员会不慌不忙地上路前往鹿特丹，到达后便舒舒服服地住在最好的旅馆里。他们用了两年时间才写出报告，鹿特丹则为此项工作花掉了10.5万荷兰盾。

由于双方都受了很大的刺激，他们发现很难单方面地责备某个党派。但因为一个委员会除了报告有关情况以外就再没有别的意义了，整个事件的责任最终落到了鱼市场的两个妇人头

① 所罗门（活动时期公元前10世纪中叶）：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他以贤明著称，善于断案。

② 因奥伦治家族（House Of Orange）中“奥伦治”有橘黄色的意思。

上。据说她们是坚定的亲王的追随者，她们说到爱国者党的士兵时使用的语言离恭维实在太远。她们因为这种冒犯被分别判处 10 年和 6 年的监禁，而且真的被送进了监狱。她们在监狱里一直呆到普鲁士军队促成亲王的复位。她们获得释放，允许回去继续从事卑下的卖海货的行当。她们是平民百姓，表达热情的方式不可能成为行为端正的公民的样板，但她们却因荒唐的不公正的定罪方式遭受苦难。亲王那一方给一点小小的奖励不会显得不适当。不过这不属于亲王的习性。我们必须跳到下一个问题上去了。

用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我们在开始鹿特丹之旅的同时，在海牙也有一个委员会正开会准备就杜默林将军控告布伦瑞克公爵的事件写报告。委员会还没有结束他们的调查。公爵拒绝挪挪地方。即使有人提出只要他离开共和国就可以有一大笔现款进账，他也顽固地拒绝放弃他仍从博伊斯勒迪克司令的职位上领取的丰厚薪水。

委员会拿不定主意接下去该做什么。正在这时，冷不防一门重型火炮被搬上了阵地，把公爵轰走了，还对执政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就是《顾问条例》的公开发表。通过这份文件，威廉把自己置于公爵的看护之下。此时的知情者不过 20 来人。过去曾多次讨论过是否公开这份文件，但受到一项保留权的阻止——只有在必需时才有权公开它。

1784 年年初，在主要的爱国者党报纸《低地莱茵邮报》上有过一些议论，该报称在亲王与他以前的监护人之间存在一份秘密的协议。和许多条消息一样，这个信息也是报纸的编辑从阿姆斯特丹的朋友那里获取的。这些阿姆斯特丹的朋友为了自己特殊的目的，把这份报纸用作非正式的喉舌。

由于这个陈述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让事情变得更加公开化就很容易了。齐里克塞城的代表团向泽兰省三级会议询问其成

员是否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三级会议的大人先生们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们会调查这件事。

这是荷兰省的行动信号，因为它在这类事情上从未让相对次要的省份占先过。因此，荷兰三级会议任命了一个其中包括首席市政顾问凡·伯克尔和德·吉斯莱尔的委员会，派他们去见执政，正式向他询问这个秘密协议的真相。假如这样的一个文件真的存在，执政阁下是否愿意向三级会议送去一个副本？

亲王承认文件的存在，答应他不仅会把副本送到荷兰省三级会议，而且还会把它送到各省的三级会议和三级会议总会。

准备 8 个副本花了 10 天的时间，然后它们便被送往各三级会议，并附上了执政的一封信，用以解释该协议是如何签订的。在这封信中，亲王公开为他以前的监护人辩护。他提醒各三级会议，公爵之所以留下来为共和国服务，只是因为三级会议自己的殷切恳求（事情确实如此)。他声明他并不是在每个可能的场合都只征求公爵的意见，而是只在他自己认为必要的时候才这样做。因此，似乎只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公爵所给的劝告才不该承担责任。

该文件公开之时恰逢奥地利的约瑟夫威胁要与共和国另开一场战争的困难时期。正当公众反奥地利的情绪高涨时，人们发现奥地利皇帝自己的一位陆军指挥官多年来竟一直是共和国执政行为的操纵者。这种时候没法期望就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冷静的讨论。这是歇斯底里的恐慌时期，对着公爵掀起的风暴使他在共和国的职位绝对保存不下去了。亲王开始看到绞刑架的幻象，在梦里则被查理一世[①]的幽魂跟随。他打算逃到自己在德国的领地，在那里平安地度过余生。最后公爵收拾起

① 查理一世：英国和爱尔兰国王（1625—1649 年在位)，最终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人民公敌被送上断头台。

行李，只留下了可观的债务。1784 年 10 月 16 日，他起程前往不伦瑞克[1]，在那里苦熬着剩下的岁月，还试图为发生的一切辩解。

然而对于三级会议，事情还没有完。他们多次企图弄到公爵的来往通信，希望那些通信里有可以控告亲王的内容。一些幸运的外国士兵被雇用来盗取凡能找到的这类信件。他们去了艾克斯莱班，公爵正好在那儿，但他们的一个同伙出卖了他们，致使这个高尚的计划受挫。

凡·德·卡佩伦没有成为爱国者党人这个伟大胜利的见证人！1784 年 6 月 6 日，他死于兹沃勒，终年 43 岁。许多年来，差不多从童年起，他就一直受慢性胃病的折磨，他的政治行动不断为疾病所打扰。他的许多朋友真诚地哀悼他的逝世。倾慕他的诗人预见在天堂中等待着他的荣耀——这是对其工作的公正奖赏。其他的本国公民则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炸掉了他的坟墓，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① 不伦瑞克：德国西北部的古代公国。



9 最后的岁月

1785年，共和国处于很糟的境况。与英格兰的战争结束了。公共债务增加到几乎不可能付出利息的地步。在最近4年中被捕获的尼德兰船只还没有归还。实际上已经破产的东印度公司面对英国人的竞争艰难地维持着，它不得不允许对手进入其部分的领地。对共和国来说，一些殖民地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与美国的贸易因圣尤斯塔修斯岛的丢失而化为乌有。

大多数民众因被夺走了惯常的收入而心怀不满地受着苦。富裕阶层把精力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争论上。每个城镇和每个乡村，几乎每个家庭都意见分歧、争论不休。奥伦治党人的家庭保持着沉默。爱国者党人狂妄自大，在咖啡馆和俱乐部到处议论他们的事情，以当代某些政客的那种时尚，把过错都归咎于所有那些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的最卑鄙的动机。由于相当大一部分人失业了，爱国者党人费尽心机想利用这个机会使这些人对新的学说感兴趣。仅次于最时髦的爱国者党俱乐部，他们

建立工匠和雇主互相见面的社团，在那里一方教给另一方有关新思想的基础知识。这些俱乐部不是很成功。绝对的阶层差别严格保持了这么多年，结果一方的奴性和另一方的屈尊姿态总是把彼此的友善相待搞得一团糟。当主人们把自己的身份忘个干净，同意坐在自己的仆人身边时，看上去好像那种可以称为根基的东西正开始离荷兰社会而去。

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个庄重的古老国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1784 年 3 月的骚乱之后鹿特丹所颁布的对橘黄颜色的禁令，同年 7 月在荷兰的部分地区受到仿效，这些地区的禁令甚至更为强硬。它们不仅禁止穿戴一切橘黄色的服饰，还要禁止使用偏要以橘黄色表皮取悦亲王的水果的名称，以及以那个显赫家族成员命名的某些蔬菜的名称。不能让这些服饰、名称激发公众的想像力。最后连唱、吹口哨、演奏或另外谱写以“拿骚的威廉”为题的音乐作品(而“拿骚的威廉”也是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沿用了 250 年的备受敬重的国歌的题目)都是严重的冒犯。

执政与制订这些荒唐法规的人们住在同一所建筑物里。他只得接受所有这些侮辱，没有发出一声抗议，从那以后他想吃“公主豆”这种蔬菜时不得不改用其他不得罪爱国者党人的称呼。他越来越看清楚了，没人再需要他了，把他赶下台是反对派的真正目的。此时反对派中的极端分子逐渐站到了前台，占据了其党派的领导权。

1785 年 1 月，奥地利军队威胁任何时候都可能进犯共和国。没有军队，也没有防御工事，没有什么可以用来阻止他们的进攻。威廉请求将爱国者党的自由军团用于祖国的防卫，把他们派到前线去抵抗奥地利人的进犯。可想而知，这个请求遭到直截了当的拒绝。

组织自由军团，是爱国者党用来对付执政的防卫手段，而

不是出于维护祖国利益的目的。只要党派的利益不受侵犯，国家遭受毁灭也在所不惜。于是一个省接一个省都拒绝接受这个计划，即使是极短的时间，他们也不愿失去对亲王追随者一方可能的反抗的防卫。除了用一笔现款贿赂奥地利皇帝，使之放弃蛮横的要求，就没有别的可做了。

我们惊奇地注意到，执政是如此的无助，而审视一下他的对立阵营的实际能量，却发现那是多么的强大。即使在乱糟糟的荷兰三级会议，当反对派的所有成员统统到场的时候，爱国者党人也只占某种多数。贵族依旧站在亲王一边，而且随着暴力事件的增加，相当多的反对派的支持者看到还是投亲王的票最符合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受害于自己作为一个政党中较为达观分子经常表现的那种漠不关心。当需要他们站出来的时候，他们却经常袖手旁观。而爱国者党人在他们那三位市政顾问的有效推动下，以纯粹的议会策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就像仅仅几年以后，少得可怜的一些法国公民吓坏了其余的人，扼杀了他们心里的想法，就因为他们比其余的人有更好的组织，行动起来更为坚决。

几乎每个城市的公民都让自己听从自由军团士兵们的使唤，但说到底这些军团登记的人数从未超过两万人，来自荷兰一个省的超过了总人数的1/4。

以这一年的乌得勒支作为例子。在这个城市，几千个平民士兵和一位吵吵嚷嚷的演说家使整个社会一直处于混乱之中。正像我们有必要在前面提到的，乌得勒支的事情总有些不对劲的地方。1672年，路易十四占领了这个城市，在这位法国国王撤离之后，执政威廉三世设法获得了对这个城市行政机构的完全控制权，他在1702年去世之前一直是这个城市的“领袖”。随后乌得勒支恢复了自治。然而到了1747年，执政制度又恢复了，威廉四世和后来他的儿子威廉五世，又成为城市

的主人。他们控制了城里所有的机构，不对亲王或他的代理人进贡的话，谁（不管他是什么等级和地位）都别想做成什么。亲王自己从不呆在这里，但他的代理人一直呆在乌得勒支，靠着公共经费致富，因此人们把他恨透了，他在各阶层中都不受欢迎。正像我们前面谈到过的，乌得勒支是个大学城，又位于国家的中心，对国外发生的事情与国内的同样清楚。城市很繁荣，人们在一些问题上比共和国的大多数人知道得要多一点。

20 年来，居民中最受尊敬的那部分人一直在采取积极的行动，反对将城市置于执政权威之下的所谓“管束”。然而威廉是刚愎自用和固执己见的，他拒绝放弃这种古老的权力，不折不扣地坚持这种特权。由于他弄不懂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他认为人们反对“管束”只是众多的臣民不幸具有的喜欢咒骂的个性的另一种表现。这时正好是 1784 年，市议事会里有一个空缺，按照法律执政可以随便任命一个人，而无需考虑议事会其他成员的愿望。

然而在亲王任命某人之前，700 个乌得勒支的市民到市议事会请愿，要求对执政那可疑的特权不加理睬，自己来做这样的事情，任命他们选择的某个人来填补这个空缺。请愿书正式声明，议事会作为古时候的行业公会和城市民兵的代表，完全被赋予了这样做的权力。

由于获得了 26 票的多数，议事会确实做了人们要求它做的，未请示亲王就填补了那个空缺。那位新当选的议事会成员接受爱国者党人吵吵嚷嚷的欢呼。而当他第一次出现在市政厅的时候，由自由军团士兵组成的仪仗队陪伴着他。

执政提出抗议。他向该省三级会议发出一份正式文件，把那里称作“主教管区”(虽说已有 246 年不存在与之相关的主教了)，但三级会议拒绝给予执政满意的答复。他们把这件事留给乌得勒支城，让该城自己去决定 1672 年的“管束”是否

违反了这个省古老的法律。要是违反了，议事会完全有权力对执政的所谓特权不加理睬。但在这首次的英雄行为之后，紧接着便有了一个反应，乌得勒支城聪明而谨慎的议事会成员被自己的无畏举动吓坏了。当他们允许自己照街上群众的要求去说、去做，便就此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又该如何来预防下一次人们请愿要解雇一个他们刚刚任命的人呢?

当不久出现第二个空缺时，这样的情况就反应出来了。一些议事会成员突然病倒了，这样就不用参加选举新成员的会议了。这次新当选的人只获得相当小的多数。下一次选举，其结果变得不占多数了。

市议事会方面的退步是不太符合爱国者党人的口味的。乌得勒支的爱国者党人的头脑里完全为民主学说所充满。他们继续鼓动几项当地很必需的改革措施，并使市议事会做出决定：由 9 位市政官员组成的委员会用 5 个礼拜的时间坐在那儿倾听市民们提出的对他们认为必要的改革措施的恳切请求。这个请求刚被准许了，暴风骤雨般的请愿又来了。在每家书店，为数众多的请愿书等待着一切愿意来签名的人。

这正是该城的摄政者真正害怕发生的事情。爱国者党人不仅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执政，还要求任命一个市民协商机构，这个机构将控制城市的财政，新的税收项目出台之前也须先向这个机构通报。这样的市民协商委员会并非新鲜事物。在奥弗赖塞尔的一些小城市，已经在凡·德·卡佩伦的鼓动下任命了这样的委员会。但这样的计划还未在乌得勒支这么大的城市尝试过。

摄政者感到压力非常大，不知该如何答复这个请求。市政预算自古以来都是严格保密的，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来源，控制他们的经费只会引起他们难以形容的憎恨。此时他们开始意识到在两种邪恶势力中，亲王实在是居其次的。在这些事情的进程中，出现了另一个职位的空缺，这一次是市长和司法长官的

职位。摄政者拒绝任命爱国者党人要求他们任命的人选，而是让前任延长他们的任期到下一年。而且他们立即开始弥补因反对执政而对自己阶层的人造成的伤害，并对街上人肆无忌惮的表现加以约束。

不过这已经太晚了。在以前学神学、现在是职业爱国者党人的年轻的翁达阿杰先生的领导下，情绪激动的人们要求将16人的协商委员会增加到24人，而且主要由来自自由军团的代表构成。摄政者断然拒绝任命这样一个机构。于是人们毅然前行，自己任命了这个机构。8个自由军团接着选举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管理自己特定的利益。乌得勒支城突然发现自己拥有了3个各自为政的政治机构，每一个都想对某些事情采用不同的做法。

执政与乌得勒支城之间的斗争此时变成了摄政者与爱国者党人之间的争吵。不顾该城所有爱国者党分子的联合反对，议事会于1785年的夏天以16票的多数选出了一个令爱国者党一般成员极为憎恨的人。爱国者党人威胁使用暴力，除非议事会取消这个任命。议事会当即失去了勇气，许诺在听取人们的意见之前，不让这位新成员参加会议。人们又来请愿了，并通过他们的发言人翁达阿杰向议事会的大人先生们发表了一通有关人民的权利和政府职责的精彩演说。

议事会的人士答应将考虑这件事，他们便无限期地考虑下去。因此，当随着时间的消逝，并未给予确定的答复时，爱国者党人又向最为尊贵的议事会发表他们的意见，并请求给予明确的答复。不会很快得到答复。于是在几天的间隔之后，爱国者党骚乱的人群和自由军团的士兵出现在市政厅的前面，再次通过翁达阿杰请大人先生们回答：他们打算做什么?议事会的绅士们并不属于奥尔登巴费尔特和德·维特那类人，他们一看到群情激愤的人群就害怕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们撤销了

先前的决定，罢免了他们刚刚任命的人。

对议事会的许多成员来说，这简直太过分了。他们为自己的怯懦感到羞耻，宁愿辞去他们的职位也不继续留在这个有可能在一伙“全副武装”的人的威吓下被迫屈服的职位上。

不过，乌得勒支的反对派从这时起迅速地分化了。民主派的爱国者党人一直是胜利者。但该党的所有保守分子开始犹豫不决，并寻求与执政和共和国其他保守分子的合作。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省三级会议。在三级会议中占据席位的摄政者发现，作为他们反执政鼓动的结果，他们现在不得不对付不知要危险多少倍的敌人。在一些小城镇，人们马上照着乌得勒支的样子做。不仅任命了市民委员会，而且除了现有的市议事会，还建立了敌对的议事会。事态有一度变得极为混乱，以至于不得不请求执政派出军队，驻防到几个叛乱的城市，以使市民规规矩矩，停止扰乱城市的安宁。

这一年召开的爱国者党全体会议，摄政者全都缺席是不值得惊奇的。该党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差异比先前都更加确定无疑。三个市政顾问中只有德·吉斯莱尔到会。格尔德兰和奥弗赖塞尔派了许多成员，而乌得勒支由于爱国者党的鼓动刚遭了殃，没有派代表到会。与会者谈得很多的是该党自身所处的危险，以及为更细心地观察日常发生的事件而任命了一个7人委员会，并决定向全国呼吁捐款。

在所有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执政仍住在海牙，但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他那请求对日复一日发表有关他的讽刺诗文进行调查的信函没有得到答复。对其不断遭受的许多侮辱和人身攻击的赔偿要求也被无礼地置之不理。

而此时在城市里的一些无业游民与自由军团士兵之间的争吵，被用作了剥夺亲王海牙城防司令职务的借口，并将这个权力移交给了荷兰三级会议。亲王提出抗议。他在一封信中愤怒

地质问：谁敢担任他的军队的司令?对这封信的惟一回答就是荷兰又图谋要剥夺亲王阁下联省军队总司令的职位。这即使对威廉五世这么一个有耐心的人也是太过分了。9月15日，他离开海牙去了布雷达。他把妻子孩子送到了吕伐登。他计划过一阵子全家都搬到他在德国的领地去。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公主劝住了丈夫，认为走这一步似乎是在爱国者党人面前逃跑，将再不会有返回的机会。因此亲王同意留在共和国，选择格尔德兰的尼梅格为他的居住地。他自我调侃说，在那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打猎和拜访仍然忠实于他的家族。就像以前他父亲那样,他是个非凡的“等待者”。他能够耐心地等待证明他正确的那一天的到来。这样的一天在短时间内是不太有希望了。柏林的弗里德里克叔叔已到老迈之年,在他的一生中已获得足够的荣誉了。他不愿让自己卷进这种就本质而言是家族的争端之中。惟一的希望在于反对派在如何分赃这个问题上自乱阵脚。

这样的情况确实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给许多人的心思带来了非常自然的反应。他们从未太在意那位软弱的执政。但此时执政已被迫离开了荷兰省，他们自问他是否真该有如此下场。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本不该如此，他毕竟没有那么坏，所有的麻烦都是居心不良的爱国者党人造成的。

爱国者党人已处于困难时期。该党的民主派发现自从为摄政者做成了事，后者就不再需要他们了，他们正被推向暧昧的、在别人看来是惹事生非者的境地。这不是爱国者党人投入斗争时想达到的目的，他们向摄政者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但摄政者在他们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的压力下，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准备重建社会固有的秩序。

然而这已为时太晚了，危害已经铸成!那些屠夫、面包师和烛台制作工匠多年来已经习惯于在国家机器中充当某种非常小的角色，此时拒绝回到他们原来最为卑贱的仆人的地位，拒

绝听从他们上司的指令。中等阶层的成员已有将近 3 年拥有相当的权力，他们想像不出回到只给他们与最卑贱的挑煤夫同样待遇的境地该如何是好。

摄政者想取缔自由军团。突然间他们顾忌起主要并不是用来在骚乱和火灾的情况下保护城市的武装组织的存在。自由军团的成员愿意放下他们的武器回到原先的职业吗?不，自由军团不会做这种事。他们非常喜欢现在轻而易举便能获得荣耀的生活，而不愿再过以前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

不安定的时期延续了许多年，一直到共和国的末日。顶着各省执政名义的亲王在格尔德兰过着半流放的生活。他想通过对国内各个省份的旅行，重新获得某些他失去的特权。然而，荷兰和乌得勒支形成了国中之国，对待执政就好像他是他们那小小的主权国家的敌人，不允许他进人两省的边界。

共和国开始与有“轻喜剧”名声的南美共和国越来越相似，甚至都不存在表面的秩序。已经永远离开牧师职位的凡·德·肯普，在乌得勒支的一个小村庄组织了一个新的共和国，突然宣布自己既不听命于三级会议也不听命于执政。当他拒绝解散由当地乡下人组织的骑兵团时，针对他那新共和国的军事行动开始部署了。听到这个消息，来自乌得勒支和荷兰各地的志愿者云集到叫威克巴埃杜尔斯坦德的小城镇，全力投人这个小城镇的防守。不过三级会议的军队没有出现，而 700 人的新共和国也就自然消亡了。

在格尔德兰，有两个默默无闻的村庄，名叫哈特姆和埃尔堡。在前一个村庄里，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爱国者党人，他很年轻，名叫丹德尔斯[1]，后来因成为拿破仑的将军和尼德兰印度

① 丹德尔斯（1762—1818）：爱国者党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787 年他参加保卫阿姆斯特丹的战斗，失败后流亡法国，加入法国革命军，1793 年参与法国对荷兰的入侵。1807 年他被任命为亚洲殖民地的总督。

群岛的总督而闻名。当时他的村庄在当地的事务方面与执政发生了纠葛，居民们决定不再听从执政的指令。他们这样做了。即使在亲王光临的省份，也有一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村夫公开不服从他。

由于驻扎在沿德国边界的联省共和国要塞的一部分军队归执政统率，这样就有可能对叛乱立即采取步骤。格尔德兰三级会议对其同省公民的行为无丝毫热情可言。应他们的请求，一些军队被派往两个反叛的小镇。听到计划要征讨的消息，全国各地的爱国者党人都赶去救援。他们日夜忙于两个地方的防御，但当联省军队终于出现，战斗刚打响时，他们的勇气却丧失殆尽，都落荒而逃，而且一直逃过了乌得勒支边界才止住脚步。

多年来遭受爱国者党人侮辱的联省军队以抢劫当地一些叛乱领袖的家来进行报复。于是荷兰做了先前没听说过的事情：对执政的士兵的残暴行径向格尔德兰三级会议提出正式抗议。

格尔德兰三级会议则送去了一份长篇大论的答复，它所表达的意思很明显，也就是“管好你自己的事吧”。这正是荷兰三级会议不爱听的。他们真正想找的攻击对象是执政而不是一个相邻省份的三级会议。至于执政，整个骚乱期间他一直安安静静地呆在尼梅格。荷兰三级会议向他发出一份非常简短的信函，请他在24小时内答复：他对格尔德兰三级会议依靠暴力措施以征服为数不多的无辜反叛者究竟有何感想？

亲王所做答复的大意是：他对整个事件非常无奈，他应这个省三级会议的请求派出军队也是他应尽的职责，不过这是格尔德兰三级会议的内部事务，格尔德兰作为享有自身主权的省份，可以采取他们认为适当的措施去维持秩序。

但荷兰三级会议更希望听到格尔德兰三级会议对其行为矢口抵赖，这样便可激化矛盾。在令人胆战心惊的爱国者党士兵

所造成的恐慌之后，紧接着是由出版物掀起的可怕风暴。在荷兰三级会议，德·吉斯莱尔把威廉的行为描绘成“阿尔瓦[①]第二”的所作所为。当威廉允许他那杀人不眨眼的军队降祸于当地无辜儿童的头上，把和平的景象变为余烟袅袅的废墟时，爱国者党人就好像回到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和尼禄[②]的残忍暴虐的时代。

在这些夸大其辞的情感的影响下，荷兰三级会议此时采取了新的步骤，他们于1786年9月22日以15票的多数通过，宣布威廉五世已被剥夺了陆军和海军总司令的职务。由于对亲王的任命不是由三级会议总会做出的，而是由各省三级会议分别做出的，荷兰三级会议便可以合法地采取这个步骤。但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像这对国家总体的境况产生了何种的后果。从那时起，荷兰和乌得勒支所关心的是不再让执政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并没有公开地说要脱离，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脱离了，而且他们暗示决不会允许执政再有返回的机会。

由于害怕执政会召集正规军，亲王的追随者又总想摆脱不得人心的爱国者党的束缚，从而使这两个省陷入真正的骚乱。一位在军中颇有声望的德国亲王受雇指挥自由军团的部队。乌得勒支城位于由尼梅格通向阿姆斯特丹的道路的前沿，这个城市已布下坚固的防线。

这一切都是盲目的。执政并未挪动地方。在大费踌躇之后，他终于去了阿默斯福特[③]。那里的爱国者党人与摄政者之间不断发生争执，他被迫派去了少量军队。他的荷兰朋友们敦促他迅速越过荷兰边界，到海牙来。他们想让他相信，大多数

① 阿尔瓦（1507—1582）：西班牙军人和政治家。1567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派他率大军前往尼德兰镇压人民起义。

② 尼禄（37—68）：罗马皇帝，是出名的暴君。

③ 阿默斯福特：尼德兰乌得勒支省城市。

人极端厌恶爱国者党人的专横跋扈，他们肯定会欢声雷动地来欢迎亲爱的执政。他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只要他主动前往，他将会看到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

执政仍没动窝。最后他的妻子对可耻的犹豫不决和整个事情厌倦了，决定代替她的丈夫采取行动。多年来她已经成为亲王一家聪明的头脑人物，总在她丈夫拿不定主意该做什么时起作用。但由亲王或他的朋友所做的每件事都具有笨拙的特征，即使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是如此。为了取得成功，执政必须在爱国者党人尚未意识到他的存在时出现在海牙。除非完全地出人意料，别的方式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然而，他们不去做秘密前往海牙的准备，却让一切都以最为公开的方式进行。公主不是只由少数几个朋友陪伴，而是带着必需的侍女、侍者全套人马浩浩荡荡地缓缓开进。他们不使用快马火速赶路，而是走普通的邮路，一路上使用的马匹许多天之前就预先租好了。

因此荷兰的爱国者党人提前好多天就知道这个计划是毫不足怪的。他们派出士兵代表团到沿边界的各个村庄等候。1787年6月28日，公主和她大批的随从出发前往海牙，但她一进人荷兰边界就立即受到阻拦，并被追返回尼梅格。

这里要给荷兰历史提供一些新的内容。当时流传的有关公主受到蛮横对待的故事是一派胡言。她受到爱国者党士兵指挥官的尊敬对待，没有吃什么苦头。但在1787年，其意义则颇为不同，那是几个农夫和奶酪商穿着士兵制服，阻拦普鲁士国王的妹妹，以不失尊敬的方式拘留她，并请她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无声无息地过去。没过多长时间，普鲁士首都的方向就听到了沸沸扬扬的传闻声，普鲁士国王陛下自然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别人告诉他这纯粹是荷兰三级会议的问题，只有他们该承担责任。三级会议总会既不敢反对他们，也没有鼓励他们做这样的事。普鲁士国王使应要求对荷兰

三级会议提出抗议，并在抗议中表现出极大的义愤。

荷兰想从法国那里得到帮助，但希望却很渺茫。法国一点也不愿为当时正管理曾是那么强大的省份的一帮疯子去作战争冒险。其他省份只是通过对荷兰省行为的抗议和谴责来平息普鲁士国王陛下的愤怒。这样做的结果是三级会议总会终于不复存在了。

这一时期对爱国者党人中的极端分子有利。所有那些抱残守缺的人投向了该党的保守派阵营。而所有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却为冲突的引发而精神倍增。在荷兰三级会议，通过了针对国家所有敌人的最荒唐的法规。那些以任何方式对执政表示同情的人一旦被发现，几乎不需要什么程序就可以被枪毙。人们公开建议没收执政的财产，永远将他及其家族排除在执政这个职位以外。

来自各方的自由军团开到防守最薄弱的地方。爱国者党的报纸以歇斯底里的最大音量发出刺耳的喧嚣。普鲁士在格尔德兰边界集结了两万士兵。一场进犯已迫在眉睫。荷兰三级会议依然拒绝对普鲁士国王就他的妹妹在荷兰边界被赶走所遭受的像国家的叛徒那样的侮辱表示道歉。照三级会议的说法，并不存在任何程度的侮辱。他们（三级会议）在自己的边界内拥有主权，他们愿意的话可以拒绝任何人入内。

在普鲁士人提出第一个赔偿要求之后，第二个同样的要求随之而来，其言辞更为直率和激烈。三级会议送去的答复与上一次也没有实质的区别。费了许多笔墨，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是：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道歉的。

于是普鲁士国王发出最后通牒。要么荷兰三级会议在4天之内做出最为诚恳的道歉，要么普鲁士国王命令他的军队进犯，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4天过去了，荷兰三级会议没有做出任何答复。1787年9月13日，普鲁士军队由布伦瑞克公爵

的堂弟指挥，侵入共和国，沿着三条路线进军乌得勒支和荷兰。接着就发生了全线崩溃。爱国者党人对乌得勒支城寄予很大的希望。该城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守卫在通向阿姆斯特丹的路线上。然而普鲁士人没去理睬乌得勒支，而是绕过了该城。守卫该城的火炮和人员未发挥任何作用。

随后便是大恐慌。城镇和乡村未作任何抵抗就一个接一个向普鲁士人投降。阿姆斯特丹开闸放水淹没了城市周围的乡村，以这样的方式苟延残喘了几天。海牙没有防御工事，完全处于敌人的掌握之中。三级会议曾考虑逃往哈勒姆。但他们不能及时作出决定，一直商议到普鲁士人包围了他们的开会场所。

“复位”在5天之内就完成了。一个星期以后，当一切都做完之后，威廉出现在海牙，受到市民的高声欢呼。他什么也没做局势就发生了变化，但就像他重获权力那样有些事情也注定将要发生，他得承担普鲁士人入侵的后果。他恢复了原有的一切职位，在先辈的王宫里重新过上了原来那种舒适的生活。他妻子此时得到了想得到的所有赔偿。普鲁士人因他们的服务而得到50万荷兰盾的酬报之后返回祖国。

“复位”之后没有出现任何针对遭受失败的党派的暴力行为。没有运用绞刑、枪毙或其他处决方式。加入爱国者党阵营的摄政者都被解职，他们的职位由亲王的朋友占据。

没有要更改当地法规的企图，而通过更改法规本来可以使那些事件不可能重演。一切都保留老样子，一切都回到了拼拼凑凑、不得人心和半截子措施的原先的制度之下。

执政也没有试着利用这胜利时刻组织一个围绕在他周围的坚实的党派，也不想把忠诚的下层民众控制在强大的奥伦治党人的组织之中。许多已经受够了那种与商贩工匠亲近的试验的摄政者已转向了强大的保守派阵营，并愿意支持亲王。然而亲王不愿意接受那些曾公开与他为敌的人的支持，拒绝与他们在

任何方面合作。

那么爱国者党人又怎么样了呢?他们构成了对一个国家的正常生活最具危险性的群体———个永远不知足的阶层。他们中成千上万的人在激烈的党派争执的岁月中让自己越陷越深，终于觉得呆在国内再无快乐可言了。他们作为自愿的流放者离开了祖国，去了法国或比利时。连沿着边界的所有比利时的小城市都挤满了尼德兰移民，更不用提布鲁塞尔了。他们细细回味所遭受的苦痛，策划能使他们重新掌权的途径和手段。既然执政为了救自己愿意把外国势力拉入争端，他们为何就应该对所选择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式特别顾忌呢?事实上他们是无所顾忌的。他们让自己尽情地沐浴在流溢于法国和比利时的学说的影响之下。成千上万的尼德兰流放者迎接法国大革命就如同迎接新纪元的黎明。

当法国开始将自由的祝福带往欧洲其他国家的历程时，这些流放者争先恐后地加入了法国军队。从在共和国的爱国者党同伴那里，他们了解到“复位”所带来的对于一个国家极其必需的和平安宁是如何之少；从另一方面说，执政和其顾问的迟钝已将瞬间的热情变成了冷漠和持久的无所用心。

在第一年里，强大的普鲁士军队分别在最难对付的城市驻军，确实控制了先前的党派争执。但这些士兵不仅使国家付出巨额的钱款，而且他们的残暴行为，激起了民众要对亲王报复的欲望——民众认为亲王是所有这些麻烦的起因，他们认定他对促使国家处于外国的支配下的那些事件负直接责任。

复兴共和国商业贸易的企图遭到彻底的失败。在与英格兰的长期战争中，已经失去了太多的领土。采用更现代的做生意方式的对手已经占据了原先尼德兰商人的位置，想赶也赶不走了。

至于陆军和舰队都无所作为。绝望之中，共和国被迫回到

了与英格兰原先签订的和平条约，为了一旦需要，它可以受到来自英国海军方面的支援。与普鲁士的一个条约则带来了在陆地上获得军事帮助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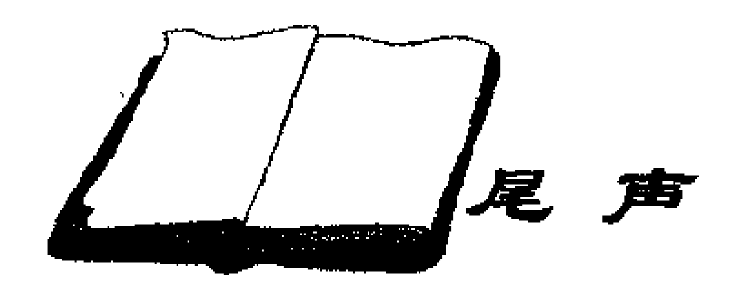
当局以含糊不清和杂乱无章的方式做了一些努力，想使共和国内部事务处于一个较好的基础上，却没有取得一点成绩。摄政者因为害怕刚刚发生的那些事件会再度重演，便义无返顾地摒弃了那些现代观念的一切表现形式。而那些现代观念此时正逐渐为全欧洲所普遍拥有。

所有那些无论在信仰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有所失的人此时联合到惟一的立场上，反对由那些曾获取一切的人宣传的新学说。不再有自由军团行军，爱国者党人也不再去他们的政治俱乐部讨论拯救国家。自由军团遭到取缔，俱乐部被迫关门。报纸不再向热切的民众作宣传。而那些民众先前相信他们的社论就如同相信一种千真万确的新福音。印刷铺关闭了，编辑更该住在敦刻尔克或布鲁塞尔，等候报复的那一天。没有一个人格突出的人能使民众聚集到他的周围，没有人指出方向，人们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无创造性的保守主义的国家，共和国的寿命已屈指可数。

1793 年 1 月 21 日，路易十六被斩首。2 月 1 日，法兰西共和国向荷兰执政宣战。人们拼命却是徒劳地试图加强这个国家的防守。3 月的内尔温登战役[①]暂时抑制了法国人的胜利进军。此时共和国似乎又在外国的干涉下获得拯救。但它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两年以后，1795 年的秋天，全能的基督乐得有个机会消除这个人间事物中最可悲的东西——一种已经衰老无用的制度。

① 内尔温登战役：内尔温登是比利时布拉班特省的小区。1793 年，法国军队在此被奥地利军队击败。



尾声

这是共和国招来外人解决其党派争端之后发生的事情。法国军队开到了海牙，执政乘一只可怜的小渔船逃走。他为失去国家感到难过，但他印象深得多的似乎还是乘坐气味难闻的小船跨越北海所遇到的麻烦。他安全到达英国港口，在那里我们可以对他说再见了。过了几年，他去了未遭波拿巴先生侵占的某个德国领地，并于 1806 年作为一个流亡者死于不伦瑞克。

至于共和国，它遭受了一场动乱。这样的动乱是它自公开弃绝其法定的君主，宣称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那个重大日子以来还没有经历过的。接下去的 20 年，这个国家由爱国者党人统治，却事事遵照巴黎的主人的意志和愿望。法国革命多样化的经历没有哪个阶段没在 1795 年和 1813 年间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过烙印。

当法国有一个雅各宾派政体时，共和国也有一个；当法国作为对极端革命化的情感的反应，产生较为保守的政府时，海

牙的当权者也迫使自己修正其政府模式，直到与他们南边伟大的邻居保持一致。

在法国因革命热情造成的每一个荒唐行为都可以在共和国找到相对应的内容。一切旧的东西都被废除，其价值遭到贬斥。国家被重新分割，政治体制被重组，沿用一个世纪的习惯被抛弃，引入革新的内容，直到每个人都在所进行的变革的迷宫中迷失方向。以往的分离主义已代之以从国外引进的一种新的集权制度，由于这种引进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所有的官方事务都陷入了停顿。一部部宪法来了又去了，直到绝大多数民众对犹如家常便饭的政治动乱深恶痛绝，他们才愿意接受任何一种稳定的政府，只要它能消除说变就变的局势，消除当时正努力要带来太平盛世的职业政客的假公济私。就法兰西共和国而言，除了要钱还是要钱，他们还要更多的钱。法兰西共和国不会白白给你带来“自由、博爱和平等”。

赶走执政和将巴达维亚人从奥伦治的奴役下解救出来这样的小事，却给共和国记上了数目为 100 万荷兰盾的欠账。这笔钱还必须付现款，最好是黄金。共和国在对方的要求下，还得负担 25000 法国士兵的吃穿，不是一年 25000 人，而是经常来的有 25000 人。这使那个时候凡生活必需品都要优先供应他们，让别国的人先拿走。这些法国来的先生们用流通券[①]支付自己的零杂费用。共和国收了好几百万这样的流通券，根本就不能兑换。

但这还只是开始。在共和国最终摆脱法兰西之前，已支付的税中，常规的有 1.2 亿荷兰盾，额外的有 3.39 亿荷兰盾。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说就是，共和国被抢走了最后一枚铜板。在

① 流通券：法国革命政府（1790—1795）以没收之土地作担保而发行的当货币使用的票据。

这许多年里，既没有商业贸易，也没有工业。英国人完全控制着海洋，而荷兰作为法兰西的从属国，被迫把英国当作敌人。英国人毁掉了尼德兰残存的最后一点贸易，那些仍有船在海上或在国外有股份的尼德兰商人大概损失了1.2亿荷兰盾。尼德兰的殖民地都落入英国人之手，不管从亚洲还是美洲都得不到一个便士的收入。

荷兰人从不喜欢军旅生活，但他们的新主人从不过问他们的好恶，给他们穿上法国军队的制服，将他们派到世界各地尽其所能为法国打仗。在拿破仑结束他的战争之前，整团的尼德兰士兵减员到只剩下两三个人。当和平再度来到这个国家时，整整一代年轻人实际上已被断送了。1813年，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国家垮了，民众绝望了，阿姆斯特丹城靠公共救济生存的人占了人口的一半。

详细述说各种宪法没什么用处。尼德兰历史的专家可以在尼德兰政治历史的手册中查到。只要以概括的方式提一提旧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发生的变化就足够了。

1795年，原先的国名被放弃了，换之以“巴达维亚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甚至能取悦最极端的雅各宾派的狂热分子。不幸的是它不能取悦波拿巴先生，当时这位先生经历了思想的变化，已转变为保守派。此后在1801年，第二部宪法正式施行，它是建立在较为保守的基础之上的，重新加入了许多年前人们乐意丢弃的东西，提供了爱国者党统治初尝胜果的岁月中缺乏的政治宽容因素。

1804年，拿破仑成了皇帝。现在他看不惯共和国了。平民政客从三级会议的会议中消失了，三级会议的成员又享有原先的“大人”、“阁下”的头衔了。突然间，宪法又要做第3次改动了，在一切之上设置了一位大议长。照巴黎的意思，大议长阁下应该是法国国王陛下的总督。第一位大议长[1]是非常

值得尊重的官员，他很爱自己的国家，但这人缺乏幽默感。一年以后他被打发回家，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成为“荷兰王国”的国王。借助于第4部宪法，他被寄希望于为他的哥哥——皇帝的利益统治富裕的尼德兰。但路易·拿破仑因没有这样做而获得不朽的荣誉。他认认真真想为他的新王国的利益行使统治权，而且并非没有做出成绩。4年间，他对他的哥哥进行某种“游击战”。他不能明确地违背来自巴黎的命令，但他尽其所能减轻法国的政策对他的国家所造成的苦难。1810年，他的花招被揭穿了。拿破仑以一点点事情为借口就解雇了他的弟弟，就像后者是个不称职的小公务员。当年的7月9日，莱茵河和马斯河河口沿岸诸省被划入大法兰西帝国的版图。

现在荷兰人在“外国学校”里学到了在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中所学不到的东西。他们被强行并入了一个国家。他们确实在不少年中丧失了独立，甚至不再使用自己的语言，但适当集权的政府的所有优点给他们以极其深刻的印象。现在他们清楚了，只要某一方拒绝服从全体的利益，把自己特定的利益看得比整个社会的利益更为神圣不可侵犯，从狭隘的利益出发，就做不成任何事。

很难想像有比拿破仑皇帝更严厉的主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他受命在朗伍德宅的周围栽培花朵，尽管后来那些具备他所有的恶却不具备他的善的渺小的当权者使他的工作半途而废，却仍然保留下了现代国家的基础，因为那是这位伟大的法国皇帝生前已经建立起来的。1815年，当主要的欧洲国家在维也纳召开会议，由先前的共和国和比利时组建尼德兰王国的时候，将无政府状态的共和国改变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初步工作

① 这位大议长叫希梅彭宁克，是前荷兰驻巴黎大使。1805年上任，次年不得不让位于路易·拿破仑。

已经完成。

然而代价是可怕的。既没有人也没有钱，个人的进取心也丧失殆尽，没有丝毫的公益精神。在哥萨克人和普鲁士人解放他们之前，只有几个家族和不多的一些人发动了从法国人的奴役中拯救尼德兰的革命。大多数人完全是淡漠的。尼德兰的生活变得完全沉溺于冥思苦想。荷兰人变得害怕生活，他们更喜欢引退到自己家里，在思考前辈的过去和自己灵魂的将来中为内心的痛苦寻找安慰。任何种类的变革都不受欢迎。他们对铁路抱着怀疑的态度，因为运河的航运已经满足了他们所有低层次的需要。保守固执的高墙将国家围绕起来，不让任何外来的影响进入。就这样几乎经历了两代人之后，才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改革。在冷清的街道重新挤满了有勇气接受生活的人们之前，已整整过去了 50 年。他们终于找回了生活，以平常的心态看待它，不再像先前国家陷入贫困之时自负的中产阶级那样故作庄重。

新荷兰的第一位国王也是最后一位执政的儿子。他想用完全落后于时代的方式来复兴国家的繁荣。他的热忱和良好的愿望并不能弥补他治国之才的缺乏。他失败了[①]，而他的继承者们被迫充当完全是立宪君主的角色。

摄政者想重获他们昔日的影响，但他们的日子已经到头了。除了点缀性的职位，他们不能起更大的作用了。除了少数人例外，他们都已变得贫困，要么被迫回去做他们的生意，要么在一些外省的城镇过着被人遗忘的生活。

至于爱国者党人，1815 年的成员与 20 年前的同类大相径庭。他们已遭受了惨痛的教训。他们曾想在一夜之间改变人的本性，此时他们已发现这是一个迟延缓慢的过程，必须以极端

① 指威廉一世后来因民众不满，被迫于 1840 年退位，出走柏林。

的谨慎和无限的耐心加以对待。

执政、摄政者和爱国者党人，所有这三个原有的党派，因为原先的省份和城市对他们怀有敌意，于是都在新的王国里消失了。

不论是祸是福，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公民，所有的人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从此以后，他们携起手来，共同踏上了拯救尼德兰民族之路。

荷兰共和国与欧美政局（1579—1795）大事年表

1579年 1月6日，尼德兰南方阿多瓦和海诺尔的叛乱贵族组成“阿拉斯同盟”。1月23日，北方诸省和南方一些城市结成“乌得勒支同盟”。

1581年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即“荷兰共和国”）成立，威廉·德·奥伦治（沉默者威廉）出任首任执政。

1584年 7月10日，威廉·德·奥伦治在代尔夫特城遇刺身亡。

1585年 西班牙攻陷南尼德兰的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派她的宠臣莱斯特伯爵率军援助尼德兰联省共和国。

1586年 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出任荷兰省大议长[1]。

1587年 2月8日，按照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签署的死

[1] 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任议长的时间可能要早些，房龙的年表上是1584年、1585年。这里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刑执行令，策划夺取英格兰王位的苏格兰女王玛丽被处决。同年，因为指挥无能，莱斯特伯爵被召回国。

1588 年 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舰队击溃，回航时又受风暴袭击，130 艘军舰仅余半数。

1597 年 6 月 20 日，荷兰航海家巴伦支去世。他曾三次到北冰洋探险，发现了斯匹茨卑尔根[①]。

1598 年 荷兰始在爪哇设立根据地。

1600 年 荷兰殖民者占领南美圭亚那一部分地区，后称“荷属圭亚那”。

1602 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同年，荷兰殖民者在南美圭亚那境内的埃塞奎博河河口建立殖民地。

1603 年 5 月，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苏格兰女王玛丽和达恩利勋爵的私生子即位，即詹姆斯一世，开始了斯图加特王朝对英国的统治。

1605 年 荷兰人从葡萄牙手中先后夺取安汶岛、帝多利岛和班达岛。同年，荷兰殖民者在西非黄金海岸建乌舍尔堡。

1609 年 荷兰和西班牙达成 12 年停战协定。同年，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得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订约作第三次航行，遇风暴改道寻觅西北航道，沿大西洋进人今北美哈得孙河 240 公里，到达今奥尔巴尼地方。

1614 年 荷兰建筑师亨德里克·德·凯泽设计的尼德兰第一座新教教堂——阿姆斯特丹南教堂（始建于1603年）建成。

1618 年 沉默者威廉的次子莫里斯成为奥伦治亲王。8 月

① 斯匹茨卑尔根：挪威岛群，位于北冰洋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

29日，莫里斯将奥尔登巴内费尔特逮捕入狱。

1619年 5月13日，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以颠覆国家的罪名在海牙被斩首。同年，安德里斯·德·维特出任荷兰省大议长。

1620年 荷兰与西班牙的战争重新爆发。荷兰西印度公司建立。同年10月16日，荷兰著名作曲家、管风琴家约翰·彼得宗·斯韦林克去世。

1621年 1月22日，安东尼·杜伊克出任荷兰省大议长。

1624年 荷兰人在北美奥尔巴尼建立第一个欧洲人的永久定居点。同年，荷兰人开始侵占台湾。

1625年 莫里斯亲王去世，他的弟弟弗里德里克·亨利继承其职位。荷兰人在北美建立名为“新阿姆斯特丹”的殖民区。同年，英王詹姆斯一世卒，查理一世即位。

1631年 4月12日，艾德里安·鲍尔出任荷兰省大议长。

1636年 7月3日，雅各布·凯茨出任荷兰省大议长。

1639年 荷兰海军上将马藤·特龙普在当斯港击溃奥坎多海军上将所率强大的西班牙舰队。此战役确立了荷兰第一海上强国的地位。

1643年 5月，路易十四继承父位，成为法国国王。

1645年 8月28日，荷兰著名政治家、法学家、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格劳秀斯去世。

1647年 荷兰执政弗里德里克·亨利去世，其子威廉二世即位。

1648年 《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缔约国（包括西班牙）确认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独立。荷兰人所谓“八十年战争”结束。

1649年 1月30日，英王查理一世以暴君、叛国者、杀人犯

和人民公敌被送上断头台处死。

1650 年 7月，荷兰奥伦治亲王威廉二世下令拘禁6名荷兰省三级会议主要成员，逼迫阿姆斯特丹就范。11月6日，威廉二世患天花去世。荷兰共和国进入第一个无执政时期（1650—1672）。

1651 年 9月27日，艾德里安·鲍尔出任荷兰省大议长。

1652 年 7月8日，英国对荷兰宣战。第一次英荷战争爆发。

1653 年 约翰·德·维特出任荷兰省大议长。同年夏天，英荷在特塞尔岛海面交战，荷兰战败，海军上将马藤·特龙普战死海上。

1654 年 荷兰签订对英格兰让步的《威斯敏斯特条约》。

1655 年 荷兰建筑师雅各布·凡·坎彭设计的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始建于1648年）建成，当时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

1657 年 英国议会通过新宪法，确认克伦威尔为世袭“护国公”。

1658 年 9月3日，克伦威尔卒。

1660 年 5月29日，查理二世回伦敦即王位，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1664 年 英国占领北美的荷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改名“纽约”。

1665 年 3月，英国对荷兰宣战。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

1666 年 科尔内利斯·特龙普出任荷兰海军总司令。同年，荷兰著名肖像画家弗兰斯·哈尔斯去世。

1667 年 德·勒伊特等率荷兰舰队，袭击停泊在泰晤士河和梅德韦河中毫无防备的英国舰队。这次奇袭震动伦敦。英、荷签订布雷达条约。荷兰大议长德·维特

颁布《永恒法令》，取消荷兰省的执政地位。同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进攻西班牙属尼德兰，威胁共和国的安全。

1668 年　5 月，英、荷、瑞典三国同盟迫使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签订《埃克斯－拉－夏佩尔和约》。

1669 年　10 月 8 日，荷兰伟大画家伦勃朗去世。

1670 年　德·维特颁布《协调条例》，禁止兼任共和国全境的陆军统帅和执政两个职务。

1672 年　4 月，法国路易十四突然对荷兰宣战，率军入侵联省共和国。荷兰统帅威廉·德·奥伦治下令开启阿姆斯特丹水闸，阻止法国进军。8 月 4 日，维特辞去大议长职务。卡斯帕·费奇尔出任荷兰省大议长。8 月 20 日，维特和他哥哥科纳利斯在海牙被暴乱群众刺杀。同年，奥伦治亲王威廉二世和英格兰查理一世的女儿玛丽之子威廉出任联省共和国军队统帅和执政。第三次英荷战争爆发，英国与法国联合作战。

1675 年　荷兰著名风俗画家约翰·弗美尔去世。

1676 年　4 月 29 日，荷兰海军上将德·勒伊特在地中海对法国人作战时受重伤后死亡。他曾在第三次英荷战争中多次击败占有优势的英法舰队。

1677 年　2 月 21 日，荷兰伟大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去世。同年，荷兰联合舰队在厄兰德击败瑞典人。

1679 年　2 月 5 日，荷兰诗人、戏剧家冯德尔去世。

1682 年　彼得大帝一世登上了俄国沙皇的宝座。

1687 年　3 月 28 日，荷兰著名外交家、学者和诗人康斯坦丁·惠更斯去世。

1689 年　英王詹姆斯二世逊位，由当时任尼德兰执政的威廉

继位，即英王威廉三世。6月20日，安东尼·海因修斯当选荷兰省大议长。荷兰进入第二个无执政时期。

1691年 科尔内利斯·特龙普授权统管共和国海军。同年5月病逝。

1695年 7月8日，荷兰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光的波动理论的创立者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去世。他是康斯坦丁·惠更斯之子。

1699年 11月，俄国、萨克森、丹麦三国结成反瑞典的“北方同盟”。

1700年 北方同盟与瑞典的北方战争爆发。

1701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荷兰加入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同盟。

1709年 6月26日—30日，俄沙皇彼得一世在波尔塔瓦战役中击溃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统率的军队。

1713年 4月12日，法、西、英、瑞和荷兰签订《乌得勒支和约》。

1715年 9月1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卒，年方5岁的路易十五即位。

1719年 荷兰加入英、法、奥三国签订的对付西班牙的同盟。

1720年 2月17日，西班牙与英、法、荷、奥四国联盟签订《海牙和约》，结束1718年开始的战争。9月12日，伊萨克·凡·胡恩比克出任荷兰省大议长。

1721年 9月10日，俄国和瑞典签订《尼什塔特和约》，宣告持续21年之久的北方战争结束。该和约以法律形式确认波罗的海及其沿岸地区归属俄国。

1723年 荷兰生物学家凡·列文虎克去世。他是有史以来最

早用透镜观察细菌和原生动物的人。他的细致观察和精确的解释导致了细菌学和原生动物学的建立。

1727 年　6 月，英王乔治一世（1714 至 1727 年在位）去世，乔治二世继位（1727—1760）。7 月 17 日，西蒙·凡·斯林格兰特出任荷兰省大议长。

1731 年　奥地利大公查理六世为换取荷兰等国承认玛丽亚·特蕾西娅的帝位继承权，被迫解散设在奥属尼德兰境内与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竞争的奥斯坦德公司。

1733 年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爆发。

1737 年　3 月 15 日，安东尼·凡·德·海姆出任荷兰省大议长。

1738 年　荷兰医学教授赫尔曼·布尔哈夫去世。人们公认他创立了新的医学教育体系。

1740 年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爆发。荷兰未能履行以往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派兵援助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西娅。同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卒，其子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继位。

1741 年　4 月 10 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马尔维茨战役中亲自挂帅，普军击败奥地利军队。

1742 年　6 月 11 日，奥地利与普鲁士签订《布雷斯劳协定》，结束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2 月 28 日，奥、普缔结《柏林和约》，将大部分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

1746 年　9 月 23 日，雅各布·吉勒斯出任荷兰省大议长。

1747 年　10 月 7 日，尼德兰弗里斯兰省奥伦治家族成员威廉·卡雷尔·亨德里克·弗里索成为所有 7 个省的世袭执政，即威廉四世。

1749 年 7 月 21 日，彼得·斯泰恩出任荷兰省大议长。

1751 年 尼德兰执政威廉四世去世。其妻安妮公主因儿子威廉五世未成年而取得摄政权。

1756 年 8 月，普军进攻萨克森导致七年战争爆发。11 月，英国著名政治家老威廉·皮特组阁（1761 年 10 月辞职），缔造了一个新的大英帝国。

1759 年 安妮公主卒。摄政权委托给布伦瑞克公爵。

1760 年 英王乔治二世去世，乔治三世继位（1760—1820）。

1762 年 7 月 9 日，俄国皇帝彼得三世被推翻，其妻即位，即叶卡捷琳娜二世。

1765 年 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即位（1765—1790）。

1772 年 11 月 28 日，彼得·凡·布里斯威克出任荷兰省大议长。

1773 年 荷兰历史学家约翰·瓦赫纳尔去世。他著有《尼德兰联省通史》，写到威廉四世去世。

1774 年 路易十六登上法国国王宝座，他是法国大革命前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代君王。

1775 年 4 月 19 日，北美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民兵对英军进行武装反抗，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5 月 15 日，在第二届大陆会议上，乔治·华盛顿被推举为大陆军总司令。

1776 年 1 月 9 日，潘恩发表名为《常识》的小册子，呼吁北美独立。7 月 4 日，大陆会议通过杰斐逊等人起草的《独立宣言》，正式宣告美利坚合众国成立。

1778 年 2 月 6 日，美国与法国签订秘密条约。3 月，法国向英国宣战。9 月，荷兰和美国的特使在艾克斯莱班秘密会谈，起草两国商业条约的草案。

1779年　3月11日，俄国发表有名的海上武装中立宣言，宣布中立国船只有权在海上用武力抵御交战国的侵犯，中立国有权和交战国自由贸易。10月4日，美国海军将官约翰·保罗·琼斯船长在击败英国舰队后到达尼德兰的特塞尔岛。

1780年　9月，美国派往荷兰的特使亨利·劳伦斯在海上被英国人抓获。荷美秘密条约泄密。同年，荷兰加入武装中立同盟。12月20日，英国向荷兰宣战。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

1781年　英国占领荷兰在西、东印度群岛的属地，并对荷兰海岸严密封锁。

1782年　3月24日，迫于荷兰舆论的压力，长期担任威廉五世顾问的布伦瑞克公爵无奈离开海牙。

1783年　秋，奥地利军队进攻并占领斯海尔德河河口的尼德兰防御工事。同年，英国著名政治家小威廉·皮特出任首相(1801年2月辞职)。

1784年　3月，鹿特丹发生骚乱，造成人员伤亡。同年，英荷缔结巴黎和约。

1785年　1月，奥地利军队威胁要进犯荷兰共和国。9月15日，尼德兰执政威廉五世被迫离开海牙。

1786年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其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尼德兰执政之妻威廉明娜的兄弟)继位。9月22日，荷兰省三级会议通过决议，剥夺威廉五世共和国陆军和海军总司令的职务。

1787年　6月28日，威廉五世的妻子前往海牙，但未被获准进入荷兰境内。9月13日，普鲁士军队入侵共和国。5天之内，威廉五世得以“复位”。12月6日，劳伦斯·皮埃特尔出任荷兰省大议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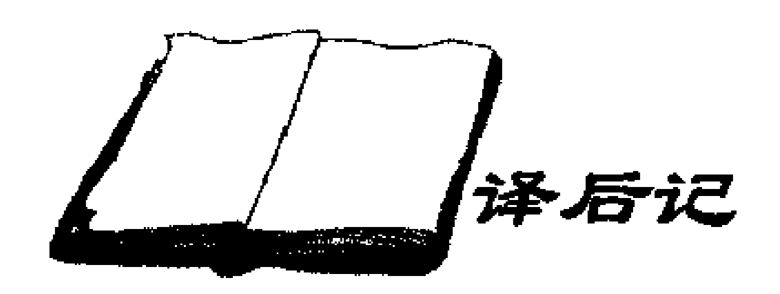
1789 年 法国大革命爆发。

1792 年 12 月 11 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交付国民公会审判。

1793 年 1 月 21 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英国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2 月 1 日，法国对英、荷宣战。

1794 年 4 月 19 日，英、荷与普鲁士签订《海牙条约》，规定普派兵赴比利时对法作战，英、荷向普提供经济援助。7 月 27 日，法国发生“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等人被捕。7 月 28 日，罗伯斯庇尔未经审判即被处死。12 月，法国军队跨过布拉班特河进攻荷兰。

1795 年 1 月 16 日，法军占领乌得勒支城；18 日，威廉五世逃往英国；法国在占领的荷兰领土上建立附庸国巴达维亚共和国。5 月 17 日，荷兰与法国签订《海牙协定》，被迫把泽兰省的弗兰德尔、文洛和马斯特里赫特割让给法国。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解散。



译后记

也算是与房龙有缘。译完他的《伦勃朗的人生苦旅》，又接手他的《荷兰共和国的衰亡》，虽说两部书的形式有所不同（前一部是传记小说，后一部是通俗历史著作），从写作时间上说相距有16或17个年头（一部是深沉老到的中年时期的作品，另一部则是初出茅庐的成名之作），但两部书从历史线索上说却恰好彼此衔接，因此也可以说是在房龙先生的撮合下，我与16至18世纪的荷兰共和国结下了缘分。《伦勃朗的人生苦旅》将一位艺术家的命运放在着力渲染的荷兰共和国17世纪“黄金时期”的社会图景之中，而《荷兰共和国的衰亡》描述的18世纪，则是人们常说的“一个悠闲自在地躺在前世纪赢得的桂冠上的时期，一个停滞衰落的时期，一个充满虚伪价值观念、腐败、弄虚作假的时期”。这两本书致使我将近两年在荷兰共和国的历史中难以自拔。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于1911年在慕尼黑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美国，在多所大学讲授历史。由于他出生于鹿

特丹，虽说后来移民美国，但一生都对荷兰的历史极为关注。1913年，他的《荷兰共和国的衰亡》问世，他从此开始了写作生涯。自1913至1940年的27年中，他写了27部书，几乎是每年一部。与荷兰历史密切相关的除了本书和《伦勃朗的人生苦旅》，房龙还写有荷兰在美洲的殖民总督彼得·斯特伊弗桑特的传记（1928）。尽管房龙的作品国内已翻译出版了十余部，有的还有多种译本，但他的处女作《荷兰共和国的衰亡》还是第一次译成中文。房龙的这本书是以他有关荷兰共和国历史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妻子伊莱扎·鲍迪奇在写作过程中给了他很大帮助。《荷兰共和国的衰亡》问世后，其销路虽远不如《人类的故事》、《人类的家园》等，却受到书评界的好评。该书于1924年再版，房龙为新的版本绘制了插图。

读完《荷兰共和国的衰亡》一书，不禁要感叹一声：原来历史书还有这么一种写法！你感觉自己是在细细地品味历史，你仿佛嗅到了距今久远的岁月特有的气息，甚至沉浸其中，为异国他乡的古人动情伤怀。你好像正面对一个巨型舞台，不仅有那个时代的大人物登场——他们正要作出影响局势的决策，而且还有庸庸碌碌的一般小人物，他们也在表达各自怀有的心思；你会看到各形各色的人在局势的变迁中如何反应、如何消遣……这一幕幕场景并不是作者虚构的，从原书所附的大量标明资料出处的注释中可以看到，书中的世态万象都有根有据，都是从留存下来的历史文献中提取出来的。原先零零碎碎的片段，经房龙出神入化且轻松幽默的手笔，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生动的历史画面。正是以《荷兰共和国的衰亡》为开端，房龙创立了一种风格，并在他为数众多的非虚构作品中贯穿始终。这种写法曾令中国现代作家曹聚仁感慨万千——“历史对于他（房龙）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此外，房龙笔法明快、简洁的自绘插画也给其作品增色不少。

对于读完《荷兰共和国的衰亡》一书还觉得不解渴、想更多了解荷兰共和国情况的读者，房龙乐于推荐[荷]约翰·瓦赫纳尔的《尼德兰联省通史》、[美]莫特利的《荷兰共和国的兴起》和[荷]比斯肯·许埃特的《伦勃朗的国家》。但上述著作还未见有中文译本问世。译者向读者推荐的两本书是：[法]莫里斯·布罗尔的《荷兰史》（郑克鲁、金志平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3月第1版）和房龙的传记小说《伦勃朗的人生苦旅》（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由于影响18世纪荷兰共和国国内局势的外部因素错综复杂，译者在原书所附"尼德兰执政与荷兰大议长任期年表"的基础上，编写了"荷兰共和国与欧美政局（1579—1795）大事年表"，以便读者在阅读时对照、参考。

为了避免"荷兰共和国"这个国名与作为该共和国7省之一的"荷兰省"相混，本书译文在提及国名时较多使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或"尼德兰"。对于这部涉及内容广泛的历史著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尽量遵循多查资料、小心求证的原则，但手头有关荷兰共和国和18世纪欧洲局势的历史资料数量毕竟有限，错译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见谅。

朱子仪

2000年1月于北京二里庄